

目 录

(一)

- 一、法国的承认是中国的一大胜利..... 1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 1964 年 1 月 27 日声明
- 二、阿尔及利亚政府的性质..... 3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 1964 年 2 月 17 日声明
- 三、美国军队从越南滚出去！..... 6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 1964 年 3 月 16 日声明
- 四、巴西的反革命政变..... 8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 1964 年 4 月 5 日声明
- 五、皮埃尔·弗朗克：托洛茨基主义出没于莫斯科和北京.....15
- 六、皮埃尔·弗朗克：苏斯洛夫指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险.....21
- 七、皮埃尔·弗朗克：致北京和莫斯科的备忘录：请改正接受黄金的地址.....26
- 八、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讨论世界局势.....29
——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会议公报
- 九、巴西政变的教训.....31
——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告拉丁美洲革命人士书
- 十、中苏冲突中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幽灵.....35
——皮埃尔·弗朗克答记者问
- 十一、论锡兰平等社会党所面临的局势.....41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 1964 年 6 月 22 日通过的决议

十二、錫兰平等社会党（革命派）临时委员会書記埃德蒙·薩馬拉科迪的声明	45
十三、皮埃尔·弗朗克：无用的革命领导	46
十四、第四国际联合書記处支持錫兰平等社会党（革命派）非常代表大会的信	55
十五、不准干涉北越！	59
——第四国际联合書記处 1964 年 8 月 5 日宣言	
十六、皮埃尔·弗朗克：“我没有忘記……”（关于多列士和陶里亚蒂）	61
十七、皮埃尔·弗朗克：陶里亚蒂的“遺囑”	66
十八、莫斯科为什么公布陶里亚蒂的“遺囑”？	78
十九、为了刚果的自由战士们	81
——第四国际联合書記处 1964 年 9 月 22 日声明	
二〇、庆祝第一国际一百周年	84
——第四国际联合書記处 1964 年 9 月 25 日宣言	
二一、中国和原子彈	87
二二、赫魯曉夫的下台	90
——第四国际联合書記处 1964 年 10 月 19 日声明	
二三、为什么不接受中国的建議？	105
二四、皮埃尔·弗朗克：克里姆林宫在反对北京的运动中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挫折	107
二五、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1964 年竞选綱領	110
二六、緩和和紧张	126
——《第四国际》社論	
二七、杰尔曼：評中苏冲突	131
二八、赫魯曉夫被撵下台	165
——美国《战斗者》周刊社論	

二九、中国的原子弹.....	167
——美国《战斗者》周刊社論	
三〇、中国对核談判的呼声.....	169
——美国《战斗者》周刊社論	
三一、中国攻击了苏联的不平等現象.....	171
——美国《战斗者》周刊文章	
三二、玻利維亞托洛茨基主义者宣告不信任軍人議會.....	175
——第四国际玻利維亞支部、革命工人党政治委員 会 1964 年 11 月声明	
三三、玻利維亞起义者使托洛茨基主义者获得了自由.....	178
三四、“圣約瑟”和索腊索腊的战斗.....	180
三五、索腊索腊的战斗.....	181

(二)

三六、第四国际(以波薩达斯为首的托派)第七次世界代 表大会公报.....	185
三七、波薩达斯：第四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开幕 詞.....	191
三八、第四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五一节宣言.....	239
三九、波薩达斯：資本主义的危机和工人国家的經濟情 况.....	258
四〇、波薩达斯：巴西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	275
四一、波薩达斯：巴西反革命反动派的胜利和“和平共 处”的破产.....	289
四二、波薩达斯：美帝国主义对越南北方罪惡的軍事鎮 压和美洲国家組織反对古巴的決議.....	311

四三、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关于錫兰平等社会党及其参加资产阶级政府问题的决议	330
四四、波薩达斯：苏斯洛夫的报告——苏联官僚机构的反革命綱領(摘要)	335
四五、赫魯曉夫下台反映工人国家面向政治革命前进了 一步	347
四六、波薩达斯：中苏分歧的发展	349
四七、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全体會議向古巴同志致敬	359
四八、第四国际英国支部革命工人党(托洛茨基主义者)致“击败修正主义爭取共产党人团结委员会”的公开信	366
四九、第四国际英国支部革命工人党(托洛茨基主义者)政治局向亲华派呼吁	379

(三)

五〇、关于錫兰背叛事件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 1964 年 7 月 5 日声明	382
五一、关于尼日利亚政府逮捕工人領袖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 1964 年 12 月 6 日声明	385
五二、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第六次年会公报 (1964 年 3 月 14—16 日)	387
五三、从修正主义到机会主义 ——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第六次年会关于国际问题的决议	398
五四、树立一个领导以击败官僚主义分子 ——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第六次年会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	409

五五、苏联的一次新危机.....	415
——英国《新聞通訊》周刊編輯部文章	
五六、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全国代表會議公報（1964 年11月28—29日）.....	417
五七、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全国代表會議宣言.....	420
五八、工党政府的作用.....	423
——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全国代表會議1964年11月 28日決議	

(一)

一、法国的承认是中国的 一大胜利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 1964 年
1 月 27 日声明

第四国际提请大家注意，不管戴高乐的动机如何，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法国政府的外交承认一事实具有伟大的意义。

法国的这一外交步骤证明了中国的日益强大的地位，而它的强大乃是由于它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之后日益发展的结果。法国在目前情况下重新恢复和中国的关系，实际是彻底打破了帝国主义自 1950 年以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外交封锁。在目前中国和其他工人国家之间的贸易已降低到具有危险性的程度的时刻，这种突破无疑将会是逐步扩大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经济关系的一个起点。

中国的外交胜利也会间接地有助于进一步驳斥，在中苏分歧的问题上，到处流传的所谓中国的领导人“好战”的诽谤言论。

它同时也证明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革命已取得了进步。

可是这一巨大的外交胜利，这种首先是对美帝国主义取得的胜利，并不能看作是大西洋集团的力量已遭到削弱的表现，也不能因此认为帝国主义分子从此将放弃他们反对殖民地革命的各种阴谋活动，特别在那些殖民地革命正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发展

的地区更是如此。

而这一胜利决不表明，目的在于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现状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具有任何正确性。对于工人、农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群众运动来说，特别是对殖民地国家中的群众运动来说，中国在外交舞台上的巨大胜利将会有力地刺激目的在于在世界范围内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

这一外交胜利决不表明应放松世界各地反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活动，更不能放松对戴高乐政府的斗争活动，虽然它最后决定给中国以外交承认。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5期）

二、阿尔及利亚政府的性质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 1964 年

2 月 17 日声明

在最近一段时期内，阿尔及利亚新政权的方针已经表明：它是早期的共产国际认为可能出现的、第四国际过渡时期纲领中把它叫做工人国家可能的先驱的那种“工农政府”。

这种政府的特征是把资产阶级排除于政治权力之外，把武装力量从资产阶级转移到人民群众的手里，并在所有制关系方面开始采取影响深远的措施。这种方针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建立起一个工人国家；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前途是没有保证的。在共产国际的初期，人们认为非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得不到这种结果的。然而经验已经证明，由于资本主义的极端腐朽以及今天世界上苏联和一系列工人国家的存在所造成的影响，上述的结论在殖民地世界必须加以修正。

阿尔及利亚从过去接受下来的是一个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民族解放阵线领导方面的危机在 1962 年 7 月 1 日到了严重关头，其结果是在几天之后成立了一个由阿巴斯和本·贝拉在其中代表新殖民主义和人民革命这两个敌对派系的事实上的联合政府。这两派在联合政府内的斗争归结为本·贝拉派力量的加强、1963 年 3 月的一些法令的宣布以及赫德尔、阿巴斯和其他资产阶级领袖的被顺利地逐出政府，虽然有些右派分子还留在政府之中。这些变化标志着联合政府的结束和工农政府的建立。

象这种工农政府所特有的情况一样，阿尔及利亚政府没有遵

循一个始終一貫的方針。但是，它的总的方向一直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旧的殖民結構、反对新殖民主义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它坚决地反击了包括武装反革命在内的所謂新资产阶级各阶层的先发制人的行动。它曾一再声明它的主观目的是建設社会主义。与此同时，它的意識由于它缺乏馬克思主义訓練和背景而受到限制。

現在还有待于解答的問題是这个政府能否建立一个工人国家。这方面的运动是很明显的，并且同古巴的模型有很多相似之处。已經实行了以实际上把最重要的耕地区域收归国有为特征的深刻的土地改革。在工业部門，由于确立了公有的和受国家控制的体系，旧的所有制关系已經遭到突破。还需要着手进行的，是沒收主要的油田和矿区、銀行和保險公司，成立一个对外貿易的垄断組織，开始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货币、金融和商业活动采取有效的对策。

阿尔及利亚最令人振奋的迹象是：(1)在对外政策上，同古巴、南斯拉夫、中国、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从而有可能从这些方面获得切实的援助；(2)政府对安哥拉和南非这样一些地区的殖民地革命的发展抱有积极的态度；(3)在阿尔及利亚內部，建立了“自管”的制度。“自管”及其已經表現出来的对发揚工农民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提供了規定工人国家制度的最有希望的机会。

总之，象我們多次指出的那样，阿尔及利亚已經进入了一个具有高度过渡性质的不断革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切基本的經濟、社会和政治結構正在受到打击并取得新的形式。这个过程肯定是要繼續下去的。如果議事日程上的一个主要問題——根据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綱領組織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能够順利地获得解决，上述的过程将順当和有力得多。

阿尔及利亚工农政府的出现，是在那里发生的革命过程深化的一个具体明证。这不仅对于阿尔及利亚和北非洲，而且对于整个非洲大陆和全世界其余的部分来说，都是有历史性的意义的。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8期)

三、美国军队从越南滚出去！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 1964 年

3 月 16 日声明

近几周来，美国的帝国主义统治者威胁要把他们在南越不宣而战的战争扩大到北越。在这时候，他们稍微压低了一些关于要轰炸河内的好战声明的调子。自从麦克纳马拉回到华盛顿之后，说要增派袭击队去蹂躏北越和增加数量本已巨大的武器和美元输出，以维持腐朽的西贡政权。

危险在于，美国对越南的干涉随时可以“升级”。这样几乎可以肯定会依次把中国和苏联卷进去。

在南越的基本事实是，美帝国主义及在那里维持着的反动傀儡面临着—场军事上的崩溃。在同一地区，十年前法帝国主义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而现在，更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将使在为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而起来斗争的人民遭受到更为惊人的大灾难。

殖民地革命显示了多么大的力量啊！越南人民仿效中国、古巴和阿尔及利亚的榜样，勇敢地、几乎是赤手空拳地夺得了运来镇压他们的大量武器以反击他们的所谓征服者。这种勇敢精神将永远留在人类的记忆中。

这个教训将以上千倍的力量传遍殖民地世界其他地区，发动千百万的人民起来反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上建立新的帝国主义联合的阴谋。

而在美国国内，大多数人，特别在工人、农民及少数民族中，将

回想起朝鮮的教訓，並將更堅決表示反對把美國軍隊投入外國領土上的瘋狂的軍事冒險政策。正是這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形成了迫使美軍回國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現在他們將勇敢地要求美國軍隊從越南撤出去。

全世界將在此種情況下提出最現實的三個口號支持他們：

不許干涉越南！讓越南人民決定自己的命運！美國軍隊從越南滾出去！

（譯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12期）

四、巴西的反革命政变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 1964 年

4 月 5 日声明

4 月 1 日推翻古拉特总统的政权的政变，是巴西反动的军事阶层勾结那些代表封建地主、大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的巴西代理人或小伙伴的政治人物发动的。这是勉强想要暂时遏制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剧烈的社会动荡已经提到巴西日程上来的革命而作出的拼命挣扎的一部分。纽约和华盛顿如释重负地和兴高采烈地为这次政变欢呼，巴西在推翻古拉特政府后，在圣保罗州的反动州长德巴鲁斯提出的“我们一定要‘追捕’共产党人”这一口号下开始了全面的政治迫害——这些都充分地证明了这次改变的反动性。

古拉特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最“开明的”部分。这一部分的人认识到：不能长期地违反历史潮流而维持巴西的陈旧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从巴西资产阶级的利益着眼，最妥善的办法是对工农群众让步，因为工农群众希望使他们的国家现代化，并且越来越意识到俄国、中国和古巴革命的类型是达到这个目标的现实主义道路。

但是，巴西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同那些具有封建思想的地主和直接与美国有商业往来的集团关系密切，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它不能发挥应有的革命主动精神来摆脱地主的控制和击退外国帝国主义者。因此古拉特的纲领大部分变成了蛊惑性的宣传。当他确实开始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时，它们仅限于接收了余剩的七家私营炼油厂，没收了巴西的铁路、公路和航路两旁的狭长条荒地，并

答应在城市里控制房租。

从不断增加的群众的压力来看，这是一些很小的让步。事实上，最近几个月农民开始在东北部分夺取土地，失业群众已在巴西利亚发生暴动，并且不消说，还经常有工人们施加压力，要求提高工资以赶上去年猛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物价。“争取进步联盟”的纲领曾向拉丁美洲的寡头政治提出过建议，如果它们希望避免被古巴式的革命所推翻，它们最低限度需要实行哪些自我改革，而古拉特的措施是远不足以适应“争取进步联盟”的纲领的要求的。

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但是，就巴西的危机四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局势来说，2月17日宣布的这种向左的微弱转变以及接着于3月18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一次巨大的示威运动，就足以起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古拉特的让步原意不过是想取得和保持他对群众的领导权，但群众却趋向于把古拉特的让步看作新时代的信号。群众行动一经开始，就势必按照它自己的逻辑从古拉特的头上横扫而过。这一点的明显标志是里约热内卢的海员、海军陆战队士兵和工会会员的基本队伍之间开始亲密地团结起来（所谓3月25—26日的“叛乱”）。

巴西的反动分子强烈地感觉到其中的含义。古拉特在土改方面所作的姿态引起州长德巴鲁斯的不满，他扬言要用圣保罗州的警察力量来阻挠联邦当局没收土地的措施。全国的大地主威胁说，只要农民前进一步，自行占据土地，就要枪毙他们。在武装部队里，抱有法西斯情绪分子开始了狂热的煽动活动。大约有七百名海军上级军官，其中包括十五名海军上将，在海军俱乐部开会，下半旗来抗议对“东部叛变者”的特赦。这些人中间有“反共同盟”

主席卡洛斯·貝納·波托和海軍上將西爾維奧·赫克，后者是在夸德罗斯于1961年辞职时反对副总统古拉特就职的夸德罗斯內閣的閣員之一。

在華盛頓的決策者給予暗示之后，陰謀分子行動起來了。3月31日，米納斯吉拉斯州州長馬加萊斯·平托反叛聯邦政府。該州首府貝洛奧里藏特的一位軍隊的發言人說：“古拉特總統管不到這里的事情了。如果總統派一個將軍到這里來進行干預，我們就要在飛機場上把他抓起來。”接着他們大批逮捕工會領袖，奪取報館、電台和電視台。巴西二十二個州中有十幾個州長參加了反革命叛亂。原來忠于政府的軍官不是投降便是被捕。伯南布哥州的社会黨州長阿拉斯，像全國其他由選舉產生的官吏一樣被逮捕了。

勞工領袖們曾經揚言要發動一次全國性的總罷工，如果受到警告的陰謀見諸事實的話。這種威脅證明是一句空話，因為事前對於這個不測的事件毫無準備。於是大多數的勞工領袖被投入獄中。陰謀實現得這麼迅速和這麼容易，連那些策劃陰謀的人自己也感到驚奇。

華盛頓點了頭

我們必須着重指出，這場陰謀中的一着關鍵性的、或許是決定性的棋子是8月17日由華盛頓方面下的，那時，負責美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約翰遜總統的拉丁美洲主要決策者托馬斯·曼在“美國供職拉丁美洲高級官員”的集會上發表了談話。那次談話的全文沒有公布，但8月20日的《紐約時報》在頭版的一篇文章中報道了它的主要內容。那是要在政策上實行重大轉變的宣告。在新的政策下，“美國將不再想法懲罰推翻民主制度的秘密軍事集團……”

據說托馬斯·曼曾經作出結論：“美國在對外政策上不應當再

去努力区别独裁和民主制度。”为了把他的論点說得更明白些，曼据說讲过这样的話，即他很难在政治上区别墨西哥总统阿道夫·洛佩茲·馬特奧斯、玻利維亞总统維克托·帕茲·艾斯坦索罗和巴拉圭总统艾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納。

“新”政策的目标規定为“帮助該地区的經济发展，保护美国在那里的九十亿美元的投资，不干涉那个地带各共和国的内政，反对共产主义”。

这并不意味着基本政策有什么改变，因为美国的基本政策一向就是保护美国銀行家和垄断資本家的投资并支持反动政权的。它只是表明了：国务院将不再受“爭取进步联盟”立场所具有的外交細节的約束，而那个立場却要求在一个“民主”政权遭到軍事阶层顛覆时表示遺憾，要求过一段时期才承认成功的政变策动者，即使他們是得到中央情报局的帮助的。

从广义上說，那篇談話是要宣告美帝国主义将取消那种企图利用墨西哥的卡德納斯和阿根廷的庇隆所作的那样的大量让步来拯救資本主义的变通办法。除了对让步抱有偏見而外，华尔街非常担心这方面的任何步骤只会为古巴式的革命敞开大門。古拉特的“开明的”方針是不能接受的。西半球的統治者按他們自己的方式贊揚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論的正确性。

在巴西事件中，托馬斯·曼的3月17日的談話說明了華盛頓是贊成將軍們、海軍上將們和反动州長們所醞釀的陰謀的。这一点由下列的事实完全得到了证实：約翰遜总统在4月2日——据报古拉特已經逃亡国外的那一天——打了一个电报給陰謀分子指定为总统的替身馬济利，致以“最热烈的祝願”；国务卿腊斯克在4月3日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将同推翻了合法的古拉特政府而建立的巴西現政权“十分密切地进行合作”。

約翰遜之所以关心巴西阴谋分子的成功，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在 11 月的竞选总统运动中，他指望利用巴西的反革命政变作为他个人通过托马斯·曼而在拉丁美洲采取的新的“反共”政策的巨大胜利，证明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把巴西从共产主义的威胁下拯救了出来”，使它不致步中国和古巴的后尘。腊斯克在 4 月 3 日对记者的谈话中暗示说，现在巴西可以同国务院一起来对卡斯特罗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了。

除此以外，美帝国主义显然还抱有这种希望，即巴西这个拉丁美洲人口最多、幅员最大的国家的变动，将不仅防止这一权力中心陷入革命，而且将为整个半球树立一个新的榜样，甚至可能鼓励智利的军事阶层在左派有希望获胜的 9 月 4 日大选之前采取相类似的手段。

不会带来稳定的局面

然而，巴西的反革命政变寿命是不会长的。它只会推迟革命并火上加油。当然，新政权将仿效它的无数先例的典型榜样。它将力求采用镇压手段来稳定局面。几百名工会会员已被逮捕，稍稍沾一点自由主义的边的派系也遭到清洗。这些步骤的目的不仅在于扼杀反对派或潜在的反对派，而且在于预为“束紧裤带的”措施准备条件，借以牺牲群众的生活水平来寻求暂时解决巴西在经济上濒于破产的问题的办法。

可是，这种措施未必能够解决巴西所面临的那种规模的經濟問題。这些問題基本上是从巴西和帝国主义中心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产生的，并且意味着国际资本主义结构的帝国主义部分和殖民地部分不同水平之间臭名远扬的“不断扩大的间距”。巴西的异常不平衡的經濟、过时的农业方式、不适当的投資結構、劇烈的通貨

膨脹和無法消滅的失業現象，都是由此而產生它們的特殊的病毒的。在今天的世界上，這種根深蒂固的災害不能靠資本主義的道路加以糾正；資本主義的道路已經被帝國主義的需要以及擔心民族資本家會對封建殘余採取有力措施這種恐懼心理所堵塞。唯一的出路是用一種同工人國家的計劃經濟相聯系的計劃經濟來迅速提高生產力。這條基本的真理已經是整個殖民地世界的群眾所能逐漸理解的了。

認為“束緊褲帶的”措施能使巴西趨於穩定，這種可憐的幻想只會陷入另一個窘境。巴西的生活水平已經是最低的了。在這個國家的某些地區，特別是東北部分，生活水平象在印度一樣低得不能再低，若干年來危險的緊張氣氛不斷有所滋長，在農民中間尤其如此。在另一方面存在着闊綽的財富和顯眼的特權的情況下，要設法進一步壓低衣食住等基本項目的消費，很快就會證明是絕對不能忍受的。變本加厲地採取恐怖手段、即企圖仿照納粹式的解決辦法，這看來在巴西很難推行，雖然某些分子顯然打算試着走這條道路。即使他們僥倖成功，最後的結果也勢必類似古巴的巴蒂斯塔和中國的蔣介石所獲得的下場，不過在目前世界的條件下，其過程還會大大縮短。巴西的前途仍然是嚴重的不穩定。

領 導 問 題

巴西工人階級的主要領導人已經證明完全不足以適應形勢的要求。當反革命的陰謀活動幾乎公開地显露時，他們似乎不能理解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受到這樣一種致命政策的欺騙，這種政策依靠和支持民族資產階級的所謂“進步”派，而不是依靠他們自己的能力和群眾的力量，也不敢果斷地採取獨立的政治行動。由於信任古拉特，他們使得奸險的前共產黨員、現為瓜納巴拉

州反动州长的拉瑟达能够轻而易举地领导推翻联邦政府的阴谋活动。在几十年間，由于共产党采用了同巴西和美国资本家阶级“和平共处”的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巴西的工人们象别国的工人们一样，已经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目前，共产党在党员人数和影响上已大为削弱，并已分裂为亲赫鲁晓夫和亲北京两个派系。后一派连同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其他流派，有希望帮助提供一个核心来建立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和群众性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只有在它避免重复哪怕是贴着新的（在某些场合还并不那么新的）标签的旧斯大林主义错误的情况下，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最大的希望是：这些斗士将继续仔细地研究古巴革命的榜样，特别是7月26日起义的领导人在执掌政权以后对于建立一个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重要性的认识。象巴西这种阶级关系十分发达、十分冷酷和十分复杂的国家里，这是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正如当前的事件又一次证明的那样。

当住在巴西主要城市的为数众多的悲惨的贫民窟里的工人和失业群众还没有作出最新成绩时，他们在难得的机会和严重的反革命危险面前缺乏现今领导人的情况可能会把政治轴心暂时移到乡间。巴西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彻底的土地改革。农民们主要是在儒利奥的领导下已经不断地组织起来，他们的期望无疑地曾经受到古拉特在2月和3月间计划的步骤的鼓励。他们也许会开始自己来处理种种问题。从地主们盲目地拒绝作任何让步这一点来看，这可能标志着最后将波及城市的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的开端。

由此可见，固然反革命少数似乎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巴西的政权，他们的孤注一掷的行径可能只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长期遏制的社会剧变的序幕。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15期）

五、托洛茨基主义出沒于 莫斯科和北京

皮埃尔·弗朗克

新的爭論显然已使中苏分歧达到最后决裂的地步。在几个月期間，闡述北京观点的文章一直沒有得到答复，之后，莫斯科展开了它自己的攻势，发表了两个月以前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这事发生在中国报刊刊载了一篇题目叫《无产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文章不久以后。〔全文見3月31日新华社电訊。〕

最后的决裂已經迫在眉睫这一点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来，即苏斯洛夫的报告要求召开各国共产党的會議，其目的不是要謀求和解，而是要保证进行一場“严重的并从各方面看来长期的斗争”。从今以后，諸如法国共产党的首脑們这样一些莫斯科领导人的最忠实的拥护者，将为这个建議辯解，譴責任何企图規避采取明确立場而保持一种騎牆观望的調和态度的共产党。

毫無疑問，赫魯曉夫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判断，即中国人不会承认任何妥协的解决办法，过去几个月的局面的繼續将使中国人能够占据上风，并将鼓励所有那些想要利用这个分歧来显示某种程度的独立性的人們。所以他决定提出召开會議的問題，以便糾集尽量大的力量来反对这样一种危險，这种危險“正在滋长，因为我們所对付的是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他們掌握着龐大的国家机器和意識形态活动的手段，所以危險更加严重。”（苏斯洛夫語）

各国共产党对于这个要求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建議的反应如何？答案将是頗饶兴趣的。在1960年的会议上，八十一个党派遣了代表。赫魯曉夫能否召开一次出席的党势必大为减少但又不致使他丢脸的会议呢？直到目前为止，意大利共产党对这种会议还抱保留态度，虽然陶里亚蒂在政治上是贊成赫魯曉夫而反对毛泽东的。官方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的“团结”經受着严重的考驗。

* * *

組織方面的这种发展伴有由上述两个文件所证明的政治攻击的加剧。在这篇文章中，我們决定抛开双方按十足斯大林主义的方式互相用以攻訐的形容詞不談，也不提双方对于对方的观点的粗暴歪曲。旧的斯大林派表明它在这两个陣营里还有它的代表。但是，我們必須承认，在赫魯曉夫的布达佩斯旅行期間，他在这方面证明是最有希望的学生。因此，在关于核战争的問題上，他把一系列愚蠢的主张說成是毛泽东的，并且断定“只有地道的白痴”才会抱有这种看法。

每一方都必然拚命地打击对方的弱点。苏联的领导人从中国人的观点中得出南斯拉夫是个“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极端的結論；当然，中国人是贊揚斯大林的。另一方面，中国人举出許多极好的例子来证明走議會和和平道路以取得政权的政策的破产和愚蠢。（伊拉克、印度、法国、阿尔及利亚、西班牙……）

但是，在官僚們所写的这些文件中，尽管实际的情况和分歧是以完全顛倒黑白的方式說明的，某些重要的問題却仍旧可以看得很清楚。

例如，苏斯洛夫的报告开头就強調指出当前冲突中的主要分歧。他說，1960年宣言的基本命題說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意即工人国家的經濟——是全世界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因

素。他指責中國人在寫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在今天看來是直接打擊帝國主義的最重要的力量”時修正了上述這個命題。他認為，這樣講就意味着“中國的理論家使它〔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只起一種使其支持和推進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的‘支撐點’的作用”。蘇斯洛夫接着說，這樣講就意味着他們不懂得和平經濟競賽的意義。

他還指責中國人這樣地歪曲了蘇聯的觀點：“蘇共領導歪曲了問題的實質，力圖證明經濟競賽將意味着‘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根本用不着進行鬥爭，用不着起來革命，只要安安靜靜地等待着，等到蘇聯的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就行了’。”^①

如果對蘇聯領導人的想法有什麼“歪曲”的話，那只是就他們並不完全敵視群眾鬥爭這一點來說是如此。然而，他們不把群眾鬥爭看作奪取政權的革命鬥爭，而只是並且主要是看作對資本主義國家施加壓力以便把它們納入蘇聯外交勢力範圍的手段——看作蘇聯和其他工人國家的經濟建設已經變成的歷史動力的支撐點。

毫無疑問，對於全世界的共產黨人、特別是受到資本主義制度的禍害折磨的那些國家的共產黨人所要考慮的問題來說，這是由中蘇衝突引起的頭等重要的分歧。他們的主要戰略目標應當是推翻他們的資本主義制度呢，還是應當在本國實現資產階級的政治合作并使這種合作同克里姆林宮達成外交上的諒解呢？歷史的動力是否不再是群眾的革命鬥爭而是某些工人國家的經濟建設呢？這是托洛茨基主義者已經竭盡所能地（雖然他們所擁有的力量和

^① 引自《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中間略有刪節。——譯者

手段相当有限) 強調了多年的重要爭点。中国人目前正在以一种据我們看来已在赫魯曉夫主义的领导人中間引起恐慌的力量把这个爭点提出来。

我們也多次說过，中国人并不是通过純粹意識形态的手段得出这种看法的。他們得出这种看法，是通过他們自身处境的前因后果，通过对苏联政策的亲身試驗，在某种程度上还自己花了代价。由于他們对这个問題采取实用主义的方法在政治上逐步求得发展，由于国家的貧穷使他們感到压力很大，中国人在实行有关这方面的路綫时并不总是始終一貫的。另一方面，赫魯曉夫主义的领导集团在实行它力图使其凌駕于群众运动之上的和平經濟竞赛的方针时却是前后絕對一致的。

在这个問題上，中国人的攻击证明很有力量，足以迫使苏联的领导采取守势。在布达佩斯，赫魯曉夫不得不申辯：“我們并不反对世界革命，不过……”不过，不过，我們不能越俎代庖。仿佛有人那样地提出过这个問題似的。

按照中国人的看法，苏联还没有消灭階級，資本主义的危險仍然存在，在資本主义的压力下，修正主义乘机兴起——象大战結束以来在一些共产党內所看到的那样，首先是白劳德，然后是铁托，现在是赫魯曉夫。

按照苏联的看法，中国是一个非无产階級阶层占压倒优势的国家，中共的领导人“肯定缺乏馬克思列宁主义气质，不能坚决地抗拒小資产階級精神的压力”。

換句話說，在一方看来，这是国内資本主义压力的問題；在另一方看来，这是小資产階級压力的問題。

但是，当它們在其观点的社会根源中找到这种分歧时，它們都

互責对方犯有同样的政治罪行——托洛茨基主义。在这场論战中，被埋葬了多次的托洛茨基主义又出現了。

在中国人看来，托洛茨基主义不过是改良主义的、孟什維克的概念——他們对这个問題的种种說法还不止是概括性的。苏斯洛夫在中国人的观点中找到的托洛茨基主义不仅在于他們的“派別活动的”方法，不仅在于他們指責苏联领导人蜕化变质的論点，而且在于他們对殖民地革命的看法，在于他們对武装革命斗争的想法，在于“和平共处”的問題^①。

如果认为敌对的双方之所以互相指責帶有托洛茨基主义的色彩，是由于象某些資產阶级的或社会民主党的評論員所設想的那样，托洛茨基主义是各国共产党之間采用的最猛烈的形容詞，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在好多年的期間，那些官僚們宁可保持緘默而不願提起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者。

不难证明，苏联和中国的主要思想家正在密切注意托洛茨基主义的出版物，虽然这些出版物的銷路一般說来远不如官方共产党的报刊。

他們并不引证其他政治流派的言論。这是頗有道理的。他們知道——并非根据經過考虑的推断，而是出于一种自保的本能——他們队伍中的这个危机并不会造成資本主义的或社会民主党的威胁。既然多年来全世界的力量对比一直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些领导人在他們自己的組織的成員中所感到的危险，就只有托洛茨基主义了。

当中国人听到談起斯大林的罪恶时，当苏联的领导人听到談起不断革命論时，任何一方都觉得那种話听来象是会随着目前全

^① 如果要把苏斯洛夫的报告中对真正托洛茨基主义观点的歪曲一一指出，那就需要写几篇文章才能把問題說清楚。

世界巨大的革命浪潮而重新出現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回声。

他們都害怕了。并且他們同时竭力互相恐吓：“当心你們究竟是为誰卖力的！”这就是他們彼此提醒的話。苏联领导人暴露出，他們对于这一点甚至比中国领导人更加注意、更加担心。

不論每一方采取什么行动，他們都无法遏阻历史的进程。好多年来，官僚机构一直支配着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日益强大的力量正在突破这种控制。双方的官僚机构互相指責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冒险主义等等。他們用资产階級或小资产階級的压力来解释当前的危机。他們表明他們不会确实认清自己，不会看出自己是什么货色——官僚主义者；并且也不会看出他們的日子是不长的了。

共产主义运动目前的危机首先是这些官僚主义领导集团的危机，是共产主义革新的紧要关头。所以这些领导集团将不再一帆风顺，同时它們将按自己的方式促成托洛茨基主义的最后胜利。

（譯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16期）

六、苏斯洛夫指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险

皮埃尔·弗朗克

現今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談将产生什么結果？如果說像哥穆尔卡这样的人物同意赫魯曉夫的总方針（和平共处、和平和議会道路，等等），他們也不一定同意他过早地召开共产党的国际会談。在目前情况下，这种会談只会保证分裂。赫魯曉夫需要巩固他那一伙人的队伍，遏制中国人的进展，所以在他多半已經沒有希望同中国人和解时，他需要举行这种会談。但是，哥穆尔卡、陶里亚蒂……各人为自己打算，并不希望召开一次終于使分裂确定下来的会談。在莫斯科，哥穆尔卡公开地表示贊成召开新的共产党会談，如果它“有助于緩和我們今天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政治分歧”。

赫魯曉夫能够把哥穆尔卡爭取过来同意他的主张嗎？还是他将贊成实行和解呢？这是在冲突的現阶段最值得注意的問題之一。

如果說赫魯曉夫陣营里的这些討論显然不是在公共廣場上举行，那么中苏冲突中的另一件事情却是在大声喧嚷使每一个人都能听到的情况下被提出来的。这就是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指責。双方不断地就这个題目互相攻击，使它成为在这場冲突中意义越来越重大的因素。其所以进行这种指責，并非因为“托洛茨基

主义”象有些一知半解的評述者所想象的那樣是各國共產黨之間可能採用的最嚴重、最惡毒的形容詞。當然，在這次辯論中不乏形容詞和誹謗的字眼，但關於“托洛茨基主義”的指責却由於一些根本並不神秘的原因而被提到政治的高度，雖然那些原因在雙方有所不同，甚至其深度也不一樣。

在中國人的最近那篇文章〔見3月31日的新華社電訊〕里，關於這方面的論證頂多只占二十五行左右，並且可以歸結為這樣一個三段論法：托洛茨基主義同拋棄革命的第二國際一樣，屬於修正主義一類。赫魯曉夫也是一個拋棄革命的修正主義者。因此，赫魯曉夫應當給自己戴上“托洛茨基主義”的帽子。

編寫這些文件的，不是第二流的官僚，而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他們並不是不學無術的人，至少在重大問題上是如此。即使我們無法直接查明事實的真相，原文的本身卻證明他們是注意托洛茨基主義的出版物的。他們知道得很清楚：托洛茨基組織了紅軍；他在二十年代和以後的若干年內對斯大林進行了鬥爭，因為這個權力的篡奪者死抱住後來赫魯曉夫不過繼續加以推行的“和平共處”政策不放，等等。換句話說，中國領導人本身即使在知識上有某些不足之處，卻故意歪曲事實，顛倒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所扮演的角色。人們可以感到：他們多少有點擔心他們目前的處境，他們希望自己在提到斯大林的時候會獲得一種保護色。

在蘇聯方面，赫魯曉夫未必能使人產生希望，想從他那里獲得深刻的政治解釋。他的思想的鄙俗無論在形式上或內容上都是昭然若揭的。你不是贊成穿一條沒有窟窿的褲子而大吃其边上放着一盤白米飯的匈牙利式的土豆燒牛肉，便是想要一條可以抽緊的褲帶和另一場戰爭。選擇是很明顯的：誰不願意吃一份出色的土豆燒牛肉，特別是一份地道地用辣椒粉烹調的土豆燒牛肉呢？〔“這

个厨师会烧出一道辣菜来，”列宁曾經这样談起过斯大林。]

可是苏斯洛夫的报告是一篇严肃认真的东西，許多事情都是以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在讲话时所能表现出来的那种坦率的态度来談起的。

当然，报告里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和中国人的观点有很多故意歪曲的地方。例如，說什么他們不考虑具体的力量对比而要求立刻到处发动革命，說什么中国人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点是純粹和简单地重复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既非战争又非和平”这一口号，說什么中国人为了迎合“革命战争”的策略而放弃和平经济建设，等等。

但是在一系列问题上，苏斯洛夫的論点是站得住脚的。

“也許有人认为中国人的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成为‘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带’这一理論是独创的吧？不是的。这几乎是一字不易地重复了当前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論題之一。我們可以在所謂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決議中讀到：‘由于1919—1923年和1943—1948年的两次較大的革命浪潮，以及1934—1937年的較小的一次革命浪潮的連續失敗，世界革命的主要中心有一个时期轉移到殖民地国家中去。’^①应当从这里寻找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的来源。”

苏斯洛夫指責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論。他說，关于这个问题的斗争曾經具有“历史性的意义”，現在“中国领导人事实上硬要我們来辯論同样的問題”。中国人的关于“有墮落为资产阶级的危险”的論題，重复了托洛茨基主义者关于热月政变派的說

^① 引文摘自去年〔1963年〕6月召开的第四国际重新統一代表大会的重要文件之一。这个文件連同其他原文見《第四国际》杂志1963年10—12月号（第17期）以及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刊物《国际社会主义評論》1963年秋季号。

法①。

在苏斯洛夫看来，事情很明显：

“中共领导人的理論見解和政治見解大体上有很多地方重复了早就被国际革命运动所駁斥的托洛茨基主义。”

苏斯洛夫认为，在某些重要問題上，中国人为处境所迫，显然开始采用了托洛茨基主义观点的一种代替物；他认为中国人对这一点也是同样看得很清楚的。于是他用揭发的措辞发表意見說：

“中国领导人力图使人相信，他們沒有注意这一切。他們或許是这样考虑的：‘今天的托洛茨基主义是个不大出名的流派，只要使他們的思想变成“中国人的”看法就能从中得到好处。’但归根結蒂，真相总是要暴露出来的！中国领导人很想隱瞞他們的思想来源；但他們无法假装不知道他們的見解是同昨天和今天的托洛茨基派的見解相一致的。”

这些話表明了托洛茨基主义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頗有势力的克里姆林宮的主子們中間所引起的恐慌。莫斯科比北京更害怕托洛茨基主义。这部分地是由于他們更清楚地了解它的实质，但主要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尽管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作了許多让步，苏联领导人却感到一个渴望自由和无产階級民主的社会正在給予日益严重的威胁。

苏斯洛夫在直接对中国人講話的时候，实质上是告訴他們：你們这些可怜的傻瓜！你們以为自己是在干些什么？你們想要拿你們从托洛茨基派那里得来的思想同我們交鋒。你們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你們自以为十分聪明，认为既然今天的托洛茨基主义是个弱小的流派，你們滿可以蒙混过关，只要用中国漆把一切涂盖起来就

① 托洛茨基主义者說的是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而不是象中国领导人所說的墮落为资产階級。在这个情况下，这种謊言頗能說明問題。

行了。你們甚至认为把这些思想归功于斯大林是一个巧妙的策略。可是，真相总是要暴露出来的，誰也不会始終受到欺騙。你們想使斯大林复活是办不到的，但你們的行动将有利于“昨天和今天的托洛茨基派”。各国的官僚們团结起来，反对现在还活着的托洛茨基主义！

苏斯洛夫这个官僚把托洛茨基主义的东山再起解释为主要是中国人的拙劣的策略所致。接着，为了贯彻他所担当的意識形态方面的工作，他又用中国的农民性质来解释中国人的“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的邏輯自有其莫测高深之处——农民产生了低估农民的思想流派……一場冲突把官僚們分裂开来了，在这场冲突中，他們暴露出自己的无能，不懂得为什么他們完全不理会彼此的意見，为什么托洛茨基主义又开始使他們日夜不安。

这场冲突将继续恶化，因为它是由全世界的革命高涨所促成和推动的，而这一在現时代使革命馬克思主义恢复光輝的革命高涨，就是托洛茨基主义。

（譯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17期）

七、致北京和莫斯科的备忘录： 請改正接受黃金的地址

皮埃尔·弗朗克

北京的《人民日报》在4月27日强烈地暗示，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一直在接济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社論沒有指名提到赫鲁晓夫。因为它不可能从照顾赫鲁晓夫的感情出发，其所以沒有指名道姓的原因还是个謎。同时，从赫鲁晓夫沒有机会在中国人的任何法院中获胜这一点来看，这也不可能是由于害怕訴訟的緣故。也許，当《人民日报》实现其提供“证据”的諾言的时候，这个问题可以得到澄清。

关于赫鲁晓夫偷偷地資助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这一指責，是同一天的《人民日报》所发表的对于苏斯洛夫报告的长篇評論的一部分。苏斯洛夫报告中的一个主要論点，是譴責中国领导人正在玩弄托洛茨基派的那一套。〔參看4月17日和4月24日两期的《世界展望》。〕

《人民日报》关于赫鲁晓夫和托洛茨基派作了如下的說明：“我們願意提醒一下：过去拥护过托洛茨基的反动主张，因为犯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錯誤而作过檢討的，是确有其人的。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同托洛茨基唱一个調子，发动反斯大林的狂热运动，使处于絕境中的各国托洛茨基分子大为囂张起来的，是确有其人的。現在到处勾結和收买托洛茨基分子进行破坏革命的卑鄙勾当的，也是确有其人的。我們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公布有关材料。”

这个指責同去年11月《約克郡郵報》和《費加羅報》刊載的暗示英國的托洛茨基派不是從莫斯科而是從北京領取黃金的材料形成理所當然的對照！

有一位比埃爾·貝特朗在11月19日的《費加羅報》上寫道：“不管實際的情況怎樣，一切跡象使人更加相信，共產黨領導人多少有些感到不安的這種滲透的努力已經把海峽對面的各種托洛茨基派團體當作工具，他們幾個月來之所以能夠恢復活動，如果不是由於獲得來歷不明的財政援助而部分地有了依靠，是很難解釋的。”

為了說得更明確一些，貝特朗先生引證了《約克郡郵報》的話來說：“至少在英國共產黨人的圈子里，據《約克郡郵報》的看法，他們相信中國目前正在不遺余力地——包括財政方面——想要建立一個服從北京的新的共產國際。”〔參閱《世界展望》，11月29日，第19頁。〕

這種暗示北京和莫斯科雙方都資助托洛茨基運動的說法，當然引起了托洛茨基主義世界組織的創始人之一、第四國際司庫皮埃爾·弗朗克的注意。

當皮埃爾·弗朗克還在追查人們認為正在流進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中國人民幣時，他在《世界報》上又看到財政援助實際上是蘇聯的盧布以及北京準備提供證據的報道。眼看有這麼多現款可以到手，第四國際的司庫不能不怦然心動。他坐到他的舊的輕便打字機跟前，打出了下面這封信寄給《世界報》編輯：

“編輯：

“在你們的4月28日那天的報紙上，你們刊載了北京《人民日報》發表的特別宣布下述事項的一篇文章的摘要：

“‘……現在到處勾結和收買托洛茨基分子進行破壞革命的卑

鄙勾当的，是确有其人的〔看来指的是赫魯曉夫〕。我們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公布有关的材料。’

“为了希望莫斯科和北京都能听到我的要求，如果你們把这封信刊登出来，我一定非常感激。

“作为第四国际的司庫，我可以說明我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地收到莫斯科的一文錢，我的組織长年累月地处于財政困难的境地。因此我不得不問一下——請原諒我的这种措辞——‘錢在什么地方？’我請北京立刻发表它所掌握的任何证据，并且也請莫斯科指出那些錢是寄給誰的。

“如果我能得到你們的准許，我还想补充一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战前受人譴責，說是拿了希特勒和东条的錢；几个月以前，英国報紙宣称北京正在把巨額款項寄給托洛茨基主义者。可是我根本没有收到过这样的錢。因此，是否有必要提醒他們，我們是一个做着革命者能够尽可能毫不隱瞞地做出的任何事情的运动；我在巴黎达波基尔路二十一号有一个非常朴实的办公处；那些政府在其他方面相当聪明，可是居然总是通过靠不住的中間人把錢送給它們似乎打算要接济的那些人，这真是不可思議？

“預先向你們道謝。

你們的誠懇的

皮埃尔·弗朗克”

（譯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19期）

八、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討論 世界局勢

——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會議公报

由 1963 年重新統一代表大会选出的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64 年]5 月底在瑞士举行了一次全体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二十四位委員和候补委員以及四位观察員。

皮埃尔·弗朗克同志作了关于第四国际在重新統一代表大会以来的种种活动的报告。巴布洛同志作了补充报告。弗朗克的报告以十五票对四票被通过。

利維奧·麦丹同志作了总的政治报告并分析了世界局勢，他的这篇发言将在《第四国际》的下一期上刊出，并以各种語文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其他刊物上发表。

这个报告以后接着进行了一場生动活泼的討論。主要的問題包括由美国自动化的发展所引起的日益增多的社会和經濟矛盾；在若干工人国家中官僚阶层、工人的先鋒队和追求社会民主主义的知識分子之間明显的紧张关系；非洲革命的新高涨，特别是安哥拉斗争的最近发展所提出的問題；中苏分歧的最新发展和錫兰的目前形勢。

关于后面这个問題，委员会委員討論了为建立工农政府的新步驟提供有利机会的錫兰的政府危机。会上作了关于执政党（即錫兰自由党）向錫兰平等社会党（即第四国际錫兰支部）提出的实行联合的建議的报告。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員一致反对任何促使錫

兰平等社会党充当资产阶级俘虏的联合。委员们认为，那种联合实际上意味着锡兰平等社会党将同现政府的破产和社会事业的缩减发生瓜葛，而如果资本主义的体制不受到破坏，社会事业的缩减是摆脱目前财政危机的唯一出路。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锡兰平等社会党提出反建议，即建议掀起一个有力的政治运动，争取在一个预示将同帝国主义和锡兰的资本主义决裂的社会主义纲领的基础上组织左翼联合阵线政府。

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政治报告的总路线。

厄内斯特·杰尔曼同志作了关于巴西军事政变以后拉丁美洲形势的报告。这引起了关于政变的原因、政变的责任和应当吸取的教训的一场讨论。发言的人特别强调它对古巴革命和智利的群众运动所产生的危险。

会上决定就巴西事变的意义向拉丁美洲的一切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其他革命人士发出呼吁。

在会议期间，全体悼念了在5月6日逝世的阿尔弗雷德·罗斯默。虽然罗斯默不是第四国际的成员，他协助创立了这个运动，深受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尊敬。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23期）

九、巴西政变的教訓

——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 告拉丁美洲革命人士书

巴西的工人阶级刚遭受了一次严重的失败。当然，这次失败不会长期没有转机。反动势力没有稳定巴西局势的任何可能。目前当权的“猩猩派”〔军事阶层的反动官吏〕消灭不了任何一个爆炸的因素。几百万无地的农民仍旧在东北地区挨饥受饿；农业工人群众还仍然是大庄园主的农奴；被吸引到大城市里去的失业者还住在可怕的贫民窟里；统治阶级中间继续实行资本逃遁；野马脱韁般的通货膨胀每况愈下；帝国主义对这个国家的主要资源的控制仍然象以前一样牢固。因此，所有这些客观因素仍然会在未来阶段引起新的群众斗争的浪潮。

但是，这些考察并不打算说明这次失败是不那么真实或严重的。一万五千名工人阶级和反帝的斗士已被关进监狱。工会和农民协会已被摧残。“猩猩派”所实行的恐怖手段，更加糟糕的是一次预料中的失败所造成的震动和惊惶，已使群众垂头丧气，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让敌人操了主动权。

巴西的失败对国际上的影响也是同样严重的。篡夺的政权已经同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它正在对拉丁美洲其余各国的政府施加沉重的压力，要它们走这条道路。它正在支持委内瑞拉的统治者——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的种种努力，想以“制裁”古巴在拉丁美洲的“颠覆阴谋”的形式对古巴发动进攻。它跃跃欲试地想率

領一支拉丁美洲寡头政治的“神圣十字軍”来对付古巴的“共产主义威胁”。

因此，巴西的事件继危地馬拉、多米尼加共和国、阿根廷和厄瓜多尔的事件之后证明了：美帝国主义断然要推翻拉丁美洲的任何政权，甚至信奉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权也不例外，只要那个政权同革命的古巴继续保持正常的关系；它不但打算横施恐怖手段，而且在它恶狠狠地想要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时候，甚至打算把世界推到核屠杀的边缘，因为卡斯特罗在美帝国主义视为禁脔的大陆上敢于蔑视美帝国主义。

这些事件是对各国人民的一种警告。但是，特别是昨天还抱着极大的希望密切注视巴西反帝反资本主义的力量高涨的拉丁美洲的各国人民，即这个广阔大陆的工人和贫苦农民群众，必须想想这些力量怎么会让自己如此容易地被一小撮反动将军所击退和打败。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包含着美洲革命的战略和战术的基本问题，并构成所有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可以从巴西失败中吸取的主要教训。

“猩猩派”的政权之所以能够如此容易地建立起来，是因为巴西群众在有关走“和平的议会道路”以摧毁亲帝国主义的寡头政权的可能性问题上被那些包括巴西的共产党在内的所谓“进步”政党弄得迷失方向。他们在古拉特的为了“结构改革”而进行坚决斗争的“决心”面前感到迷惘。他们对于古拉特的“抵抗反动势力进攻”的意志和能力缺乏正确的了解。

巴西的事件又一次证明了，虽然“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在一定限度内动员群众迫使寡头政治和帝国主义作出让步，它却不会充分地动员这些群众来粉碎国家的基本结构、反动军队和私有制。在不得不就这种动员或向寡头政治投降这两条道路作出选择时，

“民族資產階級”宁可走投降的道路。继夸德罗斯和瓦加斯之后，同古拉特打交道所取得的經驗在这方面是頗有教益的。这证明了：群众只能信任自己，不能信任別人；他們只应当依靠他們自己的力量来战胜寡头政治、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只有由一个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所領導的他們自己的斗争才能把反对反动势力的战斗进行到底。

巴西的事件又一次证明了，拉丁美洲的一切正規军队是反动透頂的。当巴西的军队中最初出現解体的迹象时，当起初是軍士，然后是海軍陆战队士兵不服从命令时，反动势力就立刻准备发动一次政变。那时各工人政党的責任是立即准备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以便不致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对付反动势力。拉丁美洲的大会战将由武力来决定勝負。这个結論已經彻底粉碎了赫魯曉夫关于“和平道路”的挖空心思的捏造，拉丁美洲的一切革命派必須強調这个結論。

有些人并没有从当前的事件中学到什么东西。在上次总统选举时，巴西的共产党同將軍們以及象德巴魯斯这种在反动阴谋中起显著作用的資產階級政客勾勾搭搭。德巴魯斯已經在为下一次的选举編导一出新的选举鬧剧了。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人士必須从巴西的事件得出結論，認識到“立宪斗争”本身并不能够指引一条出路，大多数国家所需要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道路、“起义的道路”、“游击战争的道路”。

在不让群众运动屈从于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拒絕走“和平的”和“立宪的”道路，認識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的同时，拉丁美洲的革命派必須懂得：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将象古巴革命一样，是一种不断的革命、一种連續的革命；除非領導无产阶级和貧苦农民取得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成立一个工人国家，从而象第二哈瓦那

宣言所宣告的那样保证把反帝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农民就不能获得土地，国家就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

一年以前，巴西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普列斯特斯宣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道路不适用于巴西。”群众所遭受的失败是这个破了产的路线的可悲注释。它从反面教导拉丁美洲的革命派，使他们认识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道路、而且只有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道路是在拉丁美洲走向胜利的道路。

第四国际向一切革命人士、一切共产党人、一切社会党人、一切坚决的反帝革命者发出呼吁，请求他们组成一个强大的反帝和反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从旺盛的团结一致的精神中吸取鼓舞力量，共同参加一个坚决采取革命道路的庞大的战斗阵线，而这个革命道路是特别应当以一种在地理和物质条件许可下建立游击队伍的办法为基础的。

这样，并且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象在巴西所遭到的那种失败，才会弥补巴西的失败给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才会通过在拉丁美洲本身开辟广大的第二战线这一办法减轻古巴革命所受的压力，才会使美帝国主义受到新的和重要的挫败，才会在西半球赢得社会主义的新胜利。

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23期）

十、中苏冲突中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幽灵

——皮埃尔·弗朗克答記者問

〔作为第四国际的正式代表，皮埃尔·弗朗克出席了錫兰平等社会党的6月6—7日的會議，在会上他支持左派，反对机会主义的右派领导人提出的参加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建議。在他逗留錫兰的期間，报界探詢他对各种問題的看法。下面的訪問記发表在錫兰銷路最广的刊物之一《星期日观察家》周报的6月14日一期上，所用的标题是《使赫魯曉夫先生感到煩惱的幽灵……》。〕

* * *

問：弗朗克先生，当前中苏意識形态爭論的一个方面引起我們在錫兰的这些人非常濃厚的兴趣，正如我相信它也使你作为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发生极濃厚的兴趣一样。我当然指的是互責托洛茨基主义这件事。双方都互相譴責犯有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甚或同托洛茨基主义者合作的罪名。

你无疑地了解到，这些爭吵曾經一再提起錫兰。这使我們在錫兰的这些人产生一种“卷入”这场爭論的感觉，但确实令人发生兴趣的是双方都把托洛茨基主义当作互相打击的大棒。

这仿佛象是有一个幽灵、即托洛茨基主义幽灵正在使共产主义运动感到不安……

你是否同意这个看法呢？

答：是的，它确使許多人大惑不解。可是我們先从錫兰的情

况談起。

在錫兰这里，你知道你們是把正常的程序顛倒过来了。托洛茨基主义最初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派別組織，后来成了一个独立的运动。可是在这里，第一个馬克思主义政党、即平等社会党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而共产主义者是从其中分裂出去的一个集团。

至于說到爭論，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即一个拥有六七亿人口而另一个是世界第二工业大国这两大强国，居然互相譴責被这个“小小的对手”托洛茨基主义所腐蝕，那确实是頗饒兴趣的，因为，多年以前当他們埋葬了托洛茨基和俄国具有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的任何著名人物的时候，苏联认为它早就把托洛茨基主义埋葬掉了。

然而，我应当首先談一談爭論的本身。它不象有些人所設想的那样是一种为了爭論而作的爭論。参加爭論的也不是半瓶醋或單純的知識分子。他們是被卷入世界政治并关心全球事务的两大强国的严肃认真的負責领导人。

所以这是一场非常认真的爭論。

問：是的，可是托洛茨基主义怎么会牽連进去的呢？

答：你知道，双方都看到彼此的論点中包含着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或托洛茨基主义的傾向，于是他們吃驚了，真正吓坏了。托洛茨基的幽灵正在使苏联和中国都感到不安。

苏联看到中国关于不断的殖民地革命的观点中包含这种思想，因为中国的这个观点虽然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論并不一样，却同它非常相近。

同时，中国人批評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的議會道路，批評和平共处，认为那是解除階級斗争的武装的一种方法，因此苏联人也疑心他們受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

另一方面，赫魯曉夫对斯大林的指責充分证明了托洛茨基派

之揭露斯大林政权的镇压性质是有道理的，而中国人则对这种指责非常敏感。

問：可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这种异乎寻常的神经过敏呢？

答：苏联的整个官僚系统（在中国，官僚系统带有一点家长式）是以权力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为基础的。

认为赫鲁晓夫或毛的思想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是可以怀疑和詰难的，认为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共产党、一个马克思主义运动甚或一个国家可以独立思考，认为他们的言论可以象莫斯科或北京一样正确——这种想法突然侵入了这个系统的基础。

莫斯科和北京不能允许这种思想滋长和蔓延开来。

問：由此看来，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是任何教义或“教派”势所难免的对异端思想的恐惧呢？

答：是的，但这是对于所害怕的体系的一种挑战……

問：可是，这整个过程难道不是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谴责斯大林的演说时发动的吗？

答：不错。可是我们在这里碰到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赫鲁晓夫谴责了斯大林，但他继承了并且经营着同一个体系，尽管他已经撤消了比较严酷的镇压机关。他的方法也许不同，但那个体系在其根本的性质方面是完全一样的。

拿破仑第三实行自由化，目的在于保全而不是摧毁帝国，赫鲁晓夫象拿破仑第三一样实行了自由化，其目的是为了保护那个体系。

問：保护它不受什么东西的挑战呢？

答：那确实是个有趣的问题。你知道，苏联的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简单地說，物质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已经在较高的教育和文化水平方面体现出来，特别是年轻的有思想的

人們以及知識階層正在開始自由思考，提出問題。

那是一種變化。

另一種變化是：當革命的俄國受敵人包圍並遭到各方面的威脅時這個年輕國家的第一代人所懷有的那種“變態的恐懼心理”已經逐漸消失了。特別是在戰後，當世界的均勢發生變化時，那種變態的恐懼心理很快就煙消雲散了，許多思想都自由地在蘇聯流傳着。

還有一種變化是蘇聯經濟中從重工業到消費品的轉變。在第一個方面，官僚主義和技術主義決定了一切；但在經濟領域中，由於現今強調消費品的生產，就不得不讓普通人起一種比較重要的作用。

問：可否請你說一說這些變化的性質？

答：我想說蘇聯社會在思想方面正在發生激蕩，但我要着重指出一件事情。

誰也不在詬難經濟結構。誰也不在要求發展資本主義思想，象若干時候以前波蘭和東德所表現出來的那樣。

可是所有的人，無論是作家、科學家、藝術家、經濟學家或者大學生，都要求有自由思考的權利。我們在第四國際聽到這些事情——秘密團體和非法集會、傳單和印刷品。

問：你能否舉一些具體的例子呢？

答：哦，你當然知道新作家的情形。可是還有其他許多人。

有一位十分著名的電影導演曾在一次會上發言，其中有一句話是：“我希望得到在黨中央委員會召開會議以前而不是在此以後進行思考的權利！”

我們知道俄國一所主要的大學里的某一個青年哲學家的“學派”正在提出“新的”思想。

他們所关心的是自由的概念。

目前，他們对現今流行的思想只是含蓄地抱着批判的态度。但是你知道那是一个开端，并且那是赫魯曉夫所面临的自相矛盾的現象。

你不能开始实行自由化而又在自由化的过程发展到危險阶段时加以遏制。你不能把思想当作自来水龙头一样随时开放和关闭。赫魯曉夫关于斯大林的报告鼓励了作家們以比較自由的态度进行写作，但他現今却在批評他們写得太自由了。这是进退两难的处境。

問：作为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你对这一切有什么感想？

答：哦，对于这场实际上牵涉到象战争与和平、殖民地革命等等这样一些基本問題的爭論，我們感到很高兴。

至于說到苏联国内的变化，新知識阶层的一个口号是“回到列宁”，而他們所提出的一項要求是：公布 1920—1925 年以来俄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會議記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其作用已被苏联官僚集团所歪曲和中伤的托洛茨基将在全世界的面前充分得到昭雪。

問：可是，这场爭論是旧的爭論、即最初由左派反对派发动的爭論的恢复嗎？

答：是的，不过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这里，所牵涉到的是几个国家，并且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已經把国家政权、群众宣传和联络等包括在內。不要低估国家政权。斯大林所遭遇的第一个真正的威胁来自南斯拉夫，因为南斯拉夫是一个国家，并且拥有一个国家包括在国际上自由地宣传共思想的能力在內的一切力量。

問：你是否认为中苏爭論起初是民族主义的？我的意思是說，是否起源于彼此冲突的民族利益？

答：开头的时候也許是那样，但现在这场爭論已經帶有国际的性质了。

苏联从国际上进行考虑；中国人也是如此，并且他們正开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較大的作用。

我承认：中国可能相信苏联要想同美国做交易，并且认为中国本身也許会成为那种交易的一部分。

可是爭論已經超出这些范围了。

問：最后再請教一个問題。俄国人指責中国人利用肤色和种族。你觉得这个指責有道理嗎？

答：完全沒有道理。这是苏联的誹謗，我們这些托洛茨基主义者对这种方法是并不陌生的……！

問：可是，你是否同意中国人的观点在亚洲和非洲有更大的吸引力？

答：是的，但并非以种族为理由。在激进的和富有战斗精神的人們中間，中国人的思想影响要大得多，因为中国人的观点符合这些希望立即对帝国主义采取断然行动的民族革命运动。

从他們力图通过同帝国主义做买卖的办法保持现状这一点來說，俄国人的对外政策一向都是保守的，所以亚非两洲的革命斗士认为俄国人是在竭力阻擋这些反帝运动……

（譯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26期）

十一、論錫蘭平等社会党所 面临的局势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 1964 年
6 月 22 日通过的決議

佩雷拉同錫蘭政府的总理談妥了一笔交易，在这笔交易中，他和他所指定的其他两个人被添入閣員的名单，作为他背弃錫蘭平等社会党綱領和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依据的基本原則的酬报。联合书记处对此采取如下的立場：

(1) 我們譴責佩雷拉同一个資产階級政府的首腦进行的秘密的私人談判，因为这种談判是背着他的党私底下进行的，他既沒有得到党的中央委员会授权，也沒有报告第四国际的联合书记处，并且公然藐視联合书记处对于除能导致建立工农政府的方針以外的任何方針所明白表示的反对意見。虽然佩雷拉后来把这个談判的結果——部分地或全部地——提交給中央委员会以及一次临时召开的、沒有時間来充分研究或討論这一重大問題的党的會議，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減輕他的严重违反列宁主义組織手續的罪責。

这些曖昧的手腕是佩雷拉的准备分裂党的計劃的一部分，继此以后，他自然就同意了总理的要求，让她个人有权决定下次大选中以他为首的一伙人的候选人名单。这样，他就把他的領導权拱手让給了錫蘭自由党的头目，并公然扮演了資产階級政党的代理人的角色。

(2) 我們譴責佩雷拉的取消階級路線。他接受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完全以改良主義綱領為基礎的資產階級政府的職位，這是過去社會民主黨和斯大林分子的議會派對階級敵人實行機會主義投降從而嚴重地損害了工人階級及其社會主義願望的一系列行動的一部分。我們同樣也譴責佩雷拉的追隨者莫涅辛哈和古涅瓦德尼，因為他們同他一起投降了總理。這三個以前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由於放棄了他們的革命目的並幫同班达拉奈克夫人拚命支持她的危機四伏的政府和挽救錫蘭的資本主義，已經背離了革命社會主義的最基本的原則。

(3) 這三個人通過他們自己的行動，自絕於第四國際的隊伍。聯合書記處認清這一事實，並且考慮到罪行的嚴重而把他們立即清除出去。除此以外，聯合書記處暫時剝奪所有那些在6月6—7日會議上投票贊成佩雷拉所提出的參加資產階級聯合政府的建議的社會平等黨黨員的權利，把他們的問題交給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下一次会议來作進一步的處理。

(4) 我們勸告那些支持佩雷拉的主張而錯誤地希望他的參加資產階級聯合政府的建議會促進無產階級事業的錫蘭平等社會黨黨員重新考慮他們的觀點。我們勸告所有那些繼續同佩雷拉合作而錯誤地希望這樣就可以保全錫蘭平等社會黨的團結的人們立刻同他決裂，集合到擁護黨所依據的托洛茨基主義綱領的同志們方面來。

佩雷拉的行徑給錫蘭的工人和農民帶來巨大的災難。隨着政府危機的加深，這一點將變得特別明顯。班达拉奈克夫人需要托洛茨基主義者加入內閣，以便拖延時間和暫時擺脫危機，但主要是為了同托洛茨基主義者和解，因為他們最有可能使一個工农政府執掌政權。她的詭計在於施展手腕，讓托洛茨基主義者來分擔那

种以她的资产阶级政权为目标的普遍的民怨和民愤。她希望伙同托洛茨基主义者实行反对工人阶级和少数派的措施、特别是用瘫痪工业行动的办法来达到上述的目的。她指望用这种手段使一个以革命社会主义纲领为基础政府比较难于当政并且不容易为锡兰打开一个真正崭新的局面。可是，如果这种政府——现在已经提到锡兰的议事日程上来——不能执掌政权，那么极端反动的右派终将建立一个实行残暴镇压政策的政权。佩雷拉的投降有助于为这种不幸的结局铺平道路。

固然一个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可能提出一些无关紧要的暂时的改革，僧伽罗族人和泰米尔族人却只有象俄国人在1917年那样，象南斯拉夫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人在1949—1952年、古巴人在1959—1960年以及阿尔及利亚人正在进行的那样突破资本主义的体制，才能解决他们的基本问题。

(5) 我们赞扬锡兰平等社会党的所有那些对佩雷拉的机会主义展开党内斗争、毫不妥协地反对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尽力维护锡兰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荣誉和完整并认为建立工农政府是锡兰群众的唯一现实的道路而继续为之努力奋斗的领导和党员。

我们号召第四国际以及全世界同情它的方针的团体和党派的一切成员不遗余力地帮助锡兰平等社会党的革命派来坚持并推进锡兰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纲领。佩雷拉的变节投降将不过成为锡兰阶级斗争中的一段偶然的插话。不久以前曾经理解到佩雷拉的机会主义议会主义的含意并组织力量对它进行斗争的那些忠实而有远见的领导和党员，已经经受住了严重的考验。那些同志依靠他们的坚定立场，团结了为在最短期间弥补损失所需要的可贵的基本干部。

有了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帮助，他们将以更大的自信从事建设一个能把锡兰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26期）

十二、錫蘭平等社会党(革命派)

临时委员会書記

埃德蒙·薩馬拉科迪的声明

錫蘭平等社会党革命派领导人之一、錫蘭議員埃德蒙·薩馬拉科迪于6月7日发表声明如下：

錫蘭平等社会党的改良主义多数派决定同資產階級的錫蘭自由党政府联合起来从而成为錫蘭資產階級的工具，这种决定是完全违反党的革命綱領所依据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原則的。

这种蜕化变质，是党的多数领导人若干年来遵循改良主义的議會道路、以改良主义的議會斗争代替階級斗争和革命立場并在这一基础上系統地吸收非革命分子入党等做法的必然結果。

在这种情况下，錫蘭平等社会党的革命者們已經决定在党綱的基础上自行組織起来。他們因此退出了會議，并且从此以后将以錫蘭平等社会党(革命派)的名义作为一个独立的組織发挥作用。

为了推进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錫蘭平等社会党(革命派)号召全国錫蘭平等社会党的信徒和拥护者团结在它拒絕放弃給錫蘭自由党政府和資產階級的革命旗帜的周围。

錫蘭平等社会党(革命派)临时委员会

書記埃德蒙·薩馬拉科迪(签名)。

(譯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26期)

十三、无用的革命领导

皮埃尔·弗朗克

〔第四国际的创始人之一皮埃尔·弗朗克是以前列夫·托洛茨基的秘书。他出席了6月6—7日在科伦坡召开的錫兰平等社会党的特别会议。作为第四国际在那个集会上的正式代表，他支持了左派反对佩雷拉的关于拥护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建议或其任何变种的斗争。〕

錫兰平等社会党在6月7日举行的特别会议经过表决同意佩雷拉和他的朋友们参加资产阶级联合政府，乃是一种反对第四国际和錫兰群众的行动。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是一个革命领导趋于衰竭的结果。

錫兰平等社会党的来历

平等社会党过去一向在第四国际占据一个独特的地位。它的来历和我们运动的其他一切支部的来历都截然不同。总之，我们的运动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在有相当基础的工人运动内部的比较深刻的斗争中产生的。在錫兰，工人运动本身在三十年代末期由一群在英国大学受过教育的年轻的革命者所引起，他们恰巧在左派反对派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伟大斗争达到高潮时受到共产主义的吸引，决定拥护不断革命的学说。

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当錫兰资产阶级自己不想对英帝国主义进行任何斗争，甚至不想仿效邻邦印度人士来进行斗争的时期，这

些年輕的革命者在國內嶄露了頭角。

在大战期間，錫蘭平等社會黨的領導集團開除了企圖同帝國主義合作的斯大林分子。托洛茨基主義者遭到了迫害和逮捕。其中有些人逃到印度，在地下繼續進行鬥爭。這樣，在戰爭結束以後，他們回到祖國時享有極高的威信並站在工人運動的最前列。

象每一個政治組織一樣，錫蘭平等社會黨經歷了多次的內部鬥爭。小資產階級的思潮被消滅了，同時大多數的領導也阻止了通過有組織的工會工作而獲得權威的佩雷拉的著名的機會主義傾向。

由包括考爾文·德·席爾瓦、萊斯里·古納瓦達尼、貝納德·索伊薩、多里克·德·蘇扎和埃德蒙·薩馬拉科迪在內的許多人物組成的平等社會黨真正的領導，具有高度的智能和昂揚的鬥爭精神。全錫蘭都承認他們是真正的領導小組。這個小組現在已經解体，因為大多數人在政治上破產了。這是平等社會黨所經歷的過地的悲劇。這個事件的原因何在？它是怎麼發生的呢？

必須說明，這個領導小組固然具有十分優秀的品質，同時也有著一些缺點，這些缺點的後果現在已經充分顯露出來了。

首先，就政治教育的水平來說，這些從事國際托洛茨基運動的種種活動的人和黨的大多數成員之間存在著一個很大的距離，因為後者不懂英語，又缺乏用本國語文寫成的合適的政治教育材料。這個領導小組密切注意第四國際的生活，但沒有充分地投入到這種生活中去，也不想把整個的黨帶進這個生活中去。

這個缺點在國際規模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領導人中間是盡人皆知的。不管其他的問題怎樣屢次使他們暫時意見發生分歧，對於這個問題卻一致表示關切。第四國際在組織上和財政上一般力量薄弱，不可能採取比較有力的措施，例如派遣十分幹練的托洛

茨基主义者到錫兰去长期工作，以便帮助提高該党的政治水平。正如国际書記处和国际委员会所承认的那样，1953年的分裂沒有予以帮助；而去年开始的重新統一又不容有足够的時間在这种形势下作出新的共同一致的努力来采取一項有力的、健康的措施。

平等社会党多数领导的第二个缺点是：战后議会的胜利使議會会派的傾向有所发展，而这种傾向从开头就沒有遇到有力的反对，并且它的最后的結果当时还看不清楚。甚至党的紧张活动都集中在爭取議會議席的斗争上面。

第三个缺点可以說是党在共最初几年的純粹“劳工的”性质。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通过他們的活动，已經赢得了錫兰大多数工人（科伦坡的工人、运输工人、白領工人等等）的信任。但长期以来，他們沒有抓住錫兰无产阶级的最重要的部分，即包括原先由英国人“运入的”、今天沒有取得錫兰或印度国籍的印度人在內的种植园工人。平等社会党有一个时期在这方面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控制了这些工人的一个强大的工会組織。可是，除此以外，他們很少深入到构成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村群众中去。

我們可以說，錫兰並沒有象印度或其他許多不发达国家那样的貧苦农民。不管这些群众中間的生活水平是多么低，他們却并不遭受饥荒，也沒有陷于絕望的境地。形势是很复杂的，并且据我們所知，还没有人对这种形势进行过认真的研究。总之，平等社会党从来沒有为这些群众拟訂什么綱領。（錫兰共产党的情况也差不多。）

独立以后

錫兰象印度一样，英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同意給予独立。政权轉移到了統一国民党的手里，而这个政党是代表錫

兰资产阶级通过他們的种植园、他們的对外貿易直接同英帝国主义勾結的那人数不多的阶层的。最初几次选举使平等社会党在反对派的系統中占主要地位。从此以后，不但产生了对議会的种种幻想，而且滋长了这样一种想法，认为統一国民党已經衰落和破产，它的末日就将到来了。

可是在五十年代，另一个組織即錫兰自由党发展起来了。使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大吃一惊的是，这个新的政党在1956年赢得了选举的胜利，从而执掌了政权。那时，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把錫兰自由党說成是一个它的社会基础比統一国民党較为广泛的资产阶级政党，可是他們认为：这个政党也很快就会失势，那时平等社会党就可以有所发展了。

1960年3月的选举的結果使这种希望成为泡影。平等社会党的多数领导人感到手足失措，内心开始动摇。与此同时，带有改良主义思想的佩雷拉則开始越走越远。那时他建議同錫兰自由党組織联合政府。这个建議遭到了拒絕，但平等社会党的議會党团却投了对政府的信任票。第四国际公开地不承认这次投票^①。

由于班达拉奈克政府逐漸右傾，平等社会党恢复了它的对抗，但并没有对以前的立場进行任何认真的自我批評。它提出了要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的口号。于是，它同錫兰共产党和人民联合陣綫这一小资产阶级团体組織了所謂左派联合陣綫。这是一个所提出的綱領不够充分的同盟，因为它的綱領沒有包括那些同无国籍的印度工人有关的工会組織，而且这个同盟并没有在同錫兰自由党的对抗中表现为夺取政权的候选人，虽然广大的錫兰群众正是怀着这种希望才对左派联合陣綫表示热烈的欢迎的。

^① 参看《第四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专号(1961年)。

最后，大約在三个月以前，佩雷拉秘密地开始同总理进行私人談判。虽然大約在一年以前組織起来的平等社会党左派坚决反对关于組成联合政府的任何建議，多数的領導却贊成不但由平等社会党一党、而且由左派联合陣綫的一切組織参加联合政府。

为了給这种立場找根据，他們說錫兰自由党是一个小資产階級組織，虽然那时它已經在資本主义的框框內当政了八年，并且他們还似是而非地用古巴和阿尔及利亚的例子来作比較。可是他們不希望由平等社会党单独来貫徹这个行动。就佩雷拉情况而言，这里所包含的是一切改良主义者不能不犯的严重錯誤。为了影响小資产階級群众、即在錫兰具体情况下的农村群众，他們不是希望通过战斗綱領来爭取他們，而是希望采用那种同一个資产階級政党联合起来的办法去爭取他們；这个資产階級政党当然并不代表这些群众，它对他們进行剝削，并且利用他們的反动情緒、特别是反对国内少数民族这种反动情緒来維持資本主义統治。

平等社会党的代表會議

由于平等社会党多数領導人的优柔寡断和迟疑不决的态度使他們在有一段时期已經停止进行教育的党内丧失了威信，佩雷拉变得格外胆大妄为了。党的代表會議固然是仓卒召开的，却显著地证明了这一点。

會議提出了三項決議案。經過两天的辯論，决定首先提出薩馬拉科迪-泰姆波动議，因为它在原則上是反对参加任何联合政府的。它得到了一百五十九票，占总票数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接着提出了德·席尔瓦-古納瓦达尼动議；这是曾經实际上把党領導了二十五年以上的人們的动議。它是作为对佩雷拉动議的“修正性质的”动議而由古納瓦达尼提出来的。它得到了七十五

票，約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十。

問題还不止这样。佩雷拉的決議得到了百分之六十五的票数，但在贊成德·席尔瓦-古納瓦达尼动議的七十五票中間，約有三分之二支持佩雷拉的決議。于是，过去起了这样卓越的作用的和贏得了这样大的威望的人們，就发现自己在領導了党二十五年以后只得到二十五票左右，即不到总数的百分之四。

在辯論期間，当其他两派对他們的立場表现出信心的时候——佩雷拉派相信自己的改良主义，薩馬拉科迪-泰姆波派相信革命綱領——中派只能表示他們自己的态度含糊和意气沮丧。他們既然忘記了自己所写的有关不断革命論的文章，自然就看不出一个資產階級虽然不能爭取民族独立，却是会千方百計地維持它的社会統治的。他們不再把錫兰自由党看作一个資產階級政党了。

这种墮落的最可悲的一个方面是这件事情发生在平等社会党的領導人遇到千載难逢的机会的时候。錫兰的政府危机是一个朕兆，表明一路从中国經過非洲而波及古巴的震撼了全世界的殖民地革命正在这个島上趋于成熟。資產階級感到迫切需要同工人运动的領袖联合起来，正足以表明这些領袖已經逐漸具有怎样大的机会在錫兰建立一个工农政府。不幸的是他們看不到这一点，并且屈服于这样的要求，即把他們为之准备了二十五年的好机会变成資產階級政府中职位的細小更迭。

錫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繼續斗争

由于这次會議，一伙革命領導人的道路走到了尽头。佩雷拉贏得了人們对他的改良主义所投的贊成票，大多数的旧領導人决定跟着他走。錫兰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旗轉移到了左派同志們的手

里，他們一致退出會議，立刻宣布成立了平等社会党(革命派)。

这个由第四国际錫兰支部的繼續的团体所构成的組織在困难的局势下开始工作，因为群众中間还对佩雷拉的政治抱有幻想。但是，全部的条件并不是不利的。首先，这次分裂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爭端而形成的，并且錫兰的全国人民都了解这一点。这个組織的領導集团拥有全国著名的人物：平等社会党的最早的領導人之一埃德蒙·薩馬拉科迪以及另一位議會議員默里尔·費尔南多；錫兰工会运动的主要領袖之一巴拉·泰姆波以及其他著名的領袖如卡腊拉辛格和嘉雅拉特尼。这个組織包括许多工会干部，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包括学生在內的青年斗士。

在解决了当前的組織問題以后，这个年輕的党将承担重要的政治任务。足以表明錫兰局势的特征的，不但有平等社会党的分裂，而且还有左派联合陣綫其他两个組織的分裂。錫兰共产党分裂成为两派，一派是支持联合政府的亲赫魯曉夫的右派組織，另一派是与之相对立的亲华組織。人民联合陣綫也在支持或反对联合政府的問題上分裂了。

我們欢迎这个正在继承旧平等社会党的最优良的革命傳統的新組織。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和它站在一起，共同来重新建立一个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在錫兰获得胜利的新的革命領導机构①。

1964年7月7日

(譯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28期)

① 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聯盟的领导人希利利用平等社会党的这次危机攻击了重新統一以后的第四国际，自从他拒絕参加1963年举行的重新統一代表大会以来，他对第四国际的攻击一直没有停止过。

首先，我們要提起一段小小的謊話。6月20日的《新聞通訊》上說，希利“要求參加”會議，“但在會議主席團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皮埃爾·弗朗克……同主張參加聯合政府的變節分子勾結起來，竭力主張拒絕希利的申請。”希利的要求是由包括左派代表在內的整個主席團拒絕的。在這一點上，各派的意見在這一次倒是完全一致的，並且人們也沒有征求我的意見。

第二點：希利沒有透露出，他曾要求革命派在離開會議以後不僅要同佩雷拉、德·席爾瓦等決裂，而且要同第四國際決裂。這恰恰是希利到科倫坡去的真正目的，因為他希望在那裡混水摸魚。他沒有提到這件事，因為他遭到了挫折。

現在我們再說一段另一段謊話，這段謊話表面上好像是頗有根據的樣子。按照他的說法，第四國際的代表在平等社會黨代表會議上發言說明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意見時，支持了鼓吹整個左派聯合陣綫同錫蘭自由黨聯合起來的德·席爾瓦-古納瓦達尼決議。但恰恰大家都知道的是：第四國際反對同錫蘭自由黨實行任何性質的聯合，並支持了現今作為第四國際錫蘭支部而展開活動的左派。

希利之所以背離真實報導的標準的原因是十分明顯的。這不能算是《新聞通訊》一貫不顧事實的作風的一個例證。在科倫坡，希利宣佈他支持平等社會黨的左派。但左派在去年是始終同它派有代表直接參加的第四國際聯合書記處商量後進行鬥爭的。希利一直指責聯合書記處犯有各種各樣的“叛賣行為”。因此，如果他是合乎邏輯的話，他就必須承認他曾決定參加聯合書記處所犯的一項“叛賣行為”，否則就應當承認他已經誤解了它的政策、至少是它對錫蘭的黨的政策。由於這種左右為難的處境，希利犧牲了無產階級道德而採取政治權宜之計。他想要把聯合書記處的立場同它事實上正在反對的那些建議混合在一起！這樣他就可以在《新聞通訊》的讀者面前隨心所欲地表現為反對聯合書記處而支持平等社會黨左派的衛士！

不管謊話編得多么周到，它恰恰可以十分清楚地說明希利所玩弄的權術的性質。第四國際——在代表會議之前和會議期間——反對同一個資產階級政黨聯合起來的建議，提倡關於建立一個工農政府的積極口號，並且認為針對同錫蘭自由黨聯合起來這一建議，托洛茨基主義者應當相反地提出由左派聯合陣綫組織政府這一公式，從而在具體的事例中貫徹上述的主張。

在希利看來，這種口號等於是同資產階級實行聯合，因而是叛賣行為。這個看法並不是希利的一次偶然的偏差；它是他的總的概念的一部分，表明他不懂得第四國際的過渡時期的綱領，不能真正地瞭解殖民地革命的真實意義。他因此就排斥了過渡時期的政治口號，並否認有可能產生一個過渡時期的政府。

即使不詳盡地考查他在英國的策略，只要讀一讀他的報紙也就不難猜想，他是把保守黨和工黨看作一丘之貉的。他決不贊成經歷一次工黨政府的經驗。

在殖民地革命方面，他所根據的既然是沒有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就不會有成功的革命這一前提，他便否認不斷革命論在阿爾及利亞和古巴所取得的勝利。他把卡斯特羅比作巴蒂斯塔、蔣介石和阿塔土爾克（意為“土耳其之父”，為凱末爾在1934年取得的尊號。——譯者）。在桑給巴爾，他把那裡的革命貶低為一出滑稽歌劇，等等。

希利的政治見解是很簡單的。你一打開他的報紙的任何一期，必然會發現最後的

消息报道什么地方的什么人已經叛卖了什么事业。《新聞通訊》修談“出賣”的方式，正同有些報紙修談性的交易一樣。它似乎保留着常備的头条標題，只要換一下每星期已經出賣的人的姓名就行了。據說，卡斯特羅已經叛卖了古巴的群眾，因此必須建立一個革命的領導組織。本·貝拉已經叛卖了阿爾及利亞的群眾，因此必須建立一個革命的領導組織。社會主義工人黨已經叛卖了美國的群眾，因此必須建立一個革命的領導組織。聯合書記處已經叛卖了托洛茨基主義，因此必須“改組”第四國際。根據這個政治標準來衡量，既然除希利以外全世界的人士都在犯叛賣的行為，那就不必深入分析，甚至毋需多動腦筋。兩個陣營——希利和全世界其餘的人——的每一方都循着它預先注定的途徑前進。總之，對於這種政治見解來說，根本不必屬於一個國際組織，不必參加它的代表大會，只要开好留聲機，把針頭放在唱片的蜡紋里就行了。

希利沒有真正發明什麼新的東西。他不過是恩格斯和馬克思的女兒在九十年代所反對的、列寧在二十年代所寫的《幼稚病》中加以抨擊的英國偏狹的宗派主義的今天的翻版而已。

最後再說一句。在科倫坡，希利力求就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內的許多問題同我進行爭論。顯然應當讓錫蘭工人有機會親眼看到這樣一個天才的能力發揮作用。

十四、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支持 錫兰平等社会党(革命派) 非常代表大会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

第四国际的联合书记处代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向你们的集会表示最热烈的友好祝贺。你们在遭受佩雷拉及其同伙的打击的情况下支持革命社会主义原则的坚定立场，已经到处获得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赞扬。你们的原则性很强的行动已经清楚地表明，你们代表着錫兰的工人和农民的革命社会主义前途。

结合着你们的斗争，第四国际的联合书记处除在6月22日的声明中宣布的动议外，已经通过了下列的动议：

(1) 赞成6月7日在科伦坡“工人文化宫”举行代表会议的决定。

(2) 赞成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今后在以佩雷拉为首的集团所放弃的平等社会党党纲的基础上作为平等社会党(革命派)而发挥作用”的决定。

(3) 赞成由这次会议选举一个临时委员会。

(4) 赞成平等社会党(革命派)紧急会议为选举该党常设机构并完成这种会议所应有的其他任务而作出的安排。

(5) 承认这次紧急会议是继续推进錫兰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团体，授权它表明第四国际錫兰支部的态度并处理属于该支部的任何事务。

(6) 赞成平等社会党(革命派)按照重新统一代表大会所采取

的立場繼續出版《平等社會》僧伽羅語周刊。

(7) 再度呼吁所有投票贊成佩雷拉的參加資產階級聯合政府的建議的人以及由於害怕“分裂”而尚未同他決裂的人集合到平等社會黨(革命派)方面來，因為它是在錫蘭堅持錫蘭托洛茨基運動所依據的綱領的唯一組織。

* * *

我們想對你們的緊急會議發表如下的簡短的意見，至於其他問題和更為廣泛的意見，則留待將來仔細考慮後再行提出：

毫無疑問，佩雷拉和他一伙人的投降行徑給錫蘭先鋒隊帶來嚴重的挫折。它會有助於緩和錫蘭資產階級所面臨的政治危機。再結合總理的某些讓步，它會助長一部分人民對於在結構上改革資本主義的可能性抱有幻想。因此，佩雷拉的支持和參加資產階級聯合政府的政策會幫助錫蘭資本主義延長壽命。

可是，讓步和改良的途徑將由事實證明在錫蘭是沒有前途的。要求解決的各項問題的規模遠非錫蘭的資產階級和地主的財力和人力所能應付。人們將越來越清楚地看出，有必要轉而採取革命的解決辦法乃是一件無可避免的事，如果遲遲不予採取，就會發生政治和社會的災難。先鋒隊不久就會面臨把錫蘭政權接收過來的巨大責任和機會。

按照這個前景來看，預料錫蘭托洛茨基主義者將很快就從佩雷拉的領導所造成的損害中恢復過來。但是，要想保證實現這一點，那就必須從經驗中吸取應有的教訓，加倍努力地進行工作，並想方設法根據過渡時期的要求去同其他戰鬥流派採取共同行動。必須強調指出，對於解決無產階級在錫蘭的領導地位的危機問題來說，一個正確的過渡時期綱領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在這個過程中，你們可以依靠整個的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

的精誠合作和同志式的支持，因为它非常关心錫兰这个国家及其前途。

同时我們可以肯定，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都认为平等社会党(革命派)将在帮助和支持第四国际方面开辟新的一章。你們知道得很清楚，在以前的领导下，友好关系往往是空口的应酬話。这意味着削弱第四国际这一世界組織，帮助平等社会党的右派，并在其他地方助长相类的民族主义的或地方性的派系。这种置国际主义于度外的情况在我們的国际运动遭到分裂的几年內变得更加严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特別受到損害。

由于世界运动在去年重新实现了团結，一支比較强大的力量开始对一切离心的、民族主义的傾向进行斗争，而这种傾向在錫兰是显然以佩雷拉为代表的。在右派看来，这支新的力量不能不是一种随着团結精神在团結大会所規定的革命社会主义原則的基础上日益巩固而肯定会有所增长的对他們的傾向的威胁。毫無疑問，这种形势使他們觉得更加有必要决定赶快同資产階級結成联盟。在他們的破坏紀律的罪恶昭彰的行动中，佩雷拉派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派系有了共同的基础，其中有些派系帶有极左派的色彩，它們的“托洛茨基主义”沒有发展到认真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則的程度。

平等社会党(革命派)已經证明它能够实行这些原則，因而它的榜样已經加强了第四国际，有助于巩固以团結大会所采取的綱領为基础の团結。我們指望你們将来在这方面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負責出版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理論性机关刊物《第四国际》方面，你們已經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們現在希望通过你們的合作来使刊物的出版正常化，并使它充分地获得它所應該获

得的成功。

在反对佩雷拉所领导的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中，第四国际锡兰支部的主要干部所树立的榜样是各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可以引以自豪的。我们希望，当你们以这场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为基础而向前迈进的时候，平等社会党（革命派）不仅将把自己改组成为一个以革命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群众性组织，而且这次将在国际范围内起一种模范作用，以帮助建设列夫·托洛茨基所创立的第四国际。

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

1964年7月10日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28期）

十五、不准干涉北越！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 1964 年

8 月 5 日宣言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在美国袭击东京湾从而造成严重危机时刻于 8 月 5 日发表宣言如下：〕

北美帝国主义对北越人民共和国的侵略，不是在謠传东京湾发生海軍战斗以后而采取的“报复”行动。这是一次曾經长期精心策划和系統准备的侵略。这次侵略在政治上是帝国主义孤注一擲的作法，想要拖延那为人痛恨的西貢亲帝国主义的政府的垮台。这个政府尽管从它建立之日起得到华盛顿在金錢上、物质上和人力上的龐大援助，英雄的自由战士正在使它日益接近于失败。

这次侵略的矛头正在指向越南人民和英雄的革命群众，指向整个东南亚地区的人民。它的主要目标在于扑灭革命的高潮。它很可以成为侵犯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基地。五角大楼的战争大师要为朝鮮軍事上的失败洗耻雪恨。

帝国主义再一次表示，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准备诉諸武力以对付任何一次新的革命成就。帝国主义再一次表示，“和平共处”的口号只是在群众中使他们們对帝国主义本性产生幻想的一个圈套，使他们們背离解除帝国主义武装这个迫切任务的一个圈套。这也就是说，为了使人类从可能以核浩劫告終的螺旋形战争中挽救出来而在自己的中心击败自己。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吁請各国工人对越南革命和北越人民共

和国表示积极的团结精神。帝国主义为了要重新奴役越南人民，把他们重新置于地主、高利贷者的统治之下，正在试图对越南革命和北越人民共和国加以镇压。

各地都要组织集会，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抗议。

在美国大使馆、领事馆门前举行示威，表示你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对。

通过警告性的罢工，阻止华盛顿帝国主义、寡头政治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三方面的同盟军加入对越南人民的侵略。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吁请各工人国家的政府、共产党人、革命积极分子和工人，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越南人民和北越人民共和国给以迅速的、慷慨的、无条件的援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必要的、进步的讨论，不能成为这种援助的障碍。各国共产党人必须要求赫鲁晓夫，不能以中苏冲突为借口避不表示对北越的基本团结精神，或者象滴眼药水那样提供援助。

犹豫逡巡的态度，或者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表示退却，那只会鼓励华盛顿采取进一步侵略的行动。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30期）

十六、“我沒有忘記……” (关于多列士和陶里亚蒂)

皮埃尔·弗朗克

在彼此相隔几个星期之内，西欧两个最大共产党的领导人去世了。这固然完全是一个巧合，而这两个事件的同时发生却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象征。实际上，这两人的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終結。

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間，陶里亚蒂年岁最高，就資历說，甚至比毛泽东还高。多列士也是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中間的一个长者，他是工人阶级出身的。陶里亚蒂是一个知識分子。他們两人都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老的社会党中的年青一代，他們轉向十月革命，重新展开曾被社会民主党于1914年出卖因而沾污的工人运动。他們两人出于青年人的热情，受到了布尔什維克主义的吸引。

当然，他們长时期有过不同的經歷。意大利共产党在1922—23年被打入地下，直到墨索里尼垮台才开始公开活动。法国共产党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才有地下工作的經歷。在这两个人的性格和举止上也同样有着显著的区别。陶里亚蒂比多列士来得圓滑，虽然这一点不能象許多評論家那样夸大其詞。多列士的圓滑曾不时得到证明，而陶里亚蒂表現的是官僚主义的才干。

把他們搞在一起甚至联合起来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两人都是利用他們的才能和地位，把原来是为了准备及

領導无产階級革命而創建起来的組織，置于为苏联官僚主义服务的地位，那时，这个官僚主义在斯大林领导下篡夺了苏联的政权和共产国际的权力。在多列士和陶里亚蒂，这不是一件容易做的工作，他們只是在犹豫和有所保留以后才渐渐担任起这个角色。1924年，多列士在他担任書記的加来海峡联盟散发了托洛茨基的《新方針》。甚至在1928年，他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走廊里还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論表示保留的态度。在这同一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支持布哈林；可以說，他是在車子正在开足馬力的时候从車子上跳出去的，而几个月以后，斯大林打倒了布哈林，粉碎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的右傾反对派。

这些共产主义运动的老的領導人对斯大林的罪行完全清楚，他們特別認識到“第三时期”的政策和1933年这个政策在德国造成的致命伤。但是他們俩都作了苏联官僚主义心甘誠服的工具；他們俩首先是由于对工人階級的革命力量丧失信心而成为斯大林分子的。

战后的年代里，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之間产生了差別，而这些差別仍然是他們对苏联官僚主义共同效忠的框框以內的差別。（甚至有人指出，他們俩沒有死在本国而死在苏联或死在去苏途中，这是頗有象征意义的。）

比起他們在中苏冲突中立場上的差別更为重要的是：他們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立足点——实际上，他們都放弃了无产階級革命，除了“和平”道路外，看不到别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對他們俩來說，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他們实际上还通过自己的行动向资产階級保证，他們領導的政党并不构成革命的威胁。

不幸的是，工人群众还没有懂得这一点。这部分說明人民为什么会成千成万地出来参加他們的葬禮。因此，属于工人运动外

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都不能理解象多列士和陶里亚蒂那样的人究竟起着怎么样的历史作用。于是就有象薩特尔那样的人会对他们两人讲出那么多的蠢话来。

但是，法意两国资产阶级中目光最为锐利的分子，对于这个作用有着十分正确的理解。他们没有忘记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那个时候的局势，没有忘记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对他们作出的巨大劳绩。他们的强烈感受，可以从他们二十年后在这两个领导人棺材旁公开表示的感谢中作出判断。

这就是戴高乐写给多列士的一个儿子的，并且准予发表的一封信。

“对于你父亲的去世，我向你和你一家人表示衷心的哀悼。就我来说，我没有忘记在法国处于决定性的时刻，莫里斯·多列士主席曾经响应我的呼吁，作为政府的一个成员而对全国团结作出了贡献，不管在这个时刻之前或之后他原来会采取怎么样的行动。先生，请接受我最真诚的问候。”

我没有忘记在……决定性的时刻……。说是多列士响应戴高乐呼吁的话，那是不真实的。多列士和陶里亚蒂是跟斯大林合在一起的。他们是按照斯大林在雅尔达、德黑兰、波茨坦向美英帝国主义承担的义务而行事的。其结果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得到了挽救。

戴高乐在信中概括的话，在他的回忆录里有着更加明确的叙述。

“考虑到以前的环境，那时以后的事态和今天的需要，我认为莫里斯·多列士作为共产党首脑的归来，在目前可以使人得到的是好处而不是麻烦……”。

“共产党要求的既然不是革命，而是在议会制度中的优势地

位，那么社会也就冒着較少的风险……。

“說到多列士，他固然想推进共产主义事业，但是他在許多場合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他回到法国，帮同消灭‘爱国民兵’的最后残余，而这种民兵，他的一些人曾經頑固地要在新的地下保持下去。在他的政党阴暗的、严酷的紀律允許范围之内，他反对解放委员会的越軌打算，反对过激集团主张的暴力行为。在人数众多的听他长篇大論的工人中間，特别是在矿工中間，他不断鼓吹不論代价如何，应该尽力工作以及生产的口号。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策略？对这一点加以估計，这不是我的事。法国因而得到了好处，这在我就已經是足够的了。”（《拯救》[Le Salut]，第100—101頁。）

戴高乐說，“我沒有忘記”。意大利的資產階級也沒有忘記在1943到1948年的一段期間里陶里亚蒂作出了同样的功績，他甚至使自己的政党和追随这个政党的工人接受那个把梵蒂岡和意大利共和国結合在一起的宗教議定书。这样，意大利議會議长、天主教民主党人莫洛立刻向意共提供一架意大利軍用飞机，把陶里亚蒂的助手送到已死書記的遗体边去，以便把遗体运回意大利。戴高乐的极其明白的詞句和莫洛的引人注目的姿态表明，他們都懂得这两个共产党所起的主要作用：这两个原是为了推翻資產階級社会而創建的政党，却在紧要关头挽救了这个社会。

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两人，通过他們的政党在他們指使下所起的那种作用，通过他們的参預資產階級政府，在法国和意大利救了资本主义；不但如此，如果我們回想一下当时希腊游击队的斗争，可能也救了地中海沿海整个欧洲地区的资本主义，纵使我們不談它的更加深远的影响的話。

社会主义革命的挺进走上了一条更加錯綜复杂的道路。世界

資本主义由于工人領袖的出賣而在西方得到了挽救，但是它的力量還不足以鎮壓中國革命，而中國革命反過來給予殖民地的革命運動以巨大的沖力。全世界的革命攻勢又將使各國共產黨從它們受制于斯大林主義時起賴以生存的神話趨于破滅。在這些政黨中間出現了一股敵視改良主義政治、尋求革命後果的潮流。

多列士和陶里亞蒂離開塵世的時候，恰好是經過三十年的磐石般團結以後危機爆發的時候。這次危機結束了他們統治自己政黨的時期。這是一次同中蘇沖突密切結合的世界範圍的危機。這次危機結束了蘇聯官僚政府對那些同俄國革命聯系在一起的工人運動的統治。老官僚的領導注定要滅亡。新的革命領導經過長期的痛苦考驗將要出現。他們在回顧陶里亞蒂、多列士之流的時候，將會象戴高樂那樣但是帶着一種完全不同的感情說道：“我們沒有忘記……。”

（譯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30期）

十七、陶里亚蒂的“遺囑”

皮埃尔·弗朗克

陶里亚蒂那个叫作“政治遺囑”^①的文件，是意大利共产党已故领导人为了准备同赫魯曉夫进行討論而起草的。这次討論沒有举行。意共领导公布这个文件，現已使官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危机进入一个新阶段。

到现在为止，危机的公开一面最能在中苏冲突中看得出来。中国人和俄国人，毛泽东和赫魯曉夫，代表危机的两个极端。人們当然知道，这两个陣营不是同质的。人們知道，在亲赫魯曉夫一边，有些共产党的领导特意不向法共领导人效法，象他們在多列士领导之下那样看克里姆林宮的眼色行事。熟悉共产主义运动的观察家相信，亲赫魯曉夫陣营的内部有着比赫魯曉夫本人更加一貫右傾的一翼。可是，在陶里亚蒂文件公布之前，这些分歧只是在对付中国采取何种战略的吵吵嚷嚷中才隱約可見。陶里亚蒂很可能是为了作为一个密件而写这个备忘录的，原本可以同赫魯曉夫取得某种妥协的。但是，这个文件的公布和势所不免的广泛传播，以及它在各国共产党中間引起的反应——这一切就产生一种新情况，因为文件表明他同赫魯曉夫的分歧远远超过他們在跟中共斗争的战术問題上的分歧。文件对当前形势中若干关键性問題提出一个不同于赫魯曉夫的綱領。这是代表各国共产党内部第三种傾向的綱領。

^① 即“备忘录”。——譯者

必須指出，陶里亚蒂小心謹慎地不讓事情採取這樣的形式。他只是把正在同中國人進行鬥爭的方式挑出來批評。但從這點出發，他提出了整整一系列具有頭等重大意義的分歧。

“多中心主義”

他首先擺出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作用這個問題，提出以“多中心主義”作為替代，雖然他沒有使用他一度曾在1956年鼓吹過的“多中心主義”這個名詞。他在提出這個主張時說，即使不會發生正式分裂的危險，國際會議的舉行不是無用的，也將是危險的。於是建議召開地區性會議。

倘使人們在推敲這個建議的意義時還看到他是反對全盤譴責中國人的話（他一再重申，他反對總括性的譴責，主張引用具體的論據），那麼很明顯，他所企求的就是不在主義上進行任何爭論。但是必須看到，在一般性問題上他的確譴責了中國人，而在看來凡是屬於他們領域內的具體政策，他是一言不發的。

從他的某些語句中甚至可以斷言，他沒有赫魯曉夫那種認為有可能同美帝國主義作成一筆全面交易的观点：“我們對當前國際、國內局勢前景的估計，多多少少是有些悲觀的。局勢比兩三年前糟了。……”

在這個問題上，他的結論的根據是赫魯曉夫本人的观点，就是說，在帝國主義陣營內部有人主戰，有人不主戰（這是違反馬克思主義观点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從整體來說，帝國主義是產生戰爭的）。但是陶里亚蒂從他自稱為悲觀的前景估計中歸納出以下兩點：

一、考慮到嚴重危機的可能發生，決計不要同中國人決裂。赫魯曉夫在這個問題上的國際政策使人認為，他希望同帝國主義

作成一笔取得協議的买卖，甚至把同中国决裂拿来作为預付的代价。

二、各国共产党一定要奉行一个清算“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的政策。他引证的例子表明，他的政治立場是彻头彻尾右傾的。

死灰复燃的伯恩斯坦主义

他首先并且相当詳細地談起西欧各資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我們只想談一談他的那种需要放弃无神論宣传、在各个文化領域开展討論的說法。作为斯大林主义在文化領域中的极端政策——日丹諾夫主义的反应，他在上层建筑这个最最重要的方面完全抛弃了階級观点。他贊成“相互諒解”。这种折衷主义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征。但是在陶里亚蒂的文件中，修正主义得到政治上的公开宣告。

他承认“資本主义世界的經濟危机非常深刻”，“統治階級不再能用传统方法解决”今天垄断結構内部产生的新問題。他看到資本家不得不实行一定程度的“計劃”（“planning”，他使用的詞儿是“programming”）。他注意到这是“收入政策”中“一个具体因素”。他說这大大地扰乱了工会斗争，使得工会斗争“不再能在各个国家以孤立的方式进行。”他对世界工会联合会进行了譴責，說这个組織只是作一般性的宣传，而沒有“为統一行动、共同反对大托拉斯政策發揮任何值得称道的主动性。”

但是，他有没有由此得出以下的結論，就是說，西欧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在于为广大群众展示一个社会主义的前景？他們的任务就是要指出，这些西方国家要在一个比之已經从資本主义体系分离出去的那些国家經濟水平、文化水平更高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世界，是真正可以作到的？他有没有提議过，应该提出一个把广

大工人群众动员起来、以便工农政府夺取政权的种种方式方法包括在内的过渡时期纲领来呢？他有没有说西欧具有社会主义极其成熟的条件呢？他甚么也没有。我们从他的文件中引述几句话，就可以看出他的立场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为了在经济发展计划的总机构内改革经济结构（国有化、土地改革等等），以同资本主义的计划工作相对抗，我们需要发展、协调劳工的当前要求和建议。当然，这还不能算是社会主义的计划，因为这里没有这种计划需要具备的条件，但是这是推进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一种新的斗争手段。和平进入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在今天是同理解并解决这个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对和平进入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给以更加深入的思考，我们就不得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对我们究竟有着什么意义作出具体的说明。自由和民主制度的疆界，怎样才能扩大？工人群众和劳动大众参与经济政治生活的方式什么是最有成效的？以下的问题就是这样提了出来的：对工人阶级说来，他们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尚未改变资产阶级国家性质的国家结构内夺取执政的地位；有没有可能从内部来逐步改造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

因此，陶里亚蒂不同于多列士之流百依百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他提出了在当前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他力求订出一个计划，一种过渡时期的纲领，但是这不是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的计划。他说，要作到这一点，“条件还不具备”。这种断然的说法并没有得到验证。人们倒很想知道他所考虑的条件究竟是些什么条件。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解放时期，法意两国共产党不但得到无产阶级极大多数的支持，而且得到广大中产阶级和数以万计的武装工人的支持，还有哪些条件没有具备？

陶里亚蒂的计划纲要如下：在资产阶级国家的结构内赢得“执政地位”，为从内部来逐步改造成为一个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而斗争。在新的——深化和发展的——形势下，陶里亚蒂自称提供的东西不是别的，只是伯恩斯坦在二十世纪初的老概念的新版。

根据伯恩斯坦的设想，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将随着每一个立法议席的取得，随着市级行政和合作社成立等等而一步步成长起来。今天再要加上在各式各样替资本主义利益行事的政府部门中的职位。以夺取这些所谓“执政地位”来代替夺取政权。

说实在的，伯恩斯坦可以摆出的借口比陶里亚蒂还要有力。当伯恩斯坦提出他的修正主义的时候，资本主义经历了将近二十三年的繁荣时期，世界上还没有看到制度上的根本危机的进展，资本主义正处于一个顶峰状态；而陶里亚蒂在半个世纪后提出他的修正主义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这段期间使我们经历了十年的世界大战，多年的法西斯主义，千千万万的人长年失业，以及在三分之一地球上把资本主义消灭掉的积年累月的革命起义。陶里亚蒂就是选择这个时间来提出他的从内部来“逐步改造”资产阶级国家的建议！

看不到殖民地革命

尽管殖民地革命今天站在全世界革命斗争的前列，陶里亚蒂的文件关于殖民地革命却只有三言两语。他提议，西方各国共产党不仅应该同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建立关系，而且应该同“所有争取独立、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并在可能时甚至同新近获得自由、政府进步的国家的政界”建立关系。他又说，在此同时，“对于这些前殖民地国家，我们一定要就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含义而言，等等，更深入地为这些国家探讨发展道路的问题。这是迄今尚

未澄清的新爭論中的一個問題。”

在第一點上，陶里亞蒂的一些結論可能是從法共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時期的態度中，或者是從許多地區反帝鬥爭不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展起來的事實中得出來的。但是他的說話的方式表明，他不是根據階級觀點思考的。他說，有關這些國家社會主義目標的問題迄今尚未得到澄清，這就格外叫人看得清楚了。

如果說陶里亞蒂從來沒有從馬克思 1850 年的著作中，托洛茨基的作品中或者新近中國的文件中看到不斷革命論，那是無法使人相信的。不發達國家的具體任務即使有時很難完成，那也不能說不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還有什麼含糊不清的地方。陶里亞蒂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證明，他的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概念是漸進主義的，孟什維克的。在這裡，他一定也認為“條件沒有具備”，象在經濟發達國家中一樣。然而，革命在前進……

陶里亞蒂在文件中的態度，可以看到是矛盾的。他力求“深化”和澄清新問題。而同時他又耍赫魯曉夫不在一般性方面同中國人進行討論，應該集中力量於“具體”方面：

“當討論由一般性(帝國主義的性質、國家、革命的原動力等等)轉移到當前政策的具體方面(反政府鬥爭、批評社會黨、工會團結、罷工等等)，我們總是取得輝煌勝利的。在這方面，中國人的論戰依然是完全軟弱無力的。”

孟什維克在他們唾棄“一般性”、偏愛“具體”的時候顯了原形。“具體”而不符合總觀點，那又有什麼意義？這樣一種“具體”比起最簡單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要抽象上千倍。為什麼要學習《資本論》、價值論、剩餘價值等等？這些“抽象概念”都沒有包括在成堆的經濟統計里呀。把帝國主義的性質、國家、殖民地革命的原動力等等撇開不談，那麼，正在殖民地革命中發生的事情又怎麼能夠

理解呢？

陶里亚蒂的“无知”

在对待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前殖民地国家两者的問題上，陶里亚蒂的文件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右派綱領。階級观点一扫而光了，文件把人类前进的希望寄托在空洞的“渐进性”上。

在对待工人国家方面，陶里亚蒂采取了不同的方針。誠然，他提出的問題和批評，我們过去难得会从这些共产党领导人那里听到。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文件原来只为极少数人听的，这是为了同赫魯曉夫进行討論而准备的备忘录，不是因为发生了前所未料的情况，可以十分肯定，这种意見交换将是一次密談^①。陶里亚蒂认为中国的批評除了某些地区的貧苦农民外，在意大利是沒有吸引力的。但是他知道从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至少有些問題已在工人階級內部提出来了。

“社会主义經濟政治建設問題的整个涵义，西方知道的太简单了，甚至是太粗浅了。我們不知道各国情况之間的差別，各国不同的計劃方法和逐步改造的方法，在各国經濟一体化領域方面所采取的方法和产生的問題，等等。有些情况很难理解。……”

“不要隱諱，对斯大林进行的批評是留下了相当深远的痕迹。甚至是非常靠攏我們的分子，他們在听到新的經濟、政治成就时都抱着某种怀疑态度，这是最为严重的。此外，人們普遍认为斯大

^① 根据可靠报道，赫魯曉夫的代表勃列日涅夫沒有能够說服意共新首脑隆哥把陶里亚蒂的文件束諸高閣。可以断言，文件的发表主要是由于意共领导內部有着不同的政治傾向。这些领导人在旨在譴責中国人而召开的會議上找到共同的立場。文件繼續秘而不宣，彼此担心对方将从透露文件的存在上取得某种好处，于是全体领导人都主张发表这个文件了。

林崇拜的根源問題及崇拜所以有可能發生的理由還沒有得到解決。……

“我們有許多具體事實不知道……”

一般共產主義戰士大部分不知道工人國家面對的問題，他們有着不少問題要問——這是無可懷疑的。但是這些論點出之于陶里亞蒂之口，就有些過分，即使我們考慮到他在提出這些問題時曾對赫魯曉夫施展了許多外交手腕。此外，陶里亞蒂說，這些問題應由“黨的历史學家和有資格的幹部”來研究，這說明他知道的比自己承認知道的還多。他還補充說道：“可是我們要求謹慎作出結論。”

謹慎作出結論！陶里亞蒂可以說是謹慎的圭臬：長年的謹慎對待斯大林，謹慎對待赫魯曉夫，謹慎對待中國人……還要謹慎對待意大利的資產階級國家、天主教會。資產階級的世界為什麼要尊崇這樣一位謹慎的“革命”首腦，也就可以理解了。

可是，文件之所以特別令人發生興趣，還是由於文件提出了這樣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今天，對於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最最使人注目的問題，主要是如何克服斯大林所建立起來的限制並廢除民主自由和個人自由的制度的問題。社會主義國家的情形並不是完全一樣的。總的印象是：遲緩和抗拒回到列寧主義的準則，這些準則保證黨內外，在文化藝術領域、甚至在政治方面，有廣泛的言論自由和辯論自由。我們很難理解這種遲緩和抗拒，特別是如果我們考慮到在目前情況下，不再存在資本主義的包圍，經濟建設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甚至在政治方面”這幾個字，意義豐富，彷彿在列寧的時候黨的大部分時間用於討論文化和藝術，只是偶而才擺出政治方面的

問題。陶里亚蒂在这里又再一次不能“理解”了。这也許就是他的长年斯大林主义分子奴性的证明，或者是他跟赫魯曉夫耍手腕的证明。但不管怎样，重要的是他的招认：苏联，主要是苏联人民，非但远远沒有回到列宁主义規章上去，却在重获自由的道路上遭遇到阻力和障碍。陶里亚蒂在資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領域内主张的是改良主义——渐进主义，在工人国家領域内則是“无知”——“不知道”官僚是昨天产生个人崇拜、今天对苏联真正的、彻底的民主化产生阻力的社会阶层。

发表遺囑的后果

在陶里亚蒂的文件中，我們撇开一系列有意义的問題不談而只挑出它的主要本质来談。这是斯大林主义分子右翼，正确地說，斯大林继任人政治傾向的綱領。但是这个綱領写的十分巧妙。陶里亚蒂的着重点放在必需討論各种問題上，即那些使絕大多数共产党积极分子感到困扰的問題上；在这里，他在提出他对这些問題的答案和解决办法时也表现了某种謹慎的态度。

陶里亚蒂的文件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的政治內容，而且在于它在時間上适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危机的时候，也在于它可能引起的反应。

由陶里亚蒂提出其观点的右派，至今还克制自己而沒有公开暴露自己是不同于赫魯曉夫主义的一种政治傾向。他們对赫魯曉夫施加压力，要他在政策上具有更多的右傾性质。文件公布以后，这种右派傾向現在会不会更加明白公开地显出自己的面目，尚难肯定——在工人国家中，有些人居于领导职位，不能自由地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見。可是文件的公布不免增加赫魯曉夫的困难，削弱他准备在12月中召开二十六党會議的地位。意大利人，可能还有別

的跟他們看法一致的人，将会坚持陶里亚蒂的文件，以便同莫斯科的领导保持他們的距离。

文件将在許多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間引起反应。經過这么多年的改良主义政治的日积月累之后，他們中間要想抛弃那些依然受到列宁、托洛茨基时期殘余“拖累”的詞汇的，不乏其人。对他們來說，能够抬出那一时代的老战士陶里亚蒂那样的人作为权威，真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情。

不能不看到，中国人也将从陶里亚蒂的“遺囑”中寻求好处，因为陶里亚蒂甚至在猛烈譴責中国立場的时候，也并不希望同中国人鬧破裂。他在文件中提出举行討論、辯論等等的建議，拒絕举行会同分裂牽連一起的會議。中国人并不反对这样一項建議。即使他們已經抨击訂于12月举行的預备會議，他們也許会在這個問題上改变看法，以期贏得这个陣地。

扩大討論

文件的发表将必然在各国共产党一般党员中間引起的反应，比起它在共产党领导人中間可能产生的后果来重要得多。对他們來說，陶里亚蒂文件中提出的右派解决方案，将比他提的問題和討論这些問題的要求所能引起的影响要小得多。当中苏討論由于重复而失去其吸引力的时候，陶里亚蒂的文件可以重新活跃这个討論，摆出了新的观点，提出了新的看法，特别是強調了这样一种討論的需要。

一次真誠的討論——这是陶里亚蒂意識到并且要求赫魯曉夫加以考虑以便繼續对运动保持控制的——的願望，将会从陶里亚蒂文件的公布中得到鼓励。一切希望清算斯大林主义的积极分子，不論他們的立場是右的还是左的，不論他們是不是还要很久才能

打定主意，将会利用这个文件要求举行一次在当前情形下任何會議都是消灭不掉的大辯論。

陶里亚蒂說：“每一个政党都必须……学会自主行动。党的自主，这是我們坚决主张的，不仅是我們运动的内部需要，而且是我們在当前情况下有所进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我們將反对一切要想建立一个新的中央集权的国际組織的观点。”

如果要从各国共产党領導人的宣言中作出判断，那么在这个問題上是看不到什么分歧来的。事实上分歧是的确存在的，这是因为苏联領導尽管已經沒有任何正式的組織，却仍然认为各国共产党應該象过去一样按照他們的观点站在一条綫上。中国人是由于政策問題而不服苏联領導的指导。至于就陶里亚蒂來說，那是因为他要在意大利強調他的党的“民族”特性，因此他反对任何會議迫使意共推行一个它在有些地方并不接受的行动路綫，即使这个會議并不創建正式的組織。

陶里亚蒂提出的問題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而不能獨立自存，那自然是无法設想的。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曾支持过这种意見；建立或保持一个国际，以便取消各国民族領導的需要，并代之以国际的超級參謀总部。他們支持要有一个国际，那是因为即使在民族范围内，沒有跟国际的观点、方向联系起来，行动是决定不了的。这些观点和方向只有一个既是民主又是集中的国际才能詳細规划出来。

这种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其他观点一起，几十年来在斯大林主义磐石般的官僚作为下湮沒无聞。在当前的危机中，不少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观点已开始复苏，但是关于国际的問題却依然被埋葬于斯大林主义造成的混乱废物堆里。除此之外，那句为苏联官僚机构消灭共产国际服务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口号，現在反

过来对准莫斯科了。每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一面要把磐石般的团结精神强加在本党的内部，一面要求自主。能够解决当前危机的国际会议，是以能够迅速建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为先决条件的。形势远远不是那样。目前根本的工作在于最大限度地扩大讨论，在于把那些仍对这些問題关心的干部吸引进来，在于允许党内各不同倾向表白自己的意見，在于提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派各种思潮的观点，首先是托洛茨基派的、第四国际的观点。第四国际不但在斯大林崇拜的根源問題上很久就已作出了解答，而且在中俄两方都以恐惧的心情認識到的当前問題解决上，作出了贡献。中俄两方的恐惧可以見之于他們近几个月的論战。

共产主义战士急于在这个影响他們运动的危机中找到一条出路，他們将积极捡起陶里亚蒂文件中的要求长期討論的建議，并将打消克里姆林宮的預定計劃。陶里亚蒂的文件表明，这次討論不但沒有結束，而且还只在开始阶段。

(譯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31期)

十八、莫斯科为什么公布 陶里亚蒂的“遗嘱”？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在9月4日公布陶里亚蒂的“遗嘱”，这是官方共产党内部正在爆发的危机中的一件重要事情。《真理报》于9月10日公布这同一的文件。也是有着头等重大意义的。

据说，赫鲁晓夫的代表勃列日涅夫去意参加已故意共领导人葬礼的时候，曾好几天跟陶里亚蒂的政治继任人发生争论，要他们不公开发表这个文件，并且甚么也不讲。根据同一消息来源的报道，这份“遗嘱”本身是陶里亚蒂在同勃列日涅夫发生激烈的争论以后撰写的。这位意共领导人在争论以后显出十分不安的样子。一眼即可看出，勃列日涅夫的立场是符合克里姆林集团的利益的，而赫鲁晓夫作为“较轻的弊害”而公布这个文件，显然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而才作出这个决定的。

在《真理报》上发表这个文件，是不是苏联国内有着内部的压力？对这一点，人们只能猜测。然而，在国际范围内要找到采取这个行动的迫切的理由，那并不困难。

赫鲁晓夫决定召开一次共结果必然是以宣告中苏争论告终的国际会议。赫鲁晓夫在这些事情上的主要发言人苏斯洛夫，要求对中国人干脆来个谴责。然而苏联为12月中召开二十六个党预备会议的宣言，没有象苏斯洛夫的报告走得那么远。宣言表明这次会上并不打算谴责中国人。但是很清楚，预备会议面临着许多困难。中国人和同意他们观点的四、五个党不会参加这次会议。另外四、五个党可能也不会参加。现在，陶里亚蒂的“遗嘱”被扔了进

来，声称意共将参加预备会议，以便在这次会上提出是否应在1965年举行世界会议的主张。

这样，赫鲁晓夫就处于一个对本人威望扫地攸关的局面。还只在几天以前，他曾经在陶里亚蒂的葬礼上颂扬了他，现在不把他的遗言发表，将在事实上成为对意共友好姿态的一种蔑视，并且曾有关闭任何妥协大门的风险。赫鲁晓夫还必须考虑到，不少共产党的领导人对这个“遗嘱”肯定是抱有好感的。他还必须考虑到，陶里亚蒂尽管是反对中国人的立场的，但是他的文件对于中共领导不是没有好处的。文件一面反对在1965年召开会议，一面充实了谴责修正主义的内容。赫鲁晓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陶里亚蒂的文件，他就不得不承认在他原想蒙混过关的某些抨击。

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不得不打肿了脸充胖子。但是不要忘记，赫鲁晓夫有他赌客的一面，有的时候是愿意冒很大的风险的。在当前的环境下，由于同斯大林主义国际危机直接有关的原因，《真理报》的读者知道陶里亚蒂提出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根源、非斯大林化的犹豫不前和阻力、工人国家阵营内部出现新的矛盾等等问题，他们还知道陶里亚蒂亲自表示有需要就这一切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不管陶里亚蒂的提法多么谨慎小心，这对苏联公众来说决不是一个平常的事件。恰恰相反！

要对苏联国内的反响作出判断，现在为时还太早。在一个曾被长期剥夺意见自由对立的社会内，显著的效果很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生。但是，苏联的领导人不管采取什么方法来削弱这个影响，他们的努力终将是徒然的。对于每个人的遭遇和他们的“遗嘱”，那是无法比较的，可是这里的确存在着一个测度表，表明时代已经起了变化，官僚政治的能力也随同起了变化。列宁的“遗嘱”隐瞒了将近四十年。“遗嘱”的占有和传播至少意味着流

放。陶里亚蒂死后二十天，他的“遺囑”就在《真理报》上发表了。

陶里亚蒂的“遺囑”的境遇表明，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管看来多么强大，他们不再能够遏制政党动摇的危机了。各式各样的事件打乱了他们的估计和计划。讨论就是在世界前所未见的最最革命的力量本身中产生的。官僚主义的当局和官僚主义的方法注定是要失败的。阴谋诡计要随着压制而失败。斯大林主义的彻底清算已经摆到日程上来了。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31期）

十九、为了刚果的自由战士们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 1964 年

9 月 22 日声明

比、美两国帝国主义联合在一起，把厚颜无耻的新殖民主义冲伯政权强加在刚果人民的头上。冲伯是 1960 年在联合矿业托拉斯支持下设立于加丹加的分裂政府的首脑。直接参与杀害卢蒙巴的冲伯，长期以来就是刚果的反动的、部落的、亲帝的势力的化身。这股势力把这个不幸的国家交由一些国际托拉斯及其刚果代理人在他们之间进行分割。

非洲的帝国主义主子感到，他们在刚果的巨大产业受到了人民致力于终止殖民主义统治、赢得自由以及冲破帝国主义剥削和困苦的斗争的威胁。外国的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控制，一切在所不惜。他们在“民族和解”的薄薄一层掩饰下把冲伯强加在刚果头上。这个口号的诡辩性质见之于以下的事实：用来达成“民族和解”的军队是由 1960—62 年公开反对全国统一的加丹加宪兵、由那些曾被用来反对阿尔及利亚自由战士的法国秘密军队组织的前职业杀人犯、由希特勒黑衫党的凶手、由正在南非和南罗得西亚征用的最凶恶的白人种族主义分子雇佣军等四方面组成。帝国主义者为了进一步扶持他们的傀儡，正在日益公开地提供飞机、武器之类的军事援助。

面对冲伯政权这种公开的亲帝国主义的和新殖民主义的性质，由各种卢蒙巴派力量领导的刚果人民大众起义，是刚果革命的一个新的高潮，这次革命由于卢蒙巴派力量在 1961 年的暂时失败

曾經突然停頓下來。剛果人民大眾正在為本國的統一和獨立、為趕走帝國主義的走狗而進行鬥爭。到了一定階段，他們的鬥爭必然要把帝國主義托拉斯控制本國自然資源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

從國內鬥爭來說，這個鬥爭的壓倒一切的性質在於這是一次反對帝國主義直接代理人的民族解放戰爭。這個戰爭是具有高度進步性的，應該得到全世界、特別是帝國主義國家勞動大眾的全力支持。自由戰士的勝利將在整個赤道非洲掀起新的革命怒潮。反之，失敗將使安哥拉、莫三鼻給的野蠻的殖民主義政權得到加強，將使沖伯與之日益公開勾結的南羅得西亞、南非白人種族“隔離”統治者的地位得到鞏固。

在剛果，站在鬥爭的前列，象優秀的軍士那樣在民族解放鬥爭中服役，這是工人階級和馬克思主義的戰士的職責。他們必須向自由戰士提出外國托拉斯產業國有化的綱領，建立集體農業的綱領。這些措施可以大大有助於剛果擺脫目前的困苦。正是在鬥爭的過程中，他們的努力將為一個以科學社會主義為基礎的、致力於將剛果革命繼續進行並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群眾性馬克思主義政黨奠定了基礎。

非洲國家組織在亞的斯亞貝巴會議上就剛果問題作出的反動決議，必須予以徹底的譴責。大多數出席亞的斯亞貝巴會議的非洲“獨立”政府，由於他們對沖伯政府的承認，由於他們對剛果民族解放委員會的反殖民主義鬥爭拒不給以支持和援助，他們也就顯示了他們的害怕心理，生怕開一“先例”，有利於勞動人民大眾反對非洲“正統”政府而舉行的別的起義。很明顯，這些政府本身大都是新殖民主義的、是害怕類似的人民運動高潮的。埃塞俄比亞皇帝尤其是如此，他是同殺人犯沖伯作成交易的中間人。

打倒作為帝國主義走狗的沖伯傀儡政權！

美国、比利时和英国的工人们：迫使你们的帝国主义政府停止
援助冲伯政权！

刚果自由战士的解放斗争万岁！

非洲革命万岁！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32期）

二〇、庆祝第一国际一百周年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 1964 年

9 月 25 日宣言

一百年前，国际工人协会于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举行成立大会。全世界的无产者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国际政党。

第一国际尽管有它政治上的局限性、组织上的缺点和抵消力量的内部纷争，但是它执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工人阶级的民族性组织能够从整个无产阶级运动中吸取共同的经验、知识和本领，这是第一次。他们学会了团结本身力量共同对敌的方法。

第一国际并没有能够胜利完成自己的事业。可是，它从新的经验知识中丰富起来的纲领，在以后的国际组织中得到了体现。

第二国际创建了广大群众性的政党，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知识带给千千万万的工人，特别是西欧的工人。后来，到了 1914 年，它在多年来一直是在准备肩负的任务面前，即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反对这个任务面前，声名狼藉地垮了台。

第三国际亲眼看到，第一个工人阶级国家在 1917 年第一次胜利的工人阶级革命之后得到了巩固。第三国际还在整个殖民地世界播下革命社会主义的种子。自从以斯大林为首的保守官僚篡夺苏联政权以后，第三国际就成为莫斯科对外政策的工具，甚至用来反对许多国家的革命高潮，而最后在 1943 年为斯大林所解体。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怎样出色地经受了一百年的考验？资产阶级的发言人说，马克思主义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修正主义者再三说，马克思的论点需要根本修改。真实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

义、特别是在它经过列宁、托洛茨基、卢森堡等人加以发展和丰富以后，为合理了解世界社会提供唯一的钥匙，为改善世界状况提供唯一有效的方法。

过去一个世纪的斗争，包括辉煌的胜利和苦痛的失败在内，特别表明：马克思、列宁对那种认为可以通过“和平道路”进入社会主义的说法指出它是一种空想的警语，是完全正确的。最近的例证可以见之于古巴和阿尔及利亚。

在今天的世界上，国际工人阶级面临着复杂而困难的问题。根据过去三个共产国际的精华而建立起来的第四国际，对这些问题提出活的马克思主义的深邃见解。它向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的工人，对它一开始就在列昂·托洛茨基指导下与之斗争的斯大林主义的奇怪现象作出唯一合理的说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部分透露，十分有力地证实了托洛茨基几十年前的分析。他的透露同样证明第四国际关于工人国家的纲领的正确性。这个纲领就是要按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今天在国际工人阶级面前摆着具有世界意义的任务。这个阶级一方面必须完成由中国革命的胜利开其端、十年后随着古巴的胜利而登上新的高峰的殖民地革命运动。另一方面，这个阶级还必须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开始并迅速完成社会主义的胜利。

这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防止人类在一次核冲突中可能归于消灭的唯一可靠途径。这是一条唯一的途径，可以走上一个种族平等、男女老少平等都能获得保障的世界——一个无比富饶、有着人类发展的充分机会和从生到死的福利的世界；一个持久和平、国际博爱的光明的社会主义世界。

从资本主义丛林里走出一条路来，并不容易。路上的困难重重。有些主要问题，现在正在各洲的先进工人中间进行讨论、特别是结合中苏争论的分歧来进行讨论。在这次争论中，我们相信，中共领导人说了许多正确的話，但是他们在斯大林的作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错误的。没有一个人曾象斯大林那样把可能赢得的无产阶级胜利变成势所必至的失败，放慢、戕害和阻滞社会主义革命。

在庆祝第一国际一百周年的时候，如果没有恢复和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目标，那将仅仅是一种形式。我们要承认，反对这种国际主义的力量还很强大，这种阻力的根子是工人组织的官僚。一定要同这种保守的反动倾向作斗争。象第一国际创建人教导的那样，全世界无产者需要自己的组织来同世界敌人进行斗争。

在第三国际被苏联官僚腐蚀、最后又被斯大林解散以后，第三国际在开头四次代表大会上制订的纲领已由托洛茨基保存了下来。这个纲领成为1938年创立的第四国际基本纲领的一个部分。

首先由第一国际以有组织的方式提出的革命社会主义，第四国际是确保其理论和实践继续的组织。

不管你们抱有怎么样的看法，不管你们同其他工人阶级组织有着怎么样的分歧，让我们在这个日子共同庆祝第一国际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起点吧。让我们根据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精神，在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进行共同的斗争中，致力于寻求团结的途径吧。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32期）

二一、中国和原子弹

帝国主义的美洲，这个全世界最强大的地区、世界资本主义的根据地和主要堡垒，也以它自己的特殊方式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五周年。9月29日，也就是在七亿中国人民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来庆祝他们祖国历史上最重大的节日的两天以前，国务卿腊斯克宣称，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中国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爆炸它的一个原子装置。这位约翰逊政府的发言人显然很担心这种爆炸可能会成为中国国庆节庆祝活动中的一个节目。

腊斯克的目的当然是想挑动全世界普遍存在的反对进一步进行核试验的不安情绪。这种情绪本身原是很健康的，因为它是同全人类中广大群众力求维持世界和平的深刻愿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可是美国国务院领导人为了挑动这种情绪所讲的话，实在是虚伪达于极点。他的政府，由于在人烟稠密的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而揭开原子时代的序幕，从而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骯髒的一页。他的政府坚持年复一年以数百次爆炸试验来污染环境的大气层，接着更开始了一系列的令人震惊的氢弹试验。

最后，它还进行了一种全新的试验，使这种足以一举毁灭全人类的武器缩小到极小限度，以便他们在一次有计划的战争中作为“战略武器”来加以使用。这种武器的地下试验现在仍在进行中。

除开以上所说的这些之外，美国政府更公然以这种“现代武器”装备了它的武装部队。

就在现在，美国政府的最高官员们还正在热烈地讨论，他们是

否需要把他們在南越進行的戰爭推向北越，並最後擴大到中國。他們在那里爭論着，他們是否應該授權戰場上的司令官，讓他們根據自己的“考慮”實際使用核武器。

非常明顯，即使中國爆炸了一個核裝置，美國仍然有力量發動一個使全人類陷於熱核災難之中的戰爭。

儘管腊斯克別有用心，但他實際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做出了一次真正的貢獻。他在言語之間已經完全承認，在僅僅十五年之中，中國已經從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所造成的廢墟之中，從受到美國支持的屠夫蔣介石進行的國內戰爭的恐怖歲月之中，從由於封建和資本主義長期統治一直被迫處於停滯和落後狀態的情況之中，終於成長起來，變成了一個現在已經能夠跨進原子大門的工業強國。

爆炸一個原子裝置的能力，當然也表明這個國家具有將原子能使用於和平事業的能力。中國在這方面取得的技术問題上的成就，說明中國可能會甚至以比蘇聯更快的速度朝着工業發展的道路上前進，因為蘇聯當時不得不擔任道路探索者的角色。

腊斯克所謂的中國的目的只不過是為了擠進目前以美國為首的熱核戰爭販子俱樂部的說法，實際是不值一駁的。即使中國有此願望，它也根本不可能製造出大批原子彈和投擲原子彈所必需的飛機、潛艇和導彈。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具備有象今天的美國或蘇聯所具有的那種工業基礎。而中國至少還需要幾十年才能達到那種水平。

目前中國所能做的，至多不過是慢慢通過實驗，以取得美國和蘇聯現在已經加以使用的原子秘密。這種實驗的副產品就是聚集足夠的材料來爆炸有限的幾個象美國在廣島和長崎使用的，以及英國和法國已經爆炸過的核裝置。可是能夠做到這一點，就充分

证明中国已经获得了美国在 1945 年和苏联在 1949 年所取得的技术上的成就。

腊斯克在公开表明美国国务院对于中国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怀着恐惧心理的时候，实际就等于是证实了中国革命力量的强大，证实了计划经济的巨大力量，证实了现在在亚洲大陆上正日益发展的令人惊愕的新的潜力的存在。

中国正迅速地走上世界强国的前列。它的兴起加强了和平力量，而不是加强了战争力量。不管中国在使用原子能方面取得何种形式的成就，热心于社会主义的人们始终会对它抱着这样的看法：尽管华盛顿、伦敦、巴黎和……莫斯科尽一切力量防止中国的科学家在这方面取得成就，但中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终于打破了这方面的秘密。

（译自《世界展望》第 2 卷第 34 期）

二二、赫魯曉夫的下台

苏联官僚集团的危机达到了一个新阶段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 1964 年

10 月 19 日声明

I

赫魯曉夫突然被撤消苏联共产党〔苏共〕的首脑和苏联政府领导人的职务，又一次极其显著地证明，在进步的苏联经济结构和由斯大林建立的倒退的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上升号宇宙飞船的发射，非常具体地证明了苏联科学和工业的巨大进步。三天之后赫魯曉夫就下台了，这就使得苏联政治上的缺点和混乱，和科学上的成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照。

克里姆林宫的新的领导人立即慌忙向世界表示，领导人的突然改变决不表明国内或国外政策的基本路线将会有任何变动。他们公开提出，他们将切实地执行赫魯曉夫的路线。

那么，苏联官僚集团又为什么要抛弃赫魯曉夫呢？

如果苏联官僚集团领导人对赫魯曉夫制定的总路线表示出一定的关心，那只是因为他们，象他以及他们之前的斯大林一样，全都是彻头彻尾的经验主义者。赫魯曉夫在执行那条路线时表现了許多在他们看来显然是过火的和错误的做法，他们因而感到不安了。

事实是，赫魯曉夫在许多方面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使得局势越来越紧张，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化了。苏联官僚集团希望从死胡同

里找到一条出路，因而决定拿赫魯曉夫来作一头替罪羊。

在国内經濟政策上，赫魯曉夫一味提出了許多如何提高苏联人民生活的漫无边际的空洞的諾言。九年来苏联消費者的境遇确也略有改善——这期间赫魯曉夫的威望主要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可是等到他，由于連續五年农业生产的停滞，不得不提高肉类和奶油的价格，不得不从資本主义国家进口大量的粮食的时候，情况馬上有了一个急剧的改变。去年冬天，在无数面包店門口排列的长队，对他的威望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今年农业上的較好的收成也无法挽救这个局面了。

赫魯曉夫的“生荒地”开垦計劃也同样以失敗告終。《真理报》忽然提到的不听专家的劝告而制定的“魯莽的計劃”，实际就是指“生荒地”开垦計劃而言，这个計劃苏联科学院是一直不贊成的。

赫魯曉夫农业政策的破产——自1955年以来，第四国际曾一再指出，这个问题对赫魯曉夫能否掌握住苏共領導权将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重新轉向加强正規农业的生产不可能立即获得重大效果，由于建造为发展农业所必需的較大的化学工业需要一定的時間，因而显得更为严重了。

經过大吹大擂提出的建立化学工业的計劃，由于苏联总的工业生产率的降低，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放慢了速度。要想在同一个时候既要迅速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又要維持同帝国主义进行軍备竞赛，既要大力增加对殖民地資產阶级的援助，又要在国内进行狂热的建設，而且还要拿出大量的投資以求长期維持工业的高速度发展，那显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这里还必须強調指出，赫魯曉夫提出的經濟改革政策，虽然在克服斯大林时期的过分集中和机构的过分龐大所造成的困难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后来却慢慢地越来越沒有作用了。目前

在苏联国内进行的有关經濟問題的討論，已初步表明苏联經濟正面临新的困难。

赫魯曉夫根本无意采取“大跃进”政策，而如果实行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計劃經濟和工人自己管理工厂的办法，那經濟上的大跃进也还是有可能取得的。

苏联官僚集团牺牲掉赫魯曉夫，把农业和工业上的困难全部归咎于他，目的是希望用这种办法来爭取時間，以便嘗試新的解决办法。

但不管怎样，一切可能的改革都只能具有有限的效果；苏联現在需要的是对整个經營管理制度进行一次彻底的改变。

在外交政策方面，赫魯曉夫变成了一系列的大大降低苏联威望的錯誤的替罪羊。这些錯誤包括出于不正当的估計在古巴設置導彈，提出立即解决西柏林問題的諾言而又无法实现，贊成联合国派遣“联合国軍”到刚果，而結果刚果又出現了卢蒙巴被杀害的事件，更重要的是他对待中国問題的态度引起了最大的憤恨和反对。

把苏共和中共之間的爭吵引到两国政府之間的关系上去，有其必要嗎？有必要忽然停止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嗎？有必要在尼赫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仗的时候，給尼赫魯以軍事援助嗎？有必要撕毀协助中国建立核工业的協議嗎？这些問題无疑使得越来越多的苏联领导人感到不安。更重要的，事先沒有得到充分的保证，不知道被邀請的大多数的党是否会接受邀請并支持苏联的提案，竟貿然决定在1964年12月15日召开二十六国共产党筹备會議，这种做法不是太不明智了嗎？

事实上，赫魯曉夫处理中苏分歧的态度，在苏联官僚集团的眼中，最后簡直是造成了一个灾难性的結果。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結被破坏了，苏联党的威望在各个地区又一次更为下降。甚至那些

支持克里姆林宮反對北京的黨也不願意再遵循蘇聯黨的方針辦事了。中蘇衝突產生了巨大的離心力，這不僅表現在各黨之間的关系上，如我們從意大利黨的態度上可以看到的，而且表現在政府之間的关系上，比如象羅馬尼亞對蘇聯的关系。如果明天東德，由於抗議蘇聯和波恩接近的計劃，也走上了羅馬尼亞的道路，那麼克里姆林宮對於這半數以上的緩沖國的控制就很可能會趨於解体。

此外，蘇聯官僚集團還希望，通過犧牲赫魯曉夫的做法以制止同北京的关系業已日益惡化的趨勢。重新恢復談判的主要障礙既然已經去掉，那麼北京也就可以作出自己的讓步而不至感到丟臉了。

如果現在來舉行十二月籌備會議，那麼它的意義就會完全改變了。那麼無限制的爭吵，雙方採取的許多不負責任的行動也可能就會停止了。即使不可能全面和解，至少可以把這種分歧從爛泥坑中拉出來，重新放到外交家和“理論家們”對坐着的鋪着綠色台布的桌面上來。

II

赫魯曉夫在職的那幾年，將來一定會被稱作是“非斯大林化”的時代。過去，蘇聯官僚集團篡奪了統制整個蘇聯的權力，斯大林更把這種權力變成了越來越由他個人專斷獨行的寡頭統治，現在，使這種情況成為可能的國內、國際條件都已經完全改變了，在這種新的條件之下，蘇聯的群眾已經不願意再容忍這樣一個殘酷的政權機構，不願意使自己生活上的需要完全從屬於許多包含着巨大浪費的、帶有投機性質的龐大計劃了。為了防止象 1953 年在東德、1956 年在波蘭和匈牙利發生的那種隨時可能出現的爆炸性事件，為了挽救住他們所享有的特權和他們的統治權力，蘇聯官僚

集团的领导人們于是不得不牺牲掉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化的方針。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們同时消除了斯大林在苏联經濟、政治、科学和文化領域所使用的一些极端专横、极端有害的领导方法和行政管理办法，因为这些东西越来越严重地阻撓着苏联的进步。

一向被认为是“非斯大林化”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赫魯曉夫，其实既不是这一运动的发起人，也不是它的最坚决的拥护者。在各个領域中，常常是一些更年青的、更有生气的新生力量的代表們在尽力把“非斯大林化”运动向前推进一步。这样做的必然結果，就将是重新恢复托洛茨基以及和他同时代的布尔什維克們所开创的局面。目前，进一步“非斯大林化”的主张早已受到了譴責，甚至已經被完全压制下去。

“非斯大林化”既不是赫魯曉夫的根本方針，也不是他个人所奉行的政策。这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計，是官僚集团中的絕大多数都表示贊同的一种籠絡人心的让步，因为从这里面，官僚集团可以更安全地保全自己的地位，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更大的支持。在赫魯曉夫倒台之后，决定“非斯大林化”这一路綫的客观因素还一定会繼續发生作用。

几年来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減輕了在斯大林时代使得許多社会阶层陷于瘫痪状态的恐惧心理。苏联人民群众，由于他們赢得了让步，越来越加强了自己的信心，是决不会容忍那种苦难和恐怖的統治再重新回来的。任何一种想要恢复斯大林統治方法的企图都将会遭到苏联人民的强烈的反对。

在赫魯曉夫倒台后出版的第1期《真理报》上，苏联的新的领导人們宣称他們将仍然执行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路綫，这件事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他們这样做就等于

是向群众保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在一切次要的政策上出现什么局面，“非斯大林化”所已取得的主要成就是—一定会继续发扬的。这同时也就是保证决不会恢复专横跋扈的警察机构、重新在工厂中行使残暴的压制性的法令，也决不会把人民的生活水平再降低到同斯大林时代一样。保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努力将继续进行下去。这些官僚集团对人民群众的让步，从长远来看，将只会增强人民的自信心，而进一步削弱官僚集团的统治。

正是由于客观条件不容许在“非斯大林化”问题上采取根本性的倒退政策，所以他们在对外政策方面也不敢说要作出根本性的改变。苏联官僚集团从来也没有意思要发动世界大战——同事实不符的相反的说法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所散布的谎言。另一方面，它也从来没有有意識地扶植社会主义革命，尽管只有那样做才是取得世界永久和平的唯一道路。这两条路线，尽管方式各异，其结果都将会召致官僚主义统治的灭亡。排挤掉赫鲁晓夫的那些人无疑一定会继续执行他的所谓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个政策并不是赫鲁晓夫首创的——它的发明权应归之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同美国进行经济竞赛”的政策只不过是斯大林的“在一国中建成社会主义”的旧理论在新的条件下的应用。

官僚集团的新的领导人，那怕只是为了便于同中国重新恢复谈判，为了掩饰，在他们自己的地位还没有得到巩固以前，他们本身的不稳定状态和信心的缺乏，很可能会使用比赫鲁晓夫在过去两年中所使用过的更为强硬的言词。也可能他们将改变赫鲁晓夫最近在和美帝国主义合作方面所采用的某些遭到非难的办法，比如象同五角大楼联合起来武装印度的资产阶级（这就是既反对印度的人民群众，又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放手让美帝国主义在东京湾和刚果为所欲为。现在，一切引人注目的缓和莫斯科和波

恩之間的关系的努力(这一前景曾使得东德、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大为不安)，特别是自从西德的资产阶级拒绝承认德国的新边界、并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多边核力量的范围之内追求建立自己的核武装之后，无疑已不可能继续进行下去了。

苏联的官僚集团，一如在赫鲁晓夫和斯大林的统治时期一样，一定会继续寻求，在主要为了共同维持现状的基础之上，同华盛顿作出全面的安排。它将继续反对核扩散，不管华盛顿供给象加拿大那一类的国家多少核武器的储备，仍然忠心耿耿地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不容其他的工人国家得到核装备。它将提出减缓军备竞赛的建议和裁军的主张。他将继续寻求同殖民地资产阶级进行经济合作，以代替扶植殖民地地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因为这一方针将会彻底改变力量的对比，而这种改变，不管对于工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是如何有利，肯定是不利于苏联官僚集团的统治的。它将继续尽一切力量将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斗争限制于资本主义统治和资本主义法令所许可的范围之内，推延那些国家中的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一直到美国的生产按人口比例计算低于苏联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使中苏分歧，通过两国和两党在根本路线上达成完全的协议，以立即求得彻底的解决，那几乎是犹如扭转“非斯大林化”路线以及放弃“和平共处”政策一样地不可能的。中苏争端实际并不是赫鲁晓夫的“错误”造成的。它只不过是表现了在对待帝国主义、国际革命和各自本国的人民群众的问题上，处于不同地位的两个官僚主义集团利益上的严重分歧。

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成功，对于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具有深刻的影响。它可能会使中国能更快地加入联合国，这种可能由于许多非洲国家继法国之后对中国予以承认，早已逐步

加强了。可是約翰遜却仍然不願意从远东撤回第七舰队，放弃台湾，或听任东南亚条約組織解体。只要华盛顿不肯放松压力，中国就面临着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部分經濟封鎖的可能。这种情况的存在早就足以迫使北京采取一个跟莫斯科完全不同的路綫。

克里姆林宮里的新的头目們，既然决定繼續执行由斯大林提出而由赫魯曉夫加以发展的主要政治路綫，必然也就將遇到使他們的前任蒙受政治灾难的同样的无法克服的困难。

III

苏联官僚集团希望通过抛弃赫魯曉夫以求得解决眼前矛盾的临时的办法。只要这个新的班子能被統治机构中的絕大多数所接受，只要政治危机不发生新的震动人心的轉折，官僚集团也許可以借此爭取到一定的時間。可是官僚集团是絕不可能克服由它的統治本身的特性所产生的各种矛盾的。赫魯曉夫的繼承人們，看来不但不能緩和那些矛盾和困难，相反地却只会使它們进一步恶化。

为了防止在經濟領域中出現爆炸性的事件，农业投資計劃必需以加倍的速度进行。可是柯西金，这位由于农业投資应如何按地区分配的問題曾經同赫魯曉夫发生爭吵并以此而聞名的工业专家，在牺牲重工业方面，肯定不会比赫魯曉夫表现出更大的热情。柯西金所以会被选来和勃列日涅夫分担最高領導权，这一事实就表明了官僚集团中他所代表的那一部分力量的影响。另一方面，工业生产速度的普遍放慢，对于化学工业計劃以及对于农业生产质量上的改进，肯定不会是一个吉兆。为了脫出这个困难的境地，就必须有某些方面遭到牺牲——这或者是人民群众的願望，或者是官僚集团中的工业派的偏好，或者是工厂和托拉斯的經理們

的要求，或者是集体农庄庄員們的願望，或者甚至是某一些社会阶层的利益。

在国际政治方面，情况也不是很好。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們因为急于要表現他們对“和平共处”事业的热心，作出了种种引人注目的姿态。可是要想一方面改进同北京的关系，一方面又不让华盛顿感到忧虑，那如何可能呢？因为，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所需要采取的步骤，在本质上是根本对立的。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情况也完全相同。当然，同北京的关系的某种程度的改善，将可以使中国人在爭取建立一个新的亲中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便同莫斯科的“正統”运动作竞争方面，放慢脚步。可是赫魯曉夫的忽然下台已經在一切共产党中引起了不安，引起了忧虑和混乱，这一事实有什么办法可以抹煞呢？赫魯曉夫的被逐以及这件事所以能够产生的具体条件，将不可避免地加强国外的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对于苏联的論点和網領早已抱有的怀疑态度，加强他們不願机械地亦步亦趋地追随克里姆林宫的傾向，这一事实又如何可以完全抹煞呢？那些在解释“非斯大林化”的意义和力图为不知名的赫魯曉夫建立威信的工作上遇上了最大的困难的人們，現在可能会感觉到，在作为过渡的“集体领导”由于选出一个新的执掌大权的“第一書記”而宣告結束之后，現在要想在那个神座上再安置上一个新的上帝，恐怕前景是非常不妙的。

同官僚集团上层人物的願望相反，甚至同这件事所产生的，在他們看来，似乎很令人滿意的直接結果相反，赫魯曉夫的被逐，不但沒有阻止克里姆林宫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控制权的日益削弱，而且是更加速了这一过程。官僚集团指責赫魯曉夫，說他的許多行动帮助推动了“多中心主义”的傾向。但忽然抛弃他的这种行动只可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一步刺激这种“多中心主义”的发

展。没有一个卓越的领导人，而只有一些在对每一个具有一絲一毫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进行清洗的那些年月里，一再受到斯大林的洗炼、庇护的官僚主义分子，在这稳定的个人领导遭到新的打击之后，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不可能重建起自己的威信。苏联的官僚集团慢慢将不得不习惯于看到他們的行动越来越多地遭到別人的議論，他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出的指示将越来越受到严厉的批評。

那些或者象日益向右的意大利党，或者象日益向左的委內瑞拉党，表现了决心单独行动的各共产党，从今以后，将会更加毫不拘束地走着自己的道路。而那些同法国党一样目前看来在接受领导方面称得起模范的各共产党，也可能会忽然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現。“多中心主义”势将越来越表现出它自己的发展的邏輯。

这个邏輯同样适用于工人国家。对它們來說，赫魯曉夫的下台也同样既是深刻地危及整个工人国家制度的危机所产生的結果，又是加深那种危机的一个新的因素。它們全都清楚地看到，中国第一顆原子弹的爆炸和赫魯曉夫的下台，两者之間即使沒有因果关系，却是发生在同一个時間。苏联领导人的突然更換急剧地改变了苏联同其他工人国家之間的关系。

这些过去完完全全接受斯大林控制的工人国家，現在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它們看到了南斯拉夫的反抗，接着中国也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出現了。反抗莫斯科的情緒越来越高涨了，东德、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更充分地表明了这种情緒，克里姆林宫只得以放松控制作为代价，才重新获得掌握这些国家的权利。由于群众的压力和“非斯大林化”的直接結果，这些年来苏联官僚集团的威望越来越削弱了。赫魯曉夫的垮台更是对这种威望的又一次严重的打击。其結果也将会在这方面对“多中心主义”产生新的推

动力。

赫魯曉夫的下台最終將對蘇聯社會產生什麼結果呢？人民群眾要求徹底改變政治制度的思想已經趨於成熟。在赫魯曉夫突然退出政治舞台一事的震驚之下，人民群眾有種種理由感到，有必要要求克里姆林宮的新的領導人們實現赫魯曉夫一次再次提出的種種諾言。

這些諾言可以開出一個很長的清單，從修建紀念碑以紀念斯大林恐怖統治時期的受害者，一直到在幾年之內使蘇聯人民生活達到同美國工人生活相等的水平。另外他們還將提出由於政權易人的性質所引起的一些新的要求。

赫魯曉夫的下台將對蘇聯人民群眾敢於批評的思想產生新的巨大的推動力，因此也將對進一步消除官僚主義統治產生新的巨大的推動力。在對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進行清算之後，在赫魯曉夫突然被撤職之後，蘇聯的共產黨人、其他工人國家以及全世界各地的共產黨員將可以更正確地評價動搖著蘇聯官僚主義統治的那種危机的歷史地位。他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無產階級民主的正確形式的建立，不但絕對不會構成對蘇維埃國家和“社會主義陣營”的穩定性的威脅，而實際卻是達到這種穩定的首要條件。托洛茨基的分析在這裡得到了徹底的證明。

IV

從赫魯曉夫的倒台所提出的主要教訓是，現在有必要徹底改變蘇聯的政治結構。

赫魯曉夫被趕下台的決定，從性質上講是非常奇怪的。廣大的蘇聯共產黨員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成員都完全不知道，這一決定是由誰作出的、由誰執行的、為了什麼理由，以及根據什麼論

点。他们既不知道这个被作为牺牲的人的观点，也不知道，他对于他所遭受到的秘密控诉曾如何为自己进行辩护。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在苏联是不存在的。

官方的宣传告诉我们，他们正在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社会；那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中国家和同国家有关的各种形式的控制都已经消失了。官方的宣传告诉我们，现在是“全体人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纲领严肃地将苏联命名为“全民的国家”，将苏联党命名为“全民的党”）掌握着政权。而这据说是掌握政权的人民，只看到政府领导人突然变更，却根本不知道，究竟是哪些中央委员参加了作出这一决定的10月14日的会议，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方式表决作出的决定，也不知道这一议案是怎样提出的。他们不知道新的政府的纲领同旧的政府的纲领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国家属于“全体人民”，而这“全体人民”对国家的事务却仍然一无所知。

在苏联，甚至在斯大林独裁统治时期，政府权力也并不是真正由一个人的力量来推行的。但是很明显，那也决不是“全体人民”的力量，或者无产阶级的力量。那么，构成这种力量的是些什么人呢？是以人民的名义掌握权力的“苏联共产党”吗？无数百万的党员只是在10月15日听广播或者在第二天读《真理报》的时候，才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又怎么样呢？这个机构，在1957年召集全国各地数以百计的官僚集团上层分子举行会议，以批准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的时候，确曾表现出它的真正的社会基础。而免除赫鲁晓夫职务的这次会议不管是跟那次会议完全相同，或者在规模上要小得多，它仍然只不过是代表了在苏联垄断政治权力长达三十五年以上的那个官僚统治集团。

陶里亚蒂在他的“遗嘱”——这个“遗嘱”无疑对赫鲁晓夫的下

台起了一定的作用——中宣称，苏联仍然沒有回到列宁主义的政权形式上去，仍然沒有建立在政治問題上公开发表意見、进行討論的自由。这話是对的，至少也部分地反映了真实的情况。赫魯曉夫被黜的方式表明今天的苏联，同列宁的时代（那时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比現在要穷得多、弱得多，而且受到比現在大得多的帝国主义的壓力）所建立的政权形式，不知要相去多远。

苏維埃民主的标准要求組織工人和农民的委员会（苏維埃），在这种委员会中一切尊重国家制度的团体和个人都保证享有发表意見的自由。在这种制度之下，全体工农委员会的代表会（苏維埃代表大会）将根据明确提出的、經過充分的公开討論的綱領提出政府首腦的人选。在共产党內，列宁所理解的民主集中制的概念是，一切問題在領導集团做出決定以前，必須在黨員群众中进行充分討論；容許在公开发布的綱領的基础上，在把問題提交黨員进行毫無顧忌的爭辯的基础上，自由地組成党內的派別；同时在經過全党的民主討論之后，以不同的綱領为基础，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去参加決定政策的机构。在今天的情况下，建立一种工人階級多党制以加强无产階級民主的实施，看来是完全可行的。

在苏联重新建立无产階級民主，将会大大加强无产階級和农民階級的团結。它将使得苏联政府有可能重新获得跟列宁的时代相同的人民群众的充分的信賴。它的一个巨大的好处将是成立一个有秩序的宪法机构，使領導人的更換始終遵循着正常的程序。

在国外，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苏联对劳动人民的吸引力也会大大加强。苏維埃民主的优越性，对于作为一个个体或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來說，都将会在日常生活中得到证实。

正是为了沿着这样一条路綫建立起无产階級的民主——甚至比列宁时代更为广泛、更为有效的无产階級的民主——第四国际

长时期地进行了斗争。

资产阶级记者和政客们总常常拿“西方的民主”来同斯大林时期建立的种种制度相对比。但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从来都没有扩展到生产关系上去，而在政治领域中，它也遭到了严重的侵蚀，有时甚至为法西斯主义所代替。无产阶级的民主则将渗透到所有的工厂、农庄以及整个社会的全部结构中去。无产阶级的民主，从质量上讲也将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的最好的民主优越得多。

要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就必须通过一次政治革命以打破现在的官僚集团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并把这种权力交还给城市和农村中的工人群众。赫鲁晓夫的倒台和他倒台的方式都同时表明这种革命现在仍是如何需要，以及这种革命的苗头已经是愈来愈临近了。

1956年，当斯大林个人迷信问题在联共二十大提出时，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直是致命的一击，使得它从根动摇了。比如在美国，它使得共产党不再成其为一个有效的组织了。在别的一些国家，它引起了巨大的争论，使得党的领导易人，并造成党的分裂。中苏分歧也产生了同样的作用，其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党员群众的范围。古巴革命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共产主义运动之外形成的新的革命政权，而使得问题更形复杂。现在赫鲁晓夫的倒台，则更是对这一巨大运动产生了新的动力，而这种运动的要求，从根本上讲，就是打破已经僵化的组织结构，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领导。

因此，所有积极的共产主义者都深切地关心最近的这一事件，并从中取得一切教训。他们应该要求对有关赫鲁晓夫下台问题的每一个问题进行充分的和自由的讨论。他们首先应该提出的问题之一，是听听赫鲁晓夫自己为他所采取的路线进行辩护。结束居

于少数派的赫魯曉夫的領導权的那次會議的速写記錄，應該立即印发給大家，應該让赫魯曉夫利用苏联報紙的篇幅，以及让他有机会出現在電視台和廣播電台，說明他自己的立場。工人階級中的各个派別，包括托洛茨基派在內，都應該有权參加討論。

各地积极的共產黨員，在他們自己的黨內，應該記住一个巨大的明显的教訓，那就是，依靠莫斯科的領導是危險的。斯大林領導的灾难性的实质在二十大上已經完全揭露出來，連瞎子都可以看見了。現在有关斯大林死后莫斯科領導的新的揭露，也已經提上了日程。

各共产党，必須在配合本国革命发展需要的指导之下，学着单独制定自己的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政策。这样做的最后結果，必将加速資本主义的灭亡，从而大大加强工人国家的陣容。

赫魯曉夫的倒台又一次強調表明，国际工人階級所面临的最大問題，是領導权方面的危机。解决这个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真正能够在国际範圍內——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在殖民地世界以及在那些已經取得革命胜利并已經取得工人国家地位的地区——执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綱領的新的領導。这就是第四国际自建立以来一直奋斗的目标。

(譯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36期)

二三、为什么不接受中国的建議？

中国政府在10月16日第一次取得核武器試驗成功之后，立即提出了召开世界各国首脑會議的建議。它向所有的政府宣告，它建議这个會議应包括“世界各国”。

會議的目的是要就“全面禁止和彻底銷毀核武器問題”达成協議。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步，中国政府建議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将来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約翰遜政府对这件事的反应是异常迅速的。看来，那一声核武器的爆炸到底震动了华盛顿的那些傲慢的統治者，让他们觉察到了中国的存在。可是約翰遜的回答是很难令人滿意的。他把中国政府的建議說成不过是一套“宣传”，而不予理会。

可是約翰遜的論断并不等于是經過证明的結論。如果美国政府真的相信中国的建議不过是一种宣传，那他们就應該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邀請，以便证实約翰遜的論断的正确。會議的結果自然会证明究竟誰有誠意，誰沒有誠意。

真实的情况是，約翰遜政府完全相信，中国政府說的的确是实話。中国政府确实准备签署一項国际協議，以禁止一切核武器、銷毀一切核弹儲存、制止一切原子武器的生产，并結束一切，不管是大气层或地下的試驗。

約翰遜政府既然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保证不使用原子武器的建議都不肯接受，那就证明它自己的声明才真正只不过是宣传。

華盛頓曾經作出姿態，表示要把地下試驗也包括到部分核禁試條約里去。這是何等的奸詐！在美國已進行了將近二十年的試驗（包括在過去的一年中進行的并已公開宣布的三十五次地下試驗）之後，在堆積如山的原子彈儲存已足以在一次熱核戰爭中，至少消滅全人類七十多倍的時候，約翰遜卻表示願意考慮禁止一切試驗！

真實的情況是，美國現在已經不需要再作試驗了；在一定的時間內，它根本已不需要再進行任何種類的新的試驗。這一點，曾經直接參加美國核武器生產計劃的兩個科學家，在10月號的《科學的美国人》上，已予以充分證明。

約翰遜政府，如果對於停止核軍備競賽和防止環繞地球的大氣層進一步受到污染真正具有誠意的話，另外還有兩個辦法，它是完全可以採用的：（1）全面公開一切有關製造核武器的資料，使中國政府根本沒有必要自己再去進行試驗。（2）如果它不願意同中國舉行會談，它可以提出不需舉行任何會議立即實行普遍裁軍的建議，而且可以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意，首先單方面銷毀自己的核儲備。

採取這類的行動就可以立即根本改變局面，使整個世界遠離熱核戰爭，走向和平。

看來約翰遜政府決不願採取任何這類合理的辦法，以代替它目前所走的自殺的道路。因而，它也就只會進一步為中國的論據提供前提，中國人說，為了反抗美國的軍事威脅，它除了建立一條核“防綫”作為它的軍事防禦的一個組成部分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

（譯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37期）

二四、克里姆林宮在反对北京的 运动中遭到了一次 严重的挫折

皮埃尔·弗朗克

由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提出的、目的在于糾合一个多数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綫的二十六国共产党會議，原訂于12月15日召开，現在却决定延期了，这是赫魯曉夫被革职以后，大家所預料到的事。苏联党同时宣布，中国也拒絕参加建議在明年3月召开的會議。

毫無疑問，企图把中国共产党擯之于正統共产主义运动之外的計劃，已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这个計劃本身对赫魯曉夫的倒台，也起了，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相当大的作用。自那时以后，这个會議就肯定不可能在12月15日举行了。可是我們仍不禁要問——有可能妥协嗎？

最近几周来，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們公开陈述了过去总伴之以辱罵提出的两党的分歧。現在，辱罵停止了，但分歧却並沒有消除。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們仍各自坚持过去的立場，絲毫也沒有轉向溫和的迹象。問題是非常明显的，如果現在會談，在一开始，两方面都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坚持自己原来的立場，但这也并不一定表明妥协是决不可能的。而且我們还應該注意，到現在为止，两方面还都很少談到中苏两国国家关系上的分歧。莫斯科——虽然沒有根本改变苏联官僚集团的国际政策——就帝国主义对待刚

果和越南問題所发表的几次声明，态度已强硬了一些。这样，分歧的表现在目前就仍然只是在意識形态上。

尽管别的一些亲莫斯科的共产党，在中苏分歧的問題上仍然尽可能保持沉默，铁托却完全不理睬那一套；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的代表会上，他对中国人大事攻击，并且宣称，这根本不是什么意識形态方面的分歧問題，而是“中国领导人想推行他們的大国計劃和取得霸权”。这种說法是有矛盾的。铁托忘了，从国家关系上来說，赫魯曉夫对待中国的态度，正是当年斯大林对待南斯拉夫的态度；他忘了，那时候，他也曾經使用过同样的言辞正确地譴責过苏联的領導。

正在千鈞一发的時候，赫魯曉夫的倒台暂时阻止了走向分裂的趋势。使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分离的意識形态方面的分歧，并不是由于头脑的活动过多产生的結果；分歧的根源实是这两个官僚集团所面临的不同的处境。一个希望能够同华盛顿达成全面的協議；另一个则看到自己同美帝国主义有冲突，同时又有物质上的困难，因而感到，除了尽量削弱它的敌人之外，再沒有任何其他出路。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苏联的官僚集团，虽然得到大多数共产党领导的支持，而且在国际关系方面表面上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实际上已处于守势。它现在是在尽量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群众的冷漠态度，和苏联人民希望立即提高生活水平的心願。而相反地，殖民地革命却倾向于贊成中国的路綫，象这样过于忽視殖民地的人民群众，对于苏联官僚集团的威望肯定是有好处的。

目前时期的这种秘密协商、不直接指名的批評和假惺惺的态度，使人不禁想起沒有多久以前，中国和苏联领导，通过对南斯拉夫或阿尔巴尼亚的攻击，来进行間接斗争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作

法，同那个时期一样，是不会产生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不可能通过妥协从此结束，相反地，分歧将不可避免地日益加深。最近，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阿門多拉甚至比陶里亚蒂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还要走得更远一些，他公然提出了同社会民主党合并的问题。

苏联官僚集团已经大大地丧失了它的威信。它永远也不可能再重新建立起一支完全听从它指挥的队伍了。现在，任何一个官僚集团都不可能占据它过去所占据的地位了。过去，为斯大林主义所付出的代价是一系列的失败；现在所付的代价则是长时期的混乱。可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最后终将在世界革命的道路上重新取得它本来应该占据的地位的。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43期）

二五、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1964年竞选綱領

約翰遜總統在他的国情咨文中曾談到：“在美国，五分之一的家庭的收入都低得甚至不足以維持最低的生活。”在这里，社会主义工人党正是要对这数以百万計的丧失权利的人、对一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上受到摧殘的人們讲几句话。我們向大家提出一个能够真正地、彻底地解决当前危害我們社会的各种严重問題的社会主义的綱領，而这种严重問題为数是很多的。

目的在于降低劳动力成本、大幅度增加公司利潤的技术改革和高速运轉越来越迅速地使許多工人失去了工作。同时，新的职业的設立率却越来越低，这就使得长期不得解决的失业問題不可避免地更形严重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受害最深的，則是无技术工人和老年工人、青年、黑人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于是，大片大片的地区越来越变成了充滿飢餓和貧困的經濟蕭条区。

失业工人福利金在最多的时候也不能达到正常工資的数目，因而就迫使許多工人降低了原来的生活水平；而且任何地方也不能保证一个工人在全部失业的时期內都能拿到。有些工种的工人就根本拿不到任何福利金。年老退休的工人所能拿到的养老金簡直少得可怜，有时候甚至一个錢都沒有。被迫向政府請求救济的人所得为数甚微，而他們却还必须經受一次令人感到羞辱的“貧穷”測驗；未成年的孩子也被迫来承担对他們的父母的經濟上的責任；一帮急于要討好那些逃避賦稅的闊老板的下流的政客們更大力誹謗那些領救济金的工人，說他們是“无用的道德敗坏的家伙”。

那些有能力掙得自己的收入的人們，隨時都受到公開的和隱蔽的重稅的盤剝。失業和未失業的工人全都一樣眼看著物價一天天高漲。要想知道得稍好一些，常常甚至只是為了能勉強過下去，許多家庭都不得不越來越依靠分期付款的辦法購進一些東西，拿明天的收入作為抵押品來換得維持今天生活的費用。

勉強可住的房子一天比一天難找，而房租卻高到了荒唐的程度。交通費用飛速上漲，而公共的運輸系統卻一個接一個迅速垮台。校舍破爛的學校，教室裡擠滿了學生，而收入微薄的教員卻為數不多。許多地方沒有足夠的醫院，也沒有足夠的看護和醫師，而在这个利潤第一的制度之下，醫藥費用之高簡直可以說是對整个人類的一種犯罪行為。

全國數百萬青年都感到前途茫茫。那些有幸受到較高教育的青年，也不能有把握找到一個有發展前途的合意的永久性的工作，以此作為起點來建造他的有保障的、不致虛度的生活。年輕人倒是大部分都靠得住會被征調入伍，他們很可能就會因為被派去參加一次他們實際並不理解的戰爭而死在一個什麼遙遠的地方。未參軍的失業青年一般都被看作是一個有關社會治安的“少年犯罪問題”，卻很少人看到，他們是在經濟上受到排斥的人，而且對這些人，社會沒有給他們以應有的照顧。

對於黑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來說，問題就更加嚴重了。他們中那些有工作的，一般也都不過是作著最髒、最艱苦和待遇最低的工作。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在貧民窟中過著遭受種族隔離的生活，而且還需要以極高的租金租下一間破爛不堪的住房。在他們的住處附近，永遠只有一些最窮、最擁擠和師資最不足的学校。他們所能享受到的社會福利當然也都是最低一級的。警察的殘酷迫害幾乎是他們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差不

多不論他們走到哪里，他們都會受到公開的或略加掩蓋的種族歧視，無端地損傷他們的作人的尊嚴和摧殘他們的生命。

在今天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只有一樣東西是所有的人共同享有的。那就是，不分男女老少、貧富貴賤、白人或黑人——全都面臨着熱核戰爭的威脅。對熱核災難的恐懼攪擾着每一個成年人、每一個略有知覺的孩子的生活；這是無處可以逃避的。到處自欺欺人地修建起許多避彈所，那實際不過是一種殘酷的騙局。

社會主義工人黨認為，所有這些社會罪惡的直接根源，就是這種讓大銀行、大公司來統治這個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那控制着壟斷企業的少數幾個人，他們把自己的私人利益放在眾多的實際從事生產的人們的要求之上。這少數的特權階級享受着無邊的愈來愈大的繁榮，但他們的貪欲卻仍然沒有得到滿足。今天已經得到的高得不能再高的利潤仍不能讓他們稱心，他們還必須要爭奪更多的利潤。

壟斷資本家們為了搜羅更多的財富，於是便採用帝國主義的手法剝削外國的人民，以填滿自己的私囊。可是一直到離我國海岸纔九十哩的古巴為止，一個國家接着一個國家里的勞苦大眾，現在都已經起來反對這種剝削了。他們要求把本國的財富用來滿足生產財富的人們的需要，而不是用它去養肥那些獵取暴利的人。悲慘的現實要求使他們日益排斥資本主義，並迫使他們向着國有化生產和計劃經濟的道路邁進，因為他們現在已開始從社會主義的基礎來認識自己的社會了。

美國的銀行和公司力圖消滅這種反抗活動。它們拿蘇聯集團破壞了工人民主作為借口，甚至希望在資本主義已經被消滅的國家（包括中國和蘇聯在內）中重新恢復資本主義。它們用反對所謂“共產主義陰謀”的充滿仇恨的宣傳掩蓋着自己的真實目的，愈來愈

愈放出了极端残暴和毒辣的手段。古巴的革命的工人和农民被称作仇敌，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者佛朗哥却受到同盟者的待遇。对别国人民的事务进行的军事干涉，越来越不择手段和厚颜无耻，甚至至于不惜发动一次全球性的热核战争。现在，美国所以为全世界所仇恨和恐惧，那是完全不足为怪的。

亨利·福特第二最近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讲话中，已经毫不隐讳地说出了垄断资本家们的主要信条，他说，“私人企业的中心目标就是私人利润”。他为更大的利润提出的辩护是，这样就可以使企业得到更多的投资，因而就可以产生出更多的新的工作，那么一切社会问题也就都可以得到解决了。他和他的那一伙希望把国家的税款用在军事措施上，以便维持住一个可以任他们为了私人利润任意进行剥削的“自由世界”。要说什么让政府把钱用来消除国内的贪图暴利的“自由企业”所造成的社会罪恶，那在他们看来简直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胡说八道，而福特之流的垄断资本家们对华盛顿所起的作用，显然比全国的工人所能起的作用还要大得多。

为民主党作辩护的人们说，只有共和党是垄断资本家的政治奴仆，但是实际情况并不能令人相信这一点。在基本的对外政策上，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看法永远是彼此一致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一个党可以从另一个党的手中把白宫接受过来，而美国在国外进行的军事干涉仍可以不致有片刻的停顿。在有关民生问题的国内政策上，这两个党在为银行和公司效劳方面简直就象一个党一样。披着“人民的”政党的外衣的民主党人实际比共和党人还更为虚伪，他们和南部民主党人的妥协态度是早已在全国臭名远扬的。

通过两党的共同努力，美国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结成了

軍事聯盟。一個範圍廣闊的美國軍事基地網把整個世界都包圍起來了。可以“一舉消滅”全人類的無比殘酷的核武器已安裝在導彈和美國潛艇上，隨時可供使用。自1948年以來，普遍兵役法已把大批美國青年征調入伍，他們被派到完全沒有民主的軍隊中去，然後被送到海外去作為占領軍以支持當地的傀儡政府。對於美國在國外的活動情況，政府所講的話，一再地被發現完全是一派謊言。

我們的稅款現在正被用來武裝和訓練反革命匪幫，這些匪幫的作用是鎮壓外國的反抗貧窮的起義鬥爭和推翻外國的反資本主義的政府。這兩黨的黨人拒絕承認由七億中國人選出的政府，但他們却不遺余力地支持南越的軍閥。艾森豪威爾政府首先把美國軍隊作為“顧問”送進越南，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則不顧日益增加的美國人的傷亡，進一步變本加厲地執行這一政策。

民主黨的總統指揮軍隊任意槍殺為了反對美國的奴役而遊行示威的手無寸鐵的巴拿馬人民，共和黨人則對他完全支持。兩黨的黨人對古巴實行經濟封鎖，而且還想竭力使不同意他們的政策的各個盟國屈從於他們的意旨。1961年發動的犯罪的豬灣入侵，是在民主黨人的指揮下制訂的計劃，而後由共和黨人加以執行的。華盛頓的反古巴政策，在1962年的導彈危機中，幾乎已被推進到了熱核戰爭的邊沿。那次危機的難以想象的緊張局勢已使我們清楚地看到，在今天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統治之下，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將完全決定於總統一個人的意見。千百萬的美國人民是沒有任何發言權的。

華盛頓自稱完全了解古巴國內所進行的一切活動，但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那幫人，卻無法查獲在阿拉巴馬的伯明翰教堂用炸彈謀殺四個黑人小姑娘的兇手。兩黨黨人已把全部精力都用來顛覆和試圖推翻在古巴各個少數民族之間實行真正平等的卡

斯特罗政权。

完全是为了装样子的民权法案經過一通大吹大擂被提交国会，在那里資本主义的政客們将开心地玩弄一套大选前的政治游戏。黑人自由战士为了爭取民权举行和平的示威运动，結果却遭到了警察的殘暴的攻击。为反对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暴力行动而进行自卫的自由战士被拘禁起来，最近在北卡罗来納的門罗更有四个人被加上莫須有的“綁架”的罪名，而判处长期徒刑。

正象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最近的一次报告中正确指出的，那些决心支持种族压迫的人，“不惜使用武力，使用欺騙、伪证、拖延訴訟程序以及阻撓議會會議等等办法来同宪法及法院的宣判对抗”。

一如在民权法案問題上一样，在一切有关一般社会需要的問題上，我們到处可看到充分代表两党共同政策的欺騙花招和鎮压手段。有时在群众的压力之下，他們不得不有所表示，但他們的办法仍始終是采用銀行和大公司所要求的“蜻蜓点水”的策略。新的減稅法令使逃避賦稅的垄断資本家得到的好处，不知要比承担賦稅重担的劳动人民大多少倍。因为象阿帕拉契亚^①高原那样的一些經濟蕭条的地区，当地的資本家們馬上就弄到手大批低利率的联邦貸款，靠这些錢，他們必然又可以賺到一笔可观的利潤。而失业的工人們所得到的，則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諾言；将来政府一定施加压力，使各工厂減去超过規定的工作時間，以便让更多一些人
有工可作。

长期以来，白宮一直反对工会提出的、在不減少实际工資的条件下縮短工时的要求，并一直警告工人不要坚持“引起通貨膨脹

① 位于北美东海岸。——譯者

的'工資要求,約翰遜總統對前任的這種作法馬上就加以肯定。在這一類問題上,兩黨黨人是決不含糊的。去年國會匆匆通過的一項結果使一次鐵路罷工運動成為非法的強制仲裁法案,就已經充分地表明了他們的態度。

在諸如最低工資標準、失業福利金、政府救濟、住房、衛生、教育等等社會問題上,民主黨政府始終只作了一些鮮有成效的只是說來好聽的諾言。關於約翰遜總統大吹大擂提出的他所謂的“無條件的”“對貧窮作戰”,到現在為止,原計劃的十億元,仍不過只是說要拿出三分之一來在下一個會計年度中使用。而在那同一份預算中,比這數目大五十四倍的一筆款項,卻完全撥給了五角大樓,以便作為軍費去鎮壓外國的為反對資本主義剝削進行鬥爭的貧窮不堪的人民。

為了掩蓋世界其他地區事態發展的真相,民主黨和共和黨一起不顧憲法的規定,限制人民旅行的權利。在國內,它們採用思想統治的辦法,以求達到壓制批評、強迫統一思想的目的。宣揚社會改革被稱作“顛覆活動”。對華盛頓的政策提出任何批評的人,不論在工作的地方或在自己住家的地方,都隨時會受到聯邦調查局的迫害。為人所不齒的走狗受到愛國主義者的光榮稱號。郵件遭到檢查。電子偷听器被用來干擾人民的私生活。一切民用機關企業中全充滿了軍事機構的氣息。

國會的審訊

國會委員會在電視中舉行公開審訊,使得許多人在全國人民面前受到殘酷的嘲弄。委員會經常向受審的人接連不斷提出許多侵犯他們的民主權利、干預他們的私生活的暗含惡意的問題。如

果他們根据宪法賦与他們的权利拒絕回答，那他們就会被公开指称为“心中有不可告人之事的”可疑分子。这些国会审讯的受害者常常会被加以“藐視法庭”或“伪证”的罪名。

青年人天賦有对现状不滿的权利，而印第安納大学三个学生的案件生动地說明了政府对这种权利的无理地干預。他們只不过批評了华盛顿对古巴的政策；他們曾邀請一个黑人青年在一次肯定有色人种的自卫权利、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暴力行动的学生集会上讲了一次話；他們曾表示相信，如果美国已是社会主义社会，那么美国人民的生活一定会过得更好一些。就因为这个，此外再沒有任何其他原因，一个具有政治野心的检查官，公然就在印第安納州思想統治法令的掩护之下，荒唐可笑地以图謀推翻政府为名，对他們提出了公訴。主持审讯的法官认为那一法令不合宪法精神，宣判公訴不能成立。而检查官为了想推翻法官的宣判，又向上級法院起訴，这一案件直到現在尚悬而未决。

人数較少的政党力图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参加竞选，但那尽力支持两党垄断选票的横蛮无理的选举法却使它們毫无办法。两党制定的法令根本不允許小党派在电视和广播方面占用跟民主党和共和党同样多的時間。銀行和公司象操纵两颗假骰子似的操纵着那两个党，并用它們来反对一切非資本主义的組織。

立法机构、司法命令和法庭审判全都日益侵犯着劳工的自由。罢工的权利越来越受到了更大的限制；在集体合同的問題上，政府官員，或者公开地或者使用种种欺騙办法，总是始終站在老板們的一边；而那些老板們的政府越来越对工会內部的事务进行干預。資本家們在使用警察法以反对民权运动方面也同样是不遺余力的。不論什么时候，如果空头的諾言和象征性的让步不能使不滿的人民群众保持沉默了，鎮压便必然会是資本主义制度的政治上的保

卫者们立即拿起的武器。他们不顾一切地坚决维护着把私人利润置于全体人民的需要之上的神圣的资本主义原则。

对于一百年来的空头诺言实在已忍无可忍的黑人，现在提出了立即自由的要求，他们正在为自由进行斗争。去年南部的大示威已经具体体现了他们的情绪，那次示威的目的是抗议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并要求选举权。如海浪一般的黑人自由战士在警察的警犬和水龙头的攻击下向前冲去，大批的逮捕也吓不倒他们，他们在走出监牢的时候，更决心继续为了争取人的尊严和人的基本权利进行斗争。

在那次由南部示威引起的向华盛顿的大进军中，黑人从全国各个地方赶来表明了他们对工作和自由的要求。那一次出动的人数之多反映出，在南部斗争的促进之下，北部的战斗性也已高涨起来了。抗议房租过高的罢工运动在北部许多城市都开展起来，在那些城市里，少数民族的人民全都是住在耗子成堆的贫民窟中。接着学校里也发生了在教育体系中反对对黑人和波多黎各的儿童实行隔离的学生运动。黑人，以及受到黑人启发的波多黎各人现在正在工会中要求民主权利，并要工会在力争完全平等的就业权方面给他们以支持。

由于一些保守的工会负责人对他们不予理睬，他们现在已单独行动起来。他们包围了许多建筑工地、旅馆以及其他场所，抗议在雇用工人方面的种族歧视，要求在职方面的平等权利。他们也提出了提高各行各业的最低工资限额，以及减少工时以使更多的人获得就业机会的要求。反对警察暴行的抗议示威运动也被组织起来，坚持行使宪法所规定的自卫权、反对以非法手段对争取民权的示威者进行攻击的愤恨情绪也一天比一天高涨了。

黑人和白人青年

年輕的白人学生，由于受到黑人自由战士的英勇行为的感召，并由于体会到自己同黑人之間具有根本的利害关系，起而支持黑人斗争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有相当多一部分学生参加了“自由乘客运动”^①、同时越来越多的白人学生都卷入了黑人发动的全面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代生活中，在许多方面黑人和白人青年所遭受的苦难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同样都面临军国主义措施、经济上缺乏保障和无故遭到搜捕的威胁，他们还同样会遇到其他许许多多的问题。由于这个缘故，用那些心神不安的自由主义分子的话来说：“他们现在是决心要把许多深奥的复杂的问题弄一个清楚明白。”

那些在保守和独裁的领导人的领导下陷于瘫痪的工会，对黑人斗争所树立的光辉范例的反应是比较迟缓的。这些工会只有在真正被老板们所激怒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肯正式宣布罢工。尽管大多数的黑人全都是工人，它们对于民权运动根本不予支持。它们也从来不努力使黑人和白人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来保卫他们作为工资收入者的共同利益。相反地，一般的工会领导人反而抵制黑人提出的黑人白人在工会中一律平等的要求。

工会的领导集团号召大家依靠民主党来解决劳工问题。大多数黑人领导人也同样认为南部地区以外的民主党人，在争取民权的斗争中是他们的盟友。可是他们对那些资本主义政客所抱的希望全都一样落空了。那么再下去该怎么办？黑人自由战士和工会

^① “自由乘客运动”的原文是 Freedom Rides，为黑人进行斗争的一种形式，主要指从很远的地方乘坐火车到一个地方去参加斗争运动。——译者

會員們得到的指示是，“选举更多的自由主义者”。选出一些劳工和民权运动的“真正的朋友”来，使已衰老的政府重新获得青春。

可是，过去的记录已充分表明，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一样，全都是一些提出空头的诺言和做出虚假的让步的能手。在和平的幌子下，他们同样一贯支持一个好战的对外政策。在处理国内严重的社会问题时，他们实际和那一味说空话的两党并无任何区别，他们讲得很多，但决不肯真正采取任何有损私人利润的神圣性的行动。正同其他所有的那些资本主义政客一样，他们对一切拒绝接受渐进的社会改良主义的人都抱着敌视态度。

我们且想一想最近在纽约通过的“拦路搜查”和“入户不敲门”法案。洛克斐勒州长，这位自由主义的共和党人，完全不理睬民权斗争运动的强烈抗议，公然在州立法院通过了这两个法案。它们对于黑人和波多黎各人是极为不利的，因为根据这两个法案，警察就有权在街头对行人进行搜查，而且在他们无理地闖入私人住处时连门都可以不用敲。哈莱姆区的居民完全明白，纽约市的警察必然会以洛克斐勒的新法令作为护身符任意侵犯他们的自由，而这些警察则是由一位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瓦格纳市长指挥的，他自己就是这类残暴的法令的热烈拥护者。

“学生非暴力运动行动委员会”的主席约翰·刘易斯在谈到包括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政客时，讲出了一个真理。他在准备在向华盛顿进军时公开发表而终于被禁止的一篇演说稿中说：“我们的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下流的政治领导人横行的地方，他们依赖不道德的妥协来换得自己的前途，他们完全和各种公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剥削活动联系在一起。”接着，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咱们自己的政党在哪儿？”

作为对刘易斯的问题的回答，一群有身份的黑人在那次向华

盛頓進軍的運動中散發了一個宣言，號召黑人進行獨立的政治鬥爭。“我們等待民主黨和共和黨來解除我們的苦難已經一百年，這時間實在是太長了，”他們說：“我們必須奪得自由；沒有人會把自由送到我們手裏來的。那就是為什麼……我們號召一切相信真正的解放的人，前來同我們一起組織‘立即自由黨’的原因。”

這一獨立進行政治鬥爭的號召雖然是直接對黑人發出的，但實際卻概括了甚至更大範圍的人民的需要。它為整個工人階級、一切資本主義殘暴統治下的受害者指出了一條道路。那對一味追求戰爭、種族主義、搜捕政策和造成工人大量失業的胞兄弟般的兩黨，是決不可能解決他們的問題的。只有同民主黨和共和黨徹底決裂，進步才有可能取得。

由於這些原因，社會主義工人黨完全支持號召組織“立即自由黨”的宣言中所提出的由黑人獨立進行的政治鬥爭。我們贊成建立一個以工會為基礎的獨立的勞工黨。我們主張成立一個不分黑人白人、工人農民、藍領或白領階層，包括一切遭受歧視和剝削的人羣的反資本主義的政治大聯盟。希望促成這種政治改革的人現在可以明白表示自己的願望了，我們要求一切跟我們具有共同思想的人，在11月的選舉中支持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候選人。

為了徹底解決我國國內的許多問題，我們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必須徹底消滅，而代之以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一個人人有工可做的社會。一個按民主的方式組織生產者並在力求合理地滿足每一個人的需要的基礎上進行計劃生產的社會。這個社會將決不會再存在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在這個社會里人人都有平等發展的機會。在這個社會里，每一個人都可以自由地發揮自己的創作才能、藝術天才以及人所具有的一切潛力。到那時，美國將是一個熱心幫助外國人民的國家，而不會只一味武裝、動員本國人民去同他們

打仗。

作为建造一个和平、繁荣、自由、平等的社会的具体步骤，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这里提出以下的纲领：

1. 支持和平的外交政策

停止在越南进行的“肮脏战争”。撤除关塔那摩的基地。取消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同古巴恢复友善关系。承认巴拿马政府对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废除一切军事联盟并撤消国外的一切军事基地。从外国的国土上撤回一切军队。停止一切核试验并销毁一切氢弹储存。

承认北京政府并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支持民选政府领导下的各个民族的权利。

停止秘密外交和欺骗宣传。不隐瞒一切事情的真相。让人民投票决定有关战争与和平的一切问题。

2. 反对资本主义军国主义

变军事预算为首先力求满足国内社会需要的和平预算。废除资本主义的征兵制，取消后备军官训练团，终止施加于军事机构的普鲁士式的统治。给在伍士兵以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言论、集会自由，对军官实行选举和集体协定制。

3. 让一切少数民族“立即自由”

让黑人以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享有充分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平等。支持目的在于保证这些权利的一切群众性活动，如房租罢工、学生罢课、封锁建筑工地、游行示威以及静坐罢工等等。维护在受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暴力攻击时的自卫权。

充分利用联邦政府的一切权力，以保证行使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法令和司法制度。切实执行现有的反对私刑屠杀和警察暴行的法律并制定类似的新的法令。废除野蛮的死刑并改进过时的监禁体系。

成立一个有实权的公平就业委员会，补偿各少数民族已遭受到的损害。成立一个被赋以充分的权利和能力，使其足以在国民生活的各方面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联邦机构。由联邦政府采取行动来保障和维护人民在全国性选举以及州、县、市选举中的选举权。废除一切人头税。

在学校中设立黑人和非洲历史课程。取缔一切形式的反犹太活动。

4. 恢复和扩大民主权利

废除一切限制劳工组织、罢工和纠察权利的联邦法令、以及各州或地方制定的法令。政府决不干涉各工会的内部事务。

取消“危险分子”黑名单、“忠诚”宣誓和“忠诚”清洗。停止在一切保障社会安全的福利事业中进行政治活动。结束联邦调查局对政治见解不同的人的干扰和迫害。解散议会的非美活动委员会、立法院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和各州的同类性质的机构。

废除和民权法案相抵触的一切立法活动、司法条文和法院命令。终止思想统治的阴谋和以“藐视”或“伪证”为名的政治迫害。取消一切放逐命令，免除对旅行权利的任何限制。赦免一切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的无辜者。

改订选举法。将选举年龄限制降低到十八岁。容许小党派在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其他一切公用宣传设备中占用同等的時間。

5. 結束經濟上无保障的情况

支持每周工作三十小时但按四十小时付給工資的主张，并贊成为了保证全面就业必要时进一步减少工作時間而不减少工資。保证每一个失业工人在全部失业期間都能拿到按工会規定标准足数支付的福利金。由政府接管一切閑置的生产設備，然后交托由工人选举出的委员会負責管理，开工生产。生产速度由有关工人投票决定，并由工会按多数意見加以控制。

实行不分种族、性別、年齡的同工同酬制度。妇女应享有充分的就业权以及按資历升級的权利，有孩子的母亲应得到适当的照顾。开办由联邦政府供給經費的托儿所和儿童夏令营。政府保证一切青年受到专科教育。

以百万計的老人在失去工作能力时应得到足够維持生活的福利金、包括住院治疗在內的免費医疗待遇和足够的退休金。将全部医疗机构国有化。立即通过現在在国会中受到阻碍的安德逊医药照顾法案来作为立即可以实行的一个临时办法。

6. 政府給农民以足够的帮助

制定一个由通过选举产生的劳动农民的代表会草拟和执行的联邦統一計劃，以保证他們能得到生产任何农业商品所需的全部成本。在世界上任何地区还有人挨着餓的时候，决不限制农民产量。一切在飲食方面生活在一般水平以下的美国家庭应由政府給以食品救济。

政府貸給劳动农民的救荒貸款，在債務人认为有必要时，应准予延期偿还。取消分成租佃制和地主剝削。粮食归种粮人，土地归种地者。

7. 实施解决住房問題和发展公益事业的綱領

由政府立即修建两千万套房租低廉的住房。由通过选举产生的房客代表会严格控制一切私人出租房屋的房租。实施一个規模龐大的兴修学校、医院及其他公益事业的联邦計划。由政府采取措施控制洪水,改善供水和灌溉条件,降低电费,保存天然資源。所有这些計划的費用都仰給于目前用于軍备的基金。

8. 免除微薄收入者的捐稅

取消一切工資所得稅和營業稅,以及一切实际由消費者負擔的隱蔽的賦稅。年入在七千五百元以下者免稅。年入在二万五千元以上者,其超过部分按百分之百的稅率收稅。沒收一切依靠战争物資获得的利潤。从富人收取的稅款帳目向公众公开,以供检查。

9. 工业所有权归于政府

將銀行、基础工业、食品托拉斯及一切天然資源国有化,核动力也包括在內。选出工人和技术人員委员会来,在維護生产者 and 消費者利益的原則之下,管理这些国有企业。实行計划經濟。

10. 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

結束民主—共和党对政治的壟斷。断絕同資本主义政治机器的一切联系。成立以工会为基础的劳工党。支持黑人成立独立的政党,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組成包括一切受歧視、受剝削的人民在內的反資本主义政治联盟。

力求建立一个各少数民族都有充分代表权的工农政府,以求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建美国。 (譯自《战斗者》1964年第14期)

二六、緩和和緊張

——《第四國際》社論

國際形勢顯示着這樣一些突出的矛盾是很少見的。一方面，人們不至於會否認“兩大強國”正在作出努力使這一形勢得到“緩和”並在某些問題上謀求妥協。另一方面，卻存在着一些異常危險的緊張地區，這些地區遠遠不是在趨向於消失而是正在不時地發生危機，這些危機對維持和平來說是孕育着絕大危險的。

自從1962年加勒比海危機以來，尋求緩和方面曾表現為簽訂《莫斯科條約》、日內瓦裁軍會議的談判……作為這種尋求緩和局面的基礎的客觀原因有好幾個：一次核戰爭所意味着的絕大危險、核軍備競賽的巨大經濟負擔、試驗性核爆炸所造成的禍害。這些理由之外，還得加上：對這些“大國”來說，其他國家擁有這樣的武器，即使數量有限，對國際政治將增加不可知的和不能確切估量的因素。但是，縱然有着這些認真嚴肅的理由，緩和方面並不見得有顯著的和肯定的進展。恰恰相反，《莫斯科條約》並沒有在核武器庫存上帶來絲毫改變（如果它不是有所增加的話），地下核試驗依舊在進行。日內瓦會議，正象外交史上的無數次裁軍會議一樣，並沒有取得任何具體結果。

至於緊張地區，人們可以說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還幾乎沒有消除一個，而在最近幾年卻出現了新的緊張地區。可以說全世界存在着象大地地殼的現象那樣有火山潛伏區和經常爆發區，潛伏區的潛伏性可能會突然中止（象柏林以及德國的分界綫），經常爆發區則象目前的古巴和東南亞諸國，如越南、老撾、柬埔寨。

不能遺漏掉那些不時間歇地出現險情的地區：位於阿拉伯世界之中的以色列、塞浦路斯……傳統的老式外交方式之外，現在還有着不少地域性組織和聯合國，人們在那里提出各種控訴和反控訴，而這些組織所作出的“解決辦法”時常是曇花一現的。

我們在本刊篇幅中曾不知多少次地指出：國際關係穩定化的想法是一種幻想，因為縱然“兩大強國”政府所掌握的手段多么強大，它們從此已不再處於那樣的地位，即對那些隨着資本主義制度的瓦解和受到工人國家進展的鼓舞而被解放出來的力量加以阻抑的地位^①。蘇聯領導人以及工人運動中追隨他們的人所設想的“和平共處”是這樣假定的：這些被解放出來的力量（這些力量在它們的動力的推動下正向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攻擊），只將作出逐步的進展而且只在對資本主義說來不關重要的地區開始作出進展，而資本主義制度則將接受一種極其緩慢的、毫無劇烈掙扎的、無疾而終的死亡。可是，不但我們並非面臨着這種富有詩意的遠景，而且帝國主義也拒絕對這些既成事實俯首帖耳。

在對付古巴這樣一個給全拉丁美洲以如此激動人心的和如此有吸引力的典範上，美帝國主義並不解除自己的武裝而是僱傭各種反革命組織——統治階級人們和武裝小股——試圖使這個第一次在美洲大陸發生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趨於失敗。

在東南亞，奠邊府之役十年以後，縱然美國資產階級的某些階

^① 資本主義瓦解的觀點是被一部分自稱為“左派”的新聞工作者、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等等所反對的，這種反對是以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為理由的，但是，即使以這一繁榮時期的異常持久為理由，又怎能將促使這種繁榮（如軍備競賽）而並非象徵穩定的某些情況以及殖民地革命（即使不談工人國家的進展）的情況一律抹殺呢？對資本主義作出判斷是不可能只就資本主義國家本身的情況來論斷的，它必須用全世界範圍的尺度來衡量，而從這個角度來說，資本主義制度自身呈現着深刻的瓦解狀態是無法加以否定的。

层已开始对世界上这一地区的真正形势有所认识，华盛顿方面却依然坚持对这些为他们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而行动起来的人民作战。美国国会匆匆投票通过几亿美元的补充军事预算，其进度之速正与迟迟讨论给予黑人以基本权利的议案的进度之慢形成对比。人们甚至看到这种带有讽刺意味的景象，即大西洋联盟的强大盟主、持有核武器而自夸是西欧自由的保卫者竟向它的被保护人要求给它在越南战争上以援助，这种情况不免在法国领导人中间引起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他们至今并未忘怀自己以前的不幸遭遇和美国当时的政策。

恰恰正是这种形势，即美国资本主义的强大物质力量和那本身看来并非美国的对手却在政治上和物质上给美国资本主义力量以打击的那些力量所造成的形势，远远不是有利于“和平共处”而是充满着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非常巨大的祸患；帝国主义的行动受着阶级利益的支配，既不懂得历史的发展，因而致力于大量地和迅速地调动它所掌握的力量来谋求一种解决办法。应该补充说，对美国领导人来说，要想同苏联人达成协议的那些谈判的目的，较少地是为了要达到普遍的缓和而更多地是为了要得到在世界上这一或那一地区进行干涉的自由行动。中国领导人对于这方面的事情是非常警惕的，而这也是他们同苏联领导人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今天世界所处的情况并非面临着这样的矛盾：缓和还是紧张。各帝国主义的内部并没有战争势力和和平势力之间的冲突，那种有可能通过明智的压力和工人运动的支持来使结果有利于保持和平的冲突。帝国主义在某些方面作出缓和的努力以便在别的方面更好地打击革命运动。帝国主义将不会因向它发出一些呼吁和召开一些代表大会而陷于瘫痪，在这些代表大会上多少年来都曾一

再高唱为和平和为和平利益的同样大合唱。唯一现实的方法，就是动员群众给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以无情的打击。

不错，最近期间是以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出现有那些离心倾向为标志的。人们是否能利用这种形势来削弱美帝国主义并使它在进行干涉方面更加困难呢？

人们知道在这件事上，中国人曾说过某种“中间地带”，特别着重提到法国的情况。人们也知道在这上面苏联领导人曾攻击中国人，谴责他们同某些帝国主义搞同盟或联合。由赫鲁晓夫那样希望同美帝国主义达成协议的人来谴责中国人所要同二等帝国主义者做的事情，这种谴责是毫无价值的。问题在于要知道怎样去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分歧，而不是怎样成为帝国主义者的玩具。

为了这个目的，只有一条行动路线：**国际工人运动和殖民地群众运动应该保持它们本身的目标**，拒绝把自己变成这一个或那一个外交结合的筹码，即使这样做是会对这一个或那一个工人国家有利的話。不去利用现在戴高乐对美国政策所采取的有距离的态度将是莫大的错误；但是以工人纲领的名义而不去对戴高乐统治进行斗争也将是莫大的错误。法国的当前形势是个再好没有的缩影，它反映着对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进行干预所能有的可能性和危险。法国的工人政党今天都处于吊在空中的地位：社会党只知道谴责戴高乐的“民族主义”并跟在反动浪潮后面反对他的“欧洲主义”，共产党则在寻求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基础上同社会民主党成立“联合一致”时，不知道怎样来说明情况，它们两者都让戴高乐在对付美国上涂上某种独立的色彩并让他在第三世界方面涂上自由主义的色泽。

从中苏冲突上表现出来的好处之一是：面临着这些工人国家领导班子之间的严重对立，此后将更容易地（特别是在各国共产党

中)为給予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以它們自己的目标而进行斗争。而正是这样才使工人运动能更有效地为保卫工人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和为帮助这些国家的广大劳动群众从官僚統治下解放自己而进行斗争。

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和一切类型的外交交易所带来的危险，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应该以最大的努力向工人和殖民地群众运动提出如下的几項特別重要的任务：

保卫古巴革命；

从东南亚撤出一切帝国主义的武力；

废除在亚洲、中东、地中海、太平洋、非洲以及欧洲各地的一切外国軍事基地；

进行銷毀核武器庫存的斗争，首先支持那些在各国内部为要求各該国資产階級进行单方面废除核武装而斗争的运动。

(譯自法文版《第四国际》1964年7月号)

二七、評中苏冲突

杰尔曼

冲突的辩证法

共产国际的成立，其目的在使国际工人运动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发展，当时由于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来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但共产国际仅仅取得一个历史性的胜利，那就是：保卫住了并且巩固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从这次革命产生的苏维埃国家。而在世界其他地区，最初一阵革命浪潮全都失败了。结果是第一个工人国家在一个落后的国度里受到孤立，这种情况必然有助于这个国家发生向官僚主义的蜕化。这种蜕化的胜利过程又必然导致老布尔什维克党的破坏、共产国际对苏联官僚主义的屈服，以及共产国际变成只能服务于为了保卫苏联官僚主义而执行的外交策略的单纯工具。

从1943年以后，二十年的国际革命的历史低潮时期让位于新的高涨。这次高涨累积了在南斯拉夫、中国、北越、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成功；同样，至少在客观上，它又从苏联的军事胜利和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官僚主义道路所遭到的破坏，得到补充的力量。各工人国家本身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也以其特有的方式摧毁官僚主义专政的基础。

从历史上看，中苏冲突首先表示出，已经不可能在旧基础上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官僚主义之间的关系维持下去。它表示出世界革命的高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官僚主义的控制及集中

之間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來說，虽然两个主角在表面上交换了位置（中国方面拥护斯大林，激烈地攻击南斯拉夫），它是在更大規模上重复南斯拉夫和斯大林之間的冲突。双方之所以有冲突，有激烈的冲突，那是因为苏联官僚主义对整个“社会主义陣营”和（兄弟党）“共产主义世界”的独霸，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挑战，又因为苏联官僚主义为了保持这种独霸而利用国家压力（經濟封鎖，撤退专家，对资产阶级的印度的軍事援助等）来对付这个“叛逆的党”。

冲突因此复杂化起来，因为这不仅是关于党与党之間的冲突，而且其中的某些党掌握国家权力，除了古巴的菲德尔派运动以外，全都是充分官僚主义化了的。所以，在世界革命的利益和苏联官僚主义的特定利益之間，在苏联官僚主义的利益和其他各国掌握政权的工人官僚主义的利益之間，在卷入中苏冲突中的各工人国家的实际利益之間^①，存在有种种实际的矛盾。这就同时說明，为什么它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渐渐变成普遍性的冲突，以及为什么它表现出这么一种混乱的情况，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坦白地和公开地使自己同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的利益一致起来，它們总是把这些利益部分地，或整个地从属于自己特定的利益。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都是执政的党，这还差得远呢；而所有的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和领导人也并不都是官僚主义者。如果說在苏联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之間的这些表面上純属教义性质的論战，可以反映彼此对立的利益的話，那么，它們同时又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共产党积极分子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内提出的，关于現

^① 关于問題的这一面，我們在談到因“社会主义陣营内部分工”而引起的問題时再来討論。

时代革命的战略和战术的許多问题的真实爭論。在这里，我們又看到了斯大林統一体的解体所产生的后果——这一解体并没有产生一个真正民主的群众性革命的国际来代替斯大林的国际机器，而是陸續分裂成为好几个集团，有的向“民族”官僚主义发展，有的向要求摆脱一切监护，暂时局限于“民族道路”的群众运动的方向发展。

所以，中苏冲突既反映出毫不留情地摧毁了斯大林統一体的那个客观存在的世界革命过程的力量，又反映出这个过程内部的主观因素，也就是共产主义觉悟的相对薄弱，这就使得民族革命战略或战术的考虑，以及各个官僚主义的利益构成区分論战中各陣营的界綫，同时論战双方的主角中没有一个真正举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而这面旗帜却在目前进行的論战中反映世界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世界革命的利益。

这面旗帜是第四国际的旗帜，是当代列宁主义的旗帜。由于这个理由，第四国际不作为两敌对陣营之一的支持者而加入中苏冲突，而是以它的整个綱領干預冲突，并且提出它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是惟一能使目前冲突朝着加强国际革命、加强真正革命力量的方向，而不朝着使它們分裂、瓦解、沒落的方向得到出路的方案。苏联人和中国人彼此攻击对方为“托派”，并且从第四国际的正式文件中引用許多文句，来为自己的攻击辯护，这个事实就证明我們的立場是独立自主的。

但是我們的这个立場不是，也不能是弃权不管的立場。我們不能滿足于把这两派官僚主义劝开，希望上帝有朝一日把它們全都用响雷劈死。我們是积极地干預这一深深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斗争中的，这个斗争不仅关系到两派官僚主义的命运，同时关系到正在生气勃勃地发展的革命和真正工人国家的命运。我們参加斗

爭的路綫已經在第七屆世界代表大會和在第四國際重新統一代表大會上提出來了^①。現在我們要來考察一下最近幾個月來在衝突中所有的文件和大事。

蘇維埃國家和國際的物質力量全都集中在蘇聯官僚主義手中，這就使得真正的共產國際有可能轉變為一架為這個官僚主義服務的國際機器，而無需改變各黨和國際的形式。在革命的國際低潮時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認為保衛蘇聯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這在客觀上又便利了這個轉變過程。在斯大林正式解散共產國際和許多在本國人民中有真正基礎的工人國家出現之後，由於革命在國際方面的擴展和工人國家的經濟及文化進步的聯合影響，斯大林統一體解體了。這個統一體的解體導致物質力量的分散，結果產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多中心”的理論和實踐，因為單獨一個國家不能有這樣大的力量，足以把世界共產主義的主要力量長期吸引在自己身邊。

我們深信，上面說的是歷史的一段彎路。中蘇衝突和因此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引起的普遍論戰，有力地表示必須成立一個新的共產國際，用民主方式來討論和處理各黨之間的爭執，但這需要有一個條件，那就是討論必須真正是以民主方式，真正是在平等基礎上，真正是在各無產階級政黨之間，而不是在被官僚主義敗壞了的各黨之間進行。

衝突的原因

不管怎樣，中蘇衝突雙方都不是真正的革命政黨，而是程度不同的工人官僚主義機關，是極度官僚化了的工人政黨，因此，應該

^① 特別參閱政治決議和特殊決議，《中蘇衝突以及蘇聯和在其他工人國家的情況》，（《第四國際》第19期，1963年第三季度）。

把双方思想意識的分歧看成是远不及各自利害冲突重要，这才能理解冲突的尖銳性。

我們并不否认中苏冲突也具有思想意識冲突的形式，也不否认这场思想意識的冲突具有它特有的价值和邏輯。但单是思想意識的冲突不足以解释这次公开論战的激烈性和由此产生的国家关系方面的多种措施。在馬克思主义者看来，爭論之所以这样激烈，只能由于这是对立的物质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冲突。

关于这一点，中国方面最近发表的文件明白无誤地表示了出来。我們特別看一看1964年5月11日《北京周报》发表的中共中央給苏共中央的2月29日的信。中国领导人在信中列举下面所受的損害，这些損害全都涉及国家間的物质冲突：

1) 苏联政府破坏了中苏边境的現状；

2) 苏联政府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給与中国(和北朝鮮)的軍事援助，要中朝两国偿还，而且这些援助貸款还要利息，使貸款的偿还推迟；

3) 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沒有事先通知或进行协商，就突然被召回苏联，这事“破坏了我国国民經济的原定計劃，給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北京周报》第19期，1964年5月11日，第14頁)。中国领导人原本可以再补充一句，說“在我国經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部門的二百五十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工作的停頓，其后果特別严重，因为中国在这时候遭到一次表现为农业生产的退縮的特別厉害的經济危机。这好象是一把經济的匕首，刺在一个面临饥荒的工人国家的背上。中国领导人事实上是这样說的：“你們乘人之危，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驟，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①；

^① 人們可以补充这样的話：你們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因为你們不在这

4) 苏联政府自 1960 年起，造成許多障碍，使中苏貿易不能維持以前的水平。人們知道，这个水平降到很低^①。中国领导人沒有指責苏联領導人在中国发生极大經濟困难的年度，1959 年至 1961 年間，沒有給中国以无私的援助；其实即使加以指責，也是完全有理的。他們是这样說的：“我們不需要的或者不十分需要的物資，你們就大量給我們；我們很需要的物資，你們就卡住不給或者很少給我們。几年来，你們也利用两国貿易的关系作为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

5) 苏联政府帮助印度反动派，供給他們武器来打苏联人民的中国兄弟。应当指出，中国领导人曾有一篇专文，署名是《人民日报》編輯部，題为：《苏共領導联印反华的真相》（1963 年 11 月 1 日）。其中有一段特別值得注意：“苏联領導人在中印边界問題上的立場，不仅背叛了无产階級的国际主义原則，而且也說不上是中立的。他們同美帝国主义一起，援助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印度人民。他們不仅背叛了社会主义陣营，而且背叛了印度人民。”

以上是关于經濟封鎖、給予一个同工人国家发生武装冲突的資產階級国家以軍事援助、利用貿易为政治压力的工具等的五項严厉指責。对于这些指責，苏共領導提不出什么了不起的理由来反对，人們一讀苏共領導 1964 年 3 月 7 日對我們剛才大量引用的中共中央的那封信的复信，或苏斯洛夫的报告，对这一点就不至再

时候以贈与形式向中国提供远远超过你們給尼赫魯和納賽尔的“援助”总額的特殊援助。赫魯曉夫当时沒有这样做，現在却吹噓（苏斯洛夫的报告）他曾建議提供……一笔一百万吨小麦的信用貸款，即中国当时所有粮食的千分之六。在作出这样一种所謂“国际团结”的光輝表示之后，他的建議的虛伪性，也是不足为奇的。

① 參看 1963 年 3 月《第四国际》18 号所載我們的文章《中国经济紊乱的五年》。

有什么疑問了。

在1964年3月7日的复信中，苏联领导人提到斯大林死后，他们就撤走了他们在旅順的军队，清理了在中国的两国合营公司。这是确实的事。这就是說，他们取消了克里姆林宫对另一个工人国家的最可耻的军事政治的压迫形式。但中国的指責并不在这一方面。他們的指責是对其他的干涉和压迫的形式而发的，这些形式虽不及斯大林的那样卑劣、那样暴烈，但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則来看，也是同样不能容許和应该譴責的。对于这方面，苏联领导人提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答复。

不錯，苏斯洛夫长篇大段地极力为撤退苏联专家辯护，他說：1)中国当局虽然要求苏联专家留在中国，但同时把他们安排在不能接受的工作环境中；2)苏联专家抗議中国人在“大跃进”时对专门技术規律的无知所引起的損失，当他們的抗議得不到采納的时候，他们就要求回国；3)中国当局从1960年春天起，开始对苏联专家“做工作”，設法影响他們反对苏共中央，因而引起他們的“憤怒”。在上面提出的三个辯解理由中，第三个当然是苏联领导人方面最有分量的一个。但从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观点来看，从損害中国工人国家从而損害国际革命的一种行为这个观点来看，这个辯解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所以应当得出这样的結論：两个国家之間的冲突——中苏边界这个次要問題除外，关于这个問題我們缺乏資料——不是一个簡單的“官僚主义机构之間的冲突”，而是苏联官僚主义机构违反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国家利益而卷入的一个冲突。很明显，在这类冲突中，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中立”，而应当保卫中国工人国家，反对苏联官僚主义使用經濟压力，甚至用在印度资产阶级和中国革命发生軍事冲突的时候，供給印度资产阶级武器的手段，

将赫魯曉夫路綫强加于中国。

剩下来要知道的問題是：两国之間的冲突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对两党的文件加以仔細研究，特別对于事件发生的年代加以仔細考察，就会发现中苏冲突的根源是中国政府对帝国主义所持的不同态度。

要了解这点，只要考察一下这两个官僚主义对美帝国主义所表現出来的根本不同的立場就行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上沒有得到承认，也沒有被联合国接納。它的內战实际上还没有停止，只不过是因事实上的停战而暂时中止罢了；一部分中国国土——福尔摩薩——还是为反革命和帝国主义所霸占。一支美国舰队駐在那里，經常威胁着中国工人国家。

反过来，赫魯曉夫，象在他以前的斯大林一样，并且比斯大林更进一步，从有利于革命的世界力量对比的轉化所造成的世界形势中，根本上极力同美帝国主义求得一个安排，一个总的协定。他从戴維营到巴黎，从維也納到紐約，追求这个幻想。帝国主义在这一方面的最小一点点的让步，最小一点点的姿态，立即被赫魯曉夫的宣传机器吹嘘夸张，认为是“緩和的证据”、“戴維营精神”、“緩和的精神”。一般来看，这些错觉使群众在对真实的战争危险的斗争中解除了武装，涣散了意志，而結果总是得到迅速的幻灭；在“戴維营精神”之后，是U-2飞机事件引起的危机；在維也納会晤之后，是1962年10月加勒比海的危机；在莫斯科条約之后，是目前在东南亚和在加勒比海的危机。

处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之中，而又受殖民地革命的更加直接的压力，中国领导对赫魯曉夫关于“苏美友誼”那些废话的不恰当和可耻性特別敏感，这又何足为奇呢？中国领导在“戴維营会谈”时

期就責備赫魯曉夫忘記了提出福爾摩薩問題和中國進入聯合國問題，這又何足為奇呢？中國領導得到的結論是——象在它之後菲德爾·卡斯特羅所得到的結論一樣——如果有所謂“緩和”的話，那緩和決不適用於中國，這又何足為奇呢？

當中國領導聽到西方的警笛吹出那多年來由戴高樂提倡的“歐洲人和西方人，包括蘇聯人，在黃禍面前的基本團結一致”的聲音，接着是資產階級報紙對赫魯曉夫的狂熱稱贊（請看史蒂文森在赫魯曉夫七十壽辰的特別演說詞），他們該怎麼想呢？如果在這種情況下，蘇聯領導不以特殊的努力來加強團結，從而消除懷疑不信，却利用經濟壓力和封鎖，把自己的路線強加于人，那麼，衝突的所有一切基本條件就都出現了。

同工人國家間的衝突問題相連的一個問題，是工人國家間的經濟合作，或象現在人們所說的“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國際分工”問題。蘇聯領導人多次攻擊中國領導人是“民族主義”、“主張經濟自足自給”等等。很明顯，那些主張單獨一國可以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的人是沒有權利提出這些攻擊的。而且，不可爭辯的事實是，所有的官僚主義，中國的官僚主義當然也一樣，總是表現出某種不應有的民族主義的傾向的。我們在後面再來討論這個問題。但在這個經濟問題的明確範圍內，這個問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實際上我們是面臨着馬克思主義理論很少探討過的一個領域。眾所周知，照馬克思的說法，根據世界市場價格的商品交換，是不等價交換，因而將相對不發展的國家的價值（勞動社會生產率在這些國家內低於平均值），向較發展的國家轉移（勞動社會生產率在這些國家內比較高）。工人國家之間商業貿易是不是可以根據世界市場價格呢？如果不能的話，那麼，人們對於價格可以

利用哪一种客观的参考系統呢？如果可以的話，那么，这不是同样将“貧穷的”工人国家的价值向“富有的”工人国家轉移嗎？要补偿商品交换的这种价值差額，不就永远需要向穷国提供善意的援助才行嗎？而且所有的“国际分工”都有把工业发展的不平衡情况固定下来的傾向，这不又是把交换中的不平等固定下来嗎？也就是說，不管你願不願意承认，根据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論，这不就是“貧穷的”工人国家受“富有的”工人国家的“剝削”嗎？

無論如何，中国人否认他們鼓吹經濟自足自給的。下面是中共中央 1964 年 2 月 29 日給苏共中央的信里关于这点所写的話：

“你們經常攻击我們‘单干’，而吹嘘你們自己是主张社会主义各国的广泛的經濟联系和国际分工的。但是，你們在这方面的实际行动，究竟是什么呢？”

“你們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反对兄弟国家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可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經濟。

“你們欺負經濟比較落后的兄弟国家，反对它們实行工业化，力图迫使它們永远处于农业国的地位，成为你們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銷售場。

“你們欺負工业比較发达的兄弟国家，硬要它們放弃传统产品的生产，变成替你們某些工业部門服务的附属工厂。

“你們还把資本主义世界的弱肉强食的原則，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来。你們公然把垄断資本集团搞的‘共同市場’，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

“你們的这些做法，都是錯誤的。

“我們主张中苏两国之間，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在經濟、科学技术、文化方面，实行真正平等的、互利的、新型合作关系。

“我們认为，現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經濟互助委员会必須根据无产阶级國際主义的原則加以改造，使这个苏共領導一手把持的組織，改变成为社会主义陣营兄弟国家自願参加的、真正平等互利的組織。”(同上 15 頁)

人們至少可以說，以前南斯拉夫提出的同类的揭露(誰也不說南斯拉夫是贊同中国的)，現在羅馬尼亚人民共和国在这一方面同苏联的冲突，經濟互助委员会內部关于价格計算的爭論，关于在經濟合作中多边制度、双边制度或三边制度的利弊的爭論，都不能反駁中国提出的这些指責。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对这些指責也只能发出无力的叫喊：“反苏的誣蔑！”……可惜的是太多的“反苏的誣蔑”都被不可駁倒的事实证实了，使人不能輕易駁回中国人在这方面提出的指責。

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战术的分歧

在这一方面，最近发表的中国言論(《新殖民主义的辯護士》、《苏共領導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和苏联的言論(1964年4月3日《真理报》发表的苏斯洛夫报告)，对于人們已經知道的思想意識的分歧，以及冲突开始以来所有的地位变化，沒有补充多少东西。

中国繼續把他們的攻击集中于下列各点：

1) 他們肯定防止战争的根本战略路綫是革命，而不是“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作为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間的行为規約，他們并不反对，但他們說，和平共处本身长久下去是不能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

2) 他們主张在現阶段，組成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的是殖民地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陣营和資本主义陣营之間的竞赛”——工

人国家的力量加强^①；

3) 他們反对在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和平道路”的論点；

4) 他們认为有必要把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引向武装斗争,更明确地说,引向游击战；

5) 他們强调各宗主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国家的共产党有义务支援殖民地斗争,而这义务已经多次被破坏了。

在所有这些問題上,象在第四国际重新統一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所肯定的那样,中国的論点是不可爭辯地更接近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論点,比斯大林和赫魯曉夫的传统論点更为正确。

在战争問題上,毛泽东过去使用了錯誤的說法,可能使人认为他对世界核战争給人类造成的危险估計过低。很明显,关于这个問題,中国人早就糾正了,而今天如果重复 1963 年 7 月 14 日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說的什么中国人“为实现全世界革命,毫无顾虑的要通过一次使数千万人死亡的全世界的核战争”,那就是干脆純粹的誣蔑^②。

現在只把中国的許多文件中的一段引在下面：

“苏共领导为了掩飾自己的錯誤,不惜采取造謠誹謗的办法,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綫。他們硬說,中国共产党主张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就是要挑动世界核战争。

“这是离奇的謠言。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支持各国人民

① 很有意义的是,苏斯洛夫的报告开始有一章专論社会主义陣营的加强,而这正是这篇报告的軸心。这跟中国文件的不同,很是明显。

② 即使是无宁属于赫魯曉夫派的,新的意大利左派社会党統一社会党的领导人也承认这点。參看他們在 1964 年 4 月 19 日的《新世界》中《給中国同志的公开信》。

的革命斗争，包括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这样做，就是背弃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同时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任何别人都不能代替。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取得和保持核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核战争，才有利于彻底禁止核武器。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应当，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①。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核武器，永远只能是抵抗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武器。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应当首先使用核武器，进行核讹诈、核赌博。

“……事实上，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经常吹牛，说要使用核武器援助这个国家或者那个国家的反帝斗争。（《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 1963 年 11 月 18 日的公开信。）

本来在实践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歧已经很有限了，因为——至少在口头上！——苏联官僚主义并不反对必须“动员人民大众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它也跟毛泽东一样，认为如果帝国主义不顾一切，疯狂地发动世界核战争，那么灭亡的是帝国主义，而不是人类。人们很可以认为这种乐观主义的想法过于大胆，但不论怎样，这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共同想法。

中国人坚持殖民地革命在世界革命的现阶段具有头等的重要性，竟使他们被指责是种族主义！这是既离奇又荒谬的指责，因为从什么时候开始，拉丁美洲的人民——中国人一贯把拉丁美洲包括在这个最重要的地带内的——全都变成有色人种的呢？当苏联

^① 这两小段引文的次序把原文的次序倒置了。——译者

出席阿尔及利亚的亚非会议的代表加富罗夫攻击中国人“踏着成吉思汗(1)和希特勒的脚印前进”的时候，这不叫人想起另一个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所说的“希特勒托洛茨基主义”吗？当他毫不迟疑的在法国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面前说：“法国人(1)是不是认识到中国人是要联合黄种人和黑种人来反对欧洲人，来反对不管那国的白种人吗(1)？他们看到这种危险吗？”他不过是重弹那最卑劣的反共反华的宣传老调而已，而这才是就“黄祸”大做文章的真正种族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宣传呢。自称为共产党人的官僚主义者居然能堕落到这样低级的论战水平，真是丢脸。不过，这总算向我们证明，为反对苏联官僚主义的敌人而进行的论战，在克里姆林宫还没有收到非斯大林化的好处。……

中国人特别强调暴力革命、武装斗争的不可避免性，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他们提出中国、越南、古巴和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教训，并且要人给他们举一个由“和平道路”取得胜利的革命例子来。这个主张被赫鲁晓夫主义者攻击为“教条主义”。下面是苏斯洛夫关于这方面讲的话：

“中国代表在跟尚未取得解放的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中，在国际会议的演讲和发言中，只是谈在这些国家内发动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例如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就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说：‘武装斗争的道路是被压迫民族取得完全解放的道路’。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贯支持反对殖民老爷们和反对专制暴政的武装暴动，一贯支持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战争，并且继续这样做。但他们从来就反对那种简单化的战术，这种战术的基础就是教条式地应用单一的斗争形式，而不考虑具体条件。在目前形势下，这样的战术更为有害，因为在许多(1)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

国家中，民族政府掌握了政权，执行反帝的政策(1)。在这样一种形势中提出武装斗争的口号，把它当作一个普遍的解决方案，那就造成双倍的损失，既使民族解放力量迷失方向，又使这些力量不能去(1)打击帝国主义。說阿尔及利亚、加納、馬里和其他国家的工人面临武装起义的任务，这不是无知嗎？象这样的目标归根結蒂只能加强反动派，他們正是要推翻这些国家的現存政府。实现这个目标的企图只能是造成在这些国家內的損害，像在印度尼西亚和錫兰那样。”（《真理报》，1964年4月3日）

这显然是拙劣的混淆和歪曲。让我们饶了这些“一贯”支持反对殖民主义和专制压迫的武装起义的（斯大林派或赫魯曉夫派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吧；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陣綫的战士和古巴的七二六运动的战士可以对这点說一些話^①，且不提我們的秘魯同志休戈·布兰科，他最近在正式从属于赫魯曉夫的《新国际評論》中，被指責是一个“煽动者”，因为他犯了罪，想以武装来保卫秘魯农民占有的土地，反抗为地主服务的无賴打手的武装攻击^②。可

① 1964年5月9日的《圣战者》周报很及时地提起法国共产党和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对于1945年5月8日阿尔及利亚塞提夫起义事件所持的反革命态度。在談到阿尔及利亚报刊在事件发生的时期报道的方式时，这家民族解放陣綫的周报繼續写道：“讀者馬上就可以看到5月10日（星期四）总督政府的政治和外交办公室主任阿尔帝先生給法国共产党和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代表团的談話记录。他特別談到关于阿尔及利亚人民党（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政党，民族解放陣綫的前身，极左翼）、法国人民党（法国法西斯政党，极左翼）中的希特勒代理人，以及混入其他自称民主的組織，为法西斯帝国主义服务，同法西斯殖民老爷和穆斯林封建主相勾結的代理人的挑衅行为。在制造流血事件的企图未能得逞以后，“这个罪恶的联盟就一心只想挑起内战了”。听到这些話以后，代表团作如下的建議：分配七千五百公斤谷类，解除对干菜的封鎖，“特别是迅速无情地征办出卖给希特勒政权和法西斯帝国主义的維希卖国賊……”

中国共产党同志們，这些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革命初期的卑鄙誣蔑，不是在斯大林时期說出来的嗎？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从来没有加以批評呢？岂不是他贊同这些誣蔑，甚至鼓励这些誣蔑嗎？怎么你們可以攻击赫魯曉夫的政策却贊揚斯大林的政策呢？前者只不过是后者的繼續罢了。

② 《新国际評論》1963年第7期第178—179頁。

是中国人显然从来没有說过在阿尔及利亚必須发动武装起义；他們正确地认为阿尔及利亚人民从帝国主义取得“完全解放”的任务，基本上已經由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武装斗争实现了，至于其余的，可以由現政府动员群众来完成。

中国人提出的問題所涉及的国家或者是殖民地国家，或者是由帝国主义的直接代理人寡头政府統治的半殖民地国家，或者是由同新殖民主义結成联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統治的半殖民地国家。在談到由“民族资产阶级”統治的国家时，中国人很少談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武装斗争（这正是人們可以責备他們的地方），而多談摧毁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地位的武装斗争，沒有这个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終于要为武装的反动势力所推翻（他們对巴西事件所描繪的簡图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

我們倒想請教一下，“民族政府”掌握政权的“許多”拉丁美洲国家是哪些？事实上，拉丁美洲所有各国政府，一个又一个地全都跟美帝国主义站在反古巴运动的战綫上。我們也想知道这些神秘的“民族政府”的阶级性。至于在恰当的时机，为取得在印度尼西亚和錫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而进行一些武装斗争的“有害”性质，我們倒要請苏斯洛夫容許我們有跟他不同的意見。

不錯，中国领导人在殖民地革命的問題上并不支持完整的革命馬克思主义的立場。他們繼續鼓吹这个革命的“两个分开阶段”的論点，先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然后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在实践中，这个論点跟赫魯曉夫关于“民族民主国家”的論点的不同是对赫魯曉夫有利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阶段只是在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取得胜利。当他們談到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时，他們談的是跟使 1925—27 年革命归于失败的联盟毫无共同

之处的一种特殊联盟，是比较接近于毛泽东在1945—47年所主张的联盟：共产党保存它自己领导的自己的武装力量，控制自己的地区。事实上，这是双重政权的一种变相形式。

人们知道，按照这个论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今天依然认为，1949年10月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们将看到，虽然我们同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我们倒是乐于看到在未来的岁月中有很多这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老挝的冲突很可以让人清楚地比较一下赫鲁晓夫派和中国人对于跟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不同看法。苏联官僚主义当时无宁是倾向于按照字面来执行日内瓦协议，把所有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中立派”的梭发那·富马亲王手中，但巴特寮拒绝让出自己占领的一寸土地，拒绝交出哪怕是一连士兵，一步一步地吞食反动派和中立派的地区，而当中立派露出真面目、同反动势力打成一片时，它就进而占领大部分老挝国土。我们没有充分的资料，不知道这个战术究竟在什么程度内符合或不符合老挝人民群众的愿望；但这个战术跟赫鲁晓夫的战术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苏斯洛夫攻击中国人，说他们毫不重视解放了的殖民地国家中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新华社于1964年5月16日发表了越南《人民报》总编辑黄敦的一篇文章，予以驳斥。中国人的论战所针对的，不是解放了的殖民国家中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的不可能性，而是在这些国家内没有事先完成革命，没有成立工人国家，没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单独通过“经济援助”、“经济建设”的道路而达到这一个目的的不可能性^①。在这一

^① “民族人民民主革命是向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把它进行到底，就将创造有利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任务，完全不是象修

点上，中国人的論点显然又比赫魯曉夫派的論点更接近于革命馬克思主义的論点。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部力量的排队

只要把促成世界各处共产党分裂的直接原因列举出来，就足以看出这样一事实，那就是亲华的傾向，在所有情况中，都是左的傾向，而直至現在，这个規則沒有任何例外，这一事实無論如何是中苏冲突的意味深长的一个方面。

在印度，党的分裂起源于对中印軍事冲突的态度：亲赫魯曉夫的丹吉派主张同本國資產階級的神圣联合，反对中国工人国家（这是比1914年的社会民主党更为卑劣的背叛）；亲华的兰那地夫派主张革命的失敗主义。

在巴西，亲赫魯曉夫的普列斯特斯派公然声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道路不适用于巴西”，主张“和平道路”，主张同資產階級的政客結成腐朽的选举集团（大家都知道以后的結果如何！）；亲华派組成了巴西的共产党，主张武装起义的道路。

在秘魯，分裂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利馬市市議会的选举：赫魯曉

正主义者所說的那样，是发展經濟的任务。他們的最重要任务是集中他們的力量打击新殖民主义，把他們的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及使他們的国家走上非資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

請将上面这段文字同赫魯曉夫主义的阿尔·哈吉和納薩尔的文章比較一下，他們实际上认为，新独立国家向社会主义的演化主要取决于苏联的經濟援助……：“在最近从殖民枷鎖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內，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非資本主义的发展才能保证加速的經濟进步。現在有一个越来越强大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民族解放运动的广泛程度和力量都日渐增长，种种条件变得愈来愈有利于終將把这些国家引到社会主义去的那个演化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集团各国在同資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竞赛中取得的經濟成就，取决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給与剛解放出来的国家的无私的和不断增加的援助……”（納薩尔和阿尔·哈吉，《民族解放和革命过程》，《新国际評論》1964年3月号第48頁）。

夫派主张支持政府的候选人；亲华派主张支持民族解放陣綫的菲德尔派候选人（民族解放陣綫和前身是起义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的左派革命运动，以及由休戈·布兰科领导的托洛茨基派的左派革命陣綫結成統一战綫）。

在比利时，雅克·格里巴派批評赫魯曉夫派共产党在 1960—61 年大罢工时，在刚果危机时，对斯巴克的对外政策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的态度；官方承认的共产党不仅維護“和平道路”，而且維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議會道路”。

在錫兰，桑穆加塔桑亲华派批評赫魯曉夫派对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資產階級政府所持的妥协态度，要求給工人罢工以更有力的支持。

在西班牙，共产党的三个亲华派主张以革命方式推翻佛郎哥，由此轉向社会主义革命。赫魯曉夫派贊成“民族和解”和用“和平的总罢工”推翻佛郎哥，从而轉向資產階級民主的重建。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亲华派譴責赫魯曉夫派采取社会民主党方式，放弃无产階級专政的理論等。

当然，这些分裂在各国的程度有所不同，意义也不一样。一般說来，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亲华的党派比赫魯曉夫派力量大；在帝国主义国家內（日本除外），亲华力量是少数集团。按照它們在本国社会和階級斗争中所有的实际分量，这些集团或向对中国論点作有批判的支持的立場发展（这是在殖民地国家內的一般情形），或向整个地、不加批判地接受全部中国的立場发展（这通常引起迅速的分化，引起被左的路綫吸引过去的青年和健康的分子同斯大林的老官僚主义者发生冲突）。

不过，中国的論点，或是按同一方向发展的菲德尔派的某些論点，即贊成武装起义的某些論点，看来有可能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取得胜利。这个胜利可能以下面两种方式实现：或者通过整个党、或成为大多数的派别接受中国的立场（特别象在印度尼西亚、老撾、南越、南朝鲜所产生的情况，在桑给巴尔可能产生的情况，将来在印度似乎也将产生这样的情况），或者通过整个党不公开加入中苏冲突而转向武装起义的立场（在委内瑞拉产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好几个中美国家也就要产生这样的情况）。

人们当然不能排除这个假定，即在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人的日益增长的压力下，克里姆林宫对殖民地革命问题，至少在口头上和文字上，不得不要向左转。在目前，除了一些不算数的空话以外，还没有以严肃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当它看到可怕的前景的时候——特别因为这个前景使它丧失在帝国主义面前作为殖民地革命的“有效的谈判对手”的地位，这在老撾危机中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了！——当它看到自己同正在世界上进展的革命越来越脱离的时候，类似的转变也不是不可能的。但人们现在不能在这个转变没有发生之前，预先估计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中苏冲突的动力能产生什么影响。

在继续完全做克里姆林宫附庸的各国共产党和追随北京的各国共产党之间，最近六个月来，出现了一个由几个大党构成的“中间地带”，这些共产党虽然基本上或部分地支持赫鲁晓夫派的政治主张，但拒绝参加可能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完全分裂的组织活动。在这些党中间，首先要提到意大利共产党（意共本身越来越分为好几个倾向，一部分亲华的论点获得基层左倾分子的同情）、波兰党和罗马尼亚党。

当人们知道，赫鲁晓夫要立即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的计划，为中国、印度尼西亚、北朝鲜、北越、南越、阿尔巴尼亚、意大利、波兰、

日本、羅馬尼亞、新西蘭、英國共產黨，為古巴社會主義革命統一黨，而且為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所拒絕時，人們就可以理解上述“中間地帶”的意義了。這些黨代表幾百萬黨員和幾千萬同情者，他們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蘇聯官僚主義從此對這個運動部分地失去控制力量了^①。

在關於國際革命的观点和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观点之間，不存在什麼相互關係。對我們來說，這並不是新鮮事情。我們多年以來就強調指出，鐵托南斯拉夫的对內政策和對外政策之間存在矛盾。它的对內政策無疑是比較反官僚主義的、比較左傾的、部分地走經濟自治方向的——雖然由於在政治方面缺乏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而存在種種局限性——，而它的對外政策是超級機會主義的，從朝鮮戰爭到古巴革命，多次瀕於背叛行為的邊緣。由於南斯拉夫竭力邀請美帝的走狗、軍事侵略古巴的鼓吹者委內瑞拉政府參加“不結盟”國家會議，古巴和南斯拉夫之間發生了公開衝突，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怎麼還能否認這個矛盾呢^②？

在各工人國家中，生產力的發展程度、官僚主義化的程度，和對國際革命的傾向程度之間，沒有任何機械的和絕對的相互關係。同帝國主義的關係以及革命的永久性的辯證關係，在這一問題上具有無比重要的性質。1919年時貧窮衰弱的蘇俄遠沒有1959年時世界第二強國的蘇俄那樣官僚主義化；1950年比較落后的南斯拉夫曾給官僚主義的至高無上的權力施以打擊，比在工業和文化方面先進得無法比擬的捷克斯洛伐克或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早得多。進行工人管理的試驗的是今日只有不到五十萬無產者的落后

① 1964年6月號《共產黨人》雜誌承認，在九十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中，只有五十三個支持蘇聯立即召開共產黨大會、解決中蘇爭端的建議。

② 古巴報刊的文章曾轉載於1964年5月8日的《世界展望》。

的阿尔及利亚，而不是在有七千万无产者的苏联。是在不发达的古巴，而不是在一个工业化的国家里，革命的国际主义的面貌自十月革命以来第一次又以最鲜明的形式重现出来。

斯大林和非斯大林化問題

同样真实的是，随着中苏冲突渐渐恶化，中国人就更加重视捍卫斯大林和反对非斯大林化的斗争问题。以前，我们已经有机会强调指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某些主要论据的拙劣和虚伪性^①。他们在最近的文件中提到斯大林的地方当然是一样。例如在他们答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第七篇文章《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里，他们特别指出：“这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对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国际主义的支援。”

对于在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的功绩，我们之间没有分歧。但关于在斯大林时期的那些说法，那是歪曲历史真实，只能是愚昧无知或是对历史的蓄意伪造的产物。

请你们解释解释，中国的同志们，斯大林是怎样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内政策的。他强迫实行农业合作化，使苏联的农业倒退了三十年，到他死的1953年时，每一居民的谷物产量，以及在牧畜方面按人口计算的国家储备量，比三十五年前十月革命时还要低下。

请你们解释解释，中国的同志们，斯大林是怎样实行马克思列

^① 参看我们的文章：《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斗争中，向前看列宁——不向后看斯大林》，这篇文章发表在1963年10月22日的《世界展望》。

宁主义的对内政策的。他把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提出的加速工业化的要求从1923年推迟到1927年，整整推迟了五年，他同时宣称同布哈林团结一致，说：“我们现在支持，将来还支持布哈林”，而布哈林是依靠私有制的农民，要以“乌龟的步伐建设社会主义的”。

请你们解释解释，中国的同志们，斯大林是怎样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国际主义的支援”的。你们自己也承认，他在1925—27年的革命时期（对于这次革命暂时的失败起决定性的作用），以及在1940—49年时期，执行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并竭力把这条路线强加给你们①。

请你们解释解释，中国的同志们，斯大林是怎样对西班牙的“革命斗争给了国际主义的支援”的。你们的西班牙朋友的《无产阶级》报和《革命》杂志也承认，斯大林强使西班牙人民接受跟随“民主资产阶级”屁股后面的反革命路线，并堵住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大路②。

请你们解释解释，中国的同志们，斯大林是怎样对1944—47年的法国人民和意大利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国际主义的支援”的。他把最机会主义的、最右倾的路线，包括同君主独裁的反动派团结的路线，强加于他的陶里亚蒂，他又把下面这个著名的“革命

① 论文《关于斯大林问题》内。

② 最后这家杂志的情形颇为奇特。它发表了許多托洛茨基的照片。它发表一篇论西班牙内战的文章，这篇文章在所有各点上（包括对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批评在内）都同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派的分析相合。它承认在西班牙内战中的斯大林路线是错误的。它甚至承认托洛茨基在反对“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论战中，“肯定是正确的”。不过它耍了一个花枪，说是“就整个来看，托洛茨基错了，斯大林对了。它厚颜无耻地硬说托洛茨基对苏联经济建设站在“失败主义的”立场上（忘记他是计划化和工业化的创始人），硬说托派运动三十年的总结是一部“反革命破产的总结”，还说托洛茨基主义在锡兰和玻利维亚“清除干净”了（？）。总而言之，这是斯大林式诽谤的陈腔滥调，不过是印在光滑漂亮的纸上，而它“精炼”的水平仅仅足以在刹那间迷惑一些没有政治教育和知识的巴黎拉丁区的青年人罢了。

的”口号强加于他的代理人多列士：“只能有一个军队、一个警察、一个国家”，也就是只能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戴高乐的军队、警察和国家。他解除游击队的武装，阻止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请你们解释解释，这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怎么在1945年就在给英国共产党党员的那封著名的信中，传授那“走向社会主义的议会和平道路”的路线，而当赫鲁晓夫提出这同一条路线时，你们今天就理所当然地予以批判呢？怎么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革命家”以他的所有全部权威包庇了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关于以资产阶级的国有化为基础、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民主”方面的喋喋不休的修正主义废话，而现在陶里亚蒂的所谓“结构改革”路线正是当时所谓“新民主”路线的忠实翻版。

很明显，中国共产党不是真诚的，因为他们可以一面揭露那些象苏联领导那样，“把社会主义在一国或一部分国家的胜利，实际上看作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结束”（《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的人们的观点，一面又可以赞扬斯大林的“国际主义”，可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斯大林，他反对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系统地捍卫了这个单独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①。

所以，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恢复名誉的企图，在整个中国的论战中显然是一个巨大的矛盾。有必要一面寻找这个企图的根源，一面寻找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向。

中国人是“斯大林主义者”吗？对于这个问题，利维奥·麦丹

^① 而且这些“亲华分子”在这儿犯了显然的矛盾。《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一文说斯大林打击了托洛茨基提出的在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革命》杂志说（第9期第49页），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提出的在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在“理论上”是对的，但在实践上错了。《革命》杂志的负责人莫非是一个伪装的“托洛茨基派”（或赫鲁晓夫派）？或者说，应该到北京去寻找那些潜伏在《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的托派？

已經做过一个初步的答复^①，我們現在只把他的論证的大意重述一下。

很明显，中国共产党的領導人在下面这个意义上是斯大林派，他們是斯大林的政治和組織学校的产物，——同样，赫魯曉夫跟他在苏联国内外的朋友們和同盟者，从苏斯洛夫到陶里亚蒂，从铁托到多列士，全都是这个学校的产物。中国領導人也在下面这个意义上是斯大林派；他們的国家内沒有社会主义民主——在苏联也一样沒有——他們的党内沒有黨員的真正民主权利，——苏共的黨員也一样沒有，而且人們不讓他們有知道中国“兄弟党”的意見的权利。中国共产党“不顾多次警告”，仍把載有中共文件的数万份小册子，送給苏共黨員这个事实，被苏共領導人认为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殊罪过”。

但当我们离开这些一般性的范围时，情形就变得复杂多了。托洛茨基派从来就把斯大林主义看成是工人国家在一个特权阶层的力量下向官僚主义蜕化的表现。从这个观点来看，我們认为，現在苏联的官僚主义显然比中国的官僚主义更有特权，更为富有，更脱离人民，更帶有暴发戶的保守心理。如果說討論的自由，特別在非政治的范围内进行討論的自由，在苏联可能比在中国广泛一些的話，那么，在中国，特別是在公社内（它的社員大会是国家的基层机构），自治管理的因素却比苏联的多。在苏联，开始非斯大林化的十一年以来，还没有民主选举的工人委员会，也没有民主选举的苏維埃，而且还在談逐漸加强“厂长权力”的問題。

难道說，动力在苏联是向工人民主这个方向发展，而在中国則是离开这个方向嗎？應該摆出事实来证明，而不能单靠引用斯大

^① 參看《第四国际》第 20 期中他写的关于中苏冲突的文章。

林的話！无可爭辯的事实是，无产階級对官僚主义施加的压力在苏联比在中国大，因为苏联无产階級数量較多，技术較熟练，文化較高。但国内的客观形势，尤其是政府的政策，并不单是这种压力的反映，而是这种压力同官僚主义的抵抗、力量和財力方面相結合的結果——至少在它还没有被政治革命推翻之前是如此。而从这个观点来看，苏联官僚主义的力量、財力和蜕化程度比中国官僚主义大得多。中国官僚主义在本国内沒有遭到苏联三十年代的强迫合作化和集体屠宰牲畜所引起的那种可怕的紧张局面^①。

問題的根子却不在这里。在中苏冲突下面的两个伟大社会力量，一是工人国家的无产階級，一是殖民地的人民。直至目前为止，苏联官僚主义特别是对第一种力量的压力让步，中国官僚主义是对第二种力量的压力让步。要使中国官僚主义越来越脱离国内外劳动群众，保守政权得到真正的巩固，那就必須使这个官僚主义不再受殖民地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浪潮的影响。因为，我們不要忘記，托洛茨基认为，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认为，斯大林主义不是“落后国家”的机械的产物，而是由于世界革命出現低潮而孤立起来的落后国家的产物。托洛茨基曾強調指出，甚至是革命“向东方”，也就是向其他落后国家的扩展，也要打断斯大林官僚主义的腰骨。人們很难理解，当世界革命正在高涨之中，官僚主义怎么会在这些条件下在中国又生长了出来^②。

① 参考伊薩克·德歌尔：《毛泽东主义——它的起源、背景和展望》，見：《社会主义記事，1964年》第30—31頁，伦敦梅林书店出版。

② 似乎中国人重新提出斯大林关于随着无产階級专政越来越巩固、階級斗争越来越严重的論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們显然是犯了一个严重錯誤。但应当說，在赵林的文章：《关于过渡时期階級斗争的几个問題》里（发表在1963年11月20日第11期的《新建設》，这完全是内部流传的刊物，而且文章連一句斯大林的話都沒有引用），作者正确地說，在一个或好几个国家建立了无产階級专政之后，階級斗争将在国内和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掀起一个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运动呢？是因为他们“真正”是斯大林派吗？毛泽东最初是为非斯大林化叫好的，这又怎样解释呢？——赫鲁晓夫主义者也提起这一点，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他对斯大林的错误和罪恶的原因作了一个比赫鲁晓夫的更进一步、更合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因为在二十大之后，在初次赞许“非斯大林化”之后进行的“百花齐放”的试验，使毛泽东深信非斯大林化对中国官僚主义太危险了吗？但又怎样来解释，在中国丝毫没有对斯大林的崇拜，中国报刊差不多从不依据斯大林，中国杂志上的理论文章差不多从不引用斯大林，而对斯大林言论的引用和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整个运动好象完全是给外国读者看的，只是在答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评论中和给“兄弟党”的文件中才有呢？

我们依然深信，中国人保卫斯大林的运动首先是为了战术的目的；它首先用来把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以及其他共产党内怀念斯大林的人们，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下面这个事实至多是促进了这个运动，那就是毛泽东在维护斯大林的权威的同时，也就维护了一般的权威原则，因此也维护了他自己在中国和

国际范围继续进行，直至阶级在全世界消灭为止。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一位中国作家把不断革命论的第二个论点重又提出来。托洛茨基说的话跟这毫无差别：“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不是革命的结束，而仅仅是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国内和国际范围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设想”（《不断革命论》）。同样，赵林说得完全正确，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两者之间各种不同形式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之后的长久时期都是这样。因此，赫鲁晓夫关于苏联在阶级消灭之前的“全民国家”的“理论”是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借口赵林追求“一个暧昧的或卑劣的目的”，例如说他企图“在客观上为斯大林的恐怖时期辩护”（他对此却一字未提），因而反对这些论据，那是不严肃的。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其本身的价值，并不因提出普遍价值公式的作者或时机而被贬低为一堆“客观上正确”或“客观上错误”的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权威，此外，中国官僚主义害怕“非斯大林化”如果按照逻辑推到极端，就会产生过分爆炸性的力量。这当然算不了对这个运动的一种辩解，也不是一种证实。这个运动的目的和效果在工人国家中是罪恶的，它同时又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愚蠢。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个解释更符合于整个形势。

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诊断。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场首先取决于它对美帝国主义的特殊地位，它的特殊的国际形势，取决于它由于以上情况，也由于取得革命政权不久，因而受到殖民地革命的较强大的压力这样一个事实。所以我们认为恢复斯大林名誉的运动是它演化过程中的次要的、非主流的因素，不过这个运动给它的演化过程带来了一个矛盾的因子（归根结蒂，这个因子反映出中国领导的官僚主义本质）。

如果这个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将看到中国人由于他们的立场的逻辑，不得不越来越攻击“单独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平道路”和“与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实际是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我们将看到他们不得不在事实上越来越捍卫“不断革命”的路线，不得不支持“亲华的”的左派共产党，即使是他们不能完全控制的党也是一样支持（印度、委内瑞拉、古巴，以及一般在拉丁美洲的菲德尔派）；不得不接受这些党同在锡兰、玻利维亚、秘鲁、阿根廷、智利和其他各地的托洛茨基派之间的事实上的统一战线；不得不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施加压力，使它彻底改变它的政治路线，开始为夺取政权而进行认真的斗争；不得不支持在非洲的法国势力范围地带的反帝的革命派，虽然他们和戴高乐在外交关系上日益接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斯大林主义”的实际效果，至少是关于世界革命方面，其趋势是逐渐减少而不是逐渐增加，剩下来的问题就

是每个国家的群众运动和革命运动的自主力量的大小了。

反过来，如果我們的分析不正确，如果中国人的“斯大林主义”就是他們的根本“原动力”，如果他們从革命方面受到的压力只不过是次要的因素（只不过是一个“思想意識方面的借口”，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那么我們就将相反地看到，中国共产党要中止对于反对“中間地带的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的一切支持，而且推动这些国家的亲华共产党对它們国内的資产階級采取右傾机会主义的政策^①；我們就将看到中国共产党要設法以奴役方式，使正在生长的所有亲华左派共产党屈服，并且同所有不能百分之百追随他們的共产党粗暴地决裂；我們就将看到他們拒絕同托洛茨基派联合行动，即使当这种联合行动对于群众运动的前进是必不可少的时候也照样拒絕（在錫兰、秘魯和玻利維亞的情形确实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口头上对赫魯曉夫政策的批評和他們事实上在許多国家內对这种政策的模仿这两者之間的矛盾就将有目共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必然要陸續喪失在殖民地革命內部的全部影响。很明显，到那时候，占統治地位的反革命斯大林官僚主义的影响已經占了最初的“左中派”的薄弱力量的上风了。

托洛茨基主义的幽灵

从赫魯曉夫派和中国人最近的文件里，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出，这两个敌对的陣营全都攻击对方是托洛茨基主义，全都攻击对方帮助托洛茨基派。毛泽东和苏斯洛夫都說什么“托派的渣滓”、“托洛茨基主义的可怜的殘余”——垂死的、臨終的殘余，却由于他們彼此指責是由对方引起的在官僚主义陣营的突然“分裂”而奇迹

^① 日本共产党在1964年春季罢工时期的机会主义态度是这一方面的表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态度則好象比較反映出向相反方向的演化。

似地复活起来了。但这只不过是个行文的问题。人们决不会为一个“垂死的”运动、为一些并不存在的组织写越来越长的文章，决不会在印发几百万份的文章里照原文引用我们的话。

为什么苏斯洛夫不指责毛复活了“布朗基主义”或者“无政府工团主义”呢？为什么毛不指责赫鲁晓夫是为布哈林派、布兰德勒派或白劳德派效劳呢？因为工人运动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些短命的倾向，早就都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而托洛茨基主义则从没有象现在这样更有活力，在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它是到处都以政治的方式表现出来；同时随着近代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越来越多的“新”国家里发展起来，它在这些国家出现，从而鲜明地显示出了它的普遍价值。

辩论的论据一般是显然薄弱的，可能赫鲁晓夫主义者季莫菲耶夫的论据是例外，他在《共产党人》中不是没有理由地攻击中国人借用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同时又大大歪曲了这个理论。中国共产党答复苏共“公开信”的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一般说来，也是一篇卓越的文件，显然是中国人直到现在所写的最好的一篇文章，对于其中的论据，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赞成百分之九十……哪怕只是因为他们自己说过所有这些话，而且说得更好，说得更早^①。但象列宁所说：“一勺瀝青可以弄坏整桶蜂蜜”；在这篇卓越的文件里的那勺瀝青，就是下面这段话：

“苏共领导给中国共产党扣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这更是荒谬绝伦。事实上，继承托洛茨基主义衣钵，同今天的托洛茨

^① 参看利维奥·麦丹著：《战后共产党的政治理论》（米兰施瓦茨书店）里面的，对于在意大利紧接战后的“特殊”条件下，以议会民主作为夺取政权的工具的新改良主义和新考茨基主义的理论的卓越批评。

基分子站在一起的，不是別人，恰巧是赫魯曉夫。

“托洛茨基主義在各種問題上表現不一，而且經常戴上‘極端左傾’的假面具，但是它的本質是：反對革命（！），取消革命。

“在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上，托洛茨基主義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實質上是一丘之貉。所以斯大林曾經一再指出，托洛茨基主義是變相的孟什維主義，是考茨基主義，是社會民主主義，是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隊。

“今天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實質，也是反對革命，取消革命。因此，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不僅同考茨基主義如出一轍，而且同托洛茨基主義殊途同歸。‘托洛茨基主義’這頂帽子，還是赫魯曉夫自己戴起來罷。”

上面這種推理的邏輯的確是很奇妙的。托洛茨基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所以它同“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是一家人。它們兩個都是“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隊”。赫魯曉夫主義呢，則跟考茨基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是一家人，所以它也是一支“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隊”。但這樣就不僅意味着蘇聯今天是由一支“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隊”領導着，在蘇聯當權的是國際資產階級（他們對這一點當然沒有意識到），而且意味着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他們是老早就可能被斯大林以“腐朽的自由主義”的罪名送到老家去的不可救藥的修正主義和事佬——答應跟一支“反革命”先鋒隊坐同一張桌子邊，跟他們討論，甚至建議停止公開論戰，宣揚繼續內部討論，“達成一致的協議”^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莫非也是類似的“先鋒隊”嗎？人們看到，論戰過了分，反而打中了自己；中國領導人想證明太多事情，結果在這方面完全陷到泥坑里去了。

他們說：“托洛茨基主義的本質是反對革命，取消革命，反對無

^① 參看：《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

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难道还要浪费笔墨来证明这只不过是經不起客观辯論考驗的卑鄙誹謗嗎？托洛茨基的历史功績正在于他在1905年就預言了导致俄罗斯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一定要到来，在1925年就預言了导致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断革命一定要到来，“托洛茨基主义的本质”怎么能是“反对革命”呢？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希腊的托洛茨基派早在1944年就費了那么大的力气，作出那么多的牺牲，在无产阶级专政問題上跟斯大林-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托洛茨基主义的本质”怎么能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呢？玻利維亚的托洛茨基派早在1952年就参加玻利維亚革命，美国的托洛茨基派就在合众国的心臟內，系統地組織保卫古巴革命的工作，法国的托洛茨基派和其他許多国家的托洛茨基派，在帮助阿尔及利亚的革命上起了头等重要作用，因而使得第四国际書記处的三个成員遭到帝国主义的指控和监禁，而日本的托洛茨基派在1960年阻止艾森豪威尔来日本訪問的多次激烈示威游行中起了众所周知的作用，“托洛茨基主义的本质”怎么能是“反对革命”呢？

現在讓我們来看一下另一个陣营是怎样看待托洛茨基主义在中苏冲突中的影响的。苏斯洛夫报告《苏联共产党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統一而斗争》第七章的一大部分是专論托洛茨基主义的。标题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的偏向的危险》。我們不能把論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段落全都引下来。我們只引下面几段吧：

“所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采取了这条道路之后，中国领导人合乎邏輯地墮落到这步田地，竟至从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行囊里借用許多思想和概念，同样，他們又继承了托洛茨基主义在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斗争中的派別和分裂方法。

“是的，同志們，應該公開的說出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理論和政治概念的整体在許多方面都是托洛茨基主義的翻版，其實這些早就被國際革命運動所拋棄了。

“中國領導人關於戰爭和和平問題方面的概念實際是表示什麼呢？不是別的，就是托洛茨基派‘既不要戰爭也不要和平’的口號在新的條件下的重復。

“拿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反對同資本主義進行經濟競賽的積極鼓動來說吧。這種提問題的方式是新鮮的嗎？不，它不過是托洛茨基關於放棄（1）和平經濟建設，關於手持武器，向‘革命戰爭’的戰術，向世界革命的‘加速’”過渡的老主張罷了。

“人們知道（1），這就是托洛茨基派的不斷革命論的真正涵義。在這個問題上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曾經有過歷史性的重要意義。鬥爭的結果決定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和國際革命運動的命運……

“……中國人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蛻化’的危險的論點，跟托洛茨基主義的類似也同樣明顯。對這一類的捏造，我們可以這樣回答：這不是什麼新鮮的事，我們黨老早就聽過了。這是在新的條件下重復托洛茨基派所說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蛻化’為‘熱月政變國家’這個誹謗。（《真理報》，1964年4月3日）

蘇斯洛夫接着對中國領導人發出一連串的警告：你們以為托洛茨基派今天是“微不足道的小集體”，就可以借用他們的思想了。你們醒醒吧！他們將利用，而且已經在利用你們的革命了。從前，你們了解“小資產階級滲透”的危險威脅着你們自己的黨，今天你們好像把它忘了。是你們懸崖勒馬的時候了，因為你們這種政策既威脅我們，也威脅你們自己。

這種“理論的”依據（蘇斯洛夫無聊的議論的確只配帶上引

号!)是十分可怜的,倒說托洛茨基主张“放弃”和平經济建設(其实是为了这个緣故,他早在1923年就提出苏联要进行工业化,实施五年計劃);倒說中国人也是这样(实际是因为这样,苏斯洛夫才在后面一頁中指責他們要过度加速他們国家的工业化);倒說不断革命就是过渡到“革命战争”(对一生从沒有见过真正的革命的眼光短浅、暴发的官僚主义者來說,无产阶级群众或一个革命的政党夺取政权的斗争只不过是……由苏联来发动一次“革命战争”)。这就是人們在今天,斯大林死后十年,对世界各地的数千百万的共产主义者,作为新福音一般提出来的这种“馬克思列宁主义”。

但是,在这些可耻的伪造后面,倒有一种同真理距离并不很远的政治邏輯。苏斯洛夫說,中国人大部分思想的根源是托洛茨基主义;这完全正确!他說,这些思想威胁苏联官僚主义的地位,他也沒有怎么搞錯。而他最后警告中国领导人說,在他們那里同样有官僚主义,它有为“不断革命”的跃进付出代价的危險;这也是真理。

这就是中国人反托洛茨基派的立場的秘密,也就是他們的一般是进步的思想意識的立場和他們拚命拖住斯大林的企图之間的矛盾的秘密。因此,由于世界革命、殖民地革命、工人国家內的政治革命、还有我們應該期望的帝国主义国家內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进步而导致的这个矛盾的正面解决,将在当代革命馬克思主义者的托洛茨基派綱領的基础上,創造出必要的力量,把爭取国际工人运动革命路綫的斗争同爭取工人国家內社会主义民主的胜利的斗争結合起来,把坚定不移地保卫革命馬克思主义原則的斗争、在所有工人国家的民主和平等的基础上重建統一集团的斗争以及根据民主集中制重建一个群众革命国际的斗争結合起来。

1964年6月10日

(譯自法文版《第四国际》1964年7月号)

二八、赫魯曉夫被攆下台

——美国《战斗者》周刊社論

10月12日苏联发射了一个环绕地球的三人宇宙飞船。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魯曉夫在这三个宇宙飞行员刚进入轨道的时候，在一次向苏联人民及全世界广播的电视节目中，跟他们进行了谈话。但是，后来当这些飞行员被送到莫斯科来接受庆贺的时候，赫魯曉夫，这位国家最高领导人却不知去向了。他的名字已经从苏联的报纸上消失，许多建筑物上悬挂的他的巨幅画像也全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苏联人民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对于这一重大事件，事先毫无所知，他们只能感到仿佛他们也曾到外层空间去了一趟。

苏联宇宙飞船的发射和克里姆林宫秘密而急骤的权力转移两件事的同时发生，戏剧性地表明了苏联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一方面是计划经济制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另一方面是受宫廷革命和官僚特权阶层的上层人物的阴谋所支配的政治制度。

赫魯曉夫的被攆下台和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上台，究竟是由于一些什么问题，以及这种权力的转移究竟是如何完成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员或其他共产党党员全都毫无所知。同他们一样，我们现在也必须等待见到更多的材料后，才能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才能了解这件事对于苏联、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对于世界局势将会产生何种影响。等到事态有了进一步发展，同时我们获得了更多的情报的时候，我们当再作进一步的分析，不过目前有几点看来是很明显的。

斯大林依靠屠杀实际出现和潜在的反对者、依靠对人民实行

大規模的恐怖政策來維持他的統治地位，而目前統治蘇聯的官僚集團已無能重新建立那種穩若磐石的統治了。在今天，這個集團同蘇聯經濟的發展、人民群众的覺悟程度以及其他工人國家的需要，發生了日益尖銳的衝突。

在莫斯科出現的急驟的、秘密籌劃的權力之事，表明在蘇聯有必要重新實行工人民主。蘇聯人民有權利知道赫魯曉夫為什麼被拋棄掉，這裡面究竟有些什麼問題，他們有權利討論這一件事和其他一切重大問題——有權利通過投票對那些問題作出決定。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以及他們的前任赫魯曉夫、馬林科夫和斯大林——所行使的官僚主義的統治方法，同蘇聯早期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領導下所實行的工人民主，簡直是截然相反的。那時，在由內戰、帝國主義干涉和戰禍連年所造成的無比困難和危險的情況之下，蘇聯人民和共產黨員也仍然完全了解他們的政府正面臨什麼樣的問題、對問題持不同看法的各个方面都有些什麼論點，而且政府從來也沒有對他們隱瞞過具體發生的事情的真相。列寧也可以因為得不到多数的支持而被免職——這樣的事也的確有過——那才真正是多数決定一切的政體。

因此，赫魯曉夫被免職一事所產生的一個最突出的效果，是使人非常清楚地看到。蘇聯人民迫切需要在他們的國家中消除那個掌握着政權的官僚集團——經濟上的寄生蟲和人民政權的篡奪者——重新恢復年輕時代的蘇維埃共和國所建立的工人民主。

計劃經濟所取得的巨大進步已為取得一個比早期蘇聯困難時期所實行的還要更為完備得多的工人民主打下了更好的基礎。這樣一種民主的重新實現，無疑將給經濟和文化以不可估量的刺激，並對世界範圍的社會主義鬥爭發生巨大的推動力。

（譯自《戰鬥者》1964年第38期）

二九、中国的原子弹

——美国《战斗者》周刊社論

10月16日中国宣告自己試驗成功，从此打破了美、苏、英、法向来对核武器的垄断，同时宣称：“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議：召开世界各国首脑會議，討論全面禁止和彻底銷毀核武器問題。”这一建議同苏联多次提出要求召开一个商討銷毀核儲备問題的會議的建議是完全一样的。

任何一个政府，如果对于防止大气层进一步遭受到核試驗的污染、对于制止核武器的无限制的生产、对于結束毀灭性的热核灾难的威胁具有任何誠意的話，就不可能不对这个建議表示贊同。

但是，美国政府，一如它过去拒絕俄国的建議一样，断然拒絕了中国的建議。約翰逊总统，在他就中国的試驗所发表的声明中，竟用了一副在人类政治史中少有的最无耻的伪善面貌，拒絕了这一建議。約翰逊毫不害臊地說，他对于中国使放射性尘埃污染大气层的举动感到大为震惊。

大气层試驗首先是由美国政府开始的。它极力推进——現在仍繼續在那里推进——核軍备竞赛，使得別的国家不可能不进行核試驗。它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对人类使用核弹的政府。而且它这样作也不过是在进行一次实地“試驗”，因为在它把炸弹投在挤滿男人、女人和儿童的两个城市里的时候，日本已經被打敗而且已經在求和了。

美国政府，只是在通过自己的大气层試驗已經取得全部它所需要的資料之后，才簽訂大气层禁試条約的。自簽訂禁試条約以

来，它已进行了数十次地下試驗，而且現在还在繼續进行着。它繼續把核武器扩散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把它們裝在北极星潛艇上、裝在所謂的多國籍船員的船上、裝在環繞整個世界的基地上，并裝在去中国海岸巡邏的帶有核裝备的軍艦上。

而約翰遜——干过上述一切、曾經进行过三百五十多次大气层試驗的美国政府的目前代表——却裝出对中国进行的那么一次試驗感到震惊了。

更奇怪的是，約翰遜竟对中国人民的經濟上的福利表现了极大的关怀，他认为中国政府把发展国家經濟极其需要的本国資源，大量使用在核計劃上，实在是一出“悲剧”。而說这話的正是那个对中国实行封鎖、把它排除于联合国之外、拒絕批准本国人民把剩余的麦子或其他任何东西卖給中国的那个政府！說这話的，正是那个提出所謂的在美国“对貧穷宣战”，而他建議使用的經費还不及他用在备战方面的費用五十分之一的約翰遜。

他摆出这么一幅伪善面貌是有目的的，那就是要用这种烟幕来掩盖一个簡單的事实：美国政府仍然拒絕这个为了达到裁减核軍备的目的而必需采取的最合理、最显然的步驟。

（譯自《战斗者》1964年第38期）

三〇、中国对核談判的呼声

——美国《战斗者》周刊社論

在中国政府提出召开世界各国首腦會議以商談禁止核武器問題之后，中国总理周恩来直接写信給約翰遜总统和所有其他国家的元首，力求促成这一會議的召开。而华盛顿的这位睥睨一切的冷战司令所能作的唯一答复，却是这只不过是一种“騙人的”建議，中国人对此事并无誠意。这話实际只是表明約翰遜政府，对于禁止核武器这一重大問題，自己是完全沒有誠意的。

联合国秘书长吳丹，跟他完全不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建議。他提議五个核国家——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現在再加上中国——应在1965年中举行一次會議，以討論結束一切形式的核試驗、采取步驟防止核武器的扩散、及“其他一些有关裁減軍备的問題”。

吳丹強調指出，1962年联合国大会曾經通过的一項決議，不仅譴責使放射性尘埃污染大气层的地面上的試驗，而且譴責了一切形式的核試驗。

华盛顿的政客們对吳丹比对中国人总算客气一些。至少，他們还承认他的存在。不过，对他的建議，他們是同样断然拒絕了。

事实上，就在吳丹提出他的建議的那一天，美国政府还在密西西比試驗了一次地下的核爆炸。同时，这个——曾經进行过“大約有三百二十到三百七十五次”核試驗，世界上最瘋狂地热衷于核試驗的——美国政府，还又一次重复了它对仅仅試驗了一个炸弹的中国的伪善的譴責。

在中国沒有进行核試驗之前，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不利于美国人民的。現在，这个政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充滿着危險。美国不應該再摆出一副冷战的架勢了，它應該承认中国、放弃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主张、同中国建立外交和貿易关系，并接受商談禁止核武器的建議。

（譯自《战斗者》1964年第39期）

三一、中国攻击了苏联的 不平等现象

——美国《战斗者》周刊文章

中苏之間彼此进行恶毒咒罵的情况的忽然緩和和中止，标志着赫魯曉夫的倒台和随之而来的中苏爭端似將轉向协商的暫時休战状态。在中国总理周恩来来到莫斯科之前的一个周末，苏联政府已停止了对中国向苏联听众定期进行的广播的干扰，这表明克里姆林宫实际已接受了这种休战。

可是，在目前的这种休战状态出現之前，中国人，特别是在他們回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的第九篇文章中，已將爭端推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阶段。因为在这篇文章中，中国人已提出了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危机的**社会根源問題**。

正如厄內斯特·杰尔曼在巴黎的一种劳工刊物，9月25日一期的《世界展望》中所作彻底分析中指出的，中国人的这篇文章，同他們最近以来所发表的有关意識形态問題的其他一些文章一样，基本上是自相矛盾的。中国人的文章，使用了只有托洛茨基在反对官僚集团的特权的斗争中曾經使用过的最尖刻的言辞，譴責了苏联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把它說成是苏联国家领导中的修正主义的根源。同时，这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个錯誤的看法，认为苏联官僚集团是一个**资产階級**（或**資本主义**）阶层，而且这个阶层目前正走向使**資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道路。

中国的理論家們指出，一个“社会上的特权阶层”在苏联的发展，乃是修正主义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文章极其鮮明地描繪了

这个特权阶层的特点，其中有許多話是相当有見解的：

“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識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識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

如果在这一段中，“健康”的同“蜕化变质”的知識分子和干部的区别还不过限于意識形态和精神面貌方面，那么，关于这种蜕化变质現象的社会和經濟条件方面的基础，在文章的另外几段文字中，却是說得非常清楚了：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統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們支配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权力来謀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仅通过高工資、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賄，化公为私。”

文章在它的分析中正确地強調說明，列宁（其实他們还可以加上馬克思）早就提出警告，指出过分的社会不平等現象的結果就会有招致工人国家的机构走向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道路的危險。

“列宁当时非常強調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非常強調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工作，不断揭发和清除苏維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新资产阶级分子，并且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同时，列宁还非常強調，在工資政策中必須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則，即一切**公務員，都只应領取相当于工人工資的薪金，只对资产阶级专家付給高額的薪金。**”

另外，在談到苏联国家的腐化現象的总的教訓时，文章說：

“絕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間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有趣的是，他們在談到这种教訓时，还說：

“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須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同时，普遍組織和訓練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絕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中国人对苏联經濟上的不平等所作的这种攻击，如果繼續下去，可能会有很大的作用。因为，如果他們企图恢复斯大林的名誉、反对非斯大林化的宣传运动根本不可能得到苏联工人和农民的任何支持，那么这种以平等为号召，反对苏联官僚集团享有各种实际特权的运动，无疑一定会得到苏联人民的响应。

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1930年取消了“党内最高限額”（即担任职务的党员的最高收入，一般以不超过技术工人的收入为原则）。从那以后，社会不平等现象不但一天天无限制地发展下去，而且变成了一种公开奉行的教条。布尔什维克对不平等现象作斗争的传统，被公开指責为“小资产阶级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国家、党和經濟机构的最上层的领导人，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全都享受着巨大的特权。

关于军队的问题，我們在这里还有必要說，是斯大林破坏了民兵制度，斯大林并没有建立民兵制度嗎？有必要說，是他使军官集团完全脱离了普通士兵嗎？是他使得人民对“保安”部队沒有絲毫的控制权嗎？是他使得政治警察可以进行清洗、进行虛构罪名的

审判、謀杀或放逐成千上万正直的共产党员嗎？

九評的作者們尽量給斯大林抹粉，却把苏联的不平等現象归罪于赫魯曉夫。他們一方面承认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中已經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現象，一方面却說，“在赫魯曉夫上台以前，他們（特权阶层）在苏联社会中并不占統治地位，他們的活動受到种种限制和打击。[但]在赫魯曉夫上台以后……[新資產階級分子]就在党、政、經濟、文化等部門[逐漸]①占据了統治的地位，形成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

中国人还把這個特权阶层叫做“目前苏联資產階級的主要組成部分”，叫做“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和“苏联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根据中国人的說法，这个“資產階級阶层”正力图使資本主义在苏联复辟。

过去的經驗已經一再地证明，苏联国家和它的官僚集团是具有二重性的。我們應該相信，这个官僚集团一方面犯下了許多重大的錯誤并尽量使自己变成一个特殊的特权阶层，一方面，它也按照它自己的特殊方式在維護着国有化和計劃經濟，維護着十月革命的主要果实。因此，苏联国家虽然在寄生的官僚集团的統治之下已有蜕化变质和腐化現象，但我們仍必須承认它是一个工人国家。

对于一切既支持苏联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來說，強調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和中国的根本一致的階級性，是完全必要的。这就是苏中軍事联盟的客观基础，这一联盟是符合反对帝国主义的國際工人階級的利益的。

（譯自《战斗者》1964年第41期）

① 此段方括号中文字为《九評》英譯者所加，不見于《九評》原文中。——譯者

三二、玻利維亞托洛茨基主義者 宣告不信任軍人議會

——第四國際玻利維亞支部、革命工人黨
政治委員會 1964 年 11 月聲明

在全體人民歡呼聲中，最殘暴的帝國主義走狗在最近垮台了。革命工人黨和人民一起慶祝這個殺害大學生和礦工的凶手的垮台。這是資本主義政策瓦解過程中的必然結果，是資產階級綱領（在玻利維亞以及在全世界）的危機的必然結果，這種危機使得騷亂達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以致民族主義革命運動黨的末日已經成為不可避免的。事物的发展，要么是發生一種沿着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人民起義，要么是按照美帝國主義的命令撤換帕斯^①和民族主義革命運動黨。這就是革命工人黨所着重強調和要使人了解的事情；記着這一點，工人們準備建立自己的政府。

無產階級的力量及其革命的鬥爭，粉碎了這一可怕民族主義革命運動黨政府及其最無恥的屈從國際金融資本的整個反勞工政策。

民族主義革命運動黨的強有力的鎮壓機構，已經建立了十二年了，並沒能壓制住或破壞了人民的鬥爭精神。儘管有流刑和監獄，儘管用軍隊在索賸索賸進行屠殺並進攻“聖約瑟”電台，可是人民仍然精力旺盛；帕斯這一屠夫的命運已經決定了，他的垮台只是

^① 維克多·帕斯·埃斯登索羅 (Victor Paz Estenssoro, 1907—)，玻利維亞民族主義革命運動黨領袖，1952 年起就任該國總統。——譯者

時間問題。

但是，面對着迫害和屠殺的失敗，軍隊突然叛變了；正是這一軍隊，它直到 11 月 2 日以前還支持這一暴虐的政權，它在蘇克雷、科恰班巴、拉巴斯等處和僱傭軍、政治警察、騎槍手在一起同人民為敵。

在民族主義革命運動黨的最後時刻，這一軍隊進行干預了。這一軍隊，它在幾天以前還按照這一暴君的命令，屠殺索賸索賸的礦工，並進攻礦工的“聖約瑟”電台。這一軍隊，它在此以前還在聖克魯斯和阿波洛進攻游擊隊。野馬式轟炸機在礦場上面飛翔，以威嚇無產階級。

而且，同我們的預測完全一樣，在玻利維亞發生的政治事件，乃是一次預防性的政變，目的在於保衛這一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結構。毫無疑問，這是得到狡猾的美國大使的默許的，其目的是要壓制起義，並欺騙群眾的感情。

這樣，原本應該轉入人民及其政治組織手中的政權，就落到軍事議會的手裡。而這個軍事議會掩護那個屠夫及其隨從者逃跑了。

民族主義革命運動黨所建立起來的機構根本未受影響，各種官員仍然是維克多·帕斯政府的舊官員，其中包括一些地主。政治經濟也和過去十二年中完全一樣。因此，軍事議會不是人民所歡迎的那種政府。

全體人民——大學學生、礦工、教師等等——都武裝起來推翻了民族主義革命運動黨的整個政權及其所體現的全部概念。人民現在所要求的是：埋葬民族主義革命運動黨的全部政策、它的人員以及它的由美國大使指定的計劃。人民不打算繼續保留過去的東西，也不打算“恢復”它。

因此，工人階級、職員、愛國的大學生、革命的知識分子、農民、公社社員、前佃農——所有這些人的立場只能是對軍事議會保持絕對獨立，提高警惕，完全不信任它。

有必要克服各種機會主義思潮的障礙，這些思潮力圖使工人階級投向軍事議會那一边。

至於各工人政黨，它們的任務在於建立**左翼的統一陣綫**，來組織人民群眾，指導他們沿着革命的社會主義道路爭取真正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

沿着這條道路，就有必要以一種革命的辦法使玻利維亞總工會恢復生氣，醫治它的官僚主義的骨絡，消除民族主義革命運動黨的影響。作為無產階級力量的中心，它必須變成一個生氣勃勃的、有戰鬥性的獨立力量。

玻利維亞所屬各工會，必須鍛煉得具有無產階級的自我犧牲精神、堅忍不拔的意志和革命決心。

各政黨、各工會和全體人民，讓我們高高舉起**反帝國主義鬥爭**的旗幟吧。

（譯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41期）

三三、玻利維亞起義者使托洛茨基主義者獲得了自由

革命工人黨和人民群眾在一起，積極地、英勇地參加了反對最殘暴的民族主義革命運動黨政府（在他們仍然當權的時候，這個稱呼我們反復用過上千次了）的鬥爭，這使得我黨有了許多受傷者。

在最近幾個星期裏，在我國內部以及在拉巴斯，革命工人黨的許多積極分子陷入監獄或者受了傷。在奧路羅，“聖約瑟”工會總書記鮑里諾·若尼基納受到政治警察、騎槍手和軍隊的野蠻迫害，直到在最近一個星期被捕入獄並受到殘暴毆打。作為一個工會領袖和托洛茨基主義的戰士，他很嚴格地履行了他的職責，和大學學生並肩戰鬥，並且動員了礦工。

在具有歷史意義的那個星期二（10月29日），在拉巴斯，一整隊革命工人黨的信徒被捕，在政治警察的監獄中受到極其殘暴的折磨。其中有加布里爾·古茲曼、尤洛吉奧·山切茲、杰姆·拉托雷、因達累喬·諾哥累斯（是一個工人）、阿曼多·腊米雷茲、洛蘭諾·阿巴扎·鮑提斯塔、路易·鮑提斯塔、卡羅斯·西爾瓦、米古爾·扎姆布蘭納、喬治·貝雷多和里嘉多·塞加斯同志。諾哥累斯同志是塞德的一個領袖，他由於把二百個工人從他的工廠帶到大學隊伍那里而受到鞭打。山切茲同志頭部受了傷。古茲曼同志由於凶手曼納科親自動手折磨而受重傷。阿達里德·拉托雷也被捕入獄，並受到特務的毆打。

當人民攻入那可耻的政治警察的大樓時，所有這些托洛茨基

主义的同志,都得到了自由。我們把所有这些同志的姓名,記入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帕斯·埃斯登索罗的斗争的光荣册。

(譯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41期)

三四、“圣約瑟”和索腊

索腊的战斗

在矿业工人的英勇斗争中，革命工人党的战士站在最前列。由于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参加，矿工的动员得到了力量和动力。

革命工人党对于那些参加索腊索腊战斗的在瓦努尼、卡塔维和西格洛温提的本党同志们，表示祝贺。虏获的武器一定要加以妥善保管，并利用它们来组织一支党的武装队伍，作为矿工无产阶级军队的一部分。

索腊索腊的战斗，以及对“圣約瑟”电台的进攻，都将作为人民群众反抗的象征载诸史册。前者以勇敢和沉着为特点，后者则以顽强为特点。在这两次行动中，保卫暴政的军队都曾吹嘘他们的强大和他们的现代武器。

但是，实际上，这两次反对拿破仑主义和复辟主义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政权的战斗，都决定了那个想要终身担任总统的人物的垮台。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41期)

三五、索腊索腊的战斗

〔《世界展望》的特約記者，在到卡塔維和西格洛溫提矿业中心的一次旅行中，訪問了 V.E. 以及和他一起參加索腊索腊战斗的其他矿工。V.E. 是第四国际玻利維亞支部革命工人党的一个成員。在进行这次会晤的一間小屋里，桌子上象征性地放着一挺从政府軍那里虏获的机关枪。下面是这次訪問記的譯文。〕

* * *

問：矿工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动員的？

答：奥路罗游行示威和遭到警察、軍隊鎮压的消息，一传到卡塔維和西格洛溫提，工人們就开始动員了。我們听說很多人被杀死或受了伤，听說甚至在給牺牲者举行葬礼的时候都发生了战斗。实际上，我們听到的消息是有很多人死了或受了伤，这就是矿工的反应之所以如此迅速如此激烈的原因。

問：他們的具体反应怎样？

答：10月28日的晚間，他們开始动員。夜間，一百五十个至二百个矿工带着炸弹和旧枪，乘三輛卡車，向瓦努尼-奥路罗行进。同时还有一輛卡車从卡塔維出发。当夜，他們到达了瓦努尼，力量集中到一起。在这里，在共产党的干部（在西格洛溫提，他們是大多数）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战士（第四国际玻利維亞支部革命工人党的信徒，也是《人民》报的信徒，是由吉勒尔摩·洛腊領導的）之間，展开了一場爭論。

問：他們爭論的是什么？

答：共产党的游击隊員們不願意打。他們的理由是，托洛茨

基主义者的武器最好，所以要让他们先走。于是一卡车托洛茨基主义者开到前面去，其他两辆卡车跟在后面。在索腊索腊，它们分道扬镳了。

問：軍隊在什么地方？

答：軍隊在索腊索腊的那一边。实际上，头一辆卡车在刚刚离开村庄时就碰到他们。有人喊着叫头一辆卡车停下来。但是同时有些士兵向卡车放了枪。天色还很黑。矿工们立刻跳下车，设法藏在路旁。不过有七个人——都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已经受了伤。

問：别的卡车呢？

答：一辆开到馬夏卡馬卡。但是后来共产党的人们回到瓦努尼。

同时，头一辆卡车上的人们让一位司机载运伤员。到了第二天早晨，所有的人都回到瓦努尼，并且开始谴责共产党人在头一辆卡车遭受军队攻击时不去协助。

問：这时在卡塔維和西格洛温提发生了什么事情？

答：由矿工控制的瓦努尼电台广播了第一次遭遇战的新聞。情况很混乱。他们说大约有六十个人死亡了。这时正是其他两辆卡车离开卡塔維和西格洛温提的时候。我正在这两辆卡车之一上。大约十一点钟，我们到达瓦努尼，别人也都到来了。很快地吃完早饭之后，我们离开这一城市，在中午到达索腊索腊。

問：以后呢？

答：他们决定带着炸弹和枪支步行走过平原。我们向馬夏卡馬卡前进。

有些人在瓦努尼没有吃饭，在他们吃饭以后，召开了一次会议，差不多有二百名矿工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十

字路口了。

問：这次會議的結果怎样？

答：奥尔頓內茲是西格洛溫提的共产党領袖，也是工会的重要領袖，他主張我們不應該再往前走；大約有一百个人就上了他們的卡車。托洛茨基主義者以及贊成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態度的矿工則決定往前走。后来，共产党的游击隊員們也跟了上来。

同时，有很多别的矿工到来了（矿工的总数大約有三千人。据说，有些农民的队伍和他們联合在一起。他們越过平原，占領了周圍的山头）。共产党人逡巡猶豫了一会儿，走回去，然后又向前进了。

問：軍隊呢？

答：很快就发生了遭遇战。矿工开始用炸弹进攻一个山头，一队兵士在这一山头上挖有壕沟，矿工击潰了他們。一个兵士倒下死了。其他兵士就都扔下武器，开始乱跑。他們不願意打仗。有些人也开了枪，但是朝天放的，沒有伤着矿工。矿工們抓到一些俘虏和繳获很多武器。

問：矿工們打算到奧路罗去嗎？

答：不。那里实际上已經調来了很多的軍隊，而且帶有大炮。同时，风刮得很厉害，尘土飞揚，使你看不見任何东西。尽管有些人持有相反的意見，矿工們通过表决，大多数决定要回到他們的基地去。

在軍隊方面，他們決定呆在他們的陣地上，不到瓦努尼去，更不用說西格洛溫提和卡塔維了。

問：矿工們回到卡塔維和西格洛溫提了嗎？

答：是的，他們回去了；当地的人民正在等着他們，由于听说有一次屠杀而挺着急。

后来召开了一次会议来做总结。那个工会书记、共产党员奥尔顿内兹说不出话来。他们喊他：“看护，女佣人。”（在这次斗争里，他开着一辆救护车。）这一报告是由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作出的。

这就是主要情况。现在矿工觉得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强、更有信心了。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42期）

(二)

三六、第四国际(以波薩达斯为首的托派)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公报

第四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已于今年3月在欧洲举行。到会的有来自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十三个国家的代表。古巴支部的代表团由于沒有領到出国签证而未能出席會議。第七次代表大会共开了十天,申議了下面的議程:

- (1) 開幕詞——J. 波薩达斯同志。
- (2) 不断革命在全世界的进展——M. 埃雷迪亚同志。
- (3) 在世界不断革命过程中的殖民地革命——C. 罗西同志。
- (4) 在世界不断革命过程中的政治革命、中苏危机和各国共产党的演变——P. 佩雷兹同志。
- (5) 各国委员会举行會議, 研究各該国革命的具体发展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 (6) 組織問題。在本时期內, 第四国际的建設問題。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在此不断革命順利开展阶段中的某种特殊的打入主义(entrism)的发展。在本阶段、以及在原子战争期間和紧接着原子战争之后的第四国际的作用——J. 波薩达斯同志。

(7) 各委员会报告、讨论和政治决議。

會議通过了下列决議：代表大会就五一节向全世界群众发表的宣言；关于投降分子利維奧·麦丹、密歇尔·巴布洛、厄内斯特·杰尔曼和皮埃尔·弗朗克的决議；关于过渡时期政治革命綱領的决議；关于从帝国主义准备原子战争时期、原子战争进行时期、同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全人类立即进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之間的过渡綱領的决議。

大会名誉主席团包括：納塔莉亚·謝多娃和列昂·托洛茨基；被巴西地主武装匪帮杀害的巴西支部的杰里迈亚同志；在同游击队并肩作战时被多米尼加軍事匪帮击杀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达里奧·佩拉尔塔同志和法哈斯·坎托同志，以及在武装斗争的最后阶段被民族解放陣綫领导当局杀害的阿尔及利亚支部的穆斯塔法同志。

代表大会全体起立靜默一分钟，向被杀害的同志，以及納塔莉亚·謝多娃和列昂·托洛茨基致敬。

代表大会向古巴支部的同志們致以兄弟般的团结的敬礼，因为他们未能获准前来出席大会，而且因为他们不顾共产党和在某种程度上古巴政府設置的重重障碍和进行的恐怖主义迫害而仍然以坚定的、战斗的革命态度坚持活动。代表大会向沒有任何罪名就被古巴政府无故投入獄中的古巴支部的三位同志致以兄弟般的团结的敬礼。大会还要求立即释放这三位同志并允許古巴支部自由活动。

世界革命的优势

代表大会向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全体革命群众致敬。

代表大会向欧洲的无产阶级致敬，尽管他們的领导者对资本主义采取了投降主义的和調和的态度，但他們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和动员，阻碍着资本主义势力的稳定和平衡，并且每时每刻都在不屈不挠地扩大着打倒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他們的斗争是促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群众的革命斗争取得进展的主要因素。

第四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号召拉丁美洲的群众起来无条件地保卫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国家。議程上的所有事項均經全体代表討論并在广泛討論后予以通过。

世界代表大会根据各項报告和所进行的討論，授权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国际書記处最后完成并审定这些文件。

會議是在最完美的兄弟友爱精神和革命热情的基础上进行的。會議通过的各项決議都是以下面各方面的客观結論为根据的，这就是世界革命的不断取得优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群众的干預、欧洲无产阶级的斗争、工人国家的不断取得进展、中苏危机和各国共产党的危机。

各項決議明确闡述了革命的不断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正在整个世界上进行着，影响并交互影响着全世界群众的斗争和决心。就社会方面来讲，资本主义無論过去和将来都是站不住脚的。力量对比始終在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在一个国家中的失敗和退却，立刻就由于革命在世界其他地方所取得的进展、特别是工人国家所取得的进展而得到了补偿。

中 苏 危 机

中苏危机、即关于和平共处和裁軍、关于即使在资本主义以原子战争进行威吓或发动原子战争的情况下也要无条件支持殖民地革命的爭論，是体现着現阶段的綱領和政策的一些根本問題。中

苏爭論突出地說明了不断的世界革命的高漲和進展。中國人為斯大林所作的辯護並沒有影響他們對赫魯曉夫集團的攻擊，反而由於進行了這種攻擊而得到了好處；中國人目前所採取的立場接近於這個歷史時代的既徹底又必要的革命路線。既然中國人為斯大林所作的辯護並沒有限制革命，他們限制和平共處並使之服從於無條件保衛殖民地革命的立場就具有極大的重要性，並且是從各方面看來都對革命有利的結論。這場爭論和中蘇糾紛，是表現革命在全世界上趨於成熟的一個基本方面。殖民地革命的進展，簡直無法生活下去的群眾對革命的推進——例如在桑給巴爾——表明，支配和決定歷史進程的正是不断的革命過程。相對的挫折——例如在巴西——不能改變有利於世界革命的力量對比關係。帝國主義準備發動反革命的世界原子戰爭，但是，群眾早準備好以在全世界同時進行革命來給予回擊，粉碎世界資本主義。各國共產黨和社會黨的領導、資本主義的領導，都將被革命、即戰爭革命的進展所消滅。他們將消失淨盡，土崩瓦解。無產階級則將作為一個有組織的和團結一致的階級而繼續存在，而把同時進行革命和進行社會的社會主義重建的領導重任擔當起來。

政治革命在這個過程中發展着，不管是在革命——即戰爭革命——之前，還是在這個過程中，都是這樣。各方面的前景均將導致世界革命的集中和高漲。根據這個分析，第四國際決心把參與指導或領導，或者帶頭進行殖民地或無產階級的革命和工人國家中的政治革命作為自己的目的。

以上就是出席第四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進行的討論和他們所一致通過的各項決議的主要結論。

此外還通過了一項經過充分討論和同意的決議，分析並且譴責了投降分子密歇爾·巴布洛、利維奧·麥丹、厄內斯特·杰爾曼

和皮埃尔·弗朗克，他們已經蜕化为两个集团和奸党，这两股逆流正在向赫魯曉夫、本·貝拉、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党寻求庇护，并且扮演着为苏联官僚制度充当調解人的角色。

各支部的生气勃勃的活动

代表大会分析了第四国际朝气蓬勃的工作，打进去主义在現阶段的运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民族主义潮流的发展，这些国家中的革命运动的迅速朝着社会革命发展，以及第四国际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远景。

业已决定不成立新的支部，而是巩固已有的支部——但特殊情况例外。

代表大会确认，改組欧洲和非洲各支部以及成立新支部的工作进行了仅仅一年半的时间，但这些支部都得到了巩固，坚持定期出版半月刊和月刊，并在欧洲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坚持着富有生气的、日益发展的活动，并且在斗争中赢得了陣地和威信。代表大会特别提到了西班牙支部的活动，它尽管受到佛朗哥的迫害，但仍然进行了正常而不断扩大的活动。

代表大会注意到，为召开代表大会而进行的筹备工作做得非常完善，为第四国际前所未有。各支部进行了深入的活动，它們朝气蓬勃地参加了阶级斗争和革命斗争；国际书记处在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进行了訪問；筹办了干部学校；各支部召开了預备會議和代表大会；定期而經常地出版了各种文件，以指导并組織国际在有关当代各个重大革命問題方面的活动，以上这些构成了为召开世界代表大会而做出的最完善的筹备工作。

对提出的各項建議和文件进行表决以后，接着就选出了新的国际执行委员会。

消灭资本主义

在代表大会进行期间，桑给巴尔政府宣布将一切外国人占有的土地——这是该国现在存在的唯一的一种财产——收归国有。根据这一措施的实施，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决定承认桑给巴尔为一个工人国家，但要求在实施没收措施时进行核查和批准。

大会结束时，由佩雷兹同志致闭幕词。接着，全体高唱国际歌。后来，举行了友好联欢会，在联欢会上每一位代表同志发表了对代表大会的感想。同志们一致强调第七次代表大会对世界各地的支部的生活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全体代表欢欣鼓舞地建议立即将此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所有决议付诸实施。最后，他们向没有出席代表大会的第四国际的同志致意。

此外还向在古巴被捕的同志们、向革命、向全世界的革命群众致以兄弟般的敬礼，这些革命群众象第四国际一样，正在为推翻资本主义、组织工人国家、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并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消灭资本主义和工人国家中的官僚政治而进行着斗争。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

1964年4月

(译自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机关刊《红旗》1964年6月号)

三七、第四国际第七次世界 代表大会开幕詞

波薩达斯

同志們！

我們以第四国际的名义，以所有因为工作关系而不能参加大会的第四国际战士的名义，以所有因为正在从事斗争而不能出席的同志的名义，以那些由于采取战斗的立場而被人杀害以致不能出席的人的名义，我們以所有这一切的名义举行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对于人类全部的未来过程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重要时期。

在致开幕詞以前，我认为有必要談談主席沒有涉及到的其他某些方面：这就是关于在組成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的問題上第四国际所遵循的准則。共产国际章程和某种程度上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前的第四国际章程，在任命代表的方式上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即选举代表是根据有关国家的重要性、这个国家中成員人数的多少以及它在国际中的地位。第四国际不是以空洞的数字为根据来任命代表，即不是根据支部的大小来任命领导的一种由各支部組成的联合会。第四国际领导机构的組成不是根据支部的大小和人数的多寡，而是决定于政治重要性、政治力量以及干部成熟的程度。干部不是以任何支部的名义，而是根据整个第四国际的发展需要来选举的。第四国际的领导成員也可能都来自一个支部。但是这些国际的领导成員并不代表任何支部而是代表第四国

际。第四国际领导机构的政策、路线和活动是根据第四国际发展的利益而提出的。选举领导成员和代表时所必须遵循的准则，是以能够发展、推进和组织第四国际为基础的。

在选举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时，我们已考虑了第四国际的这些原则。每个支部的代表的次序和数目，是根据每个支部的重要性的力量来决定的，这将由“监察委员会”在以后加以说明。因此，在选举国际执行委员会、选举第四国际新的领导机构、选举国际书记处的时候，都考虑到了干部的重要性、成熟程度，以及如何能使他们组成一个和谐、一致而坚决的团体，以便推动、领导并组织这个阶段中第四国际的活动。现在是第四国际整个历史上最困难的阶段，但是我们如果就其复杂和困难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一点来看，它也很象另一个时期，那就是列昂·托洛茨基在世的时期，即他组织左派反对派和第四国际的阶段。

争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胜利的信心和意志

左派反对派、第四国际和我们之间的联系，不仅在于纲领和政策中表现出来的历史连续性，而且在于争取胜利的意志，作出决定和发挥影响的意志，在发挥影响时，不计人数的多寡，不考虑组织力量的大小，而是考虑客观的过程，它最可能的前景，国际局势成熟的程度以及革命在全世界成熟的程度。从这一意义上讲，重要的、正在和将要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信心，是政治的和革命的决心，是行动的明确性、纲领中所规定的前景的明确性、第四国际的政策明确性，以及领导力量的和谐一致。

三十年前，托洛茨基和一小部分人正是以这样的精神决定组织第四国际的——因为第四国际是在1934年筹划成立的。三十年前，托洛茨基正是以这样的精神考虑到组织第四国际的必要性、

可能性以及它的发展和历史必要性。他考虑的不是数目，也不是左派反对派战士的影响，而是独特的基本历史条件，这就是：世界革命运动在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必然会需要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政策，必然会需要为爭取无产阶级政权而斗争的政策和綱領，即改組和革新工人国家的綱領和政策；资本主义危机無論在程度上、影响上和規模上均将不断扩大。

但是这些客观的历史因素还不足以使托洛茨基决定成立第四国际；第四国际的成立是在人类历史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刻，在革命在全世界处于低潮的时刻实现的，当时斯大林主义象巨人一样兴起，几乎要使革命力量陷于四分五裂，它同世界资本主义結成統一战綫，結成联盟来反对革命。就是在这个时刻，托洛茨基擘划了第四国际，拟定了第四国际的綱領和政策的輪廓。

爭取胜利的意志

但是，如果没有信心，没有把握肯定历史的客观过程一定要走这条道路的話，托洛茨基也是不可能提出这样的前景的。

每一个綱領和每一項政策都預示着一种前景，这种前景在成为现实以前就已孕育在思想中、理智的認識中、决心和革命的意志中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綱領和政策不仅仅是估計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工人国家、资本主义和殖民地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国家的发展之間的关系的結果；基本的要素是爭取胜利的意志。

在托洛茨基奠定第四国际的綱領和政策的基础时，他考虑到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思想将会获得胜利这种必胜的意志，并且以这种意志为出发点。思想本身显然是现实的抽象，因为它是把一种多方面的、分散的、表面上缺乏一致性的客观过程集中起来，思

想集中了这个过程，规划出它的轮廓，而且允许人们干预这个过程。任何其他办法都会引起混乱。但是，要设想这样的过程，就必须有胜利的把握。而这种把握来自实践，来自分析，来自对思想的深信不疑，但是也要在实际的活动中有信心。

从那时一直到現在，第四国际已经得到了发展，而且，正如我们将在下面讲到的，它今天在历史上已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短期內的前景

同样，我們在这个阶段也准备要来参預人类历史即将出現的实际过程——原子战争和革命。我們所依靠和爭取的前景不是第四国际在人数上的增加，而是第四国际的各支部、各团体和各党同各种力量、同各方面的领导、同决定历史进程的下一步的各种运动的联合。这就是在国际范围内、在全面的规模上实行打进去主义。这并不是爭得地位或贏得各种倾向的打入主义，而是在非常短促的阶段和时期內推进革命的打入主义。

有了这种前景，我們所依据的就不是对我們的实际力量、人数和我們的物质手段的考虑，我們所依据的是已经在望的、已经在发展着的历史必然性。

工人国家正在不同的程度上发展着，正在开始推翻苏联官僚政治的全部机构。这个明显而不可改变的过程的最重要之点是苏联官僚政治的磐石团结已经成为过去，不仅在國內范围如此，而且在世界范围也是如此；不仅是在官僚政治各部分的范围内如此，也不仅是官僚政治内部各种矛盾的结果，而且我們如果同时考虑到它是官僚政治的矛盾斗争过程的一部分，那么，它也是由于工人国家在经济方面、财政方面、尤其是社会方面的进步現在不容許、也

不能容忍官僚领导存在下去。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官僚政治的这一部分人或那一部分人中间，不仅表现在同一国家内或不同国家内官僚政治的各种倾向、各个集团和各部分之中，而且事实上，如在中国和古巴所进行的革命以及革命的进展已经同它的领导的政策发生了冲突，而且这种冲突不断地表现了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前景。这不仅是长期的前景，而且是短期的前景。短期是指短短几年；两年、三年、四年。不会再多。

战争革命

我们抱着充分的责任感和觉悟，准备并将继续准备这次世界代表大会——它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以便在最近二年、三年或四年以内——虽然也可能不出两年——干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动荡的、多方面的过程；这个过程将导致核战争，而且就在发生核战争的时候，革命将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开始。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可以设想，在下一个阶段同核战争一起发生的是整个世界的同时革命。这两件事相距不会到几个月或几年，不会的；二者将同时发生。同时并不意味着同一小时、同一分钟、同一星期或者同一个月。它意味着同样的过程毫无例外、毫不间断地在全世界发生。这是世界革命不断发展的最高形式，它将把整个世界卷入各方面的革命，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到工人国家。我们为此而做着准备。

我们不仅相信纲领和政策的正确。我们不仅相信革命发展的必然性，我们也相信我们自己。托洛茨基说：“有了党，我们就无所不能；没有党，我们就一事无成。”他的意思就是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相信我们自己只有在掌握了一种能够使人们参加到这个过程中去，领导、组织并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历史手段之后，才可能有

自信。只有这时才会有自信。

因为这不是相信个人的才干、能力和个人的决心，而是相信我們知道如何去团结、了解、认识和实现表达了客观历史需要的千千万万人的愿望和意志。正在准备着核战争和准备着革命的就是这个过程。

我們参預中苏爭論

我們已为这个阶段作好准备。不是消极地、学院式地，而是在日常的活动中；由于行动敏捷，由于决心发展我們自己，由于不仅是在过程进行时参加进去，而且还要干預并改变这个客观过程，因此我們的这种活动永远是有生气的。我們人数虽少但仍然要进行参預，因为我們相信我們自己。但是我們之所以相信自己，是因为我們不仅相信巴西、墨西哥、玻利維亚这样的不发达国家的群众的革命意志，而且相信欧洲群众和各工人国家的革命意志。在赫魯曉夫和毛泽东之間发生危机、矛盾和斗争的过程中，我們并不看重毛泽东或这个共产党的领导。我們不相信他們能够决定一切；他們是暫时的领导，因为他們虽然表明一种需要，但并不代表这种需要，不用多久，这种需要即将同这一领导发生冲突。我們在推进这一过程，我們参預它，促使它达到成熟的地步。我們这个小党参預着中苏爭論，以便改正政策，使它具有最直接地反映世界革命需要的立場，而不論是中国的、古巴的革命，其他革命，还是游击战。

群众了解这一过程

我們反复重申：我們相信我們自己，因为我們相信世界的群众。我們的信賴不是唯心主义的，即所謂“盲目的信賴”。我們的信賴是整个历史中最合理的信賴。沒有任何人会有比我們更合理

的信賴了。我們的信賴是由历史的过程所指导、监督、判断和考驗的。我們并不指望群众因为走投无路而起来反抗。我們也不指望群众因为絕望而起来推翻他們那里存在的資本主义政权，推翻苏联和各工人国家的官僚机构。因此，我們相信他們因而也相信我們自己，因为指导他們的是自觉的理解力。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阶段能够表明象桑給巴尔那样的过程。从来没有。那些致力于通过人类的精神方面来解释世界的一切哲学家、唯心論者和大批蠢人都不了解桑給巴尔，他們对它置若罔聞。但是桑給巴尔却是这个历史阶段中最高尚的范例，說明人类的生活在如何进行着，是怎样作出反应的，为什么要作出反应，为什么要推进，說明生活的本能和生活的意識之間的关系，现实和意志之間的关系，现实意志，意志现实。

桑給巴尔就表現出了这一思想的綜合。决定群众行动的不是本能。决定群众行动的不是社会现实——这就是饥饿——的直接反映。决定群众行动的不是粗暴的个人行动。桑給巴尔的革命是由一种高度的觉悟所决定的，这种觉悟表现在这个事实上，即紧接着推翻了帝国主义势力之后就出現了建立一个向工人国家发展的政权的趋势。

历史上出現这样一个事件，并不意味着桑給巴尔是一个例外，它意味着桑給巴尔是合乎規律的。它并不意味着桑給巴尔有什么特殊的性质或条件，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全世界都具有桑給巴尔取得进步的那些条件和可能性。

国家机器竭力在进行威吓

人类历史中的这一阶段必須用以下事实来估計和判断，这就是不断成熟——这种成熟表現出一次比一次更加提高、广泛和深

入——的条件同一次比一次更加往后倒退的現行領導这二者之間的矛盾和对抗。在这个过程中，貌似非常强大的領導势力，拥有各种机构、手段和物資，他們对群众进行恐怖統治，力图粉碎他們，以为他們有办法可以統治人类的思想。但是人类的思想不是蒙昧主义所能統治的，不是由模糊不定或愚昧无知所控制的。他們之所以能控制人类的思想，是因为他們有殘害人的工具，如坦克、火箭和枪炮。如果美国的武装消失了的話，那么美国用以进行鎮压的物质手段，即美国政府，也就只能維持三分钟的时间。

左右人类灵魂的不是在历史面前躊躇不定，盲目无知，也不是在社会面前不知所措。不是的！具体地說，在这些国家——北美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其所以受这些东西的左右，是因为在群众面前有步枪、坦克、机关枪，这些构成了一种压力，并且由于实行了防止群众集体活动的恐怖主义而左右了一系列的反应。但是处在这种情形下的群众只要能找到方法来向这种势力进行示威并反对它，他們就会这样做——就象在桑給巴尔一样。

桑給巴尔群众的胜利

在他們和我們之間有完全一致的地方；我們是同他們完全一致的。他們是历史現阶段最进步、最高尚和最有教养的人。能够在沒有物质資源的情况下消灭那些阻碍进步的物质手段和社会方式的正是这些人。在从前，似乎必須有了哲学、科学、化学、医学、众議員、參議員以及大批愚蠢的盜賊才能取得进步。当时这就是进步。桑給巴尔的群众表明进步并不是这样的。桑給巴尔群众的进步基础却是他們的革命意志；在历史上最恶劣的条件下，毫无物质支援，他們却克服了压力，而且使用压力来推动历史前进。

我們同他們一样；我們也是有許多困难的一小群人，沒有足够

的物质手段,却面临着各社会党、各共产党、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工人国家的领导这些方面的联合压力,面临着各种压力,这些压力似乎非常强大,足以摧毁我们,使我们在巨大的革命过程中显得微不足道和无能为力,使我们屈从于利用我们困难重重和人微言轻的情况而向我们施加的恐怖压力;但是在整个这一过程中第四国际却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有意志和革命觉悟,意识到它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且正在全世界发展着。群众和我们完全团结一致。他们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但缺乏思想觉悟,缺乏成体系的觉悟。我们则有计划,有思想觉悟而自觉地行动着。

争取世界革命的联合

我们深信革命力量不久将在世界范围内联合起来。去年7月间,我们曾谈到在一两年内同中国革命联合的问题。从那时起,根据世界历史的具体过程,我们修改我们的看法说,我们不仅将同中国人联合,而且将同世界革命联合。如果我们首先同中国人联合,这也只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这并不是我们同中国人联合,而是中国革命同我们一起取得进展。我们对于这一阶段是有准备的。

这次代表大会在历史上的意义超过第四国际其他各次代表大会,只有第一次代表大会除外,因为那次大会是成立大会,它的基本任务是使把握和信心同合乎逻辑的、辩证的前景结合起来;拟定世界革命的纲领和政策。在俄国革命后,这是列昂·托洛茨基所完成的最重要的伟大工作。这是对思想的力量、经验和人类意识抱有信念和信心的最高表现。没有这种把握,托洛茨基就不会有力量设想到战争和斯大林主义是不会毁灭人类或使人类倒退的。

是革命，还是和平共处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最艰苦的历史条件下筹备的。两年以前，我們在第四国际中經歷了一次危机。有些人更加坚强起来，并且表现出我們对于这一阶段是有所准备的，他們所以能够这样，不仅是由于思想的力量和意識形态方面的信心，而且是由于經歷了对組織和革命行动产生信心的过程。两年以前，我們在第四国际中經歷了一次危机。这次危机是分裂和破坏了第四国际。事实上，瓦解了的全都是那些已經衰弱的欧洲支部——只此而已。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拉丁美洲，第四国际繼續取得了发展而且沒有中断。我們並沒有因为即将到来的核战争而退縮不前或受到阻碍。我們所以沒有退縮，并不是因为拉丁美洲的革命热情，而是因为对第四国际的政策、綱領和布尔什維克式的組織具有信心。

运动的威力和历史意义反映在这个运动的不可破坏的連續性上。这样一种連續性沒有为危机所影响，就反映出运动的客观必要性并不完全表現在它目前的人力物力上，但是政策、綱領和前景则可以表明它的正确性。我們同投降分子决裂以后，一直在繼續发展着我們的运动，他們已分裂成六七种流派。所有这些人的基本路綫就是放弃革命的客观远景而代之以改良主义和調和的道路，在现阶段这条道路的基础就是和平共处。

有两条路綫：共处或者革命。沒有其他道路，沒有中間阶段，沒有把各方面的因素合在一起的可能，沒有能够把它們联合起来的手段。共处就是革命的反面。要維持共处，就得取消革命的斗争。这就意味着取消以群众的坚定有力的干預为基础的革命政治。革命政治不仅仅是宣称“革命万岁”，而是要推动群众去革命并相信群众。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說过的，群众是

会犯錯誤的，但是群众是不会犯那种会使他們去支持一种反对他們自己的社会結構的錯誤的。群众是会犯支持某某候选人或者支持某种倏忽失效的立場这样的錯誤的。历史上确实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事例；但是群众在斗争的方向上，在历史的远景上，是不会犯錯誤的。相反地，革命的綱領和政策如果不以群众的革命意志为基础，还能以什么为基础呢？

历史通向共产主义

一切投降分子都已經放弃了对群众的信任。他們认为资本主义沒有前途。这是十分明显的。連螞蟻也知道资本主义沒有前途。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也感到了这一点。肯尼迪在被刺以前就曾宣称：毫无疑问世界将要走向共产主义，但是还需一段時間。两个月以后，他被除掉了，因为共产主义的发展比他設想的要快。为了贏得群众的同情，当时是世界资本主义最高代表的肯尼迪，也准备說他承认共产主义不仅是人类的理想，而且是人类的希望。作出这样一个声明是因为历史的客观趋势，即历史的固有的发展过程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这不是因为苦难，不是因为社会的不平等，而是因为这样的苦难、这样的社会的不平等碰上了工人国家的发展，尽管工人国家的发展也随之产生了社会的不平等，在消費方面实施官僚主义的分配办法以及对群众实行官僚政治的恐怖主义强制办法。但是群众还是支持工人国家而根本不支持资本主义政府。

在阿尔及利亚、古巴以及其他任何国家，群众都有同样的傾向。他們在政治上成熟的程度可能有高有低，他們对付干預的能力可能有大有小，但是路綫全都是一样的。因此，桑給巴尔的革命并不是桑給巴尔成熟的結果，而基本上是世界革命的整个力量所造成的結果。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桑給巴尔的群众还没有成熟到

足以做这件事的程度。他們沒有黨，沒有工會生活，物質手段也很缺乏。對革命起決定作用的主要是世界革命的壓力而不是桑給巴爾的條件已經成熟。

投降分子向國家機器屈服

這明確而清楚地說明我們能做什么。這也表明阿爾及利亞的革命是怎樣被本·貝拉的領導所限制、歪曲和束縛了。阿爾及利亞的這些大人先生們甘願採取革命的和平路線——調和的改良——並不是因為有必要這樣做或者這是一條新的歷史道路。不是，這是因為他們投降了。這些領導人並不是相信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沒有前途的，但是他們對於世界革命沒有信心。他們中途變節了，他們放棄了世界革命的前景，放棄了前景、方法、形式、革命的綱領和革命的政治而代之以國家機器。

在他們和斯大林之間有巨大的歷史差別，但是也有相同的地方。他們同斯大林之間的巨大歷史差別在於他們有意識地不為官僚勢力辯護，也不打算這樣做。他們企圖用改良主義的方法推進革命。但是他們同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政策和利益一致的地方是這種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導致篡奪群眾的權力。在他們之間有相同之處，但是從歷史上看這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建立工人國家是有可能採取新的形式的。要建設工人國家也可能有二十種方法。列寧在分析布爾什維克黨的結構和組織形式時曾闡明：原則是不能改變的，同原則有關的職能是不能改變的，但組織的形式却是多種多樣的。在組織形式、原則和目標之間是沒有矛盾的。但是在特殊的階段中，也可能把過程中的各部分統一起來。有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建成工人國家——南斯拉夫的、古巴的、中國的、蘇聯的和東歐的。但是建設社會主義只有一條道路：以群眾為基礎

的工人政权。投降分子丧失了这种信心，只相信国家机器。他們和斯大林是一致的，斯大林不相信群众，他相信的是国家机器。斯大林的墮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放弃綱領和政策是不能不产生具体后果的。开始的时候是放弃形式、放弃执行綱領和革命政策的活动，最后的結局就会是提出把放弃革命政治的理論拼凑在一起的各种綱領。这一切只是反映某一团体的领导的叛变，他們在一个时期曾完成了革命的任务，但是在历史的現阶段却没有能力去加以发展。策略和方法不論有多少变化，它們总是要服从于綱領和革命政策。如果放弃了革命的前景，如果目标不是推翻資本主义政权，或者象在阿尔及利亚那样不是走向推翻資本主义政权或把群众提高到能够决定国家政策的地步，那就是剝夺群众、封鎖群众。仅仅在两年以内，这些变节者就垮台了，这表明在現时期历史的范围之广和压力之大——这是迅速而巨大的压力。

在現时期第四国际必須发展，这是客观的需要。因此必須改变干預主义的策略。从1951年干預主义形成直到今天，已經发生了根本的历史变化。在1951年，我們建議发展第四国际作为发展革命的方式之一。目前的基本目标就是貫徹革命，尽管我們在某一特殊时刻也許不会发展，但也要这样做。我們的发展不是某一团体的扩大，或者到处成立团体，取得历史的意义。我們的发展将是群众的发展。为此，就必须扩大我們的影响，取得更多的基地，而最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更加成熟。

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參預世界革命

在第四国际的整个历史上，我們筹备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工作是最完善的。这也是为战争—革命、革命—战争这一目标作

好准备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我們不是等待战争革命，我們今天就准备在各国参預世界革命的領導。我們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工作。这不仅表明我們对思想、对未来，对前景抱有信心，而且表明我們同从中国到桑給巴尔的全世界群众已联合起来，这种联合在我們的意識中，在我們的綱領中已經是牢固的了。

这次的代表大会是在两年的过程中筹备的，首先是我們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进行的反对投降分子的斗争，接着是四月特別代表大会，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會議，在世界各地召开的各次會議，現有支部和我們談到的各新支部的发展，所有支部的文件已經系統化和固定起来以及各支部的改进，第四国际的两个支部已出版周报，在世界革命斗争的历次事件的客观过程中，第四国际的发展——这不仅是指阶级斗争，而是指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革命斗争。第四国际是在下列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第四国际在比利时、意大利、阿根廷、巴西、玻利維亞、秘魯等国进行了反击和赢得了越来越高的威信；我們在古巴的运动虽然受到迫害和威胁（每天都有同志被投入監獄，我所說的三位被囚的同志已經被送到一所悲慘的監獄中，同伦加佐同志拘禁在一起），却表現了不屈不撓的精神和信心；我們古巴支部在繼續进行活动方面表現了信心，它在保持影响方面取得了进展。

外交必須为群众服务

从古巴传来了两件奇聞，有些同志可能还不知道，我現在打算談談。在古巴支部2月出版的一期双周刊上，曾經报道了在关塔那摩举行的一次工会會議。在这次會議上，官僚当局提出了某些建議，我們的一位同志为工人的权利进行了辯护。我們的同志胜利了，这些官僚就打算要逮捕他，但是他們沒有成功。在面包工人

工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工人代表发言，反对官僚分子剥夺工人的权利。官僚分子谴责他是托洛茨基分子，希望这样一来就能吓到到会的人，使他們不敢投票选举这位代表。这位代表答复說，“虽然我沒有当这个組織的成員的这份荣幸，但是我以被人称为托洛茨基分子而感到自豪”，而他居然当选了。这是今天正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卑鄙地、反革命地頌揚——群众将因他的这一行动而裁判他——屠杀阿尔及利亚群众、屠杀非洲群众的凶手戴高乐的时候古巴的情形。他把这个凶手說成是“叛逆者”，具有“革命精神”。这就是执行調和和改良政策的結果；这就是放弃革命政治的必然下場。

放弃革命的政治就意味着放弃前景、希望和群众的革命行动，等待結合外交来解决問題。我們并不反对結合外交行事，列宁正是历史上最干练的外交家。他有能力領導那个又穷、又沒有枪炮子弹，而且許多人死于饥饉的工人国家。他有能力抵抗巨大的压力、进攻和資本主义的包围。这是因为列宁所根据的是使革命外交成为可能的两个条件：第一，注意群众，尤其是注意他們的革命活动；不让群众的革命利益从属于資本主义提出的外交让步。第二个条件是絕不信賴任何資本家——决不！卡斯特罗对戴高乐的頌揚，就意味着贊許他，在法国群众、殖民地群众和全世界群众面前表示信任他，相信这个一度曾是屠杀全世界群众的元凶的劊子手。早在法国殖民地群众在战后不久成为第一批举行大规模起义的叛逆者的时候，他就开始进行屠杀了。而卡斯特罗称之为“天生的叛逆者”的正是这个人。卡斯特罗一定感觉到了我們对他的反革命行为的反对和鄙視。我們宣布：正象我們过去曾相信他的革命忠誠一样，我們对他站到反革命一边并同世界帝国主义重要堡垒之一的代理人同流合污的行为表示鄙視。

不論是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或阿根廷的資本主义，如果不得已而同工人国家——它們是同資本主义的世界利益相矛盾的——进行貿易的話，这不是因為它們要保卫自己的地位这一历史目标有了改变，而是因为再沒有别的出路了。当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問題上进行大辯論时——这是两位都想貫徹革命但采取不同策略立場的伟大革命家之間的辯論——他們所关心的是获得外交上的利益，設法从英法两帝国主义的分歧中得到好处。他們是想怎样得到好处呢？托洛茨基把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当作讲坛，用以揭露資本主义匪帮，特别是德帝国主义者，而列宁則向德国工人階級說：“除此以外，我們沒有别的出路；他們正在扼杀我們。要使我們不致被迫作出让步，那就要靠你們了。推翻他們！不要相信德国的資本家！”而这都是正当他同資本家談判和签署和約时所說的話！托洛茨基說：“条約只在必要的时期內有效，一点也不能超过双方的力量对比所允許它存在的時間，不論是資本家之間簽訂的条約还是資本家同工人国家之間簽訂的条約都是这样。”这是革命外交的規律和基础。

卡斯特罗帮助戴高乐

相信国家机器而不相信群众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頌揚戴高乐，是因为他希望从法帝国主义的需要中取得外交上的利益。他对戴高乐的頌揚是支持法帝国主义的一种方式，这个帝国主义只不过象戴高乐的鼻子那么大而已，这个帝国主义自己已沒有力量再活下去。卡斯特罗的支持对于法帝国主义來說，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需要。

如果說戴高乐不論是在承认中国人或者宣揚中立主义上是执行一种同資本主义的世界利益背道而馳的政策的話，那是因为一

方面各种矛盾把他置于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地位，一方面他是个失败主义者。否则他是不会奉行这种政策的。从基本上说，戴高乐的全部政策不是由法帝国主义的实力决定的，不是由它的能力决定的，而是由无法摧毁革命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弱点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从法帝国主义那里获得的利益，要比已经获得的无比优越。

如果卡斯特罗认为他正在得到了更多的利益，那他就错了，因为他这样做是在法国的群众面前，在小资产阶级面前支持法帝国主义的威信。法帝国主义被迫在中东、东南亚和古巴作出的一切让步，都大大有利地得到了补偿，使法国的资本主义得到了好处。

巴布洛认为自己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我们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说他的意图是反革命的，意思是说他是要把革命拖向后退，但是他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存在着一样的幻想。他利用计谋和手腕依靠国家机器来推进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群众的需要。社会主义最重要的、而且不可代替的需要和要求是群众的自觉的、直接的、有组织的行动，没有这种行动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要求每项政策、每个策略、每一个革命行动、每一个阶级行动、每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行动，都依靠群众的动员，依靠群众的觉悟，依靠创造、发展和在高度水平上保持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情绪；根本不相信资本主义。绝不相信！这不是因为我们由于道义式哲学上的理由而不相信资本主义，而是因为资本主义产生了阶级关系。资本主义绝不会让步，除非它被迫让步。

群众追求的目标不是取得今天的利益。群众追求的目标是今天取得利益以支持明天以及今天推翻资本主义的努力。这就是革命外交的基础。而菲德尔·卡斯特罗、皮埃尔·弗朗克、杰尔曼、麦丹和巴布洛之流却与此相反，他们放弃了革命的政策而采取改

良主义的調和政策。所有这些人在短短的两年內都投降了。在这两年內，第四国际在进入人类历史新阶段以前，就以最有力、最穩健、最一貫而且最和諧的方式作好了准备。在这两年內，第四国际为这次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作好了准备，这也許是我們进入人类历史新阶段以前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筹备一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工作，就象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一样，就象第四国际的任何其他活动一样，并不在于发表一些文件，让每个人閱讀这些文件并且得出結論。它也不在于让每个人有权进行討論、独立确定方向并作出决定；而一切象世界代表大会这样重要的會議的基本規律和根本原則在于把第四国际的注意力、精神和意志引向正确方向，使之走向明晰的目标。我們准备參預新的工人国家的建設工作，我們准备同別人一道走在未来的革命領導的最前列。为此，我們的代表大会准备要討論如何进行參預的問題。我們的討論不仅要准备好意識，而且要准备好精神和决心。如果我們不做到把自己集中在共同的意志和共同的决心之中，我們就不可能有有組織的行动、不可能有革命的前景。世界代表大会已为此作好准备。它打算发展和集中第四国际的革命力量和意志，以便向下一步的目标迈进——这就是使自己对原子战争、对革命以及对重新組織人类以便走向在全世界建設社会主义作好准备。

第四国际将进行領導

在这个具体的历史阶段中，筹备世界代表大会的工作不論在过去和現在也就是准备用我們微小的实际力量、用我們有限的物质手段，作为即将来临的世界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而自觉地进行干預。尽管我們現在不是組織者和領導者，但我們要把自己看

成是这样。我們这样看自己是因为整个客观的过程表明，发展的趋势不仅在形式上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而且还需要托洛茨基主义的领导，它具体地需要这种领导。第四国际所说的“历史的客观趋势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这句话还不够——这是一种同国家机器有关的定义，这是从“天上”来的一句话。

每一客观形势都在客观上需要领导，因此必须取得担任这一领导的权利。要取得这种领导权，就必须赢得群众的信任。这种领导权不仅同罢工、总罢工、某个国家的某一政党有关，而且同干预中国、古巴、各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的全世界群众有关。这次代表大会就是以这样的充分的觉悟、信心和力量进行筹备的，这就是在未来四年内我们将成为人类历史下一阶段的领导。这个时间也许会稍长一点，但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它将会短得多。

苏联的官僚政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第四国际

在我们看来，资本主义再经受不起四年这种革命过程了，苏联的官僚政治统治和窒息工人国家再超不过四年了。它们都没有客观的历史基础能够再支持下去或调和自己的矛盾；它们已经做到了头，它们之间的联盟和和解也已达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僚政治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发展到资本主义，也不能再放弃任何工人国家了。这不是因为它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它做不到。官僚政治已经在工人国家中实施了资本主义的形式和成份的宪法，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实施了资本主义关系的部分职能，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或者消除工人国家不可抗拒地向前迈进的基础。

但是官僚政治仍在进行活动寻求支持，寻求新的支持它的基础，因为它已经在工人国家和工人运动中丧失了支持它的基础。在形式上越来越露骨的官僚政治，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要向资本主

义、改良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集团、机构、关系和组织中去寻找支持，这些东西在今天这个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虽然不是一个东西，却已经毫无二致了。要想把革命拖向倒退是不可能的。因此，官僚分子如果不能在各种团体、倾向和追随者当中找到支持的话，它就无法继续鼓励各种潮流、团体和官僚主义的保守倾向，甚至还有资本主义势力——即使在这些东西把他们置于死地之后！例如，根据苏联刑法，侵吞公款就可处以死刑，而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这样。根据苏联刑法，工厂经理可以因为诈骗了工人的两万公尺材料而被处决，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只判处他五年或十年徒刑，甚至不予处分。但是这是他们的政治、他们的结构以及职能所产生的后果。在这个过程中，官僚政治势必越来越同资本主义合成一体，但是同时也势必要加速和促进工人国家中成熟的革命力量的形成。

論托洛茨基主义道路

在这个过程中，官僚政治玩弄计谋的余地往往更少。它的崩溃即将到来。官僚政治的本领很大：它象所有的官僚政治一样，有本领保卫自己。但是本领并不等于智慧，它只表明它能够从具体情况中找出最适合于自己的东西。这并不表明它具有推动历史发展的特性，而只表明它是保守势力。官僚政治要想维持下去，除了越来越把具有保守的、官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利益的各种倾向、团体和组织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这个时期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时期。这不仅因为客观的趋势是这样的，而且因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正在进行干预。虽然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组织上没有作出决定，但是在两三年以内，活生生的托洛茨基主义就会直接被人感觉出来。赫鲁晓夫对中国人说，“你们是

新托洛茨基分子”。表現在哪些方面呢？这种恐吓的动机是什么？这是针对誰讲的？这不是针对群众，而是针对官僚主义的中国领导，针对中国革命的一部分领导，他說：“你們要当心，否則就会陷入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險之中！”而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中国并无实力。但是，托洛茨基主义已經在世界范围内有了实力。

中国人对苏联說，你們的政策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并且譴責托洛茨基是叛徒和机会主义者，但又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自圓其說，他們这样做的动机是对官僚势力施加压力要他們反对赫魯曉夫；中国人对他們說：注意这个家伙这样攻击我們，为托洛茨基分子卖力。中国人为什么要借助于托洛茨基主义呢？他們为什么不去找別的傾向、別的立場呢？他們为什么不找伯恩斯坦呢？他們为什么不找考茨基呢？他們会去找伯恩斯坦、考茨基、加米涅夫或季諾維也夫嗎？当他們缺少理論的时候，他們不采取这些人中任何人的路綫而只是采取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綫。原因是在革命成熟的过程中整頓和革新工人国家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工人国家現在已經在革新中，但已达到了一个限度，改良的过程已經不够了，需要进行政治革命。这就是一种托洛茨基主义路綫，群众也是按照托洛茨基主义来考虑問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已經作为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存在于世界上，官僚势力知道，在托洛茨基主义式的客观过程中，这个小小的托洛茨基主义核心是能够担任领导的。不仅能够，而且正要这样做。

在革命的行動和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不是宣言，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解释理論的教科书，而是思想傾向、革命精神以及能够充分利用一个环境、每一毫米地方、每一种可能来推进爭取政权和建設社会主义的活动、革命和斗争的意志和觉悟。在个人的关系中，在同党的关系中，在革命的斗争中，千万不要放弃应当坚持的

立場。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一点上放弃立场，明天我们就会在其他方面放弃立场。意志不是内心决定的结果，但是它是由于内心决定去教育自己、纠正自己、使自己服从于意识而产生出来的。意志如果服从于意识，就会成为不可摧毁的。这并不意味着屈从于各种事件发生当时的压力，或者屈从于某一特殊环境或某一特定过程当时的需要，而是让意志服从于达到所追求的目的这个客观意识。这样，意志才是不可摧毁的，因为它只服从于意识，服从于寻求工作、领导和发展的方法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切运动，毫无例外的一切运动，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没有达到它们的政治目的和纲领所规定的目标，世界工人运动的一切思潮和倾向也没有达到这些目标。巴布洛、杰尔曼、麦丹和其他的人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失败了。一般说来，他们毫无例外地没有达到他们要推进粉碎资本主义的斗争或推翻政府这些目标。他们往往并不缺乏革命精神，并不缺乏向资本主义或政府进行斗争的意志（即使是游击队员和恐怖分子也并不总是具有反资本主义的目标），但是他们失败了。中国人打算建立听命于中国方针的组织 and 政党的一切意图都将失败。他们打算在很多国家中组织各种运动，首先是在意大利、比利时、法国、英国、智利和墨西哥等国。但是他们在每个国家中都遭到了失败。最初，中国人集中精力于那些分裂和瓦解了的共产党，他们成立了各种团体；但是不出两三个月，这些团体又开始瓦解了。

这种失败中最声名狼藉的例子就是意大利。要成立各种中心、党派和机构以反对共产党同资本主义调和的路线，以及组织支持中国人以反对苏联官僚政治的党派，意大利具有最可靠、最有利和最适当的条件。我们有最肯定的证据，说明有一年时间，中国人在成立他们的试验性组织和党派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他

們呼吁共产党分裂，并組織他們所謂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新政党。在整个这一时期中，意大利共产党处在不断的危机中。这种危机表現在各种革命傾向的发展上，表現在意大利資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上，表現在共产党組織的危机上，而新的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的成立表現了这个危机达到最高点。这个新党是在两个月以前組成的，在工会的选举中，在共产党控制的工会中，这个新的社会党获得了共产党选票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直到目前为止共产党仍然无疑地領先的一些重要选区中，这个新的社会党击败了共产党，取得了一些工厂和重要工会的領導权。

这表明建立亲华的政党的条件已經成熟。但它們为什么还没有成立呢？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象意大利共产党和赫魯曉夫一样，也是調和的、机会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分析、对陶里亚蒂的攻击、对赫魯曉夫的攻击、关于国家和革命的关系及有关这方面的理論的闡述，毫無疑問包含着革命的結論。二十五点中除了第七和第八两点是改良主义的和調和的以外，其余都包含着革命的結論。但是，由中国人成立的，或者至少是中国人所鼓励的一些党的具体政策，中国人同意或者鼓励的一些呼吁和具体組織，都是以那些跟陶里亚蒂和赫魯曉夫的共产党完全相同的綱領和远景为基础的。

正因为如此，由中国人所成立的各个党都失敗了。这不是因为他們沒有机会。在比利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处于危机之中，格里巴組織了一个新党，新党已陷于瘫痪，毫无生气。他們在意大利也組織在一个运动之中，显然就要席卷全意大利。但是，这沒有成为事实。相反，就象在比利时一样，意大利发展了第四国际。如上所述，在意大利成立了新的社会党，爭取到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以前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工会选票和工厂

代表。这表明条件已经成熟了，但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菲德尔·卡斯特罗，尤其是格瓦拉在最近发表在《北京周报》上的一篇文章里，歌颂了拉丁美洲的游击战争。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拉丁美洲的解决办法是游击战。如同中国人一样，格瓦拉这篇文章是革命的，他的结论是革命的，他的精神、他的意图和他的声明都是革命的。我们并不否认这一点。不过，他的分析和他的纲领全是一派会导致恐怖主义的骗人鬼话，表现了对拉丁美洲无产阶级缺乏了解。同样，中国人和苏联人对欧洲无产阶级缺乏了解。他们完全把它误解了。仿佛无产阶级是因循守旧、精疲力竭，而且对革命斗争漠不关心似的。其实，事情恰恰相反，中国人和古巴人之所以能够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是因为欧洲无产阶级坚持着始终不渝的和日渐壮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如果不是这样，欧洲的资本主义就能够全力以赴、集中意志、来进攻革命、无产阶级和欧洲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从而使世界的力量更加有利于资本主义。格瓦拉不懂这一点，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是不存在的。

在他看来，甚至拉丁美洲的无产阶级也不存在，因为他說拉丁美洲的革命中心是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在格瓦拉看来，这些就是革命中心。而就在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时刻，巴西的农民群众正在全国夺取土地，正在组织农民协会，而且在一个月以前，七十万工人举行了一次总罢工，在巴西历史上第一次使全国陷于瘫痪。除去1946年曾经由共产党人组织举行了一次总罢工外，在巴西再也没有过总罢工。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行动起来，作为一个包括各个方面和各种倾向的无产者的阶级而占居支配地位，这还是第一次。

光靠游击战是不够的

格瓦拉不懂得这一点。在巴西，并没有游击战。在巴西，起鼓励革命斗争作用的是农民协会。格瓦拉是在玻利维亚的十一月和十二月事件以后写这篇文章的，在那次事件中，两个政权的局面在新的方面延续了十五天，玻利维亚的无产阶级曾经有十五天成了玻利维亚部分地区的主人。秘鲁群众的斗争情况怎样呢？格瓦拉只字未提，反而空洞地称赞了一番游击战。哪里有游击战呢？在哥伦比亚，游击战已经进行了十六年。革命取得了什么进展，什么成就呢？没有，革命正在停滞不前。某些曾从事游击战的人现在已堕落成为股匪。在委内瑞拉，游击战已进行了五年。在那里，游击战在开始时由于加入了将近三分之一的陆军而得到了加强，而游击队本可以把这支军队打败的。危地马拉的游击战在哪里进行着呢？经过近十年以后，危地马拉的游击战必须进行改组，必须确定新的方针，因为它以前的行动是失败的。尼加拉瓜的游击战在哪里进行着呢？它已经连续进行了六年，现在却已陷于停顿。

要分析拉丁美洲的游击战，就必须具体分析四个主要游击战中心的失败。游击战是不可能的。它们全都失败了。这并不是因为游击战是错误的，而是因为，作为一种手段，作为一种现象，它不可避免地、不可改变地是注定要失败的。游击战可以作为一种原动力，但是，当广大的群众开始参加战斗，游击战的方法就失去了力量、威力、重要性和行动的能力。当群众的行动取而代之的时候，游击战就仅仅成为行动的一种手段，并且不是主要的手段，而是次要的手段。工人民兵和总罢工是比任何类型的游击战都要无比优越的武器。游击战通常不是集中行动，而是分散行动，而民兵则通常要集中行动，集中打击力量。决定胜负的不是打几枪，也不

是消灭五个或者十个资本主义杀人犯，决定胜负的是能够在人民中赢得威信、打乱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能够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目标下集中动员群众的能力。象总罢工一样，民兵也是集中群众行动的組織，它使群众对自己具有把握和信心，使他們能够有組織地参加战斗，去坚决实现目的和政治目标。而且，这样不会分散群众，而是把他們聚集在一起。这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一个究竟是民兵、游击战，还是总罢工更好的问题。它們都是行动的手段，可以用于革命的目的，不过，它們的重要性和用途各不相同，因为它們是由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需要所决定的。

总罢工是不能代替的

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軍事形式就是組織无产阶级的军队，这是无可怀疑的。我們指的是一支无产阶级的军队，而不是爭取到革命方面来的资产阶级军队。其次是民兵，因为民兵是在已經組織起来的群众中心发展起来的，它依靠的是群众的有組織的战斗意志，它把軍事制度应用到群众的有組織的战斗意志上，它利用軍事制度作为达到击败资本主义这一目标的手段之一。但是，它有賴于总罢工，有賴于人民的参預。总罢工是不能代替的，因为总罢工意味着引导全体人民进行参預。民兵是从属的，它推动它所賴以为基础的总罢工。它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其原因不在于民兵本身，因为它的軍事手段可能是极为有限的，而是因为它并非从它的武器中获得力量，而是从全体人民要求参加斗争的愿望中获得力量。游击战能够发动这种斗争，鼓励这种斗争。但是，当人們投入农民协会、总罢工和民兵的有組織的行动以后，游击战就失去它的作用、它的重要性和它的力量了。

而且，在具体分析游击战时，不能談論什么哥伦比亚、委內瑞

拉、尼加拉瓜或危地馬拉，而是必須進行客觀的分析。怎麼能夠光說“哥倫比亞游擊戰的範例”，而不說這場游擊戰已經持續了十六年呢？十六年啊！可是，現在卻陷於停頓了！委內瑞拉恐怖分子的鬥爭已經持續了四年。因為他們不是游擊戰士，而是恐怖分子。恐怖主義是一種個人行動。它設法通過恐怖手段，通過消滅個別個人來強行達到自己的目的，可是，它是以貴族的鬥爭概念為依據，根據這種概念，起決定作用的是一小撮人。然而，一小撮人永遠也不能粉碎資本主義統治。他們可以殺死五個、十個，甚至一百個資本主義領袖，但是，這些人又會被別的人所代替。資本主義不是單純由人組成的，它是一種制度，一種組織，一套機器。它是一種能夠發生、產生、創造為它的发展所需要的種種因素的制度、組織和機器。它所創造出的因素也許比已經被消滅了的东西更好，也許不相上下；總之，它會產生这些东西。恐怖主義的全部歷史證明了這一點。

無產階級領導着鬥爭

但是，與此相反，為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服務的、從屬於群眾行動的恐怖行動則具有意義、力量 and 重要性。恐怖行動不是恐怖主義。恐怖行動可以是一次總罷工附帶着消滅五個、六個、八個或二十個資產階級領袖。不過，在總罷工時附帶進行的恐怖行動，其目的在於削弱敵人的國家機器，當它取得進展的時候去打碎它，使之無法恢復，無法重新組織，從而消滅它。殺死十個資本主義領袖，同時又進一步推動總罷工，這就可以打碎國家機器；這就是恐怖行動和恐怖主義的區別。

強調游擊戰，就好比一個人看不到阿根廷和玻利維亞的群眾一樣。——就好比分析拉丁美洲的階級鬥爭和革命，却不談革命

的基本力量是在巴西、阿根廷、玻利維亞、智利、秘魯一樣。怎麼能夠無視正在智利所發生的事件呢？怎麼能不說智利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是在南美在政治上最活躍的，而資本主義之所以不能夠取得進展，正是因為智利無產階級的行動呢？怎麼能不說亞歷山德里之所以沒有同古巴決裂，之所以能依靠自決，正是因為智利群眾對小資產階級的重大影響呢？由於需要發展自己，資本主義就不能依靠本階級的力量，它必須依賴小資產階級，而後者卻受到古巴革命的影響。但要不是智利無產階級堅持不懈地進行鬥爭，要不是它堅持它崇高的活動，小資產階級是不會受古巴革命的影響的。一個人怎麼能覺察不到這一點呢？怎麼能不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呢？他們覺察不到這一點，並非因為他們沒有看見，而是因為他們的經驗主義，因為他們就客觀過程所進行的分析和所作的結論不是以深刻的理解、明確的思想和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為根據的，不是以對無產階級力量的認識為依據的。

忽視歐洲無產階級是完全錯誤的，我們重復我們向歐洲幹部學校以及在我們的文章里說過的活：當菲德爾·卡斯特羅、格瓦拉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理論家談論拉丁美洲的游擊戰和農民革命時，他們的意思是說，無產階級沒有能夠完成它作為革命的組織核心的任務。這就是他們的用意。他們不承認農民是革命的發動機。不！這意味着無產階級已經失敗了。農民是革命的發動機。但是，發動機並不等於是方向盤。如果發動機離開了方向盤，離開了四個輪子，那麼，它只能原地不動。提供動力、推動前進的是發動機，但如果既沒有輪子又沒有方向盤，那麼，發動機能走到哪里去呢？當托洛茨基說“農民革命，這是拉丁美洲革命的發動機”這句話時，他說的是“發動機”而不是“方向盤”。就以這個菲德爾·卡斯特羅來說，也表明他是依靠農民革命的發動機來開始革命的，並沒有依

靠无产階級；但如果他沒有依靠无产階級的組織，那么，工人國家是建立不起來的。古巴工人國家目前所賴以建立的基础，它賴以發揮作用的基础，不是农民，而是无产階級。問題在于帮助无产階級掙脫声名狼藉的苏联官僚政治的鎖鏈、共产党人的鎖鏈、民族主义者的鎖鏈。这就是我們必須做的。

欧洲无产階級的坚持不懈的革命斗争是决定世界力量对比的一个主要因素。

早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还没有梦想到社会主义的存在，或者社会主义有存在的可能性的时候，早在所有拉丁美洲的游击战理論家，或拉丁美洲的共产党領袖和民族主义領袖出現以前，欧洲无产階級就已締造了七个工人國家。七个工人國家！除非能证明这不是事实，誰还敢說欧洲无产階級越来越保守了，他們已經安于舒舒服服地享受优厚的工資了呢（且不談他們并没有优厚的工資，因为欧洲每天都发生罢工）？无产階級建立了七个工人國家。

东欧群众在进行革命

从1943年起，欧洲的无产階級就为消灭資本主义而进行斗争。苏联軍隊进入欧洲，进入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并不是造成資本主义崩溃的决定因素。如果没有无产階級群众事先的行动，沒有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群众对納粹的抵抗，沒有群众反对資本主义的行动，占領工厂、罢工和游击战，那么，当苏联軍隊开进来的时候，它是不会取胜的。在战争期間，所有这些國家中的資產階級有半数已被消灭。是誰消灭他們的呢？是战争本身嗎？不！是群众對他們的斗争。資產階級支持德国人，群众就起来反对它，尽管有着共产党，但是把消灭資產階級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是

他們。

資產階級的消失并不是因为战争毀坏了他們的工厂，虽然战争的确毀坏了他們的工厂。可是，为什么工人沒有把工厂交还给資本家呢？占領工厂和保卫工厂，这两件事本身就是无产階級革命。这就是战后欧洲无产階級革命阶段所采取的形式。当苏联軍隊到来的时候，群众已經占領了工厂，他們正在举行各种會議和进行着罢工，这就是資本主义在东欧消失的原因。在捷克斯洛伐克，这种情况一直持續到 1948 年，貝奈斯之所以去职，是因为他說他們欺騙了他。而且因为群众再也不能支持他，于是他們就把馬薩利克扔出了窗口。官僚們一直到最后都在寻求和解。他們作了許許多多的让步。群众却不肯让步，苏联的群众也坚持要扩大工人国家，坚持必須發揮工人国家的职能以发展經濟。这种事情得以发生，只是因为存在着无产階級。并非因为存在着农民，而是无产階級。在这些工人国家成立以后，在欧洲举行了多次大罢工，接着就在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进行了夺取政权的嘗試。从 1947 年起直到現在，比利时无产階級曾經有三次想夺取政权，表现了要这样做的决心。在法国，在 1946 年，如同熟悉法国历史的人所知道的那样，由于开除了两名共产党员印刷工人，致使整个法国生活陷于瘫痪。在战争期間，法国共产党是一个小党，今天，它已經成为一个强大的党。在意大利，甚至在謀刺陶里亚蒂的事情发生以前，群众就已經紛紛投向集中体现着反資本主义精神的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社会党。意大利共产党給群众的答复却是：支持意大利的資產階級宪法。閉眼不看欧洲的历史是不可饒恕的。如果說无产階級沒有在欧洲掌握政权，那是因为他們的領導人在从中阻撓。无产階級要掌权。无产階級並沒有失敗，失敗的是他們的領導。

政党和工会的必要性

如果没有党，没有组织，无产阶级也能够掌握政权并消灭资本主义的话，那么，我们早已生活在社会主义之中了。党和工会的行动在历史中起着一种根本的、特殊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全人类都为共同的愿望所指导时，当全人类为一种建立在消灭了个人的和集体的斗争、消灭了阶级对抗和个人对抗的基础上的共同的兄弟友爱精神所支配时，当社会主义把所有这一切都消灭了的时候，群众的意志就将是集体的意志，消灭产生这些情感和反应形式的各种因素的社会和历史条件，消灭这些精神和意识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也就具备了。在任何对抗面前，群众的反应将以集体的形式出现。全世界的群众将决心完全根据自己的看法来改变事物。如果说，现在群众还不能决定自己的事情，那是因为只要集体的行动不是通过组织来进行的，资本主义的教育、结构和职能就会阻挠这种行动。因为决定社会关系的是私有财产。工会、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虽然限制私人的活动，但并不消除这种活动。因此，工会和政党都是不可缺少的，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也将如此。只有到社会主义时，工会和政党才不再是必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格瓦拉以及所有民族主义和革命的领袖，所有在拉丁美洲自认为是革命者的人都必须纠正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判断。他们必须认识到，今天欧洲的无产阶级已准备好夺取政权。一个无可争辩的主要的证据就是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的成立，它在无产阶级的其余部分中所受到的欢迎和它在意大利共产党中引起的回响。意大利共产党曾向资产阶级说：“我们全都处在危险中。全都如此。我们愿意同政府携手合作，以保障资本主义政策。”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话：“我们奉行一种维护私有财产的政策，如果不这样，

我們全都得崩潰。”这番話表明，所有这些人——資產階級、資本主義政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都認識到了这样的事实：他們都处在危險之中，因此意大利共产党，首先是陶里亚蒂、阿門多拉、巴叶塔等人，正在設法建立一个新型的党，他們想通过这样的党来形成資產階級潮流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在革命的反資本主義潮流中这些人否定民主制度，而現在在資產階級潮流——这种潮流力图在意大利共产党内部得到发展——中却又承认民主制度了。

如果不承认拉丁美洲的游击战必須以推动无產階級起来行动为目的，那就不可能对这种游击战作出严肃认真的估計。只有当农民革命这个发动机找到了无產階級的領導以后，这个发动机才会导致資本主義的失敗。

第四国际在欧洲和非洲的新支部

中国人、游击战、古巴的政策、苏联官僚集团的政策、共产党的政策、麦丹、弗朗克、杰尔曼以及所有这类人的政策、綱領和目标全都失敗了。它們全都被擊敗了。第四国际的政策却不断地获得进展，这不仅仅因为历史的进程說明了这一点，而且因为这一点客观地表现在群众斗争中，进而还表现在这一事实中，即一旦革命不論在那一方面开始进行，只要革命繼續下去，只要不遭到失敗、扼杀或遏制，那么，它立即就会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更重要的是它有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直接参与。

在所有这些都遭到失敗，而且經過了千百次的曲折反复的时候，第四国际却取得了进步和发展。这次代表大会就是明证，它不是证明第四国际有那么多的支部，它們出版着許多周刊，第四国际本身也有十四种刊物，而是证明了：同它取得的进展相适应，革命内部在討論着托洛茨基主义政策。第四国际發揮了影响并贏得了

威望；我們的运动随着它决心进行参預的程度而变得强大、有力而又生气勃勃，它影响并决定着諸如巴西、墨西哥、秘魯、阿根廷和意大利这样一些重要的革命运动的总进程。它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它虽无权决定这些党的方針或某些重要派系的行动，但是它具有重大的影响，而且仅仅是在一年半的时间內就产生了这样的影响。第四国际的力量在增长着，而所有这些潮流却在分崩离析。菲德尔·卡斯特罗感到需要依附戴高乐。你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呢？依附戴高乐！为了繼續奉行工人国家的政策，他觉得不得不决定同戴高乐联合在一起，而为了同戴高乐联合，他就必須頌揚戴高乐。

在这期間，改良主义、調和政策、經驗主义政策也都失敗了，而有原則的政策的重要性則得到了证实。原則都被巴布洛、弗朗克、麦丹、杰尔曼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等所有这些人抛弃了。格瓦拉給人一种印象，似乎他正在努力認識并采取有原則的方針。我們希望他这样做。正如我們希望一切誠实的革命者也都这样做一样。正当所有这些人丧失了革命的客观性而依附戴高乐和本·貝拉等等之流的时候，第四国际却在一年半之內建立了六个支部，五个在欧洲，一个在非洲，它发展了它在拉丁美洲的支部，完成了以前的領導不得不着手进行的工作，即在西班牙建立一个領導机构，这不是一个徒有其名，而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支部，它虽人数不多，力量不大，但已經是建立在一部分西班牙群众的基础之上的。

当这些人都在失去力量的时候，第四国际却取得了进展：在一年半的工夫里，第四国际能够建立起六个支部，其中一个在西班牙，一个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支部不是在两年前才开始建立。它是在1959年开始建立的。是在前一届国际时建立的。然而，如果說，第四国际在一年半之內成立了六个支部，把它的刊物

正規化起来，这些刊物虽然作用有大有小，质量参差不齐，但均在发展，而且享有象在比利时、意大利和阿尔及利亚那样的威信；如果說，它有能力召开一次有来自阿尔及利亚和西班牙的代表同志参加的世界大会（我們也曾决定让古巴的代表来参加，我們一直等到最后一刻，他們沒有能来，因为在最后一刻，即十五天以前，他們得不到签证，否則的話，会有两位同志前来）；如果說，第四国际有能力在一年半的时间內建立起六个支部，巩固了它們，成立起一些小組，虽然有些面临着危机，有些还存在着弱点，但是，总的說来，正在取得威信，那么，产生这六个支部的，并不是国际领导机构的力量。产生这些的并不是国际领导机构的决心和政治眼光。而是第四国际的綱領和政策。組織它們、协调并建立它們是必要的。我們所做的不过是这一点。要做到这一点，动力、决心、力量和意志无疑是必需的。而且还要相信我們的力量。沒有这些，那是办不到的。

在欧洲成立支部的成就

如果說，只是在六个月之內，虽然遇到我們在欧洲成立支部时所遇到的那种阻力，那种由于政治无知、恐惧和沒有信心而产生的阻力，以及單純的阻力，我們仍然能够建立起目前这些正在起着作用的支部，这就說明，第四国际在欧洲馬上就是大有可为的。我不仅是說拉丁美洲。而且是說欧洲。情况虽不相同，但都具备着立即实现的可能性。在一年半之內，曾經必須集合起一批同志，以便建立起这些支部的雛形。曾經必須重新組織他們。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須使他們相信这个事实，即有可能获得成功，有可能出版报纸。就要在欧洲破天荒地信任那些生平从来沒有写过文章的同志們，那些新加入第四国际的同志們（他們当中的百分之九十五加

入第四国际只不过一年或一年半——沒有再多的了)。曾經必須使他們相信，他們能够出版報紙，在我們帮助下，他們能够做到，報紙会受到人們的欢迎，它会得到发展和改进，它能够对付第四国际以前的成員(杰尔曼、麦丹、弗朗克等等)所进行的思想、精神和肉体上的恐怖行为。这些人看来儼然是智慧的中心，是深思熟虑的人，是托洛茨基主义所賴以建立的思想源泉。要使我們在欧洲的团体相信，有可能对抗他們，消灭他們，对付那些自封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人，对付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客观压力，这些知識分子曾經而且仍在相信皮埃尔·弗朗克的才华、杰尔曼(这个人还想当比利时国王陛下的大臣哩)的智慧和巴布洛的能力；要提高我們的团体，直至他們相信他們有能力克服这一切，以上这些并不是一件思想說服工作。它不单纯意味着思想說服，而是启发和建立意志的工作。因为这在过去和現在都必须对付人数微弱这个客观存在的压力，对付共产党、社会党和工会的龐大，对付亲华派的形成、中国人對我們的压力，以及第四国际缺乏传统和經驗的弱点。尽管如此，我們仍然决心在一年半期間內完成这个任务。結果就有了这六个支部，它們都派代表参加了大会。

这显示了第四国际的理想、政策、綱領和远景的巨大力量。在一年半的期間就克服了整个斗争阶段的种种困难，证明成立支部、发展支部，以及召开世界代表大会是办得到的，这显示出第四国际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还没有發揮，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充分利用。这意味着，在欧洲有一支在不到一年的期間里就能够掀起巨浪的力量。比利时、意大利、英国、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等国有着立即取得巨大发展的可能性。而且是在短期內，是馬上。甚至在英国也是如此。工党群众正在准备击败資本主义，这不是投社会党的票，而是要打倒資本主义。希利派正在企图阻撓第四国际的

发展。我向这次代表大会再次提出我们对希利派的評價。这是一些直接或间接地为英帝国主义效劳的人，他們的任务是妨碍、破坏和阻撓第四国际的发展。他們通过他們的刊物和活动来完成的的就是这项任务。我們之所以不得不作出这种評價，是因为他們在政治上微不足道，而且缺乏革命的意图和目标，可是却有种种物质手段来进行同他們完全不相称的出版活动。

在历史的現阶段以前，第四国际并没有发展。在現阶段中它发展了。这并不是因为第四国际的領導人在以前錯了。他們确曾犯过許多錯誤，他們走錯了路，他們为小資产阶级的生活和发展所支配，不了解群众。1946年以来的伟大革命他們并不理解。他們不了解南斯拉夫、欧洲的工人国家和中国，他們只是在工人国家取得成就数年以后才看到这种成就。我們重提一下能够說明这些人的投降性让步的評断：1946年，当时被当作第四国际的正式路綫的杰尔曼所写的小册子談到这些已經成为工人国家的国家时提出“把苏联軍队赶出东欧，把帝国主义赶出去”的口号，这是不正确的口号，正确的口号是“赶走帝国主义軍队，工人国家万岁，让苏联軍队无条件地支持欧洲工人国家的建立；让工人群众作出决定。”托洛茨基在1939年曾支持对芬兰的进攻，这不是为了粉碎芬兰，而是为了推进革命。这說明了这些人的投降政策和让步。

第四国际的历史結構

以前，发展第四国际的历史客观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要发展第四国际，过去和現在都需要有利的历史条件。有利的历史条件就是世界革命的发展，工人国家的发展，不断革命的发展。在革命倒退、停滞和被扼杀的情况下，是无法发展第四国际的。新的国际——第四国际——是以群众的客观經驗、以領導机构、各种行

动、各个团体和倾向的客观經驗为依据的。它的发展有賴于这一切。不仅仅因为它的政策是正确的。如果仅仅需要制訂正确的政策就够了，那么，資本主义早就死亡多时了。群众是在已有的組織中过生活的。他們并不是在学习、体验和克服困难方面都很緩慢。他們是生气勃勃的，异乎寻常地生气勃勃。由于受到私有财产关系的支配，由于只是在家庭联系和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資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联系上联合在一起，由于不得不起来进行斗争以摧毁一种构成今天的各种事物的基础的各种关系的制度，因此，对于群众來說，要在一天之内来一个变革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因为他們的精神是保守的，而是因为他們能够体验到的只是他們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制度。經驗的基础并不在于才智的大小。經驗的历史条件是社会发 展同人类的关系、同集体的社会关系之間所发生的关系。这决定着經驗。就个人而言，这个或那个人可能有更多的經驗。而就集体而言，人类則是以上述方式发展的，因为它为私有财产关系所支配。

群众要了解 and 信任第四国际、相信工人国家、相信革命，要接受第四国际的綱領，需要經過一定的革命发展的历史阶段。但并不是任何的发展。以前的革命发展是在第四国际弱小而官僚政治得到推行的情况下发生的。革命发展了，但官僚政治也发展了。第四国际所不得不面临的不仅是群众的不成熟和客观条件的未能充分发展，而且还有一套官僚机器。我們說群众不成熟，并不是指的缺乏革命的成熟。战后，群众已經准备要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夺取政权。难道他們不也是准备要改变政党、改变领导、准备团结起来打倒官僚政治么？衡量成熟不成熟的条件是目标：成熟是为了做什么？比方說，古巴群众是成熟的，完全成熟的，足以阻止資本主义在古巴复辟。但是，他們并未成熟到足以击败官僚势力、官僚

政治的代理人和在古巴強制推行的官僚政治。我們決定，我們所採取的同群眾有關的行動要以第一種情況為依據，而不是以第二種情況為依據。我們深信，他們也將會作出這樣的決定，因為我們對他們的成熟的革命決心懷有信心。

成立第四國際所需要的條件

在 1932 年以後，在左派反對派成立和第四國際的基礎初步奠定以後，還沒有歷史時間來成立一個政黨。在歷史過程中，國際的成立經常是，或幾乎經常是某一歷史事件的產物。第三國際是俄國革命的結果。成立一個對於第四國際至為必要的歷史性政黨需要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歷史條件。要創造內部的和諧，要達到團結，要使人們對綱領、政策和遠景具有信心，時間是必要的因素。在這樣的基礎上，一個對自己懷有信心的、緊密團結的黨才有應付歷史壓力的基本條件。基礎並不意味著是擊退這種壓力的力量。但是，它已有了基本條件。第四國際曾經有能力成立一個黨。在 1934 年以後，第四國際曾經成立了第一個黨。那是一個非常小的黨，是托洛茨基和散處世界各地的另外四、五個人組成的。而且是在革命處於低潮的情況下組成的，那時進行活動只能是為了支撐和捍衛馬克思主義，防止失敗、防止喪失信仰，防止辯證唯物主義被拋棄掉。這是當時的主要任務。當時的任務不是成立一個必然會推動和領導革命的黨。當時沒有時間成立這樣一個黨。從 1934 年至 1939 年，那是革命倒退的五年，當時黨——就是托洛茨基——的中心活動就是教育世界無產階級的各部分，就是解釋、支撐和捍衛辯證唯物主義，防止世界運動的潮流脫離工人。當時沒有時間成立任何黨。後來，1939 年戰爭就開始了，一直打到 1945 年。這時也沒有可能進行活動和展開黨內生活以組織並發展領導

机构。在前一个时期里，不但不具备有利于在全世界发展党的良好条件，能够使人产生信心和把握，反而出现了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这是自从1914—1918年战争以来世界无产阶级所遭受的最惨重的打击。只是到1946年以后，才产生了有可能发展一个国际党和国际领导机构的新条件。在此以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

第四国际前领导人的错误观念

1946年以后，发展第四国际的国际领导机构的客观条件形成了，但是，当时成长着的团体，正如欧洲和亚洲的大多数团体一样，都是很脆弱、很单薄的。领导机构是根据错误的观念组成的，对欧洲国家的革命，对共产党的性质和战后欧洲各种力量之间的内在关系都不了解，而是设法从上层钻进各党，等待着这些党的分裂，并且指向战争。他们的想法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他们期望第四国际的理想和立场在过程中会自动发生作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表现出仿佛自己是精通某种享有特权的思想的人似的，他们指望第四国际会从战争中产生，而用不着他们在任何欧洲国家里建立任何工人团体。

这个领导机构所犯的错误是造成第四国际欧洲各党和各支部的停顿和瓦解的基本原因。可是，这不单纯是犯错误的問題，虽然当时还不具备发展第四国际的群众政党的客观条件。历史还没有表明：第四国际作为一个群众政党，或者是作为一个能够同革命融合为一体的并成为革命的良心的部分、倾向、领导机构或政党，将采取何种手段、道路和方法。然而，要发现这些，从外面行动是不行的。用这种方式行事是不行的。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在群众的核心中建立小组，组织将来世界革命所不可缺少的领导干部。当时存在的可能性虽然并不太大，然而这却是道路。但是，他们却

不想去了解这一点，也沒有这样做。他們怀着一种特权威和优越感而行事。他們的失敗并非第四国际的前景的失敗，而是虛伪的政策の失敗。这不是客观前景の失敗，而是一种企图不要群众进行直接干預就可以取得成功的政策の失敗。这是一种小资产階級关于党—階級—領導之間的关系和关于党—階級—革命之間的关系的概念。归根結蒂，这种概念是由以下事实产生出来的：在历史的現阶段，有一个巨大的过程在官僚政治内部发展着，他們很想通过投机手段参与这个过程，但是，同这个巨大过程相比，他們感到自己很渺小。而在同一时期內，在拉丁美洲成立了一个拉丁美洲局。这表明能够做些什么。这并不是因为在拉丁美洲有着特殊的条件。在意大利、比利时和法国，情况同拉丁美洲一样，而且还有千百万无产者的行动这样一个有利条件。所缺少的是，在那个历史阶段中，沒有一批人知道应当做些什么，而且懂得运用这个概念、这个政策。

托洛茨基主义在活的經驗中发展着

托洛茨基曾經談到过这一点。托洛茨基在分析階級—党—領導之間的关系时，曾說明需要有一批能够了解具体条件下的历史阶段、能够对这个阶段进行干預、使之变得更加生气勃勃的人，他认为这是很重要的。那个历史时期的困难不允許第四国际发展，可是却允許在革命群众斗争中博得信任，而且在革命中发展为最优秀的分子所影响的政党，正如在拉丁美洲的拉丁美洲局的情况一样。

要評价領導机构的行动，光研究它的綱領、它的政策是不够的。綱領和政策可能对整个时期都是有效的。虽然政策可以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但是，是綱領決定政策，而不是政策決定綱領。

如果綱領規定要在革命中發展第四國際的話，那麼，思想以及感情就都應當已經受到革命的最大影響了。而在這個階段，對於第四國際來說，革命的最大的影響是拉丁美洲局。那麼他們為什麼沒有受拉丁美洲局的影響呢？如果說他們沒有受拉丁美洲局的影響的話，那是因為他們抗拒這種影響。當時他們關於領導作用的概念既是經驗主義的，也是小資產階級的和唯心主義的。他們把群眾的有組織行動建立在確定需要做些什麼這樣一個知識性活動的基礎上。人們不能限定一項政策，它是發展着的，人們成立政黨來執行政策。在活的經驗中，組織建立起來並得到發展，以便在階級鬥爭中、在集會中、在委員會以及黨的生活中貫徹政策。

現在，我們處在另一個階段。在這些人不斷被清算而且陷於分裂的過程中，在拉丁美洲已建立起一個領導機構，這個領導機構組織了這次代表大會，它現正準備使它自己和第四國際去干預世界革命。這說明馬克思主義既沒有確定不變的命運，也沒有什麼恩賜權，即使部分地也沒有。這說明，文化不是什麼書本和文章中的客觀知識，而文化，作為歷史進步的工具，今天在馬克思主義中得到了最高的體現。馬克思主義並不是少數領袖恩賜的一種工具，它是生活在群眾之中的，即使群眾並不理解它，並不理解馬克思，但是，群眾卻運用着它。

作為一種推動進步的工具，文化必須以這樣唯一的标准來加以估價，才能在人類的全階段具有歷史意義；這就是要看群眾是否有了進步。而估價群眾是否有進步的最好的和最高尚的辦法，是考察他們是否進行干預，是否有作出決定的權力，是否對自己有信心。桑給巴爾、加蓬、拉丁美洲、非洲、亞洲、越南、老撾的革命，非洲一些小國的革命，以及第四國際的發展都是證據，說明馬克思主義今天活在全人類一半多人的心中。它不是活在各種事實、書本、

文章之中，而是活在要求行动的願望中。旧的领导人从来未能了解群众的感情。并不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以前就不能做。以前是能够做到的。虽然不能够象今天做得这样多，但是在为未来作准备时，自觉地为未来作准备时是可以在較小的規模上做到的。正因为如此，尽管出現了投降分子，出現了他們的危机和分裂，第四国际仍然发展了，并且組織了这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就是世界革命发展的直接而又生动的表現形式。

世界大会显示了第四国际胜利的前景

在革命产生自己的力量、动力和活力的同时，它也在产生种种可能性和前景。我們的前景是什么呢？是从这群人当中产生的那种前景嗎？不。我們的前景产生于第四国际各个支部的意志，这些支部都是在現有的世界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不論革命的形式是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的，还是政治的革命。这就是我們的前景。那些已經叛变和死去的人的前景是死守着国家机器。現在是第四国际时代。我們不是在为自己辯护。群众的勇往直前、政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断前进、欧洲无产阶级的一再努力打垮資本主义、第四国际在全世界不断取得具体的进展，凡此种种都证明：現在是第四国际阶段。因为允許第四国际发展的各种因素都一齐出現了。客观上的因素是，各种形式的革命的不断进展，革命的不断过程，主观上的因素是，一个和諧一致的团体的发展，它的成員不一定都具有同样的認識、同样的意志、同样的紀律和为达到目的而努力的集中意志，但是，大家都具有崇高的政治認識。我們深信，革命斗争，我們同群众的結合，将有助于維護紀律，有助于使那些沒有足够的信心去作出我們应有的而且能够作出的貢獻的同志們产生信心。

这是第四国际的时代。这并不是因为现实在客观上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而是因为在客观上存在着一个托洛茨基主义团体。世界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在革命的社会发展中，在各种社会关系中，一切都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因为在今天，托洛茨基主义就意味着群众的直接干预、革命的立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对资本主义的剥夺，这一切都是托洛茨基主义。但是这在经验形式上也意味着是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展。现在，历史的发展方向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因为有一个团体、一些政党和一个领导机构，它们立意把以经验为基础的关系转变成自觉的关系。这一点不久就可以做到。这种从经验关系到自觉关系的转变，在拉丁美洲、在非洲和欧洲，在短期内即可完成。我们并不错误地以为自己力量强大。我们只是拥有很少物质手段的少数人。可是我们能够做出一些行动来，如在意大利成立新的社会党，阻止菲德尔·卡斯特罗杀害我们的同志，因为如果没有我们的古巴支部，没有古巴支部的活动，菲德尔·卡斯特罗可能已经允许杀害托洛茨基主义者了。我们的行动间接地吸引了古巴群众的注意和兴趣，影响着他们，引起古巴革命的部分领导的兴趣，因为它反映了针对古巴官僚政治而采取民主的生活方式的必要性，因为我们的党是一个严肃地表述了这种需要的党，从而阻止了杀害我们的同志以及逮捕一切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行为。这是对古巴革命的直接影响。这就是我们的力量。这是第四国际时代，第四国际发展的时代，因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客观历史过程表现在群众的每一个行动中，表现在一切活动中，表现在他们为自己确定的每一个目标中。而且还因为我们已经存在于许多国家中，同群众结合在一起，如在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在这三个国家里，第四国际很快将要发展成为革命的先锋队。我们的目标是，在今年内或者在明年初要成为革命的先锋队。

我們相信，在這些國家——再加上秘魯和智利——在今年或在1965年里，革命將被提到日程上來。而我們將站在革命的最前列。

我們準備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得出最完善的結論，以便建立起一支了解這個客觀過程和我們的力量隊伍，而我們的力量乃是以同群眾的聯繫和對群眾的了解為基礎的。我們站在群眾的英勇鬥爭前面，絕不是凌駕於群眾之上。我們說走在群眾前面，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比群眾有更大的能耐，更強的力量，更甘願犧牲，或更加勇敢。這些東西群眾和我們一樣多，或者甚至更多。使我們走在群眾前面的是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認識。否則的話，行動就是個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空談的，短命的，以為只要發號施令就能領導革命。這是個人主義的、宗派主義的態度，它同集体的進步和群眾的影響是背道而馳的。

我們的力量來自群眾的意志

每一個不受群眾的革命行動影響的運動都是已經死滅了的東西。我們說“在群眾之前，而不是在群眾之上”，那是因為“之前”的意思是我們從意識形態和政治上影響群眾，而他們又通過他們的革命意志來影響我們的運動。一個人如果凌駕於群眾之上，那他就受不到他們的任何影響，相反地他就要受小資產階級的影響，小資產階級總是不承認群眾，而傾向於消除群眾的影響。我這篇演說不單純是一篇開幕詞。實際上，它是政治決議的總輪廓，其中涉及了政治決議的所有各點。這就是開幕詞的內容。我們並不是想頌揚我們自己的行動，要別人注意我們的進步，而是想綜合地談一談；我們將往何處去，前途將會怎樣。代表大會的全部活動將在這個基礎上開始和開展。開幕詞等於一個中心，它指導着並有助於決定代表大會的生活、政治活動和政治結論。為此，我進行了分析

并得出了重要的結論，这些結論將再次写入政治決議中。如同在四月會議上一样，我們是从分析革命进程出发的，而不是从分析經濟形势出发（因为决定历史的是革命），我們这个開幕詞也采用了同样的准則。

我还想就拉丁美洲的革命，就我們在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干預等方面另行作出分析，因为我們在这些地方看到了第四国际立即发展的可能性。我們将在其他一些报告中这样做，首先是在起草关于第四国际的組織和发展的报告时这样做。在組織問題中，也将談到民族主义和現阶段的民族主义潮流等問題。

第四国际将要并且必須更加有力地进行干預

召开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基础是：革命在全世界的发展，我們对革命的干預，以及我們各方面的同志的被杀害；他們有杰里迈亚，佩拉尔塔，法哈斯·坎托，阿尔及利亚的穆斯塔法，以及其他我們还不知道的人。这都說明了第四国际的活动，不是从可能性的角度来看的活动，而是有效的活动。被杀害了的多米尼加的同志們的活动是他們自己决定的，而且作出了由他們自己执行的各种決議。杰里迈亚同志的行动是第四国际筹划的，阿尔及利亚的同志們的情形也是如此。在四月會議上講話时我断言，我們必須准备牺牲更多的人。随着第四国际干預活动的增加，我們将会牺牲很多人。我們尊敬并銘記着我們被屠杀了的同志，但是我們并不把他們視為特殊。和他們在一起，我們也銘記着千百万革命战士，銘記着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农民和工人——他們象我們的同志和我們自己一样，正在为了推进革命而獻出自己的生命。

我們不能把我們的同志視為特殊。我們必須在这样的限度內来衡量他們，否則的話，我們就是在制造宗派情緒。杰里迈亚、佩

拉尔塔、法哈斯·坎托和穆斯塔法这四位同志，都由于同样的原因，都是为了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成百万的农民以及欧洲的无产阶级一样的目标而被杀害的，这千百万的人也是在为革命而斗争着。我们必须明确认识这一点，我们不能区别对待。但在同时，这些同志的被害则说明了，第四国际是有力量的，它进行干预不仅仅是发表文件，不仅仅是在会议上讲讲话或是卖卖报纸，而是在积极地进行干预。

在下一个阶段，第四国际必须参预游击战、农民斗争、山区民兵斗争、总罢工，要比迄今为止所做的强百万倍。我们将会死更多的人，但我们的革命将会取得更大的进展。不破坏就不能建设，不幸得很，世界上的力量对比关系就是这样。只有社会主义可以在没有破坏的情况下建立，它将进行改造。另一方面，为了建设第四国际，不可避免地要有成千上万的同志被屠杀。我们并不是准备去死，而是要为推进革命而斗争。

在筹备这次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时，不仅把它的力量、团结和信念建立在这些被害同志的活动，即他们的革命活动的基础上，而且把这些建立在两年来的筹备工作的基础上，两年的筹备工作使我们具有这一共同目标，即为了推进革命而进行干预，这不是为了第四国际的荣誉，而是为了人类的进步。我们大家都认为革命是切身的事。我们不是慷慨大方的人，我们不作无谓牺牲。我们战斗是因为我们深信社会主义是必要的。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就是我们人生的乐事。因此，我们同群众之间有着一致的目标，共同的联系，而且有共同的记忆和为社会主义而战斗、而战死的共同认识。否则的话，我们就成了一个自我颂扬的宗派了。

我们成立了干部学校，组织了群众集会、报告会和代表大会，以前各个国际的活动从来没有获得象这个国际这样的发展。从来

沒有在两年当中，我們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各个支部都相继成立了干部学校。我們組織了代表大会、报告会、旅行，我們帮助各个支部办周刊影响群众，使它們取得进展。在革命的历史上，从来还没有过象我們在巴西东北部的同志們那样的行动，在那里一小伙人就可以震撼整个巴西。从来没有过象巴西目前这样的形势，在那里囚犯們在监牢里成立了一个有五百个农民参加的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他們离开又回来。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但是，我們說出这一点絕非是嘩众取寵。我們这样做是为了告訴巴西西北部^①的同志們；这意味着革命在前进，它已經临近了。这意味着，我們必須发展，以便参加到有組織的革命陣綫中；去組織合作社、民兵、游击队，利用这些来作为团結下級軍官、士兵和工人的开始，准备打倒資本主义制度。这个結論对巴西东北部的支部极为重要。对阿根廷和玻利維亚的同志來說也是如此。代表大会也正是为此进行准备。这就是我們的力量。这并不是因为我們相信抽象的观念，而是因为这些观念是組織我們自己和夺取政权的工具。

在結束我的开幕詞之际，我以第四国际領導机构的名义向一切同志致敬，再次向那些沒有到会的，向象我們一样，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在另外的活动領域里，为推进第四国际的共同目标而战斗着的同志們致敬。

客观地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客观地促进群众的干預，客观地促进全世界群众斗争的統一，这就是第四国际的胜利。原子战争和紧跟在原子战争以后的革命将意味着世界革命的巨大发展，我們正在为此而准备着。但是，为了在这个时期中进行干預，現在我們

^① 西北部疑为东北部之誤。——譯者

就必須最大限度地、最深刻地、最有力地把領導革命的責任担当起来，首先是在已經可以这样做的国家里：巴西、阿根廷、玻利維亞，部分地在秘魯、意大利和下一阶段在比利时。

1964年3月

(譯自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机关刊《紅旗》1964年9、10月号)

三八、第四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五一节宣言

致全世界受剝削的人民群众，致各工人国家中的人民群众，致工人、农民、士兵，致妇女，致儿童，致所谓的老年人，致世界上所有为争取人类摆脱一切形式的人剝削人的现象而在进行斗争的人民群众。

同志们：第四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热烈地迎接第一工人国际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第一国际的目的是要把世界上的无产阶级的斗争集中起来，以便组织这场斗争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第一国际的存在为时短暂。那个时代不容许它那具有历史意义的存在长期延续下去，但是它却确立了一些必要的概念，这些概念跟组织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的那些概念是相同的：就是说，国际是世界人民群众斗争中进行组织工作、确定方针、起指导作用的中心，是世界人民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者。组织第一国际的目的以及由于它的成立而提出的一些问题跟今天世界上受剝削的人民群众所追求的目的和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

不同的地方在于，在目前这个阶段中，力量的对比远远有利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有利于立即有可能在全世界建立工人国家、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残余。

历史阶段是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所取得的进展同反革命势

力、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来衡量的。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里，连一个工人国家也没有；当时的問題是要組織起历史上第一次組織起来的一个世界性的工人組織。在目前这个时代里，已經有了十四个工人国家，而且建立一个世界领导的根本性的、必不可少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基础也已存在，这种领导的任务包括有，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残余，在世界范围内把受剝削的人民群众的一切斗争組織起来并且把各个工人国家組織起来成为世界人民群众为爭取建立“世界革命陣綫”以便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設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的一个部分。这就是形成目前这一历史阶段的特色的基本形势。

目前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問題就是缺乏一个革命的領導。

社会产生真正危机的基础不是經濟的衰退，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的社会危机，也不是各工人国家的危机。这个危机是缺乏一个能够把世界上受剝削的人民群众的斗争組織起来以便消灭资本主义残余的“国际馬克思主义革命領導”。从世界范围的人民群众的斗争的观点来看，力量的对比对他們絕對有利。現在有了十四个工人国家的存在，从世界上的力量的对比来看，这些国家是对革命有利的力量对比中的无法代替的、不可战胜的必不可少的历史基础。

同十四个工人国家一道，在四大洲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系列的接近于成为工人国家的半殖民地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桑給巴尔、加納、馬里、几内亚和緬甸。它們是一些不断地經过了殖民地革命和資产阶级民主革命、接近于取得一种社会主义的解决的半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沒有后退，它們越来越接近于成为工人国家、不是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停滞不前。而且，还有象印度尼西亚和老撾那些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国家。

欧洲工人的力量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革命在不断地前进。在非洲，正如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一样，殖民地革命无论在规模上、深度上还是在范围上都不断地取得了进展。在非洲，最近在桑给巴尔发生的革命几乎已经直接地提出了建立一个工人国家的必要性。他们短期内即将把土地收归国有，从而开辟走向一个新的工人国家的道路。在加蓬，人民群众不承认并且要推翻亲帝国主义的政府的意图显示出了他们的决心，尽管法帝国主义的军队为了支持并维持傀儡政府立即进行干预。人民群众并没有涣散，而且已经在进行罢工并且作一番新的努力以推翻这个军事政权，其目的是要在这块殖民地上开展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

欧洲的无产阶级不断地、经常地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它在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显示了它那强大的革命战斗精神。无产阶级不断地、经常地通过罢工来表明它要求什么。欧洲各主要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表明他们希望推翻资本主义。在英国，无产阶级即将把工党的领导推向执政，这样做显然是抱着一种希望，有着一种意图，这种意图从他们为争取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并建立工人国家而进行的斗争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欧洲的无产阶级，拉丁美洲的无产阶级，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印度尼西亚的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人民群众，在为反对资本主义而进行的经常不断的斗争中，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取得了一些阵地。

拉丁美洲的殖民地革命由于巴西的反动独裁政权取得了胜利肯定地经历了一次退却并且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是这个独裁政权却不可能使它自己稳定下来。它不但不可能使自己稳定下

来，而且由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巨大压力的结果，已经开始以一种間接的形式出现了内部危机。这些矛盾是革命进展过程中的一个部分，这就意味着，由于人民群众的干預，由于人民群众要求改变社会结构、改变制度的願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进程、經濟和社会危机是不能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解决的。

巴西的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教訓不是反动派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干預。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是，即使是象古拉特想要进行的那些有限的、温和的改革——土地改革，对资产阶级和寡头集团把利潤从这个国家抽走的做法加以控制，給文盲以投票权，給海員、班长和軍士以参加工会組織的权利，所有这些形式都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限度范围内得到公认的，要采取这些措施的道路，只有在工人、士兵以及农民、武装民警所組成的种种委员会的支持下，在革命的斗争中，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战斗中才有可能行得通。在资本主义中，如果不以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为基础，不以革命斗争为基础，即便是要进行这样简单的改革也是沒有可能的。

从巴西事件中所出现的另外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經驗是，除非总罢工伴之以示威；伴之以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武装动員，伴之以清除资产阶级在军队中的领导，伴之以夺取并清除反动的文官制度，否則资产阶级仍然保持着他們能够动員起来支持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大土地所有者的机构。

另外一个基本結論是，即使象在巴西那样有利的条件下，在那里，有一部分军队过去受过、現在仍然受着民族主义經驗和反帝运动的影响，而所能争取到的也只是一部分的军队。但是军队的结构是絕不可能争取过来的。这些結論就是这样：人民群众同资产阶级議會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结构、镇压力量的结构——軍

队和警察——之間是不可能有一种“和平共处”的政策的。

巴西表明，在資本主义国家里，如果要实现即使是最起碼的改革措施，无产階級革命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国际努力要把世界人民群众組織起来以便推翻資本主义的政权并夺取政权。在 1964 年，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国际的这个最初的想法不是通过无产階級的世界組織的主要活动来实现，而是通过已經存在的这些工人国家的世界組織来实现的。

如果說革命沒有进一步向前发展，如果說資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被打垮，这不是因为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意志；殖民地世界有一半处在革命中，欧洲的无产階級完全处在动乱之中，北美的无产階級和人民群众反对侵略古巴；还有各种各样的国家采取了中立政策。在这些条件下，如果說革命沒有进一步向前发展，这是因为缺乏一个集中的領導，缺乏一个符合世界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革命需要的組織。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这个阶段的根本問題不仅仅是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斗爭以及階級斗爭和革命斗爭的問題，而是由于完全缺乏一个領導以致直接地并在世界範圍內削弱了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力量对比的問題。因此，組織起一个世界性的集中領導是必不可少的了，它拥有一个以在世界範圍內进行計劃并組織人民群众为基础的无产階級革命綱領，拥有一个馬克思主义的綱領和一些旨在世界規模上推翻資本主义和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的政党。这就是这一阶段所出現的根本經驗。

資本主义危机的加深和革命的发展

資本主义是处于一种經常的、不断的危机之中。尽管欧洲的資本主义在經濟方面有了发展(在生产、生产力和利潤上均有巨大的增长)，但同时，人民群众的階級斗爭也在增长，比利时、法国、英

国和意大利的无产阶级要求推翻资本主义的意图变得更加明显了。在美国，尽管出现了一种只有战后那几年才能与之相比的相当大的繁荣，但资本主义仍然需要采取一系列的内部措施才能维持生产机构经常开动。但是它找不到一种支持侵略古巴的舆论。资本主义是在极端矛盾的过程中前进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群众尽管还没有控制生产机构，但他们也受到了殖民地革命的影响。资本主义已经没有控制人民群众的权势了。资本主义依靠它的生产机构使小资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服从于资本主义制度。但人民群众不再相信它在社会上的权势了；资本主义已经丧失了它在社会上的权势。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群众强烈地受到殖民地革命和各工人国家的发展的影响。肯尼迪的被暗杀表明，资本主义处在一个内部矛盾的过程中，这些矛盾妨碍它的稳定，并且妨碍组成一个对付世界革命的单一领导。这就是世界革命能够指望取得胜利并使人类遭受的损失尽可能达到最小限度的一个基本因素。这种可能性对世界革命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资本主义矛盾中的最清楚不过的例子之一就是，在美国，为了维持生产机构，必须把税收减少一百一十亿美元。

这仅仅是一种暂时的兴奋剂，它只能维持一个短暂的时期。美国的繁荣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政策、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是健康的，而是由于国家机器采取了一种人为的措施，这种措施意味着一个巨大的通货膨胀的过程，生活费用大大地增长和人数更加众多的失业。维持资本主义机构的主要的基础不是它的生产能力或消费能力，而是军事生产。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基础是维持准备核战争的生产。

戴高乐的政策——戴高乐的承认中国，他的拉丁美洲之行，他

提出的“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建議，他反对在南越进行侵略和战争以及他目前反对老撾的右派政权的態度——表明，資本主义对自己本身愈来愈缺乏信心，資本主义中的一些重要阶层之間存在着一种失敗感。

这并不意味着資本主义由于革命以及各个工人国家有了发展而要投降，但这肯定地意味着資本主义的抵抗能力正在削弱，而結果，它的历史前途也就要拖延一个短暂时期。肯定地说，戴高乐打算从美帝国主义对各工人国家所采取的立場中撈到好处。因此，正如美帝国主义从苏联官僚集团的和平共处政策中撈到好处一样，戴高乐为了法国資本主义的利益，为了在和平共处政策中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竞争，也打算从和平共处政策中撈到好处，他承认中国，他同各个工人国家和其他进行殖民地革命的国家保持較好的关系。加蓬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当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府最近对劊子手戴高乐表示頌揚的时候，这个政府所采取的就是一种罪恶的 attitude；戴高乐过去是、現在仍然是屠杀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人民群众的劊子手。

共产党阻碍革命

帝国主义的这些矛盾是一个有力的前进步驟，这个步驟对于革命的进展是有利的而且必須加以利用。这就是今天，1964年5月1日的世界局势。

如果說資本主义虽然是搖搖欲墜了然而它却能支持下去，这不是由于它自身的力量，而是由于和平共处政策，由于这些工人国家在消灭資本主义的殘余的斗争中缺乏統一、缺乏計劃、缺乏集中的緣故。苏联的官僚集团，这些工人国家中的领导并没有發揮工人国家所拥有的那种巨大的潜力和权威，因为这些工人国家不

能直接表达自己的意志。这些共产党的领导既不反映出也不代表这些工人国家和世界革命的利益和历史需要的意图，它们也不是这些意图的代表。

这些工人国家和共产党的官僚集团的领导人所有的仅仅是官僚集团的保守利益和由此而产生的他们的和平共处政策。各国共产党的一切领导都同世界资本主义结成了一个反对世界革命的世界联盟。这种同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盟和妥协是由各工人国家、各资本主义国家和先进国家以及半殖民地国家中的共产党的领导所达成的，目的是要保全它们自己。革命的进展不利于资本主义，同样也不利于苏联官僚集团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

然而，世界上的人民群众是团结一致的，并且具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意识和革命的意志。力量的对比是对革命极为有利的。

五角大楼最近在老撾发动了一次右派政变而且立即被迫退却了，这不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白宫方面反对或者愿意退却，而是由于害怕中国的干预。中国的干预将迫使苏联也进行干预。以一种间接的形式而进行的美帝国主义的这次退却，并不意味着它将继续退却，但它表明，即便是在一种间接的形式下，这种有利于世界革命的力量对比也阻止了帝国主义取得象在巴西所取得的那样的结果。中国的干预可能意味着整个亚洲的革命要有发展。这就标志着有利于世界革命发展的巨大的压力和形势。象在老撾这样的小而落后——不到三百万居民——的国家里，革命都有可能存在下去并且获得发展，这不仅仅是因为革命自己的力量缘故，而且也是由于同世界上的种种力量有关，同以各个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作为一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另一方二者之间的力量对比有关。

革命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都表现出来。老撾的例子具有决定

的意义。如果说巴西没有沿着同样的道路发展下去，那首先是因为缺乏干预，而且首先是因为古巴革命的领导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如果古巴这个工人国家通过工会、通过党——如果有这样一个革命党的话——向人民群众发出了前进和动员起来的号召，它本来就可能有助于巴西的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这些人民群众就可能进行干预而不会让军队先行下手。

目前这个斗争阶段的另一个经验表明，资本主义处于极端衰弱的状态。戴高乐的态度，美、英帝国主义之间以及同法国之间的分歧表明，不仅仅在贸易方面有着分歧，而且也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前途缺乏信心 and 安全感。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具体的利益在于组织一个阻止殖民地世界革命向前发展的统一战线。尽管他们有了这种团结一致——而且它们一致起来对付世界革命——而在今天它们看来是四分五裂的并且进行对革命间接有利的公开争吵时，这是因为它们之间的矛盾太大，因为革命和各个工人国家所取得的进展的成果引起了分化并且打乱了这一阶段的反对世界人民群众的统一战线的现象。

资本主义如果不发动反革命的世界战争，它就不能维持很久。这是一种对革命有利的形势，但是在缺乏一个革命领导、缺乏一个党和缺乏革命的国际集中的情况下，革命的人民群众就不能感到这种形势的激烈。这些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为什么能够继续存在的原因。

帝国主义准备战争

和平共处是所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国家中的领导同帝国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结成的反对世界革命的联盟，和平共处是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的主要基础。所有的力量，对国际形势所作的一切

分析都表明資本主義是極端衰弱的——它不斷加強它的軍事和財經能力，但它在社會上和政治上的權勢卻不斷地下降。如果資本主義的存在延續下去，它就更加能夠給人類帶來更大的災難。它的全部活動都表明，資本主義不能接受和平共處和和平競賽。從經濟上來說，不出幾年之內，資本主義將被各工人國家、被新的工人國家的存在以及被它本身的經濟危機所拖垮。它經不起經濟競賽。

戴高樂不顧歐洲共同市場的存在而積極地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尋找市場以及他對待各工人國家和半殖民地國家的態度，都反映出是在尋找新的出路，因為他不能夠被限制在資本主義市場的范围之內。從社會的觀點來看，帝國主義不能再在許多年內容許殖民地革命向前發展，因為許多地區和許多區域一直在不斷地脫離它的勢力範圍。資本主義一直在發現它的區域在受到限制，相反地，各工人國家和殖民地革命則在擴大。由於這個原因，帝國主義在有意識地準備戰爭。資本主義的預算、技術、科學和社會的偏見，一般的電影、藝術、電視都為備戰所支配。從社會方面和政治方面來說，它們不斷地喪失了陣地。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財經力量和軍事力量却在增長。當資本主義的處境不妙的时候，它的壽命愈延長，它也就會給人類造成更大的損害。

人民群眾的世界統一戰綫

資本主義進行原子戰爭的準備不是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的輕率決定，而是歷史的必然性。肯尼迪被干掉就說明了這一點。肯尼迪所以被搞掉並不是因為他是五角大樓的敵人，而是因為從政治上來說，他的政策妨礙了資本主義進行戰爭準備的全面的直接的計劃，損害了那些在發動戰爭的時刻經常持有不同見解的大托

拉斯們的利益。同样地，戴高乐在他同无论是非洲或亚洲的某些殖民地的关系问题上，也同美帝国主义不一样并且持有不同的见解。这些并不是在战争或和平之间社会上有着什么分歧的结果，而是那些无法不暴露出来的互相矛盾的利害关系的結果。因此，资本主义被消灭的愈快，人类所受的損害也就愈小。

爭取建立人民群众的統一战綫来組織无产階級革命的胜利。

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以及世界革命爭取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軍隊中属于资产階級方面的人民群众、欧洲无产階級和各工人国家的人民群众之間建立一个世界規模的統一战綫的直接可能性中，存在着一切自然的、正常的条件；这个世界規模的統一战綫的目的就是要促进并无条件地支持世界革命。

革命愈加向前推进，世界人民群众愈加向前推进，无产階級革命組織得愈好，就对人类愈加有利，因为这将意味着損害較小。

防止对人类造成更大的危害，减少核战争代价的唯一的、真正的道路就在于很快地結束资本主义的余生，就在于在世界范围内組織革命的統一战綫以便去摧毁资本主义的殘余。这就意味着各工人国家、殖民地革命和欧洲国家的无产階級要无条件地結成联盟以便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殘余。

正如在日内瓦举行的关税及貿易总协定會議上所見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同各工人国家之間結成联盟——在那个會議上，一种特殊的、临时的、有限的联盟已經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同古巴之間实现——的情况一样，即使在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发展那样有限的問題上，这种联盟表明各工人国家有可能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产生一种客观的联盟以便在一場革命斗争中給予无条件地支持爭取这些国家的社会和

經濟的發展，儘管這樣做意味着帝國主義就要宣戰。這樣做將使世界上的人民群眾在他們自己的鬥爭中除了他們已經擁有的那種不惜任何代價前進的決心和意志以外，還會感到有了世界性的保障。這就是減少資本主義在反革命核戰爭中將給人類帶來巨大災害的機會的唯一道路。

資本主義以談判來爭取時間，從同蘇聯官僚集團和世界各國共產黨握手言歡並結成聯盟中撈到好處。富布賴特在他最近發表的演說中宣稱，有必要承認拉丁美洲的新型的社會主義革命，只要這些革命不同各工人國家結成聯盟；有必要承認某些“納賽爾式”或“南斯拉夫式”的運動；他的演說並不表明帝國主義有意於或者改變初衷而要承認人民群眾或各工人國家的社會進步和革命鬥爭，只不過是表明帝國主義適應現實情況罷了，這種情況既不能維持下去，又不能加以控制，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它感到核戰爭將會意味着它自身的死亡和毀滅。帝國主義的這種態度表明革命的發展多么強大。富布賴特發表他的這個聲明是指靠同世界上共產黨領導下的各工人國家的領導方面所結成的聯盟的支持的，他打算用這個辦法來遏制社會革命。這只不過是一個可以使帝國主義得到某種程度的恢復因而採取的一些修改和改變做法的問題罷了。但是在巴西進行干預的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帝國主義不可能作到這一點。帝國主義的某個方面發表了一些聲明，而另外一個居于最重要的地位而且具有決定作用的方面卻追求巴西式的解決；就是說，裝備軍隊並且依靠軍隊來遏制世界革命的發展。沒有希望同帝國主義達成哪怕是短時期的協議，這種協議有利于世界人民群眾爭取他們的民主權利的鬥爭的發展，有利于世界人民群眾爭取社會、歷史和具體的進步的要求。

中蘇爭論由于限制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官僚集團的領導之間

的討論範圍以內，因而世界人民群眾無法進行干預以表達他們所具有的無限的經驗。中國人有點是出自一種經驗主義的和不自覺的形式，有點是為了要捍衛各工人國家的官僚集團的反革命保守利益，因而就限制了本來有可能使這次論戰和危機推動受剝削的人民群眾為了推翻資本主義而在世界範圍內組成並體驗革命的統一戰綫這種巨大的可能性。

中國人受到第四國際的影響

蘇斯洛夫的發言中有很大的部分是批判托洛茨基主義的，是針對“受到第四國際政策影響的中國人”而發的，也就是說受到波薩達斯所寫的一些關於第四國際最近一次在拉丁美洲召開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文章的影響；這些文章說明，客觀的過程是托洛茨基主義的過程。解決的辦法，前進所要經過的道路，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社會進步和人民群眾的鬥爭，只有在採取一種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政策的狀況下，才能取得勝利。這就是托洛茨基主義。歐洲的人民群眾要求接受他們所提出的要求的鬥爭，即使是从工會的角度有限地提出要求改善狀況，要求在生活費用日益增加的情況下採取按照生活費用標準計算工資的辦法，都不可避免地要導致一個反對資本主義的綱領。資本主義決不可能經受得住人民群眾的這種要求社會變革的革命壓力和革命願望。

巴西的例子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古拉特所提出的這種微不足道的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本質上不過是要發展和擴大國內市場罷了；事實表明，即使是這樣，如果沒有人民群眾的革命支持，古拉特就不能保全自己。這就是托洛茨基主義。蘇斯洛夫對中國人的批評無異是警告說，如果中國人繼續提出他們的號召，繼續推行他們推進革命的打算——那就是托洛茨基主義。因而他們不可避免

地就要同托洛茨基主义者結成一个統一的、客观上的战綫并且将被托洛茨基主义政策所俘虏。因此，他要求中国人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他們是在追隨着托洛茨基主义的榜样、号召、綱領和政策，实际情况的确如此，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人有意識地这样做，而是因为中国的革命必須前进，而要做到这一点在客观上就需要推进世界革命。中国人不是自觉地只不过是間接地表达了这种需要罢了，他們並沒有向世界各地的革命斗争提出号召，在采取一种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斗争的綱領的基础上組織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政党。这个阶段是托洛茨基主义的阶段。因此托洛茨基主义就要受到种种的指責，因此托洛茨基主义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就要起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性的作用。

在人民群众最充分的参預下进行的 革命的綱領和任务

中苏論战的根本基础就是革命需要有一个世界性的领导。中国人既沒有苏联人也沒有提議組織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国际。他們提議在上层而不是在基层进行討論。我們說，有必要让那些正在各地进行反对資本主义的斗争、正在积极热情地进行干預的人民群众来参加这个討論，以便評价双方的經驗誰是誰非，所采取的方式不是一种拖延斗争的被动的、保守的方式，而是要組織群众斗争去推翻資本主义。这一阶段的基本經驗是，必須在推翻資本主义残余、不是为了那些最强大的工人国家、最大的国家苏联的利益，而是为了各工人国家的整体的利益計劃工人国家的經濟这种革命綱領的基础上組織群众性的共产国际。这个政策就是各工人国家所拥有的可以用来推动并鼓舞无产阶级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最强大的力量。

帝国主义知道，这个阶段就是最后結算的阶段。資本主义是准备作为一个整体、一个阶级、一种制度来对抗革命的。它所有的矛盾是不断的，同时又是深刻而巨大的。这一点表现在美帝国主义和法帝国主义之間在貿易問題和測驗苏联官僚集团的和平共处政策問題上所进行的斗争上。但是这些分歧和矛盾并没有改变或者消除他們共同准备反革命世界战争的事实。

帝国主义不能提出一种比工人国家更优越的社会制度而且相应地它也不打算把它的政权移交给殖民地革命或者工人国家。它从軍事上进行准备要以反革命核战争来抵抗世界革命的发展。因此必须要作好准备并且要預見到帝国主义是要发动世界核战争的。苏联官僚集团和帝国主义一样也企图以核战争来恫吓人民群众。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就是要阻碍无产阶级革命，这也就是他們之間的联盟的基础。苏联官僚集团当它不得不在帝国主义面前直接为自己辯解的时候，它就強調說战争将要使帝国主义而不是使人类消失，但是当它滿脑子摆脱不开人民群众并且想方设法要去恫吓他們的时候，它就說核战争将是人类的末日。这种說法是謊言。核战争将是資本主义的末日。人类将不得不为核战争的后果付出代价，正象它在其他各种战争中已經付出的代价那样，但是它是不会消失的。这场灾难将比过去的远为巨大，但人类得到的补偿也将更大。人民群众并不害怕战争。

将要发动战争的是帝国主义而不是人民群众。战争是不可能防止的。如果有可能防止核战争，而且延长資本主义的寿命三十年、四十年或五十年就可以防止这种战争，那么接受这一点就是正确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因为它沒有其他存在下去的历史可能性。它的活动，它在軍事、科学、社会和經濟方面进行的准备就是很好的证明。建立一个世界統一战线是必要

的。在人民群众参加中苏爭論的同时，必須要建立一个拥有推翻資本主义的綱領的世界統一战綫，一个由工人国家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建立的世界无产階級統一战綫。

各国共产党腐朽了；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共产党蜕化了、官僚化了、保守了而且是苏联官僚集团的反革命特务。現在提出号召要在无产階級革命的客观綱領的基础上成立各国的新的共产党是必要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同民族主义的势力結成联盟是必要的，这些势力为爭取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为爭取人民群众的經濟和社会发展、为爭取人民群众在工会中、在工人政党中、在无产階級的組織中的独立发展而进行斗争，这些无产階級的組織所抱的目的是为爭取建立工人的政权而斗争，而不要陷落在或限制在資本主义利益或民族主义的小資产階級势力的政治局限性之內。

正如在巴西已經表明的那樣，那里有着一股能够大大向前推进的民族主义的小資产階級的势力。但是由于并不存在什么能够发挥作用的独立組織，因而民族主义运动将会不断地受到限制，而且容易同軍隊和資产階級势力妥协，或者受到同他們自己缺乏远見和社会客观性有关的他們自身所有的社会局限性的影响。

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革命

必須要有一个表达人民群众的世界性要求的綱領，一个支持殖民地革命、支持半殖民地国家和工人国家結成客观上的联盟以便实现驅逐帝国主义的世界統一战綫的綱領，一个社会和經濟发展的綱領，但同时也是使独立的群众性組織革命化的綱領，目的是要使运动中的民族主义的部分对革命具有最大的了解以便毫不迟延地克服它在目的上的局限性。

正象古巴过去所表明的那样，巴西也表明已經没有什么民主的資產階級革命阶段的历史可能性了，因此，除非开始时是作为一种民族主义运动的革命朝着社会主义革命前进，否則革命就将停滞不前而且后退。这个經驗已由古巴革命所证实，而且也得到了桑給巴尔經驗的证实，同时从另一方面來說也是得到了巴西的經驗的证实的。必須要有一个号召世界組織无条件支持殖民地革命的綱領。各工人国家、各工人国家中的工会、各工人国家的共产党必須直接参加到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革命和无产階級革命中来。

必須呼吁释放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所有政治犯和社会犯，同时，还必须呼吁为爭取人民群众組織起来，爭取建立单一的无产階級和农民的中心、拉丁美洲中心、非洲中心，爭取在所有工人国家內建立以无条件地保卫工人国家为基础的多党制而进行斗争。必須有一个推动殖民地革命和无产階級革命的世界綱領，即使面对着資本主义发动世界核战争也在所不惜。

战争将是資本主义的末日，这种末日将立即、同时地在全世界范围内来到，因为人民群众将以同时发展无产階級革命来作为回答。必須为这个沸騰地、生动地开展革命的阶段作好准备。同时还必須积极有力地同各工人国家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世界資本主义达成妥协并結成联盟的傾向进行斗争。

我們号召把进行无产階級革命的斗争和进行殖民地革命的斗争組織起来，这种殖民地革命是朝着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我們号召組織各工人国家同全世界的人民群众在以社会主义的世界发展为目的的反資本主义的綱領的基础上的联盟。必須有一个在所有国家里要求实现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的綱領，要求释放全部反帝国主义和反資本主义的犯人的綱領，一个要求在全世界实现經濟

和社会要求的綱領。各工人国家,而且即使是資本主义国家,都表明目前为人类服务的生产能力是巨大的。資本主义把生产和生产力上的所有这些能力完全投入到为战争进行的准备中去。人类能够在一個短短的时期內解决所有的生存問題和粮食供应問題。二十亿居民象集中营里的人們那样地生活着。这就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組織的专家們的結論。如果在世界範圍內都是工人国家的話,只要十年,飢餓将从全世界消失,人类将进入一切需要都将得到滿足这个充分发展的阶段。

必須摧毀資本主义制度。为了作到这一点,必須在革命綱領的基础上建立各国的新的共产党:就是以統一战綫和一个具有革命綱領的新的群众性共产国际为基础。必須为在各工人国家里重新建立各級苏維埃組織、为建立象俄国革命的最初几年里的那样的苏維埃組織而斗争。

苏維埃是工人国家根本的革命基础,而且在遭到挫敗、封鎖和歪曲的时刻有可能在一个很短的阶段內发挥人民群众和工人国家的結構在发展經濟上的巨大的和强有力的动力作用。必須爭取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建立人民的公社,并把它們同苏維埃的組成,同古巴革命的发展,同爭取释放在古巴和所有工人国家里被監禁的所有革命者的斗争,同爭取所有象托洛茨基主义者那样地无条件地保卫这些工人国家的所有工人政党存在的权利的斗争,同爭取在所有工人国家里的人民群众选举他們自己的政党和他們自己的革命組織的絕對的权利的斗争結合起来。

这些就是人类在这一阶段上向前迈进时所具有的无限美好的胜利前景,这也就是第四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在1964年5月1日所提出的号召的基础,这个号召提出这个阶段革命的中心任务;提出要建立革命的世界领导来表达和集中世界人民群众推翻資本

主义、清除官僚集团和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决心。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

1964年4月

(译自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机关刊《红旗》1964年6月号)

三九、資本主义的危机和工人 国家的經濟情况

——波薩达斯 1963 年 12 月 20 日在第四国际
欧非各支部干部学校发言的摘要

人类的三分之一已經进入工人国家，工人国家正在发展，与此同时，資本主义依然存在。它們当中的关系怎样？这是一个对立面互相渗透的过程。从这个过程中應該得出什么結論？在短期內将出现怎样的前景？

很明显，資本主义处在垂死阶段。資本主义之所以依然存在，并不是由于它自己的經濟、社会或軍事力量，也不是由于共产党和社会党給它所作的工作、給它的支持和支援，而是在于各工人国家的领导是資本主义的坚定可靠的同盟者。这个問題正應該从世界范围来考虑，而不應該从这个或者那个共产党来考虑。

事实上，那些共产党沒有足以决定資本主义依然存在下去的那个根本力量。在欧洲，除了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毫无力量。有力量的是社会党和英国的工党。在亚洲，除了越南以外，共产党毫无力量。在非洲，共产党沒有任何力量，沒有任何可能起有影响的作用。拉丁美洲也是一样，只有智利除外。

与此相反，社会党、工会领导、民族主义运动則执行同資本主义妥协、支持資本主义的政策，不过，他們的力量并不在于他們自己这样做的决心和政治能力，而在于他們依靠苏联官僚主义統治在世界范围内同資本主义妥协的政策。正是这样，他們才能在群

众面前为自己的政策辩护，才能欺騙群众，使群众跟着他們走妥协的道路。

如果苏联官僚主义統治、中国、所有工人国家（包括南斯拉夫、古巴等）的官僚主义統治决定并且执行了推翻資本主义的革命政策、綱領和目标，那么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其他派別就全都会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这就会决定它們的路綫，阻止資产階級和小資产階級的民族主义派別，使社会党、共产党或工会能掌握群众运动的領導。这就是現阶段的根本問題，这就是問題的关键所在。

这就說明，为什么苏联官僚主义統治过去把手伸給肯尼迪，現在伸給約翰遜。这就說明它为什么給資本主义直接的援助。它为資本主义打开了进入苏联內部的大門。当苏联官僚主义統治执行这样的政策的时候，就給了世界工人运动中的民族主义、小資产階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各派別以充分的权威，帶着一个綱領在群众面前出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群众支持这个綱領或者同意这个綱領，它只說明群众沒有別的选择罢了。在苏联官僚主义統治的这个政策背后还有那些工人国家。在全世界群众心目中，苏联和所有工人国家（包括中国）的官僚主义統治以工人国家的全部权威表現为資本主义的敌人，这就在世界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使他們对工人階級的政党和領導失去了部分信心。而这是第四国际不曾得到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四国际不應該对个别共产党、个别社会党或者个别小資产階級政党进行斗争，而應該向工人国家的巨大权威所产生的結果、向工人国家領導亲資本主义的妥协政策进行斗争——这种政策是被当作工人国家必然采取的政策向群众提出的。群众并不接受这种政策；他們的斗争性、他們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是同这种政策背道而馳的。然而在現阶段，群众比已往任何时期都更不可能具有对

革命过程的政治的、意識形态的概念。而他們需要过日常生活，需要进行日常斗争的綱領和政策。

問題的另一方面是資本主义的現狀。資本主义正在度它的末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死亡。还需要打它，它才能倒下。因为它还拥有强大的破坏手段，而它准备无恶不作。如果以为它不会使用原子武器，不会发动原子战争，那就未免太愚蠢了。在五千八百亿美元（原文作五百八十亿美元——譯者）的总額中，投入原子战争的資金达七百三十六亿美元。他們自己說，这超过国家預算的百分之四十五。美国的国民收入是五千七百亿亿美元。投入原子战争的資金超过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这是他們自己宣布的数字，实际数字还要大得多。譬如說，为了暗杀肯尼迪用的錢——这是发动反革命世界战争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他們是在所不惜的。他們为了这个目的化了好几百万美元。

資本主义繼續存在着。它在現阶段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他們一致同意准备反革命的世界原子战争，一是他們相互之間仍然存在矛盾，进行內部竞争。

人們之所以可能通过革命推翻資本主义，其原因之一就是因為資本主义是个充滿矛盾的制度。在矛盾之中存在着竞争。这是曾經导致資本主义危机，而且現在日益导致資本主义危机的方面之一。然而由于群众斗争今天比过去任何时期无比强大，它就构成資本主义內部竞争激化的根本因素之一。并不只是欧洲国家无产阶级的斗争才有很大的重要性，全世界殖民地群众的斗争也是如此。这个斗争使資本主义剝削的范围，使它投资和取得利潤的基地日益縮小。因此，这个斗争就加剧了資本主义国家为了重新分配日益縮小的世界剝削范围而相互間进行的斗争。

无产阶级的工会斗争是人类进步的一个主要方面。它反过来

又构成促进资本主义内部相互竞争的一个因素。无产阶级的斗争曾经迫使，并将继续迫使资本主义在它存在的整个时期减少它大量增加利润，并使资产阶级各阶层有成长的可能性。剩余价值的总额在增长。然而享受这个利润的资产阶级人数在减少。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因为它意味着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结构的缩小、资产阶级的分化和他们相互间竞争的增长。

另外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方面就是工人国家——这个世界工人阶级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及其代表——迫使资本主义加剧相互间的经济竞争。这种竞争是事实。这是赫鲁晓夫为他的政策辩护时所根据的那个幻想的基础。然而资本主义在准备原子战争同时，也在同工人国家进行竞争。它之所以这样做，那是因为它没有能把工人国家摧毁掉，也是因为苏联官僚主义统治无意于通过革命来摧毁资本主义。

在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及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数不多，例如意大利——进行经济金融的干预方面，苏联官僚主义统治也直接同帝国主义进行竞赛。《消息报》不久前说，是帝国主义在直接的竞争中杀死了马泰（意大利国家碳化氢公司总经理——译者），因为马泰发展意大利资本主义的一个部门的利益，而他因此必须直接面对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德国人等等。

在现阶段的历史发展中，这个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使资本主义能以生存下去。苏联官僚主义统治的政策是资本主义的养料，这不仅因为它跟资本主义争相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些落后国家进行投资，尤其因为它同时执行着同资本主义共处和妥协的政策。而现在，通过经济互助理事会的银行，它向世界资本主义提供了向有关国家投资的可能性。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政府不久就要赔偿在革命中被剥夺的资本家。这是对资本主义的直接支持，

对革命的危害超过无产阶级的任何失败。这些就是表明资本主义的基础何在，力量如何的有份量的、无可怀疑的事实。不错，帝国主义拥有强大的军事和金融机器，但是从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之所以还能存在，归根结蒂是苏联官僚主义统治和所有工人国家造成的。

竞争受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法则的支配，其中包括平均利润率法则。平均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它决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努力方向，决定资本主义的投资。美帝国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中心。然而四年以来，它在国外的投资比在国内的投资逐年成比例地增加。现在它竭力控制欧洲汽车市场。这就说明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中心已经没有办法在它内部发展，而必须到外部攫取平均利润。由此产生日益尖锐、日益残酷、日益凶暴的竞争。

戴高乐跟美国佬之间的“冻鸡之战”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谁知道他们明天会不会为一棵蒿笋厮打起来。这是很可能的。重要的是，对美帝国主义来说，是在美国之外，而不是在美国国内，平均利润率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另外一方面，跟攫取剩余价值的资产者的人数越来越少、越来越集中的同时，世界资本主义大量支出的必要性也越来越增大了。这些支出用之于反革命世界战争的准备，用之于反革命的军事和警察镇压行动，这就使帝国主义不能以最大的力量跟工人国家进行竞争，因为工人国家虽然也要为军事准备投入资金，但是它们从世界殖民地革命和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罢工中得到支援，足以弥补它们在军事准备方面投资的不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群众以及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所有这些斗争都增强工人国家的力量，因为群众的斗争有助于摧毁资本主义。这就从具体的军事观点上削弱资本主义的结构、机体和力量。

这就是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之间的客观的、“天生的”联盟。毫无疑问，这就为一个自觉的联盟提供条件和基础，使工人国家能和殖民地革命结成一条推翻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官僚主义统治对此不感兴趣。这就使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间的这个客观存在的联盟不能产生更大的效力。

资本主义是个充满着矛盾的制度。这个矛盾的主要基础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就妨碍资本主义实施计划化，因为每一个资产者按照他个人的利益来决定他的行动。垄断是一种简单化的、私有的计划形式。这个计划不是为了发展经济，反而阻碍经济的发展。归根结蒂，一切垄断的目的都是为了控制市场。这就导致危机阶段的来临。因此，垄断就不可避免地，而且事实上也起着减少生产和消费的作用。此外，资本主义不能在事先进行计划，而只能在市场表示出它需要什么东西以后再行计划。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资本主义没有可能精确预见市场在哪怕是一个短时期以后的反应。

决定资本主义投资方向和场所的是消费者和商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购买力。欧洲资本主义的资金是在观察了市场的反应以后再动员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却指导市场，因为它不是由利润，而是由消费的需要决定的。

所有这一切使资本主义不可能结成一条和谐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的统一战线。这我们现在可以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的分歧中看出来。这些分歧的一部分导源于官僚主义统治不要战争这样一个事实，然而殖民地革命却不断发展。本·贝拉不止十次地向法帝国主义提出保证，他不会损害它的利益，他要赔偿它的损失。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群众来说，这些话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占领了工厂、土地、房屋。他们迫使本·贝拉把革命向前推进。伊拉克复

兴社会党就是这样例子。那时有一个具有馬克思主义傾向但是缺乏馬克思主义綱領的小資产階級民族主义政党。直到那时候，馬克思主义只限于在口头上。一个月以前，制訂出了一个馬克思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綱領。这就是不久前伊拉克发生軍事政变的原因。这次政变正在影响，或者就要影响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因为那是革命发展的最先进的形式。这并不是說革命向前进了，而是說那是最先进的思想意識綱領形式。这是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間)的客观存在的、“天生的”联盟的又一个例子。

另一件就是不久前刚在巴西发生的事件。几天以前，有可能当巴西財政部长的布里佐拉^①說，如果任命他当部长，他要执行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綱領。法国《世界报》的一个記者說：“那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式的……”布里佐拉辯解說：“我不認識他。我是巴西人。”布里佐拉的政党在某些行动上是同我們党結成联盟的，它的主要领导人跟我們的同志有联系，采取共同行动。

阿根廷政府最近宣布它卖一百七十万吨小麦給共产党中国。这对美帝国主义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打击。反过来，中国卖商品給阿根廷，而貿易超額是用英鎊支付的。有意思的是英国人也牽連进来了。这就是所謂三边貿易，虽然形式上只是双边貿易。

资本主义最根本的条件价值法則，也就是剩余价值，同样支配着工人国家。不过它在那里产生的效力、后果和作用有所不同。这只能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那就是工人国家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国家形式，那里有着对立物的互相渗透。价值法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法則。当它在工人国家中存在时，它應該起同样的作用，产生同样的結果。然而由于工人国家是需要发展經濟的过渡

^① 布里佐拉(Brizzola)，巴西众議員，前南里約格蘭德州州长。——譯者

性质的国家形式，它就必须在整整一个时期内建立在能够取得剩余以便发展国家这样一个基础上。这项剩余只能来之于人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剩余是资本主义积累，从而也是私人资本主义力量的基础，而在工人国家，它是发展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是说，剩余价值就实际上全部用之于发展，而是说，按照不同的领导、计划和决定方针的人，剩余价值在工人国家起着大小不等的进步作用。

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今天还受到一个重要事实的影响，那就是它的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必须用来保卫它本身的存在。而这还不仅是正常的国家预算（包括军事和警察费用），它的数额达到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例如美国并不把它给不发达国家的四十亿援助列入军事预算，这并不是给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而是一种反革命投资。

这种为维护制度而经常投资的必要性，减削了它自己抵抗的能力。两星期以前，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在意大利《晚邮报》的一条消息中谈到了美国的经济衰退。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最近两次在美国出现的经济衰退所产生的后果并没有全部消失。也就是说，这两次衰退在美国经济结构中留下了创伤，而任何一次新的衰退都将在危机的总的基础上以更高的水平开始出现。这些基础之中有一个就是：生产、生产率和投资都在增长，而失业人数却降不到三百五十万以下。

市场购买力保持稳定，因此购买力是强大的，但也不特别强大。美国有百分之十八的人口既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

美帝国主义在重工业中的投资方向主要是军事工业。汽车和钢在投资中的百分比降低了。煤炭的生产和投资也在降低。美国经济的基础显出是薄弱的。主要的刺激不是决定于货币—商品—

貨幣这个資本主义的循环,而是决定于国家的干預。

資本主义国家也以一定的方式計劃它們的生产。国家以强大的行动能力和反应能力进行干預。然而資本主义的这种行动并不取决于資本主义的力量,而是取决于它的衰弱。国家之所以能够干預,那是因为它是由越来越少的資本家阶层控制着的。我們再就肯尼迪的被刺說几句话。只有那些自信具有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力的大金融集团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才能把美国的“民主权利”推翻个一千二净。它們之所以还没有这样做,那是因為它們目前还无意于此。肯尼迪被刺了,而凶手找不出来,那是因為金融机构和軍事机构是串通着的。这是现阶段資本主义的一个现象。

在資本主义世界,至少是在那些大国中,国家越来越成为少数垄断集团的代表,这些集团的力量基础不在于議會而在于有势力的軍閥集团。这是一个可以随时发动战争的机构。它凌駕于人民之上,凌駕于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法律传统之上。国家机器是大金融集团和主宰一切的軍事机构的一个共栖体,这一个事实就概括地表现了上述现阶段資本主义的那个现象。这是现阶段資本主义的主要特征。

美帝国主义在它跟世界其余部分的关系中,需要使資本主义保持其活跃和具有生气。另外还有一个問題对我们的認識和行动也是非常重要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尽可以发生危机,在这些国家尽可以发生經濟恶化,这并不必然牵动整个資本主义世界。反之,美帝国主义的任何重大危机却牵动資本主义的全部。

下面这个事实是无庸置辯,能够說明問題的:美元已經沒有它十年前那样的力量了。它丧失了百分之二十五的能力。不过它依然还是国际貨幣。德国資本主义可以发动一个反对美元的斗争——至少是在欧洲——来促使美元贬值,从而增强德国資本主义的經

济力量。德国人在德国贬低了美元的价值，但是贬得很少，甚至不到百分之四。他们之所以不更进一步，那是因为美元的落价牵连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他们是事先研究过这个问题的。

这个事实之所以重要，那是因为在战前，资本主义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那时大家都认为美元是所谓“健全的货币”。今天，这种货币不再健全了。它有它自己的毛病，而且还为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所苦。

这个事实显示了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制度的虚弱状态。欧洲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竞争中不能利用对美国佬不利的形势，因为它害怕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发生问题。

关于这一切，还有一个证据。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帝国主义的货币储备是二百九十亿美元。现在则是一百六十亿美元。这就意味着美元贬值了百分之三十。货币储备减少，而与此同时，战争等非生产性开支却在增加。

关于这个非生产性开支问题，必须稍为解释一下。所以叫做非生产性开支，就是因为它没有完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循环。人们生产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产生利润，使一部分资本家积累了资本，然而它却没有进入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也没有使这体系运行起来。因此，这是妨碍资本主义的扩展，妨碍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力量的一个障碍。资本积累增加了，但是这个积累和消费间的直接关系并没有增长，也就是使生产性再投资和资本主义的扩展成为可能的那种关系并没有增长。

当我们谈到资本主义的完全的循环的时候，那就是说：货币生产商品，商品卖出去，消费者把它买来，货币又回到资本家手里，其中包括他的投资和他得到的利润。与此同时，它发展、维持或者扩大了市场。它扩大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资产者和小资产者的

数量增加了，就业、劳动和商业增加了。

与此相反，军事生产的投资却产生相反的效果。资本家从事投资。他取得比其他任何投资无比优厚的利润。他积累了大量货币。然而买主是国家。国家只占全部人口的千分之一。因此，一切就止于此了。它并不扩大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因为它并不产生更多的小资产者，更多的商人——除非是在极度微小的范围内。从历史观点来看，这不但不是加强资本主义，反而是削弱和限制资本主义。

此外，付钱的并不是消费者，为更大的投资，为货币的稳定创造社会基础的并不是由人民的消费所产生的资本积累。付钱的是政府，它是从人民那里取得财源。因此这是一个逆方向的循环。它不仅不能加强资本主义制度，反而从两方面削弱资本主义制度。第一方面是从金融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经常负债，它跟社会的关系因此恶化。第二方面是社会基础方面：商人、小资产者、资产者日益减少，而占统治地位的少数资本家的比重却日益增加。

结果是，这个以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准备反革命世界战争为目的的非生产性投资的循环，从社会方面不断削弱资本主义制度。

赫鲁晓夫、苏联官僚主义统治要跟这个制度搞和平共处，搞经济竞赛。只要稍为看一看事实，就可以看出：如果短期内不发生战争，资本主义的大危机就要爆发。应该读一下戴高乐的皮尔拉特（法国正在兴建中的新原子研究中心——译者）投资计划。他上哪里去筹款？要实现皮尔拉特计划，要如他所愿，增强法国的“原子独立”，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法国资本主义的金融和贸易能力。然而这将怎样实现呢？他们还为胡萝卜和冻鸡打得不可开交呢。

一年半以前，他们在一次宴会上跟戴高乐谈过一次话。戴高乐咳了一阵嗽。他们问他：“将军，您怎么啦？Allergie（反应过

敏)?”戴高乐答道：“不，Algérie(阿尔及利亚)!”

戴高乐是个讲究精确的人。他訂了一些計劃。工資已經两年不涨了。今年跟前三年一样，国家投資又减少了。不过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国家投資的方向。百分之七十用之于軍事目的。你們見過法国的地下电車嗎？他們添了一个車廂，添了三四十米月台。他們这样做，为的是提高运输能力，减少开支。事实上，法国人需要整整一个新的地下电車网，因为現有的不够用。我們有一天坐了地下电車，那都老得沒有牙了。

法国資本主义在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都有投資場所，可以按照正常的投資途徑，增加它取得的利潤。然而，法国資本主义的資本却越来越投到非生产方面去。

因此，虽然資本主义对赫魯曉夫抱有好感，它却提不出任何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的前景。恰恰相反，象我們所分析的那樣，它却以它的全部資金来保卫自己。

切合实际而且具有綱領性质的結論是，應該預料在資本主义国家內迅速出現大規模的斗争。此外，由于資本主义沒有能力建立法西斯或軍事独裁，有可能使社会党，甚至共产党出来担起組織反革命政府的任务。法国社会党就在准备这样做。(……)

另外一方面是工人国家。應該把工人国家和資本主义放在一起进行全面分析。不光是把資本主义当作一个整体，而是把它和工人国家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也有一个相互影响，有一个对立物的相互渗透过程在不断地发展着。毫无疑问，基本的傾向是对革命有利的。不过，資本主义不会不作一番努力，不会不试图利用工人国家官僚統治的狼狽处境。肯尼迪的政策只能这样来解释。

帝国主义对南斯拉夫和波兰的态度，其目的就是要建造通往工人国家领导的一座影响和引誘的桥梁。資本主义在确定它的目

标的时候，它的指导思想并不是认为这些国家就要回到资本主义去。誰也不这么想。他們试图从中取利，爭取时间，尽可能維持自己的生命，并等待发动原子战争的有利条件。在这些有利条件中，还不仅是占有可以在半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内解决战争问题的武器，占有能以反击工人国家的最大火力的足够数量的武器这样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利用各工人国家官僚统治之间的分歧、异議和相互間爭夺利益的竞争。（……）

以赫魯曉夫为代表的官僚统治比南斯拉夫走得无比地远。經互会銀行为私人資本的投资敞开大門，这是比南斯拉夫采取的各项措施无比地更加具有灾难性的一个措施。这是为金融資本打开了大門，而金融資本的侵入比在工人国家建立一两所资本主义工厂厉害得不知多少倍。

现阶段工人国家的发展应该同殖民地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联系起来考虑。对它們各方面来说，短期内就要算总賬，这是明摆着的。苏联官僚统治感觉到算总賬的最后时刻就要来到，这从它对帝国主义的政策中可以看得出来。化学工业方面的四百二十亿卢布的投资和經互会对私人資本的呼吁，‘这两者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四百二十亿卢布意味着工人国家生产机构的极度虚弱，是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竞争的开放的障地。如果帝国主义向經互会投资的話，那它将不是为了攫取百分之几的利潤，而是为了取得决定投资目标、投资监督人、投资的社会和財政保证等的权利。

苏联官僚主义统治之所以必須执行这样一种政策，那是因为它感觉到在工人国家内部，群众无论从社会方面或者政治方面都不接受这个统治。存在着拒絕、抛弃官僚主义统治的过程。

就工人国家的过程来说，根本的因素不是在这个或者那个經

济部門投資的問題，而是在世界範圍內全体工人國家的計劃化問題。我們說的是世界範圍，而不是國際範圍，因為在四大洲都有工人國家。如果說非洲還沒有工人國家的話，那末那里却有两三个接近于工人國家的國家。它們現在還不是工人國家，不過不久就要成為工人國家的。

決定一個國家是不是工人國家，有两个標準。如果推翻資本主義的政權是具有革命性綱領的革命政黨，那立即就是一個工人國家。（……）

要保證無產階級政權的社會基礎，就必須一切生產資料的國有化。然而，即使沒有實現一切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只要政黨是革命的，依靠革命群眾，進行革命活動，那麼這個國家也可以被看成是工人國家。

反之，如果推翻原有政權的不是革命政黨，那麼，只有當所有制關係國有化了，或者至少是主要部門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以上國有化了，這個新國家才能被看成是工人國家。資本主義的法律機器摧毀了。當生產資料國有化時，資本主義的法律基礎不可避免地崩潰了；基礎、根基、法律結構崩潰了。例如，在蘇聯，生產資料國有化了。私有財產制的法律根基、法律基礎消除了。然而，人們還是按照資產階級的規則來審判酗酒、盜竊和罷工，那就是說，還存在着資本主義的法律形式和法律關係；不但存在着資本主義的分配關係（通過剩餘價值），還存在着資本主義的法律關係。（……）

在阿爾及利亞，很大一部分生產資料國有化了。在工人管理下的生產資料並沒有國有化，這是過渡形式。我們為它的國有化而鬥爭。不過，這是過渡形式，從法律上看依然是在資本主義手里。阿爾及利亞群眾的鬥爭、動員、占領土地，這些都是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是社會主義方向的。不過，所有制還是資本主義

的。要說明阿尔及利亚的性质，不能单从群众斗争来看，要从群众斗争和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这两方面来看。绝大部分还是在资本家手里。

在埃及，百分之六十的主要生产在国家手里，或者說是不再在私人资本主义手里了。这是确定一个工人国家的主要基础之一。然而我們不把埃及說成是工人国家。第一，因为埃及经济目前的主要基础，也就是土地，还处在私有制状态下。每一个业主占有的公顷数减少了，然而土地还在大小地主手里。即使他們每人占有的公顷数不能超过某一数字，同一地主也可以使用法律伎俩，一个人占七八份。

如果埃及把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土地收归国有，剥夺大纺织工厂，那就是一个工人国家了。我們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工人国家的就是所有制关系。资本主义的特征，它的基础，那就是私有制。尽管可能有一个社会党和共产党政府（英国就有过两次），但生产资料依然留在私人手里。决定一个国家的性质，不能考虑是哪个政党当政——因为这是暂时的——而应该考虑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共产党在法国和意大利都当政过，然而我們誰也沒有认为法国和意大利曾經是工人国家。反之，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60年虽然还是小资产阶级领袖，自称反共，但是他把百分之六十到六十五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所以我們就把古巴称之为工人国家，尽管当时他自己还没有这样說。古巴无产阶级的斗争在国有化以前曾經比后来激烈得不知多少。然而我們并没有因为这些斗争而說古巴那时就是工人国家。那时群众占领了所有的住宅和工厂。但是只是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群众的压力下（这同当阿尔及利亚的群众占领土地和工厂时的情形一样），不得不把大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时候，我們才說古巴是一个工人国家。所謂大部分，并

不是就数量而言，而是就社会和經濟比重而言。在埃及，对外貿易由国家垄断，銀行国有了，百分之四十五到五十的紡織工厂国有了，全部交通運輸国有了，大中商业也国有了。資本主义还剩下什么呢？

应该从所有制关系来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的主观意图，或者根据当政的人說的話来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本·貝拉每隔三分钟就喊一次“社会主义万岁！”可是他每隔四分钟就跑到群众面前，不让他们剝夺資本家，不让他们占领工厂。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本·貝拉讲的話，而是阿尔及利亚現存的所有制关系。因此，在目前这个过程中，我們說，由于它的所有制关系，埃及更接近于是一个工人国家，而不是更接近于是一个資本主义国家。

毫无疑问，埃及的工人被杀害，也被关进监狱。不过赫魯曉夫也关人，也杀人。斯大林消灭了六百万农民。他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就消灭了一万五千名托洛茨基主义者。尽管有这些屠杀和罪恶，我們从来没有說苏联不是工人国家，因为决定工人国家性质的不是政府的作为，而是所有制关系。

这个分析的实际的、历史的、具体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决定我們在每一个情况下所采取的态度和应该实现的任务。譬如說，如果我们鉴于斯大林的屠杀，就肯定苏联不是一个工人国家，我們当时就可能組織无产階級革命来推翻这个国家。我們在苏联国内的政策就会是进行怠工破坏，不顾一切地展开階級斗争，因为那是一个資本主义国家。而如果我们认定它是工人国家——我們事实上也就是这样做的——，那么我們的斗争目标就是，而且現在依然还是发展工人国家，不仅仅是从經濟方面来发展它，同时也通过群众的集体干預和苏維埃的恢复来发展它。在古巴和在中国也是这样。

在埃及，我們当前的政策是支持埃及政府。不过我們同时也为彻底剝夺資本主义而斗争，保卫埃及不受資本主义和旧地主的进攻，带着反資本主义的革命綱領参与埃及国内和議會中的斗争，参与已經組織起来的統一政党的工作。

如果我們不这样来看待埃及的話，我們就会发出組織革命政党、推翻政府、消灭資本主义的号召。我們并不想推翻納賽尔，这不是我們的政策，同样我們也不想推翻本·貝拉。我們向納賽尔或本·貝拉的資本主义政策和国有化的局限性进行斗争的方式就是把革命繼續发展下去。这就是决定一个国家性质的具体的、历史的、政治的、实际的結論。

（譯自法文版《共产主义斗争》1964年2月号）

四〇、巴西的民族主义和 社会主义革命

波薩达斯

自从夸德罗斯逃亡以后，人們看到巴西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处于瓦解过程。帝国主义在巴西失去了威信、基础和力量。资本主义失去了来自小资产阶级、农民和落后无产者的基础、威信和力量，这些小资产阶级、农民和落后无产者以前在政治上都是支持资本主义的。这三年是巴西群众不断成熟的三年，也是他们在阶级斗争和革命斗争组织能力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的三年。

革命在前进而共产党的威信则在下降

1946年，共产党获得了六十六万张票。这意味着今天的三百五十万张票，因为那时候只有八十万至九十万工人，而今天则有二百五十万工人了；世界革命斗争已经非常成熟，工人国家起着不容争辩的影响；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显著的阶级划分；资本主义为一方，反资本主义为另一方。这六十六万张票在今天应该至少是三百五十万张票，因为共产主义在正常地扩大它对全世界的影响，世界正在向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可是，共产党今天所获得的票数还不到1946年获得的百分之三。

巴西组织工会的浪潮，特别是组织农民协会，是在反对共产党的情况下进行的。巴西几次组织大罢工是在反对共产党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这些罢工中，有几次是由共产党党员和共产党的积极

分子組織和領導的，但是他們並沒有用共產黨的名義，如果不是違反它的指示而進行的話。

因此這一過程說明巴西革命正在成熟並且是在沒有共產黨參加、組織和領導下而是在反對它的情況下，向最後突擊的方向發展的。

在這三年內——從夸德羅斯垮台到今天——巴西大地成熟了。巴西革命成熟的发展是由下列因素促成的：資本主義的衰退、群眾革命意志的突飛猛進、資本主義內部發生的種種矛盾、反資本主義世界革命的巨大影響和資本主義本身所顯示的無能，它無法通過經濟——社會的發展找到能滿足群眾的意志、要求和意識的解決辦法。

巴西北方的農民正在發展一大批農民協會。我們的黨是參加到這種組織中去的。為了這一點，杰里邁亞同志被暗殺了。為了同一緣故，現在我們有四個同志被關在獄中。他們殺害了杰里邁亞，於是又出現了四位新的領導者。他們監禁了四個托洛茨基派領導人，現在有了二十個以上的領導人。在巴西北部，黨有着異常高的威信。象伯南布哥（巴西沿海城市）發生的那種事情是歷史上從未見過的，那里的犯人可以出獄到政治集會上演說，隨即又回到獄里去。這種情況只能在革命期間看到，那時社會基層的意志、感情和意識已在革命中培養了起來。否則，這樣的事情是沒有有的。讓政治犯——而這些是托洛茨基分子啊！——出獄，讓他們在集會上演講，這就意味着在當局的意識中，革命已經獲得勝利了。他們的做就像已經垮了台的那種人的做法一樣。

當巴西發生士兵和下級軍官的叛變，當這些軍人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召開會議、發表宣言、同工农結成統一戰綫，這是說革命已在他們的意識中取得了勝利。革命在取得真正勝利之前，在採取

行动和取得胜利的决心上已获得了胜利。

1946年以来的十七年中，巴西工人群众曾举行了出乎他们领导人意料之外的空前规模的总罢工。小资产阶级分子大量地并且经常地参预罢工。社会各阶层中的人也参预了罢工。资本主义的镇压机构已无能为力。它正在崩溃而且感到在采取对策方面毫无办法。主要镇压机构不是警察而是军队。拉丁美洲国家的军队担任着警察的任务。拉丁美洲(国家)的资产阶级不能对军队灌输丝毫爱国行为的思想。它交给军队一个相当有爆炸性的任务，要它去对付居民。而军队则感到居民是对它沉重的负担，对它施加一种压力。军队感到居民是对的。因为自从1810年以来，拉丁美洲国家的军队的唯一光荣是杀害工人和镇压罢工。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军队还能给自己某种理想的军人信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那些扩展殖民地的战争还被军人认为是一种军事行动，此外，还被认为军队具有超社会的一种社会权力。给它权威感的，并不是侵略非洲的事实，因为它知道这种侵略是何等骯髒、何等血腥的杀人行为，而是资本主义感到有实现这种侵略的力量和权威这一事实。

巴西沒有資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在巴西，资本主义沒有向前发展的任何出路和途径。从财政和经济观点来看，它是半死不活的。它毫无发展前途。

这不是投资的问题。咖啡作为巴西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正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它必须减少生产来维持价格。固然，通过改进生产和生产技术还可以进一步降低价格；它还可以增加投资从而把生产成本降低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但是，向谁去销售咖啡呢？咖啡正处在危机之中，不论是在消费方面还是在价格方面。

巴西国内市場不可能替代国际市場。如果咖啡生产下降，巴西的全部資本主义即将陷于瓦解状态。

巴西的工业发展了而且大大发展了。从工业的观点來說，巴西的生产量很大。但是它的經濟依然是以出口咖啡为主。他們必須改变情况来解决这一問題。改变情况的基础是改进技术，就是降低咖啡的生产成本。这将意味着，除了其他一些后果以外，失业情况将大大比現在严重。这种情况实际上靠发展工业是得不到緩和的。今天任何落后国家都不能从資本主义观点出发来发展工业了！没有一个国家能这样做！資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已达到了飽和点。北美、日本和欧洲共同市場以及一些工人国家都能以低于拉丁美洲国家生产成本一半的价格向拉丁美洲国家推銷产品。这就是說，这些国家发展工业的可能性的基础是有限的。問題不在于政府或投資的好坏。問題是，帝国主义对投資存有戒心；这是肯定无疑的。但这并不是不投資的主要原由，因为对非洲來說也同样存有这种戒心；可是他們却在那里投資。如果不进行投資的話，那是因为在那里沒有投資的可能性；那里的平均利潤率低于可以在別处得到的。此外，还存在投資不安全的現象。

組織工会的进程超过官僚主义的领导

此外，在巴西，农民动員起来、为土地而斗争、为組成农民工会而斗争，这是一场革命。过去資本主义賴以維持統治地位的基础之一是不让农民組成会。目前所开展的形势已經是谁也不能再加以阻止的了。在四年的过程中，从已經被远远抛在后面的儒利奥的农民协会开始，群众紛紛参加了工会組織。从組織工会起，他們現在正走向組成工会联合会和統一的农民中央組織以及制定一个阶级的和革命的綱領。这一切是在短短四年時間内发生的！

这一发展过程是在背着共产党而且是在反对它的情况下进行的。它既不是由任何阶级的政党所领导也不是由任何阶级的政党所组织。托洛茨基分子以相当大的声势参加了巴西农民群众的组织工作，但他们并不是其中的主要分子。他们的行动和活动是重要的，但主要还是靠群众的主动性。这是以群众为基础来发展这个工会运动的。群众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工会，在那些不可想象地非常落后的地区组织了起来。无产者扩大它的工会组织，它的斗争和它的胜利。斗争和胜利主要不是通过增加工资来衡量，而是通过他们组织工会的决心以及统一斗争和统一工会组织的决心来衡量的。

到目前为止，资产阶级，象他们现在阻止农民组织工会那样，使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未能参加工会。他们所以能这样干，是因为共产党、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人直接间接地在为资产阶级的目的服务。这些领导人曾经破坏或者正在破坏由群众直接干预和决定的群众斗争和罢工。他们为此施加了某种恫吓手段、某种阻挠办法，使群众不再自发地广泛组织工会。资产阶级的力量并非来自本身固有的能力，而是得自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反革命行动和破坏行为。

今天，这些领导人继续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但是他们被群众的动员所超过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正在不断加剧。这种表现之一就是，不可能建立一种资本主义政权的平衡局面，例如，通过议会来做。自从夸德罗斯下台和逃亡以后，那些以前基本上是在议会形式下得到解决的东西——资本主义政权的稳定、平衡的基础，解决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和问题的根本方法——都已消失了。议会成了一个杂技团。他们在那里表演，但是问题的解决是在议会外边进行的。这是每天发生的事，大家都对此心中有数。

因此，这种經常性的危机正在这形势的基础上发展，并且清楚地在我们眼前摆着一条短期革命的途徑。

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軍士的冲击力是决定性的力量；他們代表着全国的絕大多数。资产阶级的各級机构都有一种瓦解現象，这种瓦解是从主要的镇压机构，即軍隊开始的。士兵和下級軍官的叛变只是軍隊瓦解的一个方面。这是最重要的方面，但不是唯一的方面。这是国家领导人同軍官之間的斗争，即公开支持古巴革命的軍人所进行的斗争；而这种情况并不新鮮。不要忘記夸德罗斯曾企图給格瓦拉頒发勳章。这并不只是一种蛊惑宣传。从基本上來說，这种宣传的意义是他不願意在巴西来一次古巴式的革命。但是他又要用古巴的革命来博取群众的支持。这就是給格瓦拉頒发勳章的意义。当为了当选而有必要支持古巴革命时，他并不是要使群众对古巴革命发生兴趣，而是因为这种兴趣早已存在。虽然夸德罗斯的垮台是直接由于这种作法引起的，但这并不是他垮台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件事被反动派作为借口联合起来，用以向大批軍人和部分资产阶级說明采取一种违宪的出路是合理的，从而使一部分反对革命的反动分子达到目的，就是說，通过依靠小资产阶级給巴西强加一个作为独裁制政府基础的强有力政府。夸德罗斯逃亡了。群众沒有逃亡。

这并不是因为群众不能从巴西逃亡。他們可以不管这些事！相反，他們对这些很关心。他們参加了进去。結果，两个月以后开始了这样一个过程：我們发现群众在沒有党、沒有领导、沒有工会、沒有組織的情况下，在巴西推行了一条革命的进步路綫。沒有党、沒有組織、沒有工会和反对共产党！从这里人們可以估計出有利于革命的力量、有利于革命的全世界力量同全国力量之間所形成

的关系。

革命形势朝着一个目标发展

当前的形势正朝着一个目标发展。由于没有党和没有领导，所以这一过程不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的。这就是说，它不是根据预见的、有组织的行动分阶段进行的。这个过程是动乱的、鲁莽的、混乱的和武断的（我们这样说，因为这一过程有它的各个方面和各种情况）。它可能是混乱的，但不一定是动乱的。它可能是武断的，但未必是动乱的。但是所有这些情况说明群众的这一巨大的干预行动是由成千上万的人民不断地和大规模地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有农民的游击队活动、占领土地行动、工会的罢工行动、农民的罢耕、军人的罢役、军人开会和示威，他们说：“我们的武器是供工人阶级为了保卫人民自由使用的……”这好象是一部电影！不是因为有了这种情况，而是因为有了这种情况时，它没有取得胜利！

资本主义依然在巴西存在。人们甚至不能解释当资本主义没有任何理由找到支持自己的力量时，它竟依然存在。这说明所有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以及卡斯特罗的政策失败了。因为在巴西当前的形势下，在革命的形势下，支持资本主义政权要比推翻它困难得多得多！应该计算一下，在巴西的整个社会内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古拉特总统认为自己有必要作出调整工资的建议！象阿方索(A. Alfonso)那样的部长竟用法令(!)来承认农民组织工会的权利。他用法令的方式接受航空公司职员和驾驶员的总罢工。在有关农民工会和它们组成中央统一机构问题上也发生了同样情况，而这是——根据宪法——不许可的。正象其他方面一样，任何宪法都不准许军人干预一个国家的政治，特别是反

对資本家的政权！在資產階級之間的斗争中，資產階級是反对那些不順从他們的軍人进行干預的。而十年以来，資產階級已經不得不让軍人公开地进行干預。但是，不能让士兵这样做！进行干預的是軍官們。然而，所有这些都表明巴西目前处于什么情况。

在这一进程中有必要成立一个群众的中心机构。巴西的托洛茨基党现在担負起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成为工人、农民、小資產階級、軍人联盟的組織者、指导者并且成为这一联盟的中心。我党积极参加了这一过程的活动。党在革命事态的发展中起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这不是由于它的人数众多而是由于它的理解能力和組織能力。虽然它的規模小，但它能够而且将在巴西革命中扮演一次比一次更有决定性的角色。它将成为主要的因素之一，将成为推动革命的組織者。

巴西沒有資本主义的出路。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是拉丁美洲資本主义体系的主要基地。巴西資本主义的存在，巴西資本主义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性，对美帝国主义來說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十分明显，全世界資本主义以及美帝国主义将丧失巴西，而且資本主义在不久将来会丧失巴西。但是它們无法加以阻止；不論是投資、援助或軍事鎮压都将无济于事。因为对巴西进行干預会立刻激起群众的反应，尤其是在巴西，但是在阿根廷、玻利維亞、秘魯、智利、墨西哥也同样——特别是由于巴西同南美洲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反应的情况将是对街道上的一切北美人进行屠杀以及沒收一切資本家的财产。

資本主义是要对巴西进行干涉的。它已組織了干涉。四五个月以前，它結束了一次海空軍事演习，名为“統一行动”，演习范围遍及拉丁美洲南部，以可能的入侵者为假想敌人。誰会入侵呢？是蚊子嗎？这次演习的目的是反革命准备对拉丁美洲群众、小資產

階級和民族主义者运动的反抗进行干涉。这是一次旨在恫吓、設法抑制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演习。但是它并没有抑制住群众的革命行动，反而使这行动更加高涨了。帝国主义没有任何有效的主动办法来阻止这一革命进程。一种也没有！“进步联盟”已被埋葬。肯尼迪的声明在这方面說得很清楚。他們已經懂得这是一种无法扭轉的革命进程，——肯尼迪是这样表示的——它是无法用武力来抑制的。他們懂得在拉丁美洲已經有变革的必要，但是这种变革是要以土地的世代地主自动地进行土地改革为基础的。于是寡头們用这种口吻来回答肯尼迪：“你，婊婊！”首先因为他們不准备放弃他們的利益。其次因为进行一次真正的、自願的土地改革，就等于革命。这一切都說明資本主义的方法不可能解决革命問題或者說資本主义对革命有所理解是不可能的。

巴西所提出的当前問題是：最近将来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巴西社会的一切进步力量都参加、願意参加并且将参加进来。目前，事实上在行动方面已經結成了一个統一战綫，这种行动是武断的、沒有联系的、沒有明确目标的；軍人、农民、工人、小資產階級正在包围、攻击、不承认、摧毁、粉碎、打乱資本主义制度的作用；这特別表現在士兵和下級軍官这些軍人的行动上，他們正在摧毁資本主义制度結構的稳定性。

問題是現在还没有一个統一的工会。現在还没有农民的中心組織，也还没有規模龐大的农民工会。現在还没有一个階級的党，群众的党。現在有一种导向革命出路的危机。現在有一个革命的形势。革命形势的基础是：資本主义不能够施展它的威风，特别是对軍士和农民不能这样；資本主义政权經常遭到反抗，群众不断发揚他們的革命意志并采取行动、取得胜利来削弱、瓦解、从而推翻資本主义政权。

反动派试图用各种手段把反动的出路强加于人民，但都没有得逞。阿迪马尔·德巴罗斯在圣保罗选举中获得的胜利并不能说明群众在政治上有支持右翼的趋势，相反却显示出小资产阶级的种种矛盾，这些矛盾表现在小资产阶级在几个战线上行动不一致而且还有很多人弃权。这才使阿迪马尔·德巴罗斯以很少的选票获得了微不足道的胜利。拉瑟达的当选出现相同的情况。但是这些人在选举中获得的政治胜利并不意味着右翼在政治上的稳定，也不意味着他们的权力增大——这是在选举以后马上就看到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的矛盾中，不论是古拉特，还是工人党或是库比契克（Kubistchek）的社会民主党都不能获得群众的广泛支持，因为它们的政纲都没有很大差别。但是，一旦选举结束，就可以看到不论是选举还是议会都不能解决问题。于是群众出来干预。他们不是在选举中干预而是在具体斗争中，在群众性斗争、罢工、占领土地、农民武装斗争中进行干预。这里有群众的参加。

当前是组织一个群众性政党的阶段

当前的形势正在成熟，有利于组成用来集中、领导和组织群众行动的机构。这就是巴西革命的目前阶段。组织一个群众性政党，——即使不是一个由自己来承担推翻资本主义的政党——在它的政纲的各点中载有一系列反帝国主义的措施来给群众以一种民主的、革命的权利：这是巴西社会主义革命成熟的一大步。而这就是当前的阶段。现在还没有群众性政党，也没有群众性工会。现在还没有工农阵线，没有工人、农民、士兵和下级军官的阵线。可是，这样一个阵线是必要的。

在下一阶段，巴西革命的高涨程度将表现为有必要组织群众，从而使它能够有组织地向夺取一系列阵地进发，使它推出甚至象

布里佐拉那样的一个民族主义政府，这将是革命道路上的一次大前进。在下一阶段，将呈现这种短期的前景，在这阶段，士兵、下级军官、农民、工人都将参加进来，在这阶段，所有的人都将参加。

我们的党，第四国际的巴西支部，面临的任务是开展这一活动，把军人、农民、工人等等的个别的、不相联系的行动统一在一个纲领下。这一任务，我们的党必须在布里佐拉那样有民族主义假面具的人的领导下来进行；这种民族主义倾向在现阶段来说，具有极大的进步性，它将推动革命并使群众大大提高自己的意识和信心，以便在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权的斗争中走得更远，这就是说，在不久将来把它推翻。

巴西革命所达到的水平已使它不会再后退。要达到的目的如下：经常地和不断地动员农民；组织农民工会，使它们干预和参加本国的政治生活和革命生活；发展工人工会、组织罢工并使它们在争取民主权利、工作条件等方面取得胜利；但是也要动员它们反对拉瑟达和阿迪马尔·德巴罗斯的反动政权。现在已具有把军士、工人和农民动员起来的统一目标。以拉瑟达和阿迪马尔·德巴罗斯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政权，目前已不可能动员群众来反对下级军官、士兵、工人和农民。

古拉特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旨在寻求一个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法，寻求一个资本主义的出路，向群众作出某些让步以便减轻群众的压力，并破坏士兵、工人和农民之间已有的客观存在的阵线。它所建议的措施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相反地，资本主义被迫采取的限制资本主义政权的这些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禁止输出投资资金的利润，石油提炼业的国有化，旨在阻止资金外流的各项措施；接受农民有组织工会的权利——都有助于加强群众斗争向前发展，有助于限制和削弱反动资本主义的政权，并且可以影响

軍隊本身，也就是說，影響士兵、下級軍官贊助群眾。

沒有政黨、沒有領導，就會使這一形勢拖延下去，從而使資本主義政權可以設法研究對策並繼續運用策略來破壞群眾的團結。這就是具有最大可能性去組織一個群眾運動的布里佐拉集團所以毫無作為的原因。縱然他宣稱願意制訂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和抑制資本主義政權的綱領，但他還是希望通過議會和內閣來這樣做。他害怕動員廣大群眾。他對通過群眾取得結果沒有任何理論上和政治上的信心，他認為他提出的那些措施能夠同資本主義的存在相調和。他可能希望並相信：通過和平共處，資本主義會自行消滅；這意味着他抄襲了赫魯曉夫和一些共產黨的論點，但是這是以巴西的小資產階級的名義提出來的。這說明他是沒有成功可能的。

然而，儘管他有這些幻想，布里佐拉被迫採取的以免失去對群眾控制的一切措施仍將在各方面刺激群眾起來進行鬥爭。因而在這一階段就有必要發動一個運動、組織一個政黨（即使是過渡性質的），通過它來集中群眾鬥爭的意志和統一群眾鬥爭的行動，以取得一個非議會和非內閣的出路；這個運動、政黨還要在布里佐拉運動內部把現有的革命各派集中領導起來。在組成階級政黨以前，將有必要發動一個運動，即使這個運動是混雜的，包括象布里佐拉、阿方索以及其他等人等那樣有小資產階級各種派別和傾向的人參加，但是它必須統一在一個共同願望上，即提出一系列旨在阻擊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並让群众組織起來和向前邁進的措施的共同願望。這就是巴西下一階段的情況。

這並不意味着整個階段都是這樣。巴西社會已成熟到這樣的地步，以致縱然布里佐拉、阿方索和其他的人對這一進程作出有限的推動，他們仍將刺激組織群眾的力量使士兵、農民、下級軍官有聯合在一起的感覺。而且這些力量將會超出它們的領導的控制。

毫無疑問，这样一种运动会趋向于建成一个官僚主义的、保守的、投机分子的机构；工业资产阶级将试图依靠它并试图利用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而这是有双重目的的，即利用它为自己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利益服务和垄断国内市场，同时使革命群众的行动走入歧途。这些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很小。

总的进程是向推翻巴西的资本主义，而且是在最短期间内实现的方向发展的。这是一个还不能在这时期在巴西实现的远景。毫無疑問，正象现在没有一个组织那样，领导方面也不是革命的。现在还没有群众的一个集中领导。他们还没有一个有革命纲领的领导。发展成为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或民族主义运动的过程可能是缓慢的。但这是它的前进道路。

反动派正准备用一次反革命的军事行动来回答。拉瑟达、阿迪马尔·德巴罗斯和反动派已经作好准备。几个月以前，他们曾试图行动。他们自动推迟了，因为他们感到他们将被粉碎。即使现在，他们也感到他们将被粉碎。但是他们不想长期迁就下去。帝国主义唆使他们进行干预，给他们各种援助。另一方面，他们的利益正遭到严重损失，因为他们任何方面都不能同巴西革命目前的进步过程相调和。虽然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可以设法适应这一过程，但他们则将无论如何进行一次军事的和政治的反革命镇压来回答。

巴西正朝着爆发一次短期革命的方向迈进，在这一革命中我们党将担任一个主要角色，而群众将获得一次巨大胜利。这一进程即使进行得很慢，即使由民族主义者来领导，它也不会象玻利维亚那样拖上十年之久，因为这里的条件较好、历史阶段更为有利、世界上的力量对比对革命非常有利、这里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而且还因为有我们的党。

作为不断革命的世界进程的一部分，巴西的现阶段正向不久爆发革命的方向发展，它可能导致一个民族主义的运动出来当政；这可能就是布里佐拉。但是，从这里将开始一个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过程的阶段。

我们这些人将全力以赴投入这一进程。我们将试图把这一过程在最短期间内导向社会主义的目标。

1963年12月30日

(译自法文版《共产主义斗争》1964年3月号)

四一、巴西反革命反动派的胜利和 “和平共处”的破产

波薩达斯

拉美派第四国际法国支部机关刊《共产主义斗争》編輯部按語：我們謹請活动家、工人、共产党员注意这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以便理解巴西目前的形势及其意义，从而認識全世界工人运动領導的任务、工作方法和战略。

我們号召共产党基层活动家要求在支部中討論波薩达斯同志这篇分析的各个結論。

巴西反革命政变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将是它在各共产党的危机中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危机将不会立即表现出来，而会在短期內从智利、秘魯和阿根廷将要发生的事件中表现出来。

这个危机是“和平共处”政策的破产的直接后果。而現在，这个危机建筑在跟我們更有利的形势的基础上，因为这个破产已經被共产党的活动家、被民族运动的革命基层所理解。在巴西是如此，在别的地方也是一样。这是“合法斗争”政策的破产。

共产党的危机已經相当严重和深刻。在巴西、烏拉圭、智利，共产党不仅跟它們的基层进行論战，也跟包括我們在內的其他派別进行論战。如果問題只是跟共产党的基层进行討論，他們就不会怎样重視，他們干脆中止討論就完了。然而事实与此相反，他們正在跟他們的基层进行爭論，以便抵制我們第四国际的影响。的

确，在一切派別中，托洛茨基派是唯一贏得权威，提出路綫，唯一从巴西反革命暂时胜利的原因中得出結論的派別。只有托洛茨基派才能进行分析，深入研究，得出正确的結論。

有必要把下面这一点充分說清楚：资产階級和小资产階級——不管是古拉特也好，布里佐拉也好，雷欽^①也好——进行新的尝试，以动员群众，争取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的道路現在并没有堵住。这些改革，归根結蒂将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这种尝试的可能性并没有被排除。

然而，在目前这个过程中应该討論的問題，并不是在资本主义的资产階級民主制度中、通过議會道路取得某些进展、获得某些成就、占領某些陣地的可能性的問題，而是以別的方式代替革命的可能性(除了某些极为有限的方面以外)这种幻想的破产的問題。正是应该在这方面作出結論！

反革命的胜利表明以合法斗争、議會制度当作綱領和目标这种做法的破产，而各国共产党不去討論这一点，却要討論还能取得一点什么东西的可能性。智利、阿根廷、烏拉圭、巴西的共产党正在进行斗争，以抵制各种革命倾向，特别是托洛茨基派在它們的基层以及在不跟随共产党，而走或者准备走革命道路的小资产階級中在思想、認識、精神、意志和經驗各方面的影响。因为托洛茨基派首先指出了下列事实，对它进行了分析，并且把它作为綱領的基础，那就是：如果不通过革命的道路，任何改革——哪怕是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认真一点的改革——都不可能取得，而归根結蒂，要巩固这些改革——即使是巴西那种最低限度的改革——就必须夺取政权。

① 雷欽(Lechin)是玻利維亞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左翼領袖、副总统。——譯者

共产党在准备回答我们这个观点。然而它们不准备跟这个或者那个活动家进行论战，却准备在共产党内外，特别是在共产党之外，打击这个潮流，使它不致渗入共产党基层内部。共产党人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活动家不久将作出他们自己的结论，而是因为已经存在着一个宣传鼓动、压力和影响的基础，那就是托洛茨基派，是我们支部，是我们的国际奠定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又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对共产党基层，对进行民族主义革命或者受这革命影响的各种派别的基层施以真正的影响的基础是存在着的。

当巴西这样的事件产生并且立即引起这样巨大的反响的时候，决不可以把它看成是独一无二的事例。在庇隆时期，当1955年底隆出走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一个过程。在方式方面甚至还有某些类似之处。不同的是现在有一个布里佐拉，而庇隆运动那时没有。我们相信——我们要强调——布里佐拉曾经想战斗。这就是古拉特和布里佐拉之间的区别。布里佐拉在最后时刻发出的呼吁并不是哗众取宠。这是一个将在明天产生回响的呼吁。它在发出的时候原来也是可以产生回响的。当1955年底隆出走时，殖民地革命过程的形势和发展水平远不及今日。特别是那时没有这样一个古巴！而在整个拉丁美洲，当时没有今天这样高的革命发展程度。我们认为反革命的胜利是暂时的，这就是根据之一——这些根据我们都已经阐明过了。使这个胜利得以维持下去的客观社会基础，无论在巴西和在世界范围都不存在，也不存在使这个胜利得以维持下去的政治和军事基础。

今天，我们有着使革命运动在巴西再起的有利得多的条件。可能性比以前大得多。因此，革命运动失败和再起之间这个阶段将比庇隆时期短得多。不应该忘记，当时庇隆倒台了，群众曾进行

抵抗。而群众的抵抗曾阻止了軍事独裁的建立。尽管巴西的群众缺乏一种传统，不象在阿根廷那样曾经在工会运动有組織的过程中得到过发展，尽管巴西农民的力量虽比阿根廷为大而没有集中到一个組織里去，也缺乏有組織的力量，尽管由于群众缺乏政治生活和政治組織致使集中的陆海軍士兵对他們无法产生政治影响，也尽管那些有势力的敌对分子使群众不能根据經驗、通过組織得出比較重大的結論，但是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的总的革命过程很快就將帮助群众得出下列概括的結論：合法方式是不够的，必須用革命方式来加强，拿起武器，組織革命机构，組織工人民兵，組織工农兵統一战綫，此外，控制主要生产資源，控制資本主义經濟金融决策中心和經濟机构，并取消資產階級政权。

共产党却竭力压制这一切，它起着反革命的作用。它具体地担负着反革命的任务！这是因为，今天应该做的事情，并不是来解释用議會方式取得合法的成果，取得一系列果实的可能性。用不着去討論是否有可能取得什么东西。应该討論的是巴西說明什么问题！巴西的事件說明，法律范围的、合法的斗争成果，通过議會制度取得的成果，都是很有限的。当他們把从資產階級民主的議會制度中还能取得巨大的斗争成果这一事实当作中心問題提出来的时候，他們就是混淆視听、設置障碍、阻止群众从每一阶段中吸取經驗的主要代理人。而这就是一种反革命作用。

資產階級为了它自身的利益，也在作出这些結論，采取相应的行动。共产党是压制群众的軸心。布里佐拉要求的却是別的东西。他号召人們武装起来，手执武器投身战斗。与此相反，共产党却号召压制武装斗争。这在客观上是一种反革命的作用，不仅如此，这还是有意識的反革命的作用，因为共产党竭力爭取群众走这条“合法的”道路。它竭力压制群众，要他們跟資產階級議會民主

妥协，向它屈服。这就是我們各支部在现阶段决定方向时应该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

应该不断地、經常地进行澄清工作。不是去攻击共产党，也不是参加論战，而是进行这种分析，进行这种全面的分析，肯定巴西事件的結論。

这些結論的另一方面就是，巴西这一过程是在沒有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的条件下导致这样的情况的。巴西跟古巴不同，問題不是到游击战中去寻找解决办法。很明显，如果按照布里佐拉原先的决定，情形可能有所不同。不过，也很明显，当时沒有时间这样去做。布里佐拉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享有充分的权威，足以取得进展的，只是缺乏时间。在这个运动还没有組織起来、巩固起来以前，反革命就行动起来了。布里佐拉的反应表明他的行动并不是为了嘩众取寵。我們看到他投入斗争。时间如果比較充分，他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会組織起来，大大往前推进的。当时很明显，反革命要来。我們全都預見到这一着。我們沒有能預見到的是反革命爆发的时刻。不过当时就很清楚，最后两星期，特别是最后四天是决定性的日子。反革命势力看到事态要脱离他們的掌握，就要在一个中心点上行动起来，那就是軍士會議。这是把軍士集結起来动手的一个中心。

无论如何，反革命势力成功的基础就在于军队，作为一个机构，作为一个組織，不曾被对方爭取过去。军队是一种国家設施。而作为国家設施，那就犹如不可能爭取资产阶级国家，而应该摧毁资产阶级国家一样，军队也是不能被爭取的。但是可以爭取其一部分。譬如我們可以爭取众議院的多数，但要使资本主义尊重这个多数，就必须夺取政权，摧毁議會。它們是资本主义的机关。

这是很清楚的。因此，在大多数我們掌握情况的国家中，在共

产党、社会党、民族主义运动中，目前正发生一个内部分化，对巴西事件的結論进行大爭論的重要过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反革命尽管可以胜利，但从世界形勢的整体出发，群众依然可以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現在已經不是这样一个打击就意味着后退一步的阶段了。現在不是西班牙了。当年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失敗曾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在这里，失敗被看成是取得一次經驗，結論跟西班牙当年完全不同。人們正在准备新的前进。連政变分子他們也在談論这一点。由于群众并没有被击潰，政变分子中間的危机依然存在。这表明革命的世界統一性。

虽然共产党采取了否认和掩飾这些結論的态度，可是那也枉然。存在着革命的永久性的世界过程，一个地方的失敗立即就毫不延迟地从世界另一地区的胜利中得到弥补。巴西这次事件刚刚結束，玻利維亞和智利就出現革命形勢。在玻利維亞，那倒不是什么新鮮事了。雷欽党内发生的决裂是为了重新集結力量而向左进行的。至于在智利，罢工富有战斗性，十分坚决。

共产党說什么挑衅分子焚毀了小汽車和公共汽車等等。應該揭露他們这种反革命的态度。焚毀汽車的是工人，是小資产者，是職員，他們就这样来表示他們斗爭的意志，表示他們斗爭的决心。在拉丁美洲，智利人民是有着焚毀公共汽車和电車的傳統的。当然，这种斗爭形式不是最好的斗爭形式，因为最好的斗爭形式是剝夺企业，占領工厂，强制进行工人管理。然而那些組織不向群众发出这样的指示，所以群众只好自发地上街行动，以表示他們深刻的不滿情緒，燒毀他們看到的資本主义所有的一切东西。这是他們表示不滿情緒的一种方式。这也不是什么新鮮事儿，在智利由来已久了。在每次大規模罢工中，他們总是不让一辆公共汽車留在街上的。这里存在着一个直接的原因。群众并不是无缘无故地破

坏公共汽車和小汽車，而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是打擊他們的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公共汽車車費高，又要不得。原來設計坐二三十個人，可是得裝七八十個，擠得要命，又沒有門窗。居民為了發泄他們的不滿情緒，砸碎這些公共汽車和大議員們的小汽車。這是一種抗議的方式，因為還沒有別的方式可以採用。如果工會和政黨的領導能夠組織奪取政權的鬥爭，群眾是會參加的。群眾有堅決的實際精神，足以理解什么事情是最好的。

共產黨的這種反革命立場被他們支持合法的和平道路的外表掩蓋起來了。可是正是在今天，不去從巴西這樣清楚顯著的形勢中得出這種合法道路已經破產的結論，不去得出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的合法途徑這種“和平共處”政策已經破產的結論，那就是為反革命服務，那就是充當反革命。那就是壓制群眾，不把他們引向他們應該記住的最明白無誤的經驗。共產黨人說：“列寧這樣說。”今天必須說清楚，列寧從來沒有說過應該把和平途徑或者合法途徑看成是唯一無二的中心，而是說所有那些通過合法鬥爭取得的成果，跟一切議會行動或者民主行動一樣，都不過是對打倒資本主義政權的鬥爭的一種支援，而是說必須以群眾示威、雙重政權、占領工廠、工人控制、剝奪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來加強這些從資產階級民主的議會鬥爭中取得的成果。列寧就是這樣說的！請共產黨的活動家們讀讀列寧的著作吧。請共產黨的領導人把列寧談資產階級民主道路的文章拿出來給大家看一看。列寧在談資產階級民主鬥爭的時候，不是把它看成是目的本身，而是把它看成是某一時期鬥爭的中心。也就是說，就某一時期而言，資產階級民主鬥爭形式是主要的。而我們現在是1964年，不是1905年。在1964年以前，在巴西會出現過政權掌握在群眾手中的局面。號召群眾奪取政權，組織工農民兵，這就是打倒資本主義。正因為這樣，跟民族

資產階級相联系的古拉特就沒有向群众发出号召，沒有号召軍隊參加斗争。因为他看到群众超出运动的資產階級性质，看到群众夺取政权的危險。从这个意义來說，共产党的态度是双倍罪惡的，因为它事先不把巴西无產階級不可能作为独立組織而行动这种錯誤論調的涵义告訴它的活动家，事后又不跟他們一起总结这方面的經驗教訓。

无產階級缺乏独立的行动，是使具有高度斗争精神和革命決心的陆海軍士兵屈从于資產階級領導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无產階級能以它独立的行动参与运动，它是可以把陆海軍士兵吸引过来的。巴西的事件就應該这样来分析。这是分析巴西事件應該采取的方式。

当美国帝国主义指揮下的巴西反革命势力掌握政权的时候，赫魯曉夫在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論战，吹捧肯尼迪和約翰遜这两个美国帝国主义的头子、巴西和全世界反革命势力的組織者。共产党掩飾它是巴西反革命势力暂时胜利的主要負責者。

巴西和全世界共产党的基层单位、同情者、工人活动家正在評判共产党的路綫和政策，从中得出批判性的結論。他們清楚地感觉到和看到，共处、妥协、改良政策又一次表現了彻底的破产。他們看到和感觉到，繼續留在資產階級民主的議會合法斗争的圈子里就导致对資產階級領導的投降。巴西共产党无条件地支持古拉特。

古拉特曾經贏得他在群众中的影响，把自己表現得好像是穷人之友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領袖，推进了某些經濟发展和基本改革的措施，从而把資本主义所有制推广到小农經濟，采取了某些民族經濟的措施。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巴西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他曾寻求无產階級的支持，因为他沒有別的基础可以依靠来推进这

些打击帝国主义的措施，然而这也是为了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利益。

古拉特曾经依靠群众来发展他自己的道路，然而这不是由于他的能力，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纲领，也不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而是由于共产党不能作为群众的革命的、阶级的政党而得到发展。拉丁美洲群众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派别之所以得以发展——如古拉特和布里佐拉，那是因为共产党在社会革命发展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中，被一部分群众抛弃了的缘故。共产党那些追求资本主义改良，同资本主义结成联盟，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政策、纲领和目标，只能起使它们自身解体的作用。

巴西和整个拉丁美洲共产党的破产

在巴西，共产党在1946年曾得到六十万张选票。按单纯的数字增长，它在1964年应该得六百万票，成为巴西人民压倒多数的代表。在阿根廷，共产党曾被庇隆主义这个民族资产阶级运动击退。庇隆的群众试图通过支持庇隆来打倒资本主义。在乌拉圭，共产党在1946年曾得三万多票。按单纯的数字增长和阶级影响来推算，它应该变成最大、最有社会力量的政党。然而它现在却是一个连工人阶级十分之一的支持都得不到的小党。百分之八十的乌拉圭无产阶级依然受白色的或带色的资产阶级政党（乌拉圭资产阶级政党有白党红党之分，各有几派。——译者）的影响，投它们的票。在罢工和其他阶级行动中，无产阶级为阶级利益所驱，反对白色的或带色的资产阶级政党，但是既不跟着共产党走，也不投它的票。在智利，社会党跟共产党势均力敌，甚至还超过共产党。

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巴西共产党的停滞、后退和解体，是使民族资产阶级组织起来，发展起来，并对工人阶级以及贫苦和中等的

小資產階級產生影響的主要原因之一。

巴西反革命勢力的暫時勝利並不表明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對工人階級的力量占有優勢，而是表明資產階級領導的民族主義運動的破產，共產黨對資本主義妥協、跟它聯盟的改良主義政策、綱領和目標的破產，也就是和平共處的破產。反革命的這一勝利又一次肯定了有必要把爭取民主要求、工會和政治權利的鬥爭，跟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工农聯盟、成立工农政權的鬥爭的目標和革命綱領結合起來。

巴西事件的另一個根本結論，就是無產階級有必要保有它自己的組織，提出自己的口號，提出自己階級的革命目標，從事獨立的行動，以便不受資產階級領導（不僅是古拉特，也包括布里佐拉）提出的口號和綱領的限制。如果無產階級帶着它自己的綱領和它自己的革命政黨組織了起來，就不至於由於資產階級的恐嚇、膽怯和資本主義的階級意識而裹足不前。無產階級原是有可能走得更遠，把農民帶動起來的。它原本可能號召農民和士兵參加鬥爭。它原本可能把他們發動起來，在革命的領導下，爭取實現推翻資產階級政權這一目標，使“基本改革”得以付諸實施。結論就是這樣。

布里佐拉的局限性是很明顯的。因為直到現在，他還沒有行動起來。但是他說：“我們當時缺乏一個組織。”他不認識無產階級獨立的作用。不過這也是很合邏輯的事情。除了我們以外，誰也不能在這個問題上開導他、教育他。共產黨對這毫無興趣。因此，也不能把這一點看成是落后或抗拒。他缺乏認識。從他全部活動來看，布里佐拉是個革命者。見過他的人都說他是一個行動的人，一個果斷的行動的人，勇往直前，不肯認輸。可能他感覺到了革命。他的聲明是一個感覺自己是戰勝者的人的聲明，而不是一個感覺自己是被擊潰者的人的聲明。因此必須大大強調無產階級的

独立作用。独立并不仅仅意味着有同资产阶级分离的组织，象共产党人那样。共产党人心目中的独立行动就是无产阶级有自己的工会组织，不要雇主参加。你不能有自己的工会，却执行资产阶级政府或者资产阶级的政策。组织独立意味着要有阶级的纲领，有阶级斗争的方法和目标。共产党人说：“应该监视敌人。”你监视帝国主义，举行举行游行示威，帝国主义才不在乎呢。敌人要是看不到无产阶级的武装行动，它是不会感到自己孤立的。当游行示威达到这样一个水平而不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游行示威也就不会进展。这是应该得出的结论之一。当你达到这样一个限度的时候，那就已经不可能只是威胁威胁，开开会就行了。必须行动起来，必须进行剥夺。按照古拉特3月31日达到的水平，那就已经必须转入剥夺资产阶级，取消资产阶级政权，否则就必然是死路一条。所以猩猩派说：“如果我们再晚四天动手，我们就完蛋了。”他们看出，虽然古拉特不下命令，群众就要自己行动起来了。这个反叛，开始是一千五百名下级军官，可能就会蔓延到全国，波及兵士，他们可能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和政权。到了这样一个水平，要不采取反资本主义的剥夺措施，要不把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双重政权从组织上具体化起来，那就不可能再前进一步。这是主要的结论。

资产阶级立即作出了这个结论。2日或者3日，有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在看电视的时候说：“咱们别乐了，还是谈谈巴西的事儿吧，刚发生的事情是一次1905年。”不错，是1905年，然而用不着再过十二年就将是又一个1917年。

而共产党却掩饰这个结论。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个结论。共产党的领导成员跟资产阶级一样，也知道这个结论。然而他们必须对他们的基层组织掩盖这个结论，免得他们受革命的影响。本来么，这是一个“和平共处”的问题。和平共处不仅指苏联官僚主

义統治和約翰遜之間的協議，同時也指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之間的关系。是和平道路还是革命道路——問題就在这里。應該總結一下，巴西事件到底意味着什么？它雄辯地表明和平道路的彻底破产，表明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极度有限。在目前阶段，資產階級和資本主义不能容忍对土地所有制、对生产、对所有制、对分配制的任何严重的改革——我們說的是改革而不是剝奪。不，資本主义对什么也不能容忍！因为它感觉到自己的衰弱。因此它用反革命手段来保卫自己。要維持古拉特的小小的改革綱領，就必須革命。这是應該得出的結論。这是对各国都适用的結論。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不这样做，却号召加倍努力，提高警惕，監視敌人，实现团结。团结起来干什么？起来斗争？怎样斗争？警惕敌人？什么叫警惕敌人？瞪眼瞧着他行动？对敌人，瞧着他是没有什麼用处的，对他嚷嚷也是沒有什麼用处的。如果工人不武装起来，沒有夺取政权的决心，不去占領工厂，沒有革命綱領，光是游游行示威，階級敌人、帝国主义和各国資產階級是不大在乎的。

資產階級在武装起来，进行准备。他們沒有別的出路，只能这样准备。巴西事件的結論并不是要号召随便什麼“团结”，而是要号召爭取剝奪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的团结。缺乏階級綱領的团结毫无意义，它对敌人有利，因为这种团结欺騙工人階級，使它不能从事件中得出結論。缺乏斗争精神、缺乏斗争綱領的团结对敌人有利，因为它阻碍群众进行斗争，阻碍他們从統一行动中取得剝奪資產階級的全部利益。

包括剝奪帝国主义和資產階級、工人管理、工厂委员会、工农兵委员会、工农兵联盟、工农政府这样的綱領的团结，那才是团结。把基础建筑在和平共处的前景或者單純的宣言声明上，而不是建筑在群众动员上的任何非临时性或非局部問題的团结，都对階級

敌人有利。共产党搞的就是这种团结。它们起着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作用。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从形势中得出它们自己的结论，它们对革命结论的总结毫无兴趣。

列宁在每次重大事件以后，总是作出每个阶段、每个事实的正确的客观的结论。列宁在1905革命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革命还没有成熟，有必要为建立工农联盟和工农政府而进行准备，必须为此而重新武装起来。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胜利了。可是我们今天1964年。列宁的这个经验正在巨大的规模上重复着。当象巴西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时候，那就说明今天世界处在革命形势之中。整个拉丁美洲在革命。资本主义除了进行反革命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维持它的统治地位。这次反革命政变表明，任何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府，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支持，没有群众革命行动的支持，都不能抵挡反革命势力，只能投降。古拉特不经斗争就退让了。因为，发动斗争就意味着他不能控制斗争。他宁可让他的敌人掌握政权，也不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虽然他曾经有意进行一些改良，实施一系列有利于群众的特殊的经济改革——不过这也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反革命的胜利是暂时的

目前这种形势是在对革命十分有利的特定时刻中发展的。出现了大失败。拉丁美洲的革命在巴西遭到了打击。然而群众并没有失败的感觉，因为他们并没有参加斗争。不过这毕竟是对群众的一个打击，因为它使阶级敌人有可能发动一次它正在发动的大反动，进行大规模逮捕，对民主自由进行迫害。这显然是对群众的一个打击。然而群众并没有失败的感觉，因为他们并没有参加斗争。没有人号召他们参加斗争。然而他们在遭受资产阶级和小资

产阶级领导失败所产生的后果。这些后果——我们认为是一时的——将产生重大的效果，因为它们将鼓励反动政权。它们将鼓励帝国主义利用巴西形势，来把这哪怕是暂时的胜利扩展到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他们尤其将组织起来对付古巴，然而从社会观点来看，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在在世界范围都处在不利条件下。它们没有巩固的立足点。

帝国主义、巴西和全世界资产阶级，将竭力从这次反革命军事政变的暂时成功中得到好处。然而它们缺乏把这成功长期维持下去的历史的和具体的条件。代表世界资本主义总的思想的资产阶级报刊，纷纷起来进行批评，试图把这次反革命政变的反动的社会经济后果抑制在一定范围，因为帝国主义害怕群众的反应，它感觉自己不够巩固，没有力量来依靠这次反革命的暂时成功，在拉丁美洲和全世界掀起一个加剧这种形势的运动。帝国主义看不到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可能性。与此相反，它害怕。要不然的话，帝国主义者就会怂恿巴西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更进一步，他们就会号召其他国家的反动派效法巴西的榜样。他们是很乐意这样做的，但是他们没有胆量公开说出来，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有把握。富布赖特的演说反映了世界资产阶级这种心情。巴西反革命胜利两天后，他说美国政府应该花更多的钱来提高拉丁美洲群众的生活水平，以便遏制共产主义，同时在冷战中少花些钱。富布赖特的这些考虑固然是凭借苏联和全世界各共产党赫鲁晓夫之流向帝国主义伸出来的友谊之手，但是，归根结蒂，这些考虑也是从悲观主义和失败情绪出发的，而反革命的和平共处政策却不允许别人利用帝国主义的悲观主义和失败情绪来更好地埋葬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人民群众的阶级敌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现阶段不能利

用巴西群众遭到的这样严重的失败，因为力量对比的历史的、客观的、具体的条件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主要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有没有参加斗争，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力量对比对资本主义不利。这是第一个有利的结论。巴拿马也是世界力量对比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和苏联之间的争吵也是一个组成部分。

中苏危机是永久革命的一部分。中苏危机和中国人批评苏联人和平共处的态度是有利于世界革命的力量的一部分。如果不是这样，资产阶级就可能利用那些事件。

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当工人阶级利用它在自己前进道路中的失败，不因失败而瘫痪，却继续前进，那么有些失败无疑会转变成为胜利。从而可以看出，考虑工人阶级在遭到挫折时是否瘫痪下来，该是多么重要。然而巴西的工人阶级却并没有瘫痪。当然，他们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因为阶级敌人正是神气活现，宣布镇压法令，控制国家机器，准备进攻工会。可是，工人阶级并没有瘫痪。

西班牙革命失败的例子同这次事件毫无共同之处。在西班牙，工人阶级在革命前就瘫痪了很多年了。危地马拉也是一样。从此可以看出我们现在应该进行干预这个结论是多么重要。另外一个结论是：共产党内部的危机正日益加剧，而现在必须进行干预。在力量对比方面有两个重要因素。妨碍群众前进的是哪一个因素呢？一方面是共产党的政策，另一方面是沉醉于合法手段、沉醉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斗争的那些民族主义党派的政策，它们都麻痹或者限制运动。当这种政策遭到如此重大的打击的时候，就出现对我们有利的结论。资本主义当然立即得到一些好处。然而由于群众没有别的办法取得经验，他们也就从中得到好处。并不存在工人阶级失败、后退、崩溃的条件。后退决不意味着失败。我说

的是后退而不是失败。后退和失败是两回事。后退有时候是失败，有时候却不是。在巴西这个情况，后退和失败都有。这一次工人阶级严重地后退了，也失败了，因为阶级敌人巩固了他们的政权。工人阶级之所以后退，那是因为它原来抱着站在古拉特背后有可能向前进的幻想。

这些是行将在下一阶段在政治斗争中起作用的重要因素。阻碍革命斗争向前发展的障碍来自共产党，来自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领导。障碍就在这里。富布赖特抓住了这点，他说：“应该信任赫鲁晓夫，他是一个真诚而诚实的人。让我们跟他接近吧。”这对那些人是一个惨重的打击。由此可见中国人进行干预的重要性。他们所施的打击虽然有限，而且具有相当的机会主义色彩，但是毕竟进行干预了。他们就这样在促进事态的发展，有助于对同资产阶级妥协、一味争取资本主义改革、屈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些有害政策作出结论。这些都是最重要的结论，我们在谈智利问题的时候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那时候说，不应该等待选举。应该组织游击小组，使它们现在就起作用。今天就应该占领工厂。我们说，游击小组不能保证胜利，但是足以为胜利准备条件。不应该提出什么选举胜利以后群众就可以掌握政权这样的保证。不！选举只是革命斗争的一个方面，而且不是主要的方面。在智利现在这样的情况，选举是一个有决定性的重要方面。然而如果选举斗争没有议会以外、选举以外的行动相配合，那将产生跟巴西同样的事情。再说一遍，跟巴西同样的事情。在组织和在主动权方面的优势将在阶级敌人那一边。这些是最重要的结论。

既然资产阶级面前再也没有一个历史时期可以度过，这种优势显然只是相对的东西。不过革命的任何停顿总是一件对它有利的事情。原子战争也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既然资本

主义怎么样也将失败，推延时日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么我們就会让它推行它的政策。不。不。要是我們不干预，要是我們不有意識地进行干预，从群众的經驗中得出結論，資本主义就会取得生存下去、进行打击的时间，就会变得更加凶暴。此外，对資本主义来說，利用和平共处来延續生命，那就意味着利用机会、利用形勢来进行打击，使革命的世界进程后退。

一个象在玻利維亞和智利将要取得的那样的胜利，对群众来說，就意味着一个即时的鼓舞，鼓舞他們利用他們自己在現阶段取得的一切經驗。他們已經看到，有必要把自己組織起来。特别是巴西的无产階級已經看到爭取自己的階級組織的必要性了。而这将在下一阶段起极大的推动作用，推动他們以无产階級为基础，領導軍隊中的士兵。士兵本身不能是革命的領導力量。他們的行动不会是階級的行动、革命的行动。我們在一篇文章里已經說过，如果士兵不能及时受到无产階級行动的影响，他們就会迷失方向，因为他們沒有自身的階級目标。我們在两篇文章里都說过这样的话。我們也曾強調指出，无产階級應該掌握領導，應該爭取时间。資产階級却先这样做了。我們早就看清楚，如果无产階級不能及时影响士兵，它就不能有所行动，因为資产階級領導人会压制他們的行动。士兵是不会有自己的階級目标的。这将是下一阶段的事情。尽管目前存在着插曲式的失败，群众暂时遭到打击，但是阿根廷、智利——特别是智利——的革命过程将把巴西的群众重新向前推进，使他們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无产階級冲击的基础上重新組織他們的行动。

然而，与此同时，有一件重大事件帮助群众弥补他們遭受的这个暂时打击。那就是中苏危机。等到这个危机进一步公开的时候，它无疑将迫使中国人把他們的政策更向左轉。这并不是說中

國人將採取一條在每一點上都是革命的路綫，然而這將是使他們更向左轉的一個壓力。中蘇論戰正達到更高的水平，成了幾乎是完全公開的危機，雙方的譴責十分尖銳。在這場論戰中，很難后退一步。這表明世界永久革命不能后退。革命在這裡或者那裡的一個國家遭到的打擊，並不意味着資本主義制度和世界資本主義的穩定和鞏固。中蘇危機就是這個結論的一個組成部分。資本主義穩定的主要因素是共產黨和赫魯曉夫的世界反革命政策。因此，中蘇危機就是世界革命永久過程中的一個直接因素。

中蘇危機肯定將以巨大的力量，在全世界影響革命傾向的發展。它將是把世界群眾投入革命鬥爭的巨大推動力。雖然中國人並不以十分堅決和公開的態度號召每個國家進行革命，但是他們將不得不趨向於同世界殖民地革命結成聯盟，在世界範圍同革命派別——其中包括第四國際托洛茨基派拉丁美洲局——結成聯盟。我們第四國際號召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這是實現革命的唯一可能道路），反對和平共處，反對對裁軍的幻想。最近階段中國人的綱領中有兩個問題比以往更加接近我們的路綫。在這兩個問題上，他們過去跟我們的距離是相當遠的，而這兩個問題却是極端重要的問題：一個是和平共處，一個是裁軍。中國人的態度中含有妥協的傾向，尋求資本主義國家的承認。然而他們將不再能長期這樣行動下去，因為在反蘇聯官僚主義統治的鬥爭中，他們將發現他們不得不採取——至少是在口頭上——抬高革命路綫的立場。

中國人在兩點上提高了政治認識：一是關於和平共處——它越來越不是共處了，一是關於裁軍。這是對他們的政策的一種糾正。在今天以前，他們說裁軍是可能實現的事情，而現在說要殖民地國家武裝起來，要資本主義國家解除武裝。這是明朗得多，公開得多的保卫殖民地革命的態度。這種態度雖然不是巴西群眾所受

暂时打击的对症下药的补偿，却是世界永久革命过程中力量对比的及时补偿。巴西事件是对共产党、对共产党的反革命政策、也是对群众的打击。然而它不会导致群众的长期失败，因为存在着拉丁美洲和全世界革命的过程，存在着共产党的危机，存在着中国人政策向左转的必然性。

鉴于以上这一切，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全世界试验进行一个有计划的行动，来统一对共产党反革命政策的分析和结论，来统一安排争取共产党基层组织参加推动拉美和世界革命的统一战线的行动。我们认为有必要号召它们的基层组织进行斗争，从下面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那就是：和平共处、合法道路、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纲领十分有局限性；巴西事件表明有必要在拉丁美洲范围内准备和发展民兵和武装小组，有必要争取军队的重要部门，然而这应该通过无产阶级和群众的独立行动，按照不依附于资产阶级行动的反帝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纲领和目标来行动。决不可以紧紧跟在资产阶级领导屁股后面，否则无产阶级和群众就要陷于瘫痪。这就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结论。

资产阶级在它同工农兵的关系上，总是竭力维持对他们的控制。然而这也并不排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党派有时试图调整资产阶级和群众的关系，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以便在改革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例如正在墨西哥发生的那种情况，那里正在进行改革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运动，分配土地，创造维持资本主义的更良好的条件。当资产阶级能维持它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控制时，它也求助于工人阶级的支持。当它感觉到可能失去这种政治控制时，它就对这种支持不感兴趣，就转过来反对工人阶级。这在巴西是很明显的。这种例子还会重复发生，不会是独一无二的例子。

巴西当前的斗争任务

在巴西，现在应该为争取民主要求、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和工会权利而斗争。但是这应该同时有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与之配合，无产阶级应该提出驱逐及剥夺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机构的纲领。在这方面，双重政权的机构是很重要的。有一点是十分清楚、明白无误的，那就是巴西人完全缺乏建立双重政权的意识。士兵的行动、拿起武器夺取土地的农民的行动都是双重政权的行动，但是缺乏有意识的双重政权机构。归根结蒂，决定形势的是有意识的机构，它们可以动员、集中和领导人民，可以成为组织和领导的中心。

在巴西，双重政权机构是以经验主义的、十足经验主义的方式行事的。当士兵迫使某一部长辞职、使军官的命令无效、要求释放由于进行工会活动而被捕的水兵和军士、迫使政府承认他们的工会的时候，他们是双重政权的机构，然而是有其局限性的机构。他们的行动是十分经验主义的，是片面的。他们不是根据一个中心，根据无产阶级的统一纲领而行动。因此，他们的行动是软弱的，得不到有力的响应。海陆军将领所以占士兵的上风，就因为士兵们的行动是经验主义的、局部的、直接同资产阶级机构相联系的。他们没有同无产阶级、同他们自己的阶级联系起来。问题就在这里。这些双重政权的行动没有象在玻利维亚那样建立在双重政权机构的基础上。在玻利维亚存在着同阶级相联系的双重政权机构，帝国主义因而未能把国有化工厂恢复为私有企业。这是共产党人拒绝教给工人阶级的一个经验。他们对得出这些结论不感兴趣。他们为了反革命的意图而掩盖这些结论。在每一事件中，党的责任就在于得出革命的结论，指导下一阶段的行动。革命的结论就是

要武装群众来推翻资本主义，而不是同资本主义妥协。

在下一阶段，巴西和整个拉丁美洲——特别是巴西——的问题是应该使双重政权的机构在已经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上行动起来。农民已经有了武装起来占领土地的经验。士兵已经有了组织工会的经验。既然他们应该组织工会，那么谁也不会把他们这个经验抢走。有个海军上将现在说，应该改善海军中的不良的管理和待遇，力图消除那些驱使水兵组织工会、提出要求的因素。此外，还有这样一个事实，水兵组织工会，并不只是因为海军中的不良待遇。他们的要求并不只是海军的要求。陆军士兵的行动比海军走得更远些。他们是根据人民的要求而行动的。他们跟群众有共同的利益，那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反对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因此，他们感到了群众的影响。

事实上，巴西最严重的落后是无产阶级的落后。无产阶级组织得最不好，最没有深入斗争。我们在前面说过，无产阶级没有深入斗争，因为它事先没有组织好。它缺乏有组织阶级的生活。它不控制工会。在各部門各行业都没有工会的中心机构。因此无产阶级缺乏有组织阶级的生活，使它不能在无论有无号召的情况下及时采取相应的行动。

阿根廷的无产阶级却是这样行动了的。庇隆刚倒台，无产阶级就动员起来了。当然，当他们看到一切都已完结的时候，他们反应得晚了一些，因为他们直到最后时刻还寄希望于他们的领导。当无产阶级看到他们的领导不号召他们斗争的时候，他们就自己投身进去。在巴西，无产阶级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投入斗争，正是因为它事先没有组织起来，没有组织好的力量。而工会领导又完全依靠一些小工业部門和人数不多的小组。因此，巴西当前的任务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工会，以便在下一阶段建立真正的双重政

权机构的主要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下一阶段重要的是要进行一系列的斗争、权利要求、争取工会民主权利、争取政治权利、新闻自由等，这些斗争都应该同驱逐帝国主义、争取释放政治犯和被捕的工会会员及干部、没收帝国主义企业、没收大领主土地、没收大工厂等紧密结合起来。这些争取无产阶级民主权利的斗争同时应该跟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等级工资制、等级劳动工时制、计划就业、计划经济、对外贸易的独占。不过这些还不是当前应该提出的口号。当前应该提出的口号是争取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工会权利、整个工人运动工会组织的统一、保卫一切斗争成果、维护工会的斗争成果（包括保卫士兵的斗争成果）、等级劳动工时制、保卫国有化企业、帝国主义滚出去。这些就是主要口号。随着无产阶级占领更多阵地，应该添上反资本主义的口号，如工人管理企业、对外贸易独占、没收大中资本主义企业、争取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工农政府。这些就是从巴西反革命势力的暂时胜利中应该得出的结论。

1964年4月5日

（译自法文版《共产主义斗争》1964年5月号）

四二、美帝国主义对越南北方罪恶 的軍事鎮压和美洲国家組織 反对古巴的決議

波薩达斯

美帝国主义对越南北方的进攻，不是一个由于面临越南北方的假設的或真正的进攻而作出的毫无准备的行动，或是一个突然的、意外的反作用行动。这是一个預定計劃，它的最終目的是把战争扩大到越南北方，以便接近中国国境，因为这是美帝国主义抑制、破坏和阻擋东南亚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唯一办法。

如果帝国主义有其他办法来阻抑革命的发展的話，那么它就会利用它。例如举行群众集会等等。不久以前，古巴政府在古巴圣地亚哥举行了十五万人的示威。过去和无论何时都会有上百万人的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帝国主义为什么不組織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呢？如果帝国主义具有社会和政治力量及威信来号召人民的話，它也会这样去做的。但它应用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来保卫資本家、大地主、杀人犯和軍人独裁的南越西貢政府，而以派遣大批軍隊代替示威游行。它計劃派出一万六千人，其中五千人目前已启程开往南越。如果帝国主义准备侵略并把战争扩大到越南北方，这不是由于要反击共产党舰艇的假想的或真正的进攻的結果，而是因为它企图挽救南越崩潰和阻止南越完全落入革命的手中。

南越近在眼前的失敗，意味着整个东南亚会受革命的影响和革命的扩大。整个东南亚的革命，就意味着革命会扩大到馬來亞、

日本、印度和所有的国家。因此英帝国主义是无条件地支持美帝国主义的。这是一个矛盾的态度。在某些地区，例如在古巴，英帝国主义试图在表面上采取超然态度、主张尊重人民主权和意志，它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对它毫无损失。即使它可以设法做交易，可是它一点也没有能起作用的手段。相反，它在东南亚就不能这样。它在马来亚、在大洋洲已经挨打，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婆罗洲它也正处于危机之中。还在英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其他地区，它也都面临着危险。它所剩下的极少的地盘都受到了威胁。因此，英帝国主义不能讨价还价而成为美帝国主义的伙伴。

戴高乐的比较“超然”、比较“客观”、不是无条件地支持美国的态度是由于他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任何好处而决定的。相反地，他如果保持中立，他就能在贸易上捞一把，就能削弱美帝国主义和英帝国主义的优势地位，就能使他重新回到南越进行活动。他想把通过革命失去的东西，通过做生意从贸易上捞回来。由此可见，戴高乐承认中国工人国家，完全基于要利用美帝国主义在贸易上和政治上的削弱而想在贸易上争得一些地盘，因为他要争得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地盘是不可能的。几个月来，美帝国主义的态度已可预见。美国舰队在东京湾巡逻是真正的挑衅。在一般情况下，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允许别人面对它们的海岸演习。任何人都不允许这样作。为什么美帝国主义不把它们舰队行驶的方向面对苏联呢？或者面对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呢？虽然问题发生在公海，但离海岸只有二、三哩，这是真正的挑衅。他们在那里处于战斗状态。例如，中国舰艇可能到印度支那进行访问，这是一回事，美帝国主义舰艇到印度支那去，却是另一回事。美国把舰艇面对着印度支那巡逻，其目的只能是侵略、威胁、施加压力和恫吓。它不可能有其他的理由。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是符合逻辑的：它侵

犯了法律上显然属于越南北方的領海，并击沉了几支快艇。根据越南北方行动的一切迹象来看，它并没有击沉美国舰艇，而仅仅向它发出了警告。如果越南北方有军事能力击落美国的五架战斗机，它也同样有能力击沉他們的舰艇。它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它願意只采取警告行动。假使越南北方炮击美国舰艇而不是发出警告，（他們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美帝国主义的态度，它的舰艇的态度，也是在进行恫吓和威胁。而且很可能这完全是美国人捏造的，以便在世界輿論面前，尤其在北美輿論面前证明他們的行动是有理由的。他們也要向他們的北大西洋公約同盟者和支持他們的人提供理由。事情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但实际上，越南北方方面采取的行动一点也不关重要，美国人正千方百计在寻找借口进行侵略。

和平共处的失敗和資本主义的战争政策

从基本上来看这种形势，不能仅仅看到美国的进攻，而必須衡量整个資本主义世界的态度。这里关系到的是和平共处是否有效和先发制人的战争是否正当。这件事說明和平共处显然是十分荒唐的，是沒有任何价值的。帝国主义不可能接受和平共处。它在寻找时机发动进攻和侵略，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全世界的輿論，特别是共产党的报刊都把矛头指向美帝国主义。毫无疑问，它是侵略者。但这涉及資本主义的普遍政策。这不是美国发动的第一次侵略。为了侵略古巴，它曾在猪湾登陆。美国还准备了其他方式的侵略，但在1962年封鎖时期遭到了失敗。不久以前，英国人在婆罗洲和也門也干了同样的勾当。他們轰炸了马来亚。法帝国主义不久以前轰炸了并以武力占領了加蓬。不久前他們和英国人一起轰炸了苏伊士。这就是世界資本主义对它們最强大的代

表——美帝国主义的响应。美、英、法、荷帝国主义必须采取这种政策。它们在社会方面、经济方面都没有任何可能使人相信和支持它们的帝国主义利益的东西。它们只能诉诸武力。这就是这次进攻所说明的一切。这次进攻如果不发生在今天，也将发生在一星期、一个月、两个月以后。美国人不可能干出其他事情。他们不可能用和平方式抑制南越的革命，也不可能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他们也无法说服群众放弃革命。他们只能使用武力来镇压群众。这里同美帝国主义毫不相干。这是一个远离美国数千公里的地区。

如果美国不得不派出一支拥有四万人的军队，一个舰队和若干空军师，那是因为它缺少人民的支持。因此它只有使用士兵和大炮。它之所以在那里保持它的士兵和武器，那是因为它不能抑制革命，无法采取主动的攻势，这同古巴的情况同样地是十分明显的。它没有在古巴问题上走得更远，那是因为没有发生拉丁美洲广大群众的反抗。如果帝国主义进攻古巴，那是因为拉丁美洲广大群众发动了反抗。因为拉丁美洲是帝国主义的堡垒。其次，因为苏联人会采取行动，因为保卫古巴对苏联有切身的利益。这尤其是由于同中国有关的内部理由。

从苏联官僚主义和工人国家之间的世界关系来说，它是应该采取行动的。在印度支那，苏联官僚主义者没有直接利益，而且它没有进行干预的必要。相反，苏联官僚主义对它所不能控制的东南亚革命的发展，是没有利益的，尤其当革命处在中国人领导和指挥下的时候。它的利益在于“维持现状”。而在其他地方，无论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也无论是苏联官僚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胜利都不会有任何好处。在这个矛盾中没有中间道路。由此就产生苏联官僚主义者摇摆不定的态度。而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容许了帝国主义的干涉。它估计到苏联官僚主义者将会让它自由行事的。

为什么帝国主义在古巴沒有进行轰炸呢？那是因为在古巴苏联官僚主义者及时通知了帝国主义它要去干預，而在越南帝国主义依靠中苏冲突，首先依靠苏联官僚主义者的放任态度。这是苏联官僚主义者和各国共产党犯下的一个罪行，因为問題不仅仅关系到对越南的侵略，而是关系到帝国主义企图从中得利的世界力量的对比。今天它企图进攻印度支那，明天就可能进攻中国，其目的是改变它同工人国家和世界革命的力量对比。苏联目前采取的阻抑帝国主义的态度，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胜利对它来說也是不利的。中間的解决办法是沒有的。甚至帝国主义真是遭到阻抑的話，它已經证明它将准备发动原子战争。帝国主义轰炸印度支那不是沒有考虑到相反的反应，不是不准备冒一次原子战争的冒险的。这些事态表明了帝国主义的猙獰面目。这些事态表明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表明战争每时每刻都在接近，它随时都可能爆发。在这次危机中，甚至今天就能发生战争。

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已出现了其他几次危机，我們正处于战争边缘上。战争可能被局限起来，而且将会暂时停止。这不是什么有关美国竞选的問題。約翰遜下令攻击不是为了战胜戈德华特。不，問題涉及到帝国主义的政策。它在古巴也干出了同样的勾当。在进攻越南和进攻古巴之間有着完全相似之处。在古巴，帝国主义曾企图象在越南那样去干。我們說过：帝国主义在美洲国家組織中已遭到了部分失敗，因为它最初的意图是譴責古巴为侵略者，然后向它发动侵略。美洲国家組織沒有对这个問題作具体决定，把它束之高閣，而作出了一个有待于今后执行的一般性的侵略决定。对越南也是一样。帝国主义的态度都是相似的，无论法国人对加蓬，英国人和法国人对苏伊士，英国人对婆罗洲和馬來亚，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态度都是一模一样的。它們完全依賴轰炸政

策、軍事恐怖和軍事侵略，因為它們在社會方面和政治方面不可能給予回答。這說明和平共處和和平競賽是不可能的。實際上，和平競賽的基礎就是資本主義承認它能依靠社會和經濟的支持來取勝。但它的一切態度都表明它不可能支持這樣一個政策；它不可能更長期地支持西貢。

東南亞的局勢是帝國主義將在老撾、柬埔寨和緬甸執行的全部計劃的一部分。這就是帝國主義的政策。根本沒有什麼和平共處能約束住它。它必然採取這樣的行動。不是今天就是明天，這是顯而易見的。

和平共處政策是用以迷惑和欺騙廣大群眾，尤其是服從占統治地位的各國共產黨的群眾的，然而群眾會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投入革命。即使是共產黨和工人國家類似的政黨企圖用和平共處來欺騙他們，他們也不會聽從受騙。

帝國主義對北越採取的這一態度，說明它沒有其他出路。不管它怎樣辯解，不管是預料到的或沒有預料到的進攻，不管是有或沒有越南北方的攻擊，它們都將找到進攻的借口。完全可以肯定越南北方從未發動過進攻，但它們仍採用同樣的手段來回答。美洲國家組織表明，帝國主義準備把進攻推向何處。這也說明帝國主義和工人國家之間發生爭執的間歇時間縮短了。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已經發生了美洲國家組織反對古巴的行為，又發生了美國對越南的進攻。嚴重危機的間歇時間越來越縮短了。

帝國主義表示，從它那一方面來說，它不能再長期地忍受這種局勢，特別是南越危急的局勢和拉丁美洲的局勢。美洲國家組織的決議不僅僅指向古巴，而且還指向所有的資產階級和拉丁美洲的全體群眾，其目的是為了恫嚇他們。它也直接指向智利、阿根廷、巴西、秘魯、玻利維亞，其目的是為了威嚇它們的政府和群眾。

美洲国家組織的決議要說的是：“誰組織一个社会主义的、国有化的政府，采取社会主义的措施，誰就将遭到侵略。”这就是美洲国家組織的決議。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政策。这就是帝国主义对若干共产党伸手言好、主张和平共处的回答。

工人領導軟弱无力的回答

尽管各国共产党的決議批評、揭露和譴責帝国主义，但它却加以嘲笑。帝国主义明知自己受到广大群众的譴責和蔑視。当广大群众还没有动員起来剝夺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的时候，它就会得寸进尺。它对美洲国家組織的态度和对越南的态度有相似之处。这是法、英、德、意、北美等帝国主义的共同路綫。这一路綫不能容忍和平共处政策，甚至最起码的民主权利。这一点在古巴問題上是十分明显的。它不能容忍古巴的存在，这并不是因为菲德尔·卡斯特罗（他是主张妥协的），而是由于古巴工人国家的单独存在显示出群众力量的强大、帝国主义的軟弱以及它成为广大群众的一个范例。这才是帝国主义企图扼杀古巴的原因所在。古巴工人国家执行菲德尔·卡斯特的妥协政策的一个无可置駁的和可耻的证明是，古巴工人联合会沒有发出任何一个号召，它不存在，不受人重視。对于世界人民來說，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統一党并不存在，因为它沒有发出任何号召，沒有采取任何行动。

戈德华特和約翰遜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哪一个或多或少地同工人国家有意和解，他們代表着两股潮流，正象世界各处所有政党內的两股潮流那样。这是資產阶级的两种語調。总的來說，他們有着不同的但不是敌对的經濟利益。有些人认为經濟发展是可能的，而另一些人认为是不可能的。显然，戈德华特或多或少地表达了依靠战争政策和軍备等等的財团的意見。另一个政策路綫决定于

这一个倾向，它认为人们能够从工人国家中得到好处，正如波薩达斯在有关肯尼迪遇刺的文章中所写的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戈德华特将对苏联宣战，正象戈德华特目前所说的和我们上面說的那篇文章在九个月前所说的，他企图从“冷战”中得到更多的好处，换句话说，为了进攻，准备更好的条件。这个政策尤其要在美国人民中找到一个基础来为美帝国主义的政策辯护，并为战争后依旧活命的話作好准备。帝国主义知道，它不仅要发动原子战争，而且还要继续活下去，而为此它就需要有一个存在下去的社会基础。为此，他试图在美国人民面前证明它所干的一切都是必須的和合理的。因此約翰遜表面上采取了战争为了自卫的姿态。你們說“屠杀”，但他說，“我們要和平”。在此同时他还在轰炸一个民族，这个民族从未毁坏过它任何一艘舰艇。而他重复地說：“我們要和平”。美帝国主义对这样一个不属于它的、不处于它地理范围内的国家是沒有干涉的余地的。这个国家离它有几千里之遙。美国沒有組織一次十万人的示威游行来反对越南。为什么它不象菲德尔·卡斯特罗那样在古巴組織上百万人的群众集会，尽管他主张的是消极政策呢？在菲德尔·卡斯特的号召下，示威群众要求保卫社会主义革命。他們发出呼声：“我們在这里准备对任何人的进犯保卫我們自己。”为什么帝国主义不这样做呢？它必然以轰炸代替示威游行，因为它不可能容忍和平共处。这件事应当成为各国共产党的群众、所有的同情者和所有同情社会主义思想的人的一个教訓。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剝夺帝国主义，驅逐一切軍事代表团，为了撕毁同帝国主义簽訂的一切軍事条約，为了无偿地剝夺資本主义的主要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使它在工人监督下发挥經濟作用，我們不能对和平共处抱有任何幻想，必須依賴革命的行動。

在玩一切花招时，帝国主义的有意識态度是企图找到它能进行恫吓的程度。如果帝国主义还没有把轰炸扩大到更远，这不是因为它只要给一个教訓或一个警告，而实际上是为了看一看中国和苏联的反应。但是試探轰炸了百分之十的广大地区，这实际上是对一个国家的侵略。这种轰炸等于对这个国家的入侵。它之所以还没有入侵这个国家，是由于怕引起一些反应，因为象在古巴那样，它曾搞得狼狽不堪。

对越南的这种轰炸和进犯有同样的用意。这种試探，还不只象他們在古巴所做的那样是一种威胁，而是意味着帝国主义在目前决定要走得多么远。帝国主义从現在开始已决定进行战争，由約翰逊而不是由戈德华特来进行。否則的話，它将不会作出这样的明显表示，而会象在古巴那样进行威胁和封鎖。它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这是因为它要先看一看苏联官僚主义者的态度。直到目前为止，它对苏联官僚主义者会不会让它放手执行这个政策还没有足够的把握。因为美国知道同中国和越南对敌是一回事，而同苏联对敌則是另一回事。

朝鮮战争已經向它們指出，尽管苏联不干预，尽管沒有使用原子武器，尽管軍事力量的平衡情况多少同今天有些相似，但美国仍然失败了，遭到驅逐。如果在那时候，苏联給了中国人向它要的三百架飞机，那么今天在南朝鮮已将不再有帝国主义的军队，只有一个新的工人国家，一个統一的朝鮮国家。

中国人應該从他們对苏联进行的一系列攻击中回忆起他們为斯大林辯护的时代得出結論。他們應該記起在朝鮮战争时，斯大林还活着，他并没有給中国人为了使朝鮮从美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所需要的飞机。中国人几乎忘記了斯大林的这一罪恶政策。斯大林之所以沒有給中国飞机，不是由于疏忽或因为他早已抛弃

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的學習，而是因為這件事違反蘇聯官僚主義者的利益。今天赫魯曉夫官僚主義者對此也採取了跟斯大林官僚主義者同樣的態度。蘇聯官僚主義者在中國革命勝利中沒有利益，在越南革命勝利中沒有利益，在亞洲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中也沒有利益。它在那裡沒有任何利益。

如果蘇聯在那裡有利益的話，那麼它會供給武器的。美國已派出若干艦隊，為什麼蘇聯不這樣做呢？這不是因為涉及到一個禁獵區問題，而是因為他們在那裡沒有利益，他們是反對的，因為東南亞地區的革命發展將會改變中蘇之間的力量對比。蘇聯內部的革命壓力也將越來越大。因此他們企圖採取維持現狀、保持中立這一可恥而罪惡的態度。在老撾和越南保持中立，他們怎麼說得出口呢？這必須由人民去決定。這是何等樣的中立？我們不是中立分子，我們支持任何地區爆發的革命。這應該是蘇聯責無旁貸的。說保持中立時是蘇聯官僚主義者，而不是蘇聯人民。蘇聯今天之所以向美帝國主義提出警告，那是因為在蘇聯國內，有了爭論、喧嚷、忧虑和不安。當蘇聯官僚主義者發現不得不發出不能再允許美帝國主義採取這種態度的警告時，這說明蘇聯國內的爭論已達到什麼程度，以及這種情況將在各國共產黨之間的爭論中起着什麼影響。

這個情況將在中蘇危機中占很大的比重。這將指出和平共處是不適宜的，對帝國主義必須採取強硬的態度，此外，還需要把各國共產黨團結起來和集中在單一的領導下，它的政策和綱領是消滅資本主義的殘余，必須在它進行如在越南正在進行的勾當之前把它消滅掉。所有這一切今天都將十分明顯地表現出來。但是值得注意的重大事情是，這裡所關係到的是肯尼迪-赫魯曉夫條約（實際上的）的那些後果之一。

如果帝国主义不依据苏联官僚主义者在革命胜利中没有利益可得这一事实而行动的话，那么它是不会采取这样一个行动的。为什么在古巴它不是这样做呢？在古巴问题上，充分暴露了苏联官僚主义者的罪恶利益，同时也暴露了拉丁美洲若干共产党的反动。对于越南问题，他们只对帝国主义进行了不痛不痒的谴责，而在古巴问题上，他们则在所有报纸上通栏咒骂帝国主义。对于人类来讲，今天保卫越南北方比保卫古巴要重要一千倍。它千倍地更重要，因为亚洲革命的发展意味着结束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和在太平洋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亚洲被清除，这就打破了目前存在的平衡状态。今天从具体情况来看，古巴不象越南那样存在着被侵略的危险。可是，各国共产党对古巴问题发表了很正义的公报。越南的局势对他们的压力很大，他们表明他们对革命没有客观利益，他们只对官僚阶级的利益和利己主义的、腐朽的社会利益感兴趣。这一情况贯穿在一切过程中。

世界革命的补充过程

革命不是静止的。第四国际在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分析并阐明了不断革命的过程为什么是一个革命的补充发展过程。它分析了帝国主义为什么还能进行攻击，还能占领若干阵地，还能在某些反革命行动中取得胜利，但它不可能使历史倒退。而对帝国主义的每一个进攻，广大群众以促进世界另一地区革命的行动给予回击。斯坦利维尔目前依然掌握在革命者的手中。这一胜利证明只有第四国际曾说过的：依仗弓、箭和石头也能使革命取得胜利。当我们说用弓和箭有可能打败飞机的时候，有人嘲笑第四国际，指责我们是革命的唯心主义者。没有这样的唯心主义者。我们不是唯心主义者，而是客观主义者。因为实际上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群

众渴望解放就促使他们拿起他们持有的武器，并用这些武器来取得胜利。就连帝国主义今天也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冲锋枪、大炮和军队在刚果已为弓箭所驱逐。斯坦利维尔还掌握在起义者的手中。这意味着刚果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意味着在刚果有可能建立一个由中国、若干工人国家、本·贝拉和纳赛尔承认的新的独立国家。这意味着在帝国主义的非洲最强大的工业中心之一的地方发生很大的影响。帝国主义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这一打击抵销它可能在越南北方取得的胜利岂止一千倍。

这说明和平共处的情况是什么。和平共处政策到处都经常遭到失败。苏联官僚主义者和一些共产党的和好表示只给帝国主义而不是给群众带来好处。相反，群众对和平共处是怀疑的。举例来说，在越南北方、刚果、印度尼西亚、古巴等是这样……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在刚果建立一个新的工人国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此外，根据最新消息，如果在桑给巴尔真正地实现全部工业和土地国有化，那么在那里也应当把它看成是一个新的工人国家。尽管它和坦噶尼喀联合，但在十五天前巴比对意大利《团结报》记者发表的最新声明中是这样说的：“在经济上，我们是独立的。我们有独立的警察，独立的军队，我们进行着独立的管理。”如果桑给巴尔存在着这样一个局势，那么就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工人的国家。

帝国主义已经决定使用原子武器。向美国舰队司令问及是否将来会使用原子武器时，他是这样回答的：“我认为我们希望使用常规武器将会是足够的。”因此，他并没有作否定的答复。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常规武器还不够的话，他们将使用原子武器。换句话说，帝国主义是不择手段的。这就是帝国主义对和平共处的回答。这是从整个局势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这一结论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格瓦拉、拉丁美洲各政党领袖和拉丁美洲各民族运动领

袖所不能不考虑的。再不能对和平共处抱任何期望。帝国主义的态度是明显的：它不能容忍任何革命的行动、革命的压力和革命的进展。

帝国主义反革命的矛盾

对于帝国主义的这一行动，必须以革命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政策予以回击。

工人国家方面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和无容置辩的。

美国所有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都追随着约翰逊的军事行动，但他们也同时出现了矛盾和动摇。他们知道，原子战争就是帝国主义的灭亡。参议员韦恩·莫尔斯宣布他将不支持给约翰逊以全权的要求，因为那表示愿意听由约翰逊宣布战争。这也说明他们准备走得多么远。约翰逊要求国会同意他所奉行的政策和他在这次危机中将奉行的政策。这意味着同意他可以推行他的政策导致战争。对于这点，参议员莫尔斯说：“我没有同意这样做，因为这就等于事先同意进行战争。”

他说出美帝国主义的意愿是什么。他没有说出他们之间的一切分歧。那些说约翰逊反对戈德华特，主战派反对“主和派”的人说明他们的论点是凭空虚构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主战派和“主和派”。他们只是代表帝国主义的不同倾向，但有着共同的目的。他们只是在取得利益的形式上，从和平共处政策中牟取利益上有所不同罢了。除此而外，别无其他。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当他们相信他们能够进行攻击的时候，他们的行动是一致的。而即使戈德华特的支持者反对约翰逊的总政策，他们也还是一致地、无条件地赞成对越南的政策，这并不因此而赞成别的政策。换句话说，如果约翰逊走向软弱无力，他们就会不要他而向前推进。他们现在要的是从中取

得最大的让步。

工人国家方面表现出很严重的缺陷。面对着十四个工人国家和代表世界人口一半的殖民地世界，面对着殖民地世界的革命，美帝国主义竟敢对一个工人国家发动这样一次进攻。这并不象那些把进攻看作是美帝国主义的产物的共产党人所說的那样，它的进攻是由于它本身的力量或者因为它意志坚决或疯狂。美帝国主义者维护的是资本家的流氓坏蛋的、卑鄙的利益。他们采取的态度是符合帝国主义的：一种罪恶的、卑鄙的、恐怖的、反革命的态度。但是我們所应当看到的是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工人国家没有一个共同的方案、一个纲领和一个预定的计划。

需要有一个革命的世界中心

由于还没有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的共产国际，还没有一个革命的世界纲领，因此资本主义才能为所欲为。反之，资本主义就不会如此猖狂，革命就会进一步发展，人类的损失、战争的可能、经济和生产资源的破坏就会大大减少。人类遭受的这些破坏将是无限地缩小。帝国主义的行动受它所固有的软弱和它们的原子武器所支配。但原子武器所给它的力量只占次要地位。主要的还是工人国家在殖民地革命问题上缺乏团结和一致。如果有了团结一致，帝国主义就不可能为所欲为，因为它将立即遭到反击。这就不仅仅是对美国进行轰炸，而是号召群众夺取政权。帝国主义利用了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的妥协政策，它们不去领导群众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却引导群众同资本主义妥协，寻求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进行的改革和和平共处。这正是资本主义所要利用的。

必须要有所有工人国家的一个统一政策、一个统一的纲领，必

須有一个以反对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为綱領的世界中心。工人国家必須团結在一个組織里，团結在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共产国际里，这个組織的綱領應該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資本主义”、“把群众組織起来驅逐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帝国主义則不得不不断后退，并且在发动战争时将处于最坏的情况下。那时候甚至北美的群众也将看到这是帝国主义为了镇压革命而发动战争。这将是向帝国主义开战的革命号角。

但还没有这样一个組織。显然还缺少这样一个计划世界范围统一行动的組織，这个組織是为了推动群众为保卫工人国家并发展革命而斗争。这个计划、这个中心、这个群众性的革命的共产国际不仅是用来保卫工人国家，而且也将是推进革命发展的唯一手段。这是革命的組織。

帝国主义不可能在泰国或者在越南組織一次十万人的示威游行。如果有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的共产国际，不仅仅是帝国主义将被消灭，苏联官僚主义者也要被打倒。即使苏联官僚主义者在开始时能够控制和支配这一組織，也不可能从中得到任何好处。革命的发展将清除苏联官僚主义者。正因为如此，苏联官僚主义者今天才干預印度支那，因为它不能允許帝国主义有所进展，这不仅是因为这样一来力量的对比将有利于資本主义，而且因为在苏联国内，工人国家的需要、組織和生活也反对它这样做。必須有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国际。这是从当前局势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如果不是在今天，就会在明天，在十天或半个月以后，帝国主义就会侵略越南。

它的願望是想通过侵略越南，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它想摧毁中国，并为摧毁中国找借口，不择手段地侵略中国，并试图消灭中国。它既沒有經濟借口，也找不到社会和政治借口，它什么借口

都沒有。它遭到了失敗，但它無論如何要發動這次進攻。帝國主義不會接受讓步。

這些情況表明，如果工人國家或工人的政黨不先發制人，帝國主義就會先下手。正如它在美洲國家組織方面採取了主動那樣（它的不外是要封鎖和侵略古巴，儘管它沒有什麼力量），它也採取主動來轟炸越南北方。它之所以這樣先發制人，不是因為它自己感到強大，而是因為它估計到一些共產黨、蘇聯官僚主義者的消極被動和中國方面的部分被動。在資產階級內部也存在着不平衡，帝國主義沒有立即找到支持。十分明顯，資產階級感到恐懼，他們正在尋求一個妥協的政策。只有英國立即給予支持，並且剛剛發表了聲明。如果美國的態度真正對世界資本主義有利，那麼世界資本主義就會立即給予支持。這說明大西洋公約組織內部不是缺乏團結，而是資本主義的懼怕使它對美國的態度產生了懷疑。這對革命將有很大的好處。

帝國主義在亞洲將不會後退

意大利和法國資本主義內部有了強大的群眾運動，它已接近奪取政權的時刻。它使得資本主義深感不安，而建立群眾性的革命的共產國際卻就應該以此為憑借。必須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不採取主動而讓資本主義採取先發制人的轟炸，那就不能繼續保衛工人國家。工人國家必須採取主動，並且要有一個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資本主義鬥爭的綱領：沒收土地，剝奪並驅逐世界帝國主義。中國的干預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對中國、對中國的革命及其對世界的影響來說，這種轟炸都是一個威脅。中國有責任干預，或者是直接支持越南，或者直接對抗美國。這不可避免地表明，即使目前的階段過去了，不久的將來經常會可能發生局部戰

爭，从而扩大为全面战争。美国人在这一点上是不会后退的。他們曾明确而断然地宣称：“我們不放弃南越”、“我們不放弃老撾”。他們是为此作了准备的。

失掉这些国家对美国來說就等于死亡。不能抱有这样的幻想和希望，以为約翰遜这次当选就会改变政策。美国不会放弃老撾，也不会放弃南越。因为如果失去了它們，也就会失去他們最后一块地盘的泰国。这对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緬甸将会产生影响。緬甸已将近成为一个工人国家。这一发展过程也存在于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亲王正急切地要保持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但在緬甸，这一发展过程基本上是进展得很远了。在那里，已經有了一支革命的軍队。奈溫已經采取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措施，进行了一系列的沒收等等……。这說明要建立一个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資本主义为綱領的群众性的共产国际是有着巨大的可能性的。

为驅逐帝国主义、推翻資本主义掀起一个 隨責帝国主义的世界运动

必須掀起一个为推翻資本主义而斗争的世界运动。遏制帝国主义的最可靠的办法是作好一切准备，以期一旦爆发原子战争便能及早消灭帝国主义。这将大大减少人类遭受的损失。就是这个时期中得出来的最重要的結論之一。不管人們今天达成什么協議，这种僵局将是暫时的。

帝国主义不能容忍东南亚存在这种局势。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仅仅牵涉到老撾或越南，而且牵涉到整个东南亚。革命发展的胜利将立即席卷当前作为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借以立足的堡垒的印度和日本。失去了这两个国家，就失去一切，既失去檀香山，也失去菲律宾，一个也剩不下了。这些島屿沒有任何重要意义，但

印度和日本对美帝国主义有它们的重要性。革命将会摧毁这一切，但帝国主义却不会允许达到这一阶段，它将在这之前发动战争。

从这种局势中得出的结论是，为了剥夺帝国主义，为了准备革命、推动革命，为了剥夺资本主义，为了实现无偿的国有化，为了没收并把土地分给农民，为了工农联盟，为了建立新的工人国家，为了组成新的工农政府，必须掀起一个世界运动和世界范围内的群众斗争。在尼日利亚，群众刚刚举行了上百万工人罢工，尽管他们很落后（也门的情况相同），他们刚组织了以工农联盟为纲领、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这就是尼日利亚的情况。群众的意志得到充分的表达。这表明人类社会存在着向往社会主义的良知。这应该成为对帝国主义的回答。

这也应该是对美洲国家组织所采取的措施的回答，以及对越南北方所采取的措施的回答。必须建立一个以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为纲领、为打倒尚在那里统治的资本主义而斗争的、群众性的革命共产国际。必须有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来争取小资产阶级、农民和中农参加为没收土地和归还土地、为驱逐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组织为建立工人国家而进行的斗争。这就是必须给予的回答。

用不着跟联合国去说。联合国是一个强盗窝。官僚主义者力求把联合国当作调停的中心。不必停止在联合国里进行的辩论，人们在那里有可能利用它作为国际议会的舆论讲坛来鼓吹运动，但是要到联合国外面去寻求解决方法。就是应该在联合国之外去驱逐和剥夺帝国主义，剥夺资本主义，建立新的工人国家和新的工农政府。这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回答，对准备战争的回答，同时也是不论后果如何而要扩大革命的回答。帝国主义已表示它准备发

动战争。革命的胜利越快，帝国主义原子战争造成的损失就越小。

从帝国主义对越南北方采取这一行动得出的结论是：它显得十分虚弱，它表明不可能通过和平道路来解决，也表明帝国主义不可能动员广大群众，也不能依靠人民的意志。它只能依靠它的军事力量。

这就是它的巨大弱点。从群众方面来说，群众在斯坦利维尔作出的回答是，依仗弓和箭他们准备夺取政权。同样的情况存在于东南亚。

世界广大群众应该遵循以下的纲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主义！没收土地！分配土地！剥夺帝国主义！实现无偿国有化！实行工人监督！组织工农政府！

这就是第四国际的回答，向世界所有群众发出的呼吁。

1964年8月5日

(译自法文版《共产主义斗争》1964年8月号)

四三、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关于錫兰 平等社会党及其参加资产阶级 政府問題的決議

錫兰平等社会党原是錫兰的一个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現在却已参加班达拉奈克政府，以求維護資本主义制度、維護财产私有制，并以协助推行鎮压工人运动的政策为其具体目标，因为它对部分工人尚具有領導权，現在它就要利用这种权利来維護和支持錫兰的資本主义政府。

除了直接鎮压之外別无其它办法对付目前危机的班达拉奈克政府，对于日益蓬勃发展的巨大的罢工浪潮始終无力控制。它不能对工人让步，因为从資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让步的結果就将对資本主义制度的彻底清算。因此，它开始求助于錫兰平等社会党，让它来执行这种鎮压政策，让它利用它过去作为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在工人中取得的威信，来控制 and 分化工人运动，来欺騙人民群众，使他們产生种种幻想，以造成思想上的混乱。班达拉奈克的政府就是这样利用这个政党来鎮压人民群众以支持資本主义制度。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对于該党奉行的这种政策拒絕承担任何責任。1962年4月的特別會議及1964年4月举行的第四国际第七屆世界代表會議已決定將錫兰平等社会党开除第四国际，理由是它背叛了第四国际的原則、綱領和革命的政策。第四国际书记处郑重宣告，即使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任何一个托洛茨基的政党都不容許参加一个非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府。要参加非托洛茨基政

府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一政府必须是为革命的綱領进行斗争的革命的民族主义的政府。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中，第四国际的力量参加到一个革命的民族主义的政府中去，将能产生支持和推动革命斗争以求最后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效果。这种参加的行动是由革命斗争的具体发展过程所决定的。这就是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可以参加非托洛茨基的政府，也就是说，一个既非资产阶级的，但又并非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府的唯一条件。此外，参加任何资产阶级的政府——即使这个资产阶级政府是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那也是完全违反原则、完全不必要和违反革命发展的需要。一种民族主义的革命势力，那就是说，非资产阶级的势力，那就不同了。因为这样一个政府，虽然没有有意识的在意识形态方面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綱領进行斗争，实际却倾向于这样一种政策。比如，经过游击时期之后已进入第二阶段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卡斯特罗政府，就是一个向着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的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府。参加这样一个政府就将是正确的行动。

参加一个即使是民族主义的政府的条件是，在参加的同时仍必须进行党的独立的活动，号召人民群众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斗争。因为，一切参加这种政府，但是不在政府中支持符合党的原则的活动，不在政府外采取独立的行动，为推翻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政党，结果就会使自己迁就和屈服于浸透资产阶级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政治，使自己成为这种政治的俘虏。参加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的、民族主义的、甚至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府的基础是成立一个联合陣綫，在这联合陣綫中，参加政府的政党并不因此取消自己的独立性，而且相反地，这个托洛茨基的政党必须以能保持自身的独立作为条件，以便参加后仍然单独进行革命

活动，同时为了使革命向前发展，尽量施加压力以推动政府内部的革命倾向。

錫兰平等社会党的态度是完全违反第四国际的这一革命性的論断的。班达拉奈克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它并没有推行一种革命的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政策，却决心维护资本主义。由于找不到社会和政治的手段来维护资本主义政权，资本主义靠自己的政治力量已经无法自保，它于是转向錫兰平等社会党，希望利用该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利用它过去作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的威望，来保卫资本主义制度。錫兰平等社会党在参加政府时所宣称的改革纲领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改革纲领，其中所提出的要求是并不违反资本主义政权的利益的。錫兰平等社会党只不过以此来欺骗群众，以使自己参加政府的行动可以言之成理。

该党内部的分化和解体并不是一个新近才发生的现象，这是它几年来错误地坚持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策的必然结果。第四国际早已为反对这种政策进行过斗争。自1952年以来，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一直领导着这一反对錫兰党和防止该党解体的斗争。在该党，由于对赫鲁晓夫、对苏联官僚集团、对资本主义以及小资产阶级意欲同资本主义妥协的倾向采取妥协态度，而被第四国际开除以前，在第四国际的第四和第五次世界代表会议上，拉丁美洲代表团和拉丁美洲局已经指责了该党对本国的资本主义以及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妥协态度。在第四次世界代表会议上，錫兰平等社会党曾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在苏联应容许小资产阶级政党存在，并应容许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存在；而且说，它们都应该有权利作为政党来进行活动。在工人国家中，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只容许接受和献身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利益的工人政党进行活动是完全必要的。由于官僚集团在工人国家中掌握了政权，

实际情况倒并不是这样。此外，工人国家的停滞、落后状态和保守主义的消极倾向也在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采取的妥协态度中，以及在和平共处政策中，表现出来。

在国际的第四和第五次世界代表会议上，拉丁美洲的一些代表和拉丁美洲局认为锡兰平等社会党已蜕化为资产阶级政党，提出了开除该党的建议。1960年，在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会议上，拉丁美洲代表团更以锡兰平等社会党在它的全部政策上所已表露的堕落现象以及拉丁美洲局预计它不久即将参加资本主义政府的断言（这一断言现在已完全实现了）作为依据，再一次具体提出了将该党开除第四国际的建议。以巴布洛、杰尔曼、弗朗克、麦丹等人为代表的一派却极力支持锡兰平等社会党，并对于拉丁美洲代表团坚决反对让锡兰平等社会党留在国际内部的立场大事攻击和诽谤，引起了拉丁美洲代表团的极大愤怒。

锡兰党和以麦丹、巴布洛、杰尔曼、弗朗克为代表的一派，由于共同具有改良主义思想和向工人国家中的官僚集团采取投降主义的倾向，由于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的势力采取了相同的小资产阶级的妥协立场，现在已彼此联合起来。我们不可能支持某种妥协政策而不受到那种政策所产生的后果的影响，我们也不可能奉行一种联合政策，直接或间接同资本主义的政权，不管是通过它的议会或它的政府，达成协议，而不致腐化堕落和趋于解体。拉丁美洲代表团严正地、毫不留情地指责锡兰平等社会党不应错误地坚持议会活动，并把这种活动本身当作一个目的，不应象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所有的改良主义分子一样专心致力于议会斗争的道路。尽管锡兰党——曾在一次选举中获得三十万张选票——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拉丁美洲局仍然宁愿同它断绝关系。在那次选举中，锡兰平等社会党根本就没有维护那些最终将可以

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并将使被苏联官僚集团所窒息的工人国家重新获得社会主义的活力的革命的原则。苏联官僚集团的这种保守的消极倾向所产生的一个最严重的后果是在计划经济的问题上采取了倒退的政策。一切重要的工厂被赋予更大的自由，让它们直接依靠供求关系的要求去进行生产。那就是说，完全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而不是按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制度来进行生产和控制贸易。这种情况实际就是抛弃革命思想和革命立场的直接结果。锡兰平等社会党拿议会作为进行议会斗争的手段，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堕落和解体。锡兰党的态度跟已在解体中的以巴布洛、杰尔曼、弗朗克、麦丹为代表的一派是完全相同的。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向全世界的工人和革命运动郑重宣告，锡兰平等社会党已同第四国际完全脱离关系，它的腐化堕落同那些腐化堕落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是完全一样的。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号召锡兰平等社会党中的少数派站到第四国际的旗帜之下来，站到永久革命的旗帜之下来，为了工人和农民的权力进行斗争，争取联合全世界的人民群众共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中的政治革命。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

1964年8月6日

(译自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机关刊《红旗》1964年10月号)

四四、苏斯洛夫的报告——苏联官僚机构的反革命綱領(摘要)

波薩达斯

苏斯洛夫的报告在它被提出两个月以后，于4月3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西班牙文本于5日发表)。必須把这一报告看作是內部斗争尖銳化的一部分。这并不是决裂，但斗争确是尖銳化了。如果他们打算立刻采取行动，他们就会馬上把它发表。他们把它压了下来，然后只发表其中一部分，这是因为內部存在着斗争和爭論，或者是想在发表以前同中国人达成協議。他们提出这些文件，最后是为了进行爭、辯、攻、守之用的。現在把它们都发表出来，是因为斗争越来越尖銳化了。这并不是說馬上要决裂；任何一方都不是真要决裂，但是他们正在导向决裂的道路上前进着。

苏斯洛夫文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苏联官僚們的各种計划加以协调和整理，并把它們一起端了出来。它們是思想，也是綱領。这是苏联官僚們用来回答中国人的綱領的綱領。苏斯洛夫的这一綱領，是苏联官僚們的实际的过渡綱領和背叛行为。这是一个完整的綱領，它順序地回答了人們提出的所有問題：和平共处、核試驗、战争、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它說明这一历史阶段的指导路綫是和平共处，而不是战争；它使所有殖民地革命的利益都从属于和平。这就是路綫——并且有可能使資本主义确信它們必須接受和平共处。这是这些官僚們的完整的綱領。从現在起，所有共产党都必須以之作为基础，因为它取消了革命的道路。沒

有什么革命；只有和平的道路。

官僚机构企图用“全民国家”来为自己辩护

从根本上影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这一过渡阶段的基本基础的，有两个方面。这就是关于国家和党的特性的表述，以及他们现在所说的国家的新形式——这种国家是不存在的。他们说苏联的国家已经从工人的国家变成了全民的国家，从仍然反映阶级斗争的国家变成了每一个人的国家。这就是说，他们取消了工人国家的性质。国家被放在一种对于发展和融和资本主义倾向显然有利的基础之上了。只有当消除了阶级斗争的时候，才能消除工人国家和过渡到“全民”的国家。但是那时也就将没有国家了。现在苏斯洛夫建立他的理论，说是因为马克思说——根据苏斯洛夫的解释——在社会主义中有着一种全体人民的国家。根本没有这样一回事。实际上，在苏斯洛夫这一文件中，这些官僚们是要建立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的联盟，是要使工人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和资本主义部分存在下去。

中国人有着与此相反的经验。他们接近于建成了——一个同某些资本主义成份联盟的工人国家。他们后来把这些资本主义成份消除了。是用一种改良主义的办法，十分谨慎地消除的，但是他们把它们消除了。

可是，苏斯洛夫对资本主义说，我们能够建成一个全体人民的国家。但是全体人民是什么呢？

全民国家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只是意味着一个允许有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集团和资本主义利益的国家。但是第二，较此更为重要的是官僚们的利益。这种理论是代表官僚利益的国家理论。这就是关于苏斯洛夫报告的结论。他编造理论来说明代表

全民的国家的性质，說它反映全民的利益。但是它是由官僚們来领导的；它是官僚的国家！

官僚們把自己导向各个有关方面那里去。他們把自己导向世界资产阶级那里去；实际上，他們正在打算同世界资产阶级建立联盟。

中国人对这一路綫的反应，是攻击南斯拉夫人和赫魯曉夫，說他們向资本主义敞开了大門。但是，当中国人說赫魯曉夫已經出卖給资本主义的时候，他們是說錯了。实际上，赫魯曉夫虽然打算对资本主义作一些让步，但他并沒想出卖給资本主义。他不能出卖給资本主义，因为这将意味着这一工人国家的終結。赫魯曉夫要同资本主义和解，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步驟；在这一历史阶段，在资本主义显然正在分崩离析的时候，这一步驟使得资本主义能够生存和巩固下来。当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东南亚公約組織中跟戴高乐有爭論，并且戴高乐第一次提出反对意見、投反对票和主张中立化的时候，我們就处在资本主义分崩离析的环境之中了。最近美国在日内瓦又提出它的看法，它承认它并不是支配世界的唯一国家，并且承认有必要注意世界其他部分。实际上，这是各集团之間的一次討論。美国并不是主张只有一个美国集团能够統治拉丁美洲的市場和阻止欧洲共同市場、日本等参加进去，而是同时承认另一集团具有同它自己一样的力量和权力，并且願意同这另一集团进行討論。这是帝国主义的一种退却。这是那揮舞鞭子、发号施令的头子的退却；它同意在各平等国家之間討論在日内瓦提出的建議。

官僚机构歪曲馬克思主义

苏斯洛夫的文件证明，官僚們的綱領編造了一种关于现实国

家的性质是官僚国家的理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说法，根据实际历史经验，国家当它不再有存在的必要时，它就消亡了。只有当在这里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存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时，国家才有存在的必要。这种斗争是世界规模的，而不是国家规模的。这也适用于中国人，但是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革命结论中忽视了这一点。的确，他们在攻击苏联，但是他们没有把他们的结论应用到自己身上。现在存在有世界规模的阶级对抗和阶级矛盾，存在有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国家是阶级对抗还存在着的表现。因此，当世界资本主义还存在着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国家即工人的国家是必要的，因为阶级斗争是世界规模的。

不仅国家是必要的，它反映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它是一种镇压机关；而且在苏联，国家也反映这种对抗和矛盾，并且，只要还存在着不平等的分配，即按劳分配，国家就要继续反映这种对抗和矛盾。只要还存在着这种分配，国家就是完全不可代替的东西。由于按劳分配意味着还不可能实行对每一个人都平等的分配，所以就还没有充分满足各种需要。因此也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在苏联人和中国人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条件是变动无常和可以任意改变的，因为一方面，中国人要掩盖他们不充分的理解力和理论上的幼稚病，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和苏联人一样，都要掩盖他们的官僚领导的性质。

需要苏维埃

社会主义意味着一种制度，在其中，镇压机关为说服所代替了。在这种情况下，分配工作不需要有镇压机关。相反地，国家的存在就表明还有着镇压和不平等分配的基础。无论如何，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宪兵队；只要国家还存在着，那就有不平等的分配，

在苏联就是如此。从根本上說，那里还有着工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資就不存在了，那里是按需分配的。工資意味着还需要根据一些标准来进行分配工作，这就需要有一种机构。在这种机构中，是有着差別和不平等的。因此，这种机构就是一种进行分配工作的机关；从各方面說，它也是官僚政治的根源、基础和力量。这就是在苏联实际存在着的国家。它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但是在这一国家中，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了，无产阶级不能干预政治。

在苏联，无产阶级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借以发挥威力的主要基础就是苏维埃。中国人和苏联都没有谈到苏维埃。但是苏维埃必须发生作用。如果没有苏维埃的作用，就不会有无产阶级专政。这里存在一种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资本主义的专政，要通过无阶级的作用，通过苏维埃的作用，来发挥威力；无产阶级必须在苏维埃内干预政治。如果不是这样，无产者就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实行它的专政。因为它没有赖以实行它的专政的机关。象现在这样的工人国家反映着无阶级的权力，但是它却不通过那唯一可能的机关——即苏维埃——来实行对资本主义的专政。因此，苏联的官僚们能够推行和平共处政策，能够利用这个工人国家来同资本主义和解，因为这个国家并不代表苏联的人民群众。资本主义不能推翻这个工人国家，这是无可怀疑的。而且，工人群众也不打算推翻它，他们不但无意推翻它，而且保卫它，在上次世界大战时就是如此。那时人民群众是有动机来推倒斯大林的，但是他们保卫了这个工人国家，以抵抗那更重要和更直接的危险，即纳粹侵略的危险。

当苏联官僚通过苏斯洛夫，想要压制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国家——以便走向“全民”国家的时候，那是因为他要压制

无产阶级的权力机关，即带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机关，也就是工人控制的苏维埃。其目的在于不让人民群众干预政治，并且设法同世界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再设法通过改革来消除资本主义。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可是苏联的官僚们却力图编造一些理论，以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证明他们作为一个领导阶层而存在是正当的。这就是结论。

另一个结论是，苏斯洛夫文件表明他们害怕风起云涌的世界革命。这一文件表明，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纲领，已经作了理论上的让步，无条件地接受和平，反对革命，同时还捏造了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即“全民国家”，这就是说，他们认为阶级国家已经消失了。

这种理论使资本主义相信这些官僚们将很重视同资本主义的联盟，也给这一信念提供了基础。

这些官僚们阐释了他们关于国家的特殊概念，研究并发明了一种公式，来从理论上替他们作为工人国家所有者的利益作辩护。社会主义需要有一个国家这一浅薄的想法，只有当他们企图保卫他们作为一个寄生的、保守的反革命阶层的利益的时候，才是可以理解的。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制度，在其中，国家由于没有必要已被取消了。这不仅是因为物资十分丰富以及所有需要都得到充分满足，而且也因为，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人们的思想和道德观念使得各种形式的镇压和强制机关都成为不必要的了。阶级敌人已不存在，也再没有战争的必然性。

当苏斯洛夫论证一种新式国家的理论前提时，那是因为他要说明苏联官僚们的意图，他们要保持当权的地位，就好象他们是一个新的领导阶级一样，尽管他们不可能是这样一种阶级。他们狂热地表明他们要保持从苏联社会窃取来的各种特权和利益。在批评中国人的时候，这些官僚们力图引诱他们，向他们提供一种可以

接受的公式，并为建立一种反对世界上被剝削群众的共同陣綫編造一些理論。

同資本主义和解的世界綱領

但是，苏斯洛夫的結論所反映的，还有一种比所有这些都更为重要的东西。所有討論和闡述（在他分析“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險”以前）的最重要之点是，苏斯洛夫把这一报告的重点、出发点和目标都放在这样一种看法上：目前的实际危險不是資本主义，不是核战争，也不是資本主义的敌对力量，而是世界无产階級革命。这就是苏斯洛夫的报告の結論。这是基本結論，也是一种綱領——官僚們的过渡的綱領。

整个文件并不是从世界范围的对立、階級斗争、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資本主义和无产階級的斗争出发的。各工人国家的存在、向社会主义的进军以及資本主义的灭亡，并不被认为是目前历史动向的中心樞紐。这并没有被当作基本問題。整个斗争和危險在于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是什么呢？照苏斯洛夫的說法是不断革命。但是不断革命当然不象他所解释的那样——他在說謊。不断革命并不是指蜂拥到大街上盲目放枪，而是指从一个工人国家开始直到完全消灭資本主义为止的不間断的革命。这才是不断革命。力量的对比以及进行干預的可能性，决定应该用什么样的办法来进行干預。十分明显，階級战争的历史分析表明，如果不发生战争，資本主义是不会消灭的。得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結論以后，十分明显，誰采取主动，誰就占很大的便宜。这就是預防性战争的意义。

另一方面，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战争，虽然資本主义要用战争来回答，那也不是預防性的战争。这是要使历史发展服从革命发展

的必然性。但是也必須充分利用和借助于殖民地革命的現有力量。

苏斯洛夫的結論是，目前的危險不是帝国主义，不是資本主义，也不是核战争，而且这些东西是可以使之瘫痪、加以約束和使之馴服的。这种結論完全是胡說八道。最近巴西的事例說明，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並沒有馴服；如果它們作了让步，那是因為它們觉得在某一特殊时刻它們沒有足够的力量，到了另一方便的时候，它們一定会进行反击。这些官僚們力图使自己同資本主义相协调，要同資本主义和解；資本主义在它缺乏压制革命的力量的时候，是願意和解的。一个确切的证明是：在以前，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通过電話来任免总统，随意揮舞鞭子，无需动員兵力就更換象阿根廷、巴西、智利这类国家的总统和省长。可是現在不行了；現在它必須依靠軍隊。托馬斯·曼作了論述并得出結論說，在拉丁美洲，“我們的真正力量是拉丁美洲的軍隊”；他这是承认，帝国主义者在任何拉丁美洲国家里是沒有任何社会基础来作为依靠的。尽管有着經濟力量，尽管資本十分集中，帝国主义却沒有能力來說服小資产階級，讓他們向后退却，也沒有能力在他們中間找到一块基地。因此就有了依靠軍隊的新綱領。托馬斯·曼說，“这說明軍隊是民主的最坚强、最可靠和最坚决的保卫者”，——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民主。这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結論。不能象苏斯洛夫那样抽象地談論和平。必須具体地研究这一問題。帝国主义刚刚說过，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他們的支柱是軍隊。这就是說，他們要用軍隊、用战争来进行反革命。这是实际的結論，而不是紙上談兵的結論。

当苏斯洛夫說最大的危險在于可能发生的冒险行为，因而有必要对帝国主义施加压力以便压制它的时候，帝国主义已經在越南表現了它的弱点。帝国主义者联盟显然正在分崩离析。戴高乐

的态度使得帝国主义陣綫瓦解了。

帝国主义者联盟的分崩离析

欧洲报刊說，中国人正在同法国人和英国人結盟。他們能够这样做，这是无可厚非的。我們并不批評中国人或任何工人国家，說他們想要依靠一个帝国主义来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我們完全同意这种做法，但是它不能有害革命的发展。例如，中国人只字不談加蓬問題。中国人有責任談加蓬問題，有責任譴責法国帝国主义說他們正在做跟美国佬在拉丁美洲所做的完全相同的事情。事实上还更坏些：法国人直接用军队进行干預，美国佬还没有这样直接地干預。我們要重复我們說过的話：美国佬不直接干預，那是因为这将造成反对他們的战争。他們間接地干預对于他們有利。

中国人要建立一条支持他們反对美国佬的陣綫，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同时，这也意味着法国帝国主义将利用这种“和平共处”，依靠中国和某些半殖民地国家而舍弃美帝国主义。同样，美国佬也要依靠苏联，并設法利用世界帝国主义的矛盾和虚弱的局势。这說明美国佬在不断衰弱着。

托洛茨基主义意味着世界革命的发展

苏联官僚們攻击中国人，因为这是一种基本力量，它甚至用一种既和解又斗争的办法使得这些官僚們的联合世界帝国主义的計划处于危险之中。因此，苏斯洛夫的全部报告都在攻击中国人。除了攻击中国人及其能够得到共鳴的有組織的方式以外，它还攻击中国人所受影响根源，以便摧毁这种根源。这說明，苏联官僚們的巨大弱点不在于他們缺乏物质力量，他們的物质力量是很大的；而在于他們缺乏社会支持和缺乏社会历史方面的理智。

因此就有了来自第四国际的危险。他们认为这种危险十分巨大。他们是对的，因为历史条件已经使得第四国际有可能发生影响了。如果说第四国际还缺乏影响中国人和苏联人的物质力量，那么，危险何在呢？危险在于客观的历史条件，这些客观历史条件确切地说明，只有革命的纲领才能使历史前进。

多年以来，他们都忽视了我們，可是现在苏斯洛夫突然说了他所說的話。这意味着，我們没有被忽视，他们在跟随着我們，他们不再說“我們已经埋葬了他们，他们已经死了”，而是說：“沒有死，这些人正在发生一种影响。”他们认识到，这一懂得如何維持自己的小小团体，今天在思想意識方面并且部分地在政治方面已经有了地位。到明天，它将是一个有机的、有組織的力量。

我們要重复我們曾經說过的話：三、四年以內，整个拉丁美洲将卷入革命之中；我們也卷入这一整个革命之內。这不仅是我們的看法。英国《經濟学家》这样說过，美国佬也这样說：他們要么是对付巴西，要么是让整个拉丁美洲都卷入革命之中。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因此我們看到美国佬中間也有了变化。美国佬所建議的变化是很重要的。富布賴特建議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在以前，他是跟麦克阿瑟和福斯特·杜勒斯抱有同样看法的人，是“边缘政策”的主张者。可是现在，他說我們能够适应象波兰或南斯拉夫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

富布賴特根据苏联官僚集团的反革命的政策、活动和結果，提出一种同工人国家的領導人和解和結盟的路綫；他以赫魯曉夫贊成同資本主义結盟的态度作为一个例子，又以其他工人国家——波兰和南斯拉夫——作为有决定意义的例子。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是要利用这些国家来达到它的反革命目的。

苏斯洛夫所詳細說明的路綫，是要把資本主义的改革办法当

作是一种綱領，并要靠它来爭取生存。

所有这些都說明資產階級正在做些什么，也說明他們是沒有力量的。有必要充分了解帝国主义的这种虛弱性。但是象苏斯洛夫这样的共产党人以及中国人，都沒有討論这种成为革命发展的最有利基础的資本主义的虛弱性，而只是抽象地高談闊論。

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第四国际巴西支部和波薩达斯的文章都指出：在巴西，只有依靠群众的武装动員和依靠爭取权利的斗争，根本改革才能具有意义，才能得到实施。不这样做就意味着退却。改良的政策、依靠軍隊和依靠民主的資產階級議会的政策，都已证明是不适当的。也已证明：帝国主义、地主、大領主、資產階級沒有社会力量来进行抵抗，或者能够希望在选举中，以議會形式和社会动員办法来阻止历史力量的前进。改变巴西的政权和結構的必要性是十分迫切的。而“根本改革”为改变巴西政府开辟了道路。因此，軍隊进行干預了。这种經驗是十分具体而明显的。

苏斯洛夫的演說不仅是針對中国人，而且也針對着所有的共产党，針對着在各共产党內部以及在苏联自己內部存在的各种傾向。

当苏斯洛夫认为有必要发表这一文件的时候，那是因为已經沒有可能同中国人达成協議了——尽管他們之間有着許多擁抱接吻，也不可能达成協議。周恩来用一种机会主义的和不協調的方式說赫魯曉夫是恶棍和废物，然后又祝他长寿，說他是一个伟大人物。沒有必要这样做；即使为了外交礼节而要祝賀他，那也有一些別的做法。当然，所有这些都說明中国領導人的政策有矛盾，以及中国人缺乏理解力和革命一致性。

这对于这些官僚們是一种危險，因此苏斯洛夫譴責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波薩达斯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他們譴責中国人遵循

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路線，他們不僅警告中國人，而且警告所有的官僚們。他們還對資本家說：我們反對這樣。這是他們對資本主義所做的保證之一；我們在“光榮地”保衛着資本主義和蘇聯的共同利益。沒有人能夠譴責他們的革命立場！他們正在做國際告密人的事情。其重要性是極其微小的，因為這些問題都是公開的問題。但是他們對資本主義說：我們反對這樣做；這就是說，他們向他們的同盟作出保證，他們要負責攻擊每一種革命的政治路線。這一文件不僅是針對中國人的，而且也是以一種具體的和使人信服的方式，對資本主義做出的保證。實際上，他們在向約翰遜說他們要保持聯盟，“看看我們反對所有這些事情，我們批評這樣一些立場，即那些反對和平共處、加速核戰爭和迫使殖民地不顧任何犧牲來進行革命的立場”。

將要表明中國人取得進展的最重要的問題，是當中國人對蘇聯人提出要求的時候發生的。這是一種組織方式，沒有它中國就不能取得進展。跟由於蘇聯辦法缺乏而可能取得的進展比較起來，現在的進展只是百分之五。

赫魯曉夫譴責中國人提倡派系活動自由，並不是由於偶然，因為中國人的立場顯出了這種情況。

這些官僚們提到托洛茨基主義，直接攻擊第四國際，也是因為他們感覺到：在社會陣營里，在某些工人國家里，在各國共產黨里，形成一些革命傾向的條件已經成熟了。他們感到他們在第四國際的思想的面前非常虛弱。他們沒有感到我們的實際的有機的物質力量，但是這種巨大的思想意識方面的影響就將變為一種物質的力量。馬克思說過，每一種在客觀上是正確的和必要的立場，在明天都將由於自己的歷史力量而變成為一種物質力量。

（譯自第四國際英國支部機關刊《紅旗》1964年8月號）

四五、赫魯曉夫下台反映工人國家 面向政治革命前進了一步

赫魯曉夫下台、中國核試驗以及英國工黨的勝利，提供了最新的例證，說明世界革命過程的發展是非常迅速的。只有第四國際，特別是在波薩達斯的文件中，在不久以前預料到赫魯曉夫的下台。這些事件使得所有資產階級評論員都感到驚慌失措，難過萬分。蘇聯前總理和黨的領導人的下台，乃是蘇聯官僚集團日益分崩離析、無法應付中國人的挑戰和不能滿足蘇聯群眾的要求的必然結果。蘇聯官僚集團的戰略現在處於混亂之中。他們趕緊向西方保證說，他們將繼續執行“和平共處”的政策——但是這絕對不排斥紅軍領袖們在赫魯曉夫下台的問題上起了一些作用，因為赫魯曉夫對於軍事開支的態度是有害於工人國家的國防的。在這一官僚集團中，有一些人是準備進行核戰爭的——不依靠世界人民群眾，也不希望在經過戰爭之後他們的官僚體系還保持完整。在蘇聯的“和平共處”的應用上，很可能要強硬一些。另一方面，全體一致同意廢黜赫魯曉夫，並不意味着官僚集團的團結一致，也不意味着一段穩定時期。實際上，最近這些事件促進了工人國家中的政治革命——由於世界人民群眾的壓力，由於蘇聯人民群眾願意參與世界革命的過程，也由於他們願意參與管理經濟和重新建立一種蘇維埃民主，所以在官僚集團里存在着許多派系。

赫魯曉夫被廢黜的結果，也非常清楚地表明國際斯大林主義運動的解体。象離開一條沉船的老鼠一樣，西歐和東歐的各種老朽昏聩的官僚分子，現在只是設法儘快地使自己適應資產階級的

自由主义，装作是苏联官僚們的质問者，并且开始实际提出一些麻煩問題——这种权利，他們是不給予革命者的，特别是当它涉及到他們自己的官僚主义措施的时候。最近的事件把这些可怜的人弄得四分五裂，并且进一步破坏了他們还拥有的一些力量。

中国领导人的胆小怕事

中国核装置的爆炸，大大鼓舞了殖民地人民群众，后者是很重視中国同志在中苏爭論中的革命結論的。然而，目前中国领导人的絕望的保守主义和革命的需要显然背道而馳。召开“和平”會議討論銷毀核武器这一梦嚮，并不能增加中国领导人的声望——这只是反映他們有着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反映他們相信外交是群众活动的代替品，反映他們在巨大的世界革命过程面前胆小怕事。面对着越南政权的惊人崩潰和无产阶级的以总罢工为形式的干預，他們采取了非常明显的被动做法，不肯介入其間，对此我們必須加以批評。

約翰遜中断了竞选活动，召开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来討論赫魯曉夫下台和中国核装置爆炸所造成的局势——世界帝国主义感到非常不安，它担心工人国家的发展。戴高乐訪問拉丁美洲，并且威胁說如果在农业問題上不能取得让步就要离开共同市場，这都反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这一軍事同盟內部有着无尽无休的裂痕并完全缺乏信心。整个世界局势在鼓舞着世界人民群众；通过他們的斗争实验，也促使第四国际更有可能在到处都溶合在这种斗争之中，并且把自己提高到最高可能的自觉水平——走上担任群众共产主义国际的新的世界领导任务的道路。

(譯自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机关刊《紅旗》1964年11月号)

四六、中苏分歧的发展^①

波薩达斯

从上次會議提出关于中苏分歧、关于資本主义的危机以及关于欧洲共产党和社会党等文件以后到現阶段，中苏分歧的发展已經进入某种“死胡同”。这是一条明显的死胡同，在其中，似乎只有一种程度已經减弱的公开爭論和論战；但是实际上，通过上述文件中已經討論过的一系列因素和行动，这一分歧正在准备上升到更为激烈和带有进攻性的阶段。这就是說，苏联官僚集团和前进中的中国革命的利益之間，沒有調和的可能性。中国革命歪曲地、殘缺不全地表現着必須进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这同苏联以及各工人国家的官僚阶层的利益发生矛盾，而且将发生更为尖銳的矛盾。

这一分歧的深刻化，其基础表現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苏联官僚集团在他們打算同中国人和解、并在某种程度上应付世界革命的某些压力的范围內，采取了一些保卫或者說是呼吁支持殖民地人民斗争的官僚主义措施；另一方面，在苏联内部出現并发展了一种关于苏联經濟計劃問題的十分尖銳而深刻的爭論。有一种趋势打算走向接近于資本主义的水平，即所謂“市場經濟”。赫魯曉夫和利別尔曼之間虽然有着意見分歧，但他們都打算取消和避免对經濟的控制、計劃管理和計劃集中化，想要使經濟自由化，并使每一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直接跟市場相接触。即使还服从集中

^① 这是 1964 年 12 月波薩达斯在第四国际国际書記处全体會議上所作的报告。
——譯者

化,还服从国家的控制,这一措施的发展也为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开辟了方便之门。这就不仅要支持和平共处政策,而且要破坏苏联经济本身的某些基本基础和部门。这跟中国革命的利益和必然性,跟殖民地革命以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构和发展,是直接矛盾的。矛盾的基本原因就在于此;没有和解的办法,也没有和解的可能性。

官僚集团不可能回到集中化,也不可能服从集中化,因为这跟这一官僚集团的基础是不相容的,他们都是工厂经理、行政人员和苏联人民中的特权阶层。从国际观点看,对外政策乃是国内政策的继续。苏联官僚集团不得不继续实行和平共处政策,因为这是为国内经济结构的利益所决定的。

中国人的立场就完全相反了。他们不可能跟帝国主义和解,帝国主义也不可能跟他们和解,两者也不可能互相让步。只要中国工人国家继续实行集中的计划,它的对外政策就必然跟苏联官僚集团的政策完全相反。它并不完全排斥或消除跟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和解的倾向,及其临时的或局部的影响。但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基础不允许长期地和在一种世界规模上跟帝国主义和解。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政策,总有自相抵触之处,既确立革命的立场,呼吁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又有主张跟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和解的倾向和立场。

但是,将要决定和正在决定中苏分歧的这一矛盾的主要基础,不是中苏分歧本身。这一分歧集中地反映世界革命的过程:在中国人方面,反映世界革命的进展;在苏联官僚集团方面,则反映跟世界革命过程相反的东西。这一分歧最后将由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来解决。任何一方都不能控制或支配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这一明显的中苏分歧,只是世界革命必须前进的一种无意识

的、間接的和歪曲了的反映。資本主义不能妨碍世界革命的发展。無論从經濟、社会、政治或軍事方面說，它都沒有力量来阻止这种发展。刚果、越南和古巴的情况，以及伊拉克、伊朗、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中革命的发展，都是明证。

赫魯曉夫的下台預示着一个有深远意义的历史阶段，因为这是清除和平共处政策和官僚集团的开端。但这只是一个开端，因为它并不意味着清除整个官僚主义的领导。官僚集团力图保全自己，作了一些自相矛盾的让步。虽然他們打算采取一些比較贊成殖民地人民和被剝削人民革命的政治立場，可是他們的具体的和历史的立場，却是要跟資本主义共处，跟資本主义結盟。但是，赫魯曉夫的下台并不是无益的。这是殖民地革命、无产階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力量的一种不自觉的間接的表现；这种革命蓬勃发展，力图摆脱这种官僚集团。前述国际書記处決議中所引述的官僚集团的声明，即柯西金的声明（他說：“如果不促进工人的积极性和自治，如果不讓他們参加解决所有生产問題和国家組織問題，如果不在各方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那么，就不可能达到先进資本主义国家所达到的高度生产水平。”）和勃列日涅夫关于无产階級民主的声明，乃是对苏联人民群眾的第一次答复，也是一种让步。他們打算跟人民群眾保持比較密切的关系，但这只是官僚集团的一种手段。

在巨大压力下的官僚集团

官僚集团取消了赫魯曉夫，以便繼續維持下去。苏联官僚集团后来的声明表明，他們受到来自苏联人民群眾和来自世界革命的巨大压力。因此，他們倾向于、或者假装要、并且也不得不暂时地部分地反对帝国主义，这跟以前赫魯曉夫所实行的和解政策和

共处政策是有所不同的。在对待刚果、阿尔及利亚、古巴、越南的态度上，这一官僚集团的声明，也跟赫鲁晓夫的声明有所不同。如果说仍然存在着和解政策和共处政策，那么，同时却也有着一种假装要大力支持北越、或呼吁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即使这只不过是假装要保卫刚果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也说明：苏联官僚集团已屈服于一种来自无产阶级阵营内部、来自苏联各个社会集团的巨大压力；这些社会集团正施加压力，以求实现跟世界革命的团结一致。这是一种不自觉的过程。它既不是由中国人自觉地指导的，也不是由其他革命运动所指导的。因此，它的情况是矛盾的、混乱的和游移不定的。但是，以赫鲁晓夫下台为起点的明确路线，乃是各种力量正在施加压力以求摆脱苏联官僚集团的一种继续不断的过程。最后，苏联官僚集团的一切图谋、谈论、声明和外交策略都向左面转。尽管他们只是假装采取左的立场，只是使自己适应于左的立场，可是这也表明：他们希望满足苏联人民群众的、各国共产党的以及殖民地革命的巨大压力。这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赫鲁晓夫的下台仅仅是开始；这一过程还没有找到自觉地表现自己的有机形式。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国家的领导方面，也还没有一种自觉的领导。

中国领导人没有依靠人民群众

在中国人谴责和攻击苏联官僚集团的新领导人——象谴责和攻击赫鲁晓夫一样——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制订一种纲领，并没有依靠世界革命和人民群众的共产国际，他们并没有公开要求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革命，没有主张必须实行工人管理和对工人国家经济的社会主义管理，他们并没有要求各工人国家的工会、工人中

心和共产党无条件地参加世界革命。結果，他們用行政的形式和官僚主义的方法，进行着一种爭論；这一爭論虽然在表述方式上是正确的，但在組織形式上和在政治行动上行政的和官僚主义的，因此，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吸引人民群众的磁极。这一过程处于“死胡同”之中，其原因就在于此。这一“死胡同”的情况如何，无从确定，因为中国人沒有取得进展，苏联人也沒有取得进展。但是，这一“死胡同”的路綫，这一矛盾过程的压力，却有利于革命的发展。

中国人的声明和中国人的态度，都比以前更左一些，但是他們仍然只是停留在外交外面。关于刚果事件，中国人举行了三百万人的游行示威，这是很小的游行示威。在一个由工人国家管理和統治人民群众的七亿人口的国家里，三百万人是微不足道的。并不是中国的人民群众不願意游行示威，而是领导人沒有加以鼓励、号召和組織。但是，三百万人举行了示威以及毛泽东自己领导这次示威的事实，說明他們打算从左面施加压力。这是一种胆小的、外交的和官僚主义的办法。

在中苏分歧中，这一过程所将取得的形式，不会是这样双方爭論的結果，而是世界革命的压力的結果。世界革命向前推进，这使中国人不得不采取一些贊助世界革命发展的（即使是自相矛盾的）立場。这种过程还不明确，但革命立場却已有了重大的具体的进展了。革命立場的这种重大的具体的进展，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直接地或間接地呼吁支持殖民地革命上。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并沒有伴随着一种具体的政策。中国工会和中国共产党并沒有动員一亿人来支持这种說法。因此，分歧进入了死胡同。这就是說，它不具有充分的傾向。但是，在这条“死胡同”中，趋势是有利于革命的。

苏联的官僚集团退却了。他們的退却并沒有深刻的意义，但是他們退却了。他們的退却并沒有做出重要的让步，但是，推迟召

开譴責中国共产党的會議，声明譴責帝国主义，呼吁保卫古巴、保卫越南，軍人声明反对帝国主义、声明支持刚果革命——即使这些声明后面并没有任何有效的具体的措施——所有这些，在苏联官僚集团的和解政策的范围内，确是向左让步了。这是世界殖民地无产阶级革命的压力以及苏联人民群众的压力结果。

由于没有集中的群众组织，由于没有工人的世界中心，由于没有群众的共产国际，所以人民群众不能更多地进行干预。当中国人和苏联人力图把这一分歧局限在两个领导集团的轨道之内，互相控诉、互相谩骂、互相譴責的时候，为了使这一分歧确切地有利于世界革命的发展，有必要让人民群众进行干预。凡是跟工人国家有关的事情，凡是跟人类进步的最高形式即革命和工人国家有关的事情，都跟人民群众有关。人民群众必须进行干预。中国人没有请求人民群众进行干预。他们只是请求人们攻击苏联的官僚集团，而没有请求无产阶级采取行动，这种行动才是人民群众进行干预的最高形式。

必須建立世界統一戰綫

为了施加压力使这一分歧走上唯一进步的道路——革命的发展——人民群众进行干预是必要的。共产党、工会和中国工人中心有必要请求全世界人民群众讨论这一中苏分歧；并以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共产国际、单一的世界群众中心、各单一的地区中心（拉丁美洲、亚洲、非洲、欧洲）等等綱領的世界斗争为基础，建立一条全世界人民群众、各工人政党、各工会、各工人国家的統一戰綫。

有一件事实说明革命的巨大影响，也说明苏联集团必须对革命作出让步，这就是，关于建立世界人民群众和工人国家的統一戰

綫的呼吁，被以一种經驗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方式提出来了。中国共产党也呼吁建立被剝削的人民群众和工人国家的統一战綫。这种提法是正确的。但是綱領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世界无产阶级的各領袖、各趋势、各革命思潮必須把这一空洞无物的呼吁接过来，把它跟人民群众联結在一起，把它跟各国人民群众爭取特殊綱領和总綱領的斗争联結在一起，以便在各共产党的一次世界范围的討論中得出結論。但这决不能是一种經驗主义的議會式的外交討論，而必須具有把关于中苏分歧的討論和夺取权力的斗争联結在一起的目的。解决中苏分歧这一問題的方式，必須服从并結合各国、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群众夺取权力的斗争以及各工人国家人民群众爭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

帝国主义力图利用这一分歧来从中取利。它沒有力量做任何別的事情。它不能进行干預。它的干預能够通过中苏分歧所反映的矛盾而得到便利，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可能从政治上或从軍事上进行干預，因为它不具备进行这种干預的历史立場。必須放弃那种认为任何工人国家都有可能回到資本主义的想法；資本主义沒有力量进行这种复辟。尽管象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有着通过自由經濟竞争来促进内部和外部資本主义影响的态度和官僚主义倾向，可是工人国家的力量、結構和国际关系都要比工人国家中官僚集团的跟資本主义和解的政策优越得多。另一方面，每一殖民地革命都倾向于并且力图把它自己跟工人国家联合起来，阿尔及利亚、桑給巴尔、刚果都是如此。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正是由于这一前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世界工人运动的共产党的各倾向、各干部、各革命思潮都必須干預这一中苏分歧。

世界革命間接地干預中苏分歧

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在适当时机发动热核战争。当帝国主义准备从中苏分歧中取得漁翁之利的时候，人民群众的革命却正在繼續不断地向前发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資本主义的稳定性，即使在欧洲也沒有。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能够維持一段历史时期的資本主义稳定性。在具有共同市場的欧洲，大罢工以及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胜利表明，資本主义归根到底要依靠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和解政策。在世界范围的革命发展这一基础上，中国人必須呼吁世界人民群众来干預中苏分歧；这种呼吁决不能是要世界人民群众来决定在这一分歧中哪一方是正确的，而是要他們干預階級斗争和革命斗争；爭取群众的共产国际，爭取单一的世界中心，爭取无条件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爭取工人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民主，爭取建立广泛的世界反帝統一战綫和世界无产阶级的統一战綫，爭取成立工农义勇軍，爭取无偿地沒收民族企业和帝国主义企业并把它們置于工人管理之下，在資本主义国家中爭取发展双重权力的組織，并且爭取組織苏維埃和公社。要在中国、在古巴、在各工人国家組織苏維埃和公社。要实行工人国家的經濟計划化，让人民群众通过工人管理来进行充分的干預。要建立最充分的无产阶级民主和法律，建立工人政党的大多数，来无条件地保卫工人国家和苏維埃无产阶级法律。要成立人民法庭。要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革命，要給以足够的軍事的、技术的、經濟的和財政的援助。要斥責联合国組織是帝国主义匪帮的一个基地。要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无产阶级統一战綫。要在所有国家中取消帝国主义的核武器和軍事基地。要成立地方的和洲的苏維埃联盟。如此等等。这是一种将会解决中苏分歧的綱領。

殖民地革命、无产階級革命以及欧洲階級斗争的发展，是間接地而不是直接地干預中苏分歧的基本因素。它們表面上似乎不甚重要，但是它們是基本的决定因素。各共产党的危机是中苏危机发展中的一个基本因素，但是同时，这一危机又表现在一种革命发展之中。欧洲社会党和共产党在选举上的胜利，就是一种确切的例证。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必須求助于人民群众的共产国际，来建立被剝削国家、資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群众和工人国家的世界統一战綫，无条件地保卫无产階級革命、殖民地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人民群众的共产国际。还要作好預防性战争的准备，以便使帝国主义得不到任何好处，而让人民群众和工人国家能够在这种預防性战争中得到利益。因此，全世界人民群众都要团結在人民群众的共产国际的綱領的周围，在各个国家中不惜冒任何风险努力夺取权力，因为这是保卫人类，使不遭受資本主义所要进行的热核战争的危險和灾难后果的唯一办法。

中苏分歧并不是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間的分歧，它只是世界革命发展在这时所采取的一种形式，一种歪曲了的形式。这一問題的解决，要結合着并服从于殖民地和无产階級革命以及工人国家中政治革命的发展。

第四国际的呼吁

第四国际呼吁全世界人民群众进行干預，呼吁各国共产党、意大利統一无产階級社会党、苏联工会和中国工会、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工会和工会中心、古巴工人国家的政府、各工人党和群众反帝运动、桑給巴尔、阿尔及利亚、加納、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現阶段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都在具体斗争中采用这一

綱領，在各个国家中推翻資本主义，夺取权力，建立以苏維埃和公社为基础的工农政府，推行革命的綱領和世界革命战略，建立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以及資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統一战线，从而建立人民群众的共产国际。

（譯自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机关刊《紅旗》1965年3月号）

四七、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全体 会议向古巴同志致敬

亲爱的同志们：

在国际书记处于 1964 年 12 月重新统一之际，国际书记处全体会议十分满意而高兴地向古巴支部的同志们致敬；向我们在监狱中的同志以及忍受古巴革命领导人的迫害和威胁的支部的崇高革命行为致敬。我们相信我们的同志不久就能得到自由。我们相信这一点，不是因为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不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政党在人数上和力量上都有了增加，而是因为我们的力量的相对增加乃是世界革命力量相对增加的结果。

这一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将直接有利于第四国际，支持它的斗争和立场；这就是中苏危机，即中苏分歧，它是世界革命向前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危机产生、刺激和推进了各种革命势力，使它们直接参加斗争来寻求并应用革命的纲领——即争取无产阶级政权和在工人国家中发展革命势力的纲领。

中苏分歧的影响

最近在香港，一位高级中国领导人（未说姓名，但意大利新闻记者曾访问过他）说，苏联有两千万个资产阶级分子。中国人应该说这是官僚阶层。他们自己不把这些入叫作官僚，他们掩盖这种出身来历，因为否则他们就要把斗争抬高到政治革命的水平。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和平地逐去这些官僚，取代他们。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不能不提到这两千万人并将其列为新资产阶级，这

是因为他們已經了解到：存在着这些官僚这一現象，乃是苏联工人国家发展中絕大多数弊害的根源和基础。

中苏分歧在古巴有其影响。奥多基的清洗，桑切斯的清洗，格瓦拉的介入欧洲和联合国，他自己的演說（这些演說既是和解的混合物，也是对革命的号召，在某种意义上說是很勇敢的），都說明在古巴内部有一种十分深刻的过程在进行着，不久就可能发生变化。古巴是介在中国和苏联之間的。它在經濟上依賴其他工人国家的支持。它在經濟上依賴別人，是因为它的領導人在制訂工业发展計劃方面有錯誤，这些計劃使得古巴要依靠苏联的支持。毫無疑問，它在商业上必須同各工人国家联結在一起，它必須同它們进行貿易。但是，它并不一定要依靠它們。而且，在政治上它也不必依靠它們，不必順从苏联官僚們的指揮和压力。古巴革命領導人还没有能把工人国家和工人国家領導人这二者区分开来，在这二者之間同在工会和工会領導人之間一样，是有所区别的。

作一个工人国家的領導人，并不意味着他就是这一工人国家的合法的、正确的和忠实的代表，正如一个工会——如阿根廷、巴西、智利、意大利或法国的工会——的領導人并不意味着就是这一階級和人民群众革命利益的代表一样。但是古巴是处于中苏分歧这种压力之間的，并且接受它的影响。古巴的一般傾向表明，这一工人国家的基本群众不肯屈服于苏联官僚集团。

世界力量的对比有助于古巴支那

古巴政府的这种超然态度，实际上意味着苏联官僚們失败了。即使古巴政府在經濟上和財政上依靠苏联，它也沒把自己同苏联直接联到一起，这并不是因为它同中国人結成联盟，而是因为它的基本群众不肯这样做。在去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曾說：“赫魯曉

夫是一个伟大人物，有智力，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一个伟大的馬克思主义者。”赫魯曉夫被赶下台了；他們在中央委员会里都不提到他；他們甚至不表示歉意，也不想念他，也不組織集会。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只字不談。然而，尽管他只字不談，为了掩盖他过去的錯誤，他也不得不作了一項声明，这一声明至少表明他将不屈服于苏联官僚集团的新领导。这并不是一种支持赫魯曉夫的立場——他以前是采取这种立場的——而是一种抗拒的立場。

奥多基的清洗，桑切斯的清洗，乃是中苏危机的一种表现，是古巴工人国家内部压力的一种表现，它要清洗这些官僚。既然人民群众不能通过它的組織来做到这一点，那就要通过这些斗争和矛盾来加以清洗了。我們說我們的同志即将得到自由，其原因就在于此。他們将得到自由，是因为力量的对比有利于世界的不断革命。这不是因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人数已經成百万地增加，而是因为世界革命影响的效果是与此相等的。

但是同时，我們的古巴支部繼續以它的牺牲和力量，来建立一条反恐怖政治、反迫害、反监禁、反匱乏的战綫，以牺牲和力量来面对一切困难。它必須繼續它的活动，参加这一过程，不要把自己分裂开来，也不要对这一支部或那一支部采取一种独立的态度，而是要积极地保卫和支持那倾向于形成一个革命陣地并毫无条件地支持它的支部。无需停止批評。有必要了解：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并不是来自这一过程，在思想意識上和綱領上也不是馬克思主义者。他們現在正在学习他們的馬克思主义。古巴领导人的錯誤和苏联官僚們的錯誤，其基础是不同的。后者犬儒式地保卫它的保守利益。

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对于人民群众沒有必要的历史的和具体的信心。他們沒有馬克思主义的意識形态；但是他們反对官僚化。

这种反对并不是由于他們的特殊品格，而是由于人民群众的巨大阻力，这种阻力阻止他們官僚化。这是因为古巴的人民群众过去、現在和将来都象苏联人民群众在其早期那样能够积极地进行干預。在古巴的主要阶级組織中，人民群众能够施加压力，因为古巴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发展过程中成立的，而且是十四个工人国家之一。这就是古巴革命的力量。就是由于这一原因，我們的支部必須进行干預，无条件地支持消灭官僚主义者的工作，要消灭一切使古巴革命屈服于苏联官僚集团的企图，无条件地支持古巴政府扩展革命的号召，反对和平共处；同时为了帮助古巴革命領導人和人民群众，要积极参加生产工作、軍事工作和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但是同时也要要求并爭取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

所有古巴問題都應該公开討論。有必要充分而公开地討論中苏危机、經濟困难、反帝国主义斗争以及拉丁美洲革命的問題；要研究世界革命的最高局势——如在危地馬拉——并开始加以利用；要推广这种討論。重点不要放在批評古巴革命政府上，而要放在进行和推进这种討論的必要性上。在这一方面，要反对限制这种討論的任何事情，但是同时也要了解古巴革命領導人的局限性的性质——这我們已經解释过了。古巴革命領導人由于他們的性质、意图和利益，并不是官僚，但是他們采用了官僚主义的和行政的方法。上面所說就是使我們的同志获得解放的道路。

危地馬拉革命的升級

危地馬拉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推动其他拉丁美洲革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它也推动古巴前进，它已部分地在古巴有了影响。要对革命关门，那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說过，任何人类的、社会的、物质的、軍事的力量，都不能阻止进步思想的进入和渗透。

这是阻止不住的。因为吸收和拥护进步的思想，乃是历史发展的本性。危地馬拉的革命表明它是殖民地革命的最高表现。它直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古巴支部必須維持它的出版物，即使有很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它必須爭取領導地位。它必須努力使有斗争性的工人来专心致志地討論国际問題。它必須努力使人們公开討論奧多基被清洗以及桑切斯自杀的原因。要討論这些事件并作出結論來說明：这一工人国家的巨大力量在犯了錯誤和造成損失已經几年之后，只是在最近才清除和罢免那些負責的人。而工人管理在一个月內就能糾正这些錯誤。我們的同志必須提出的基本口号之一就是工人管理。工人管理并不意味着要取代革命的領導人，也不意味着要同他們相对抗，也不意味着要推倒他們。不是这样。工人管理是要促进經濟发展和生产，要防止浪費、盜窃、不公平分配、官僚化、謀取暴利、濫用职权以及市場內部的巧取豪夺。这就是工人管理。此外更重要的是，在所有問題上，要永远使政治活动保持活跃而統一。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赫魯曉夫下台之后，第二天，柯西金就发表了一項声明，这个声明后来被遺忘了。他說：“如果不促进工人的积极性和自治，如果不使他們參加解决所有問題（不仅是生产問題，而且也有国家管理問題），不发展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民主，那么，就不可能达到最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所达到的劳动生产率的高度水平。”毫無疑問，他說这段話，是要用它来制服、安撫、滿足和欺騙苏联无产阶级和苏联的人民群众，以便使他們相信：赫魯曉夫的改革将借此而繼續实行，而这就是这种改革的根源。也就是說，他是要寻求人民群众的支持，以反对各种各样的傾向，包括軍隊中的一些傾向，以及这一官僚集团中其他部分（如工厂和工业經理）的一些傾向。

在古巴，必須应用这一結論。这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結論。它的表述方式是不够的，但是其基础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这就是工人管理，必須在古巴应用它。它既不会妨害生产，也不会延緩生产；相反地，它会促进生产。它也会提高工人階級的領導能力。工人国家不是光由政府領導的，它要由全部人口参加領導。資產階級議會同工人国家的政治和社会領導之間的区别，就在于全部人口应参加領導。不光是說“是”或“否”，而是要发表意見、作判断，并提出关于政策必須如何如何、情况必須如何如何以及生产必須如何如何的标准。在古巴，必須充分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这是我們的同志必須爭取的事情。

同时，支部必須了解，帝国主义侵略古巴的新嘗試已迫在眉睫了。我們的同志必須站在最前綫。

我們的在監獄中的同志們，必須繼續他們的有价值的工作：在監獄里教育自己，为革命准备干部，完成獄中領導人所分派的使命，以馬克思主义教育犯人。这意味着一种极有信心的态度，說明我們的同志不是作为反革命、而是作为革命者而被捕入獄的。这种監禁不是由于托洛茨基主义、革命活动同政府之間有着互不相容和矛盾之处，而是由于古巴工人国家的領導人的政治局限性和某种程度的保守主义。如果不是这样，我們的同志的爭取工人管理、爭取社会主义民主、爭取发展革命的斗争，就不会同現在的革命領導人有任何矛盾和互不相容之处。在短期內，我們的同志必将得到自由。

古巴支部的同志們，整个国际都带着深厚的感情和休戚与共的精神，来注視着你們的活动和牢獄生活。但是，由于世界革命的发展，你們即将获得自由，而且在短期內即将获得自由。有必要使我們的活动永远活跃，即使有很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要站在反对

反革命的斗争的最前列，要預見到美帝国主义的新进攻，要使古巴工会中心参加整个拉丁美洲和世界的革命，要使它参加进来并給它以支持，从而使每一工人国家中以及古巴的每一工作、活动和生活的地点都有着一种內在的政治生命，同时要預見到帝国主义企图侵略古巴这一巨大斗争的以下几个阶段，并为它作一些准备。作为这种准备工作，必須不断地发展和維持我們作为一个政党、作为一种組織的活动，要努力爭取政府公开承认我們，就象古巴人民群众承认我們一样。

古巴支部的同志們，不断革命的不断的世界范围的发展，不久即将使你們离开古巴革命的監獄。古巴革命的領導人为了他們的爭取不断革命的权利，而把你們逮捕入獄，这将成为并且永远成为他們的丢臉的事情。

国际書記处

波薩达斯

1964年12月17日

(譯自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机关刊《紅旗》1965年3月号)

四八、第四国际英国支部革命工人 党(托洛茨基主义者)致“击败 修正主义争取共产党人团 结委员会”的公开信

同志们：

英国共产党的危机反映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反映着英国共产党没有能力适应英国的革命任务，这一危机终于导致了击败修正主义争取共产党人团结委员会的成立。

委员会已经提出，有必要在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国家和革命的列宁主义的看法，在英国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因为英国共产党的领导背叛了这些原则和看法。英国共产党是一个社会民主党，要想从内部，比如说，从它的中央委员会去把它争取过来，那是不可能的，必须从外部加以摧毁。必须有新的领导来在英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希望可以把英国共产党的今天的改良主义的领导争取过来，因为这个党是工党的附庸，而工党呢，又是资产阶级国家的附庸。

二十五条

托洛茨基主义者支持上面这些结论。但是英国共产党的蜕化变质并不是昨天才开始的。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斯大林时代开始而又在赫鲁晓夫时代继续下来的蜕化变质的长过程的一部分。斯大林的忠实信徒今天就是赫鲁晓夫的最忠实的信徒——陶

里亚蒂、多列士、高兰、伊巴露丽、丹吉、普列斯特斯、柯都維亚、布拉斯·罗加无不如此。这就是斯大林所建立、赫魯曉夫所继承的队伍和国际领导。

逃过了斯大林的控制、经过艰巨和胜利的民族战争和社会解放战争而使革命在人民中国取得成功的领导，就是今天反对赫魯曉夫及其支持者的妥协投降政策的那个领导。

托洛茨基主义者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二十五条的革命结论。从一开始，我们就无条件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赫魯曉夫修正主义、争取革命地改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在拉丁美洲，编辑出版中国同志的主要文件并予以广泛传播的，正是第四国际。

这并不是说，我们同意中国同志们的全部主张，而是说，我们同意从二十五条、从谴责陶里亚蒂、多列士、印度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那些文件里得出的革命结论。

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分析、也没有向群众解释自己过去的政策，却采取机会主义的形式来为斯大林辩护，而二十五条的纲领客观上则正是反对斯大林的那些原则和政策的。

尽管中国同志们的纲领有着革命的内容，他们在所有共产党里还是得不到巨大的响应，迄今还不能在这些党的外面组织起强有力的倾向，这就并不奇怪了。

仅仅谴责赫魯曉夫，重申列宁的原则，是不够的。

革命客观上正处于剧烈变动的过程中，要组织革命的新的领导，如果采取了革命的立场，同时又伴之以机会主义的保留和行动，那就决不能贯彻始终地完成任任务。

最重要的是，必须揭露赫魯曉夫主义的社会根源，即在苏维埃工人国家里当权的特权官僚阶层。

委员会说得对，必须在英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是不

能仅仅在一国的范围内考虑这个任务。这是一个世界任务，其軸心今天就在于中苏論战，只有通过二十五条的討論来完成。

今天，全世界正处在令人目眩的革命过程中，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大陆都不例外。工人国家必須以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国际政策，作为世界革命的工具，去干涉这个过程，中国同志們的立場客观上就代表着这种必要性。

同样地，为这种政策所作的斗争是世界革命过程的一部分；它是工人国家內政治革命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些国家里，无产阶级和群众进行着斗争，以恢复对他們自己国家的领导权，并重新建立起列宁主义的领导——首先在苏維埃国家里建立起来。中国共产党的斗争部分地就是对这一必要性的回答。

和平共处

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也是对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之間、工人国家和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之間結成綱領性联盟的必要性的回答。赫魯曉夫领导在同帝国主义的談判中，在和平共处的名义下，背叛了所有这些原則，不但放弃了革命的任务，而且扮演了极度反革命的角色，用和平共处的名义反对任何地方的革命。

在帝国主义的两个头子，即教皇約翰二十三世和肯尼迪今年死去的时候，这个卑鄙可耻的角色暴露得再生动沒有了。在这两次事件中，苏联官僚阶层和它的佣仆跟资产阶级同声痛哭，在对革命的共同恐惧中双方勾結在一起，因为革命将要剥夺资产阶级和官僚阶层的特权。

謾罵不是綱領

但是对这一下流的蜕化变质进行謾罵，却是不够的。必須同

时对它的原因进行馬克思主义的分析，还要发展一个革命的綱領，借以把这些腐化了的領導集团所放弃和反对的无产階級任务担当起来。

这一綱領必須清楚地闡明当前历史阶段的根本問題，即战争与革命的問題。托洛茨基主义者說，核战争是帝国主义正在准备用来回答全世界革命的手段。帝国主义舍此别无其他防御手段。我們不要战争。但是帝国主义正在准备战争，而且具有发动战争的手段，因此我們必須准备迎接战争。在战争中，毁灭的将不是人类，而是資本主义。我們反对苏联官僚阶层所描繪的失敗主义的和駭人听聞的前景。尽管帝国主义会制造巨大的破坏，人类仍然会建設社会主义。我們必須准备把这个任务担当起来。我們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們对这个問題的結論，他們的結論是同第四国际多年来所支持的結論完全一致的。

战争和革命

委员会利用赫魯曉夫用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样論点，即說我們要战争，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者，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完全錯誤的态度。問題不應該这样提法。要战争的是帝国主义，我們是准备迎接战争，用对一切地方的群众的革命动員来粉碎战争，竭尽工人国家的全部人力物力来支持这种动員。在这个过程中，帝国主义会用战争来作出反应，結果会被清除掉。因此，重要的是先下手为强，发动預防战，进而先发制人，粉碎帝国主义正在准备的进攻。工人国家必須这样做。这是严格的馬克思主义的邏輯。委员会在这个問題上所說的一切，却都沒有正視现实所无情地提出的必要性。

必須使群众，使无产階級的最广大部分，使党准备好去夺取政

权。如果党被战争的恐惧、被共处的理论所瘫痪，那就不能作好准备，因为随着历史过程的发展，争取政权的斗争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世界核战争。

但是中心问题是要面对核讹诈。“社会主义的英国道路”是接受了核讹诈而作出的结论。高兰和赫鲁晓夫知道，英国革命会意味着帝国主义的核干涉。陶里亚蒂曾大致表示过这种见解，他说，意大利革命意味着战争，而战争则是人类的末日，因此，不可能进行革命，只好等待和平过渡。意大利共产党拥有强大的支持，如果执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夺取政权。但是接受核讹诈却意味着放弃革命政策的一切可能性。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同英国共产党一样，除了继续投降和背叛的旧传统之处，就毫无作为了。

“我们要权力”

但是在这个时代，要背叛而泰然无事是不可能的。在意大利，就象在法国、比利时和其他国家一样，二十五条纲领的主旨就是要重新组织力量，以面对采取革命政策，夺取政权的必要性。

当群众设法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刻，这一切力量正在发展。富有革命意义的罢工浪潮席卷整个意大利已经三年多了；法国无产阶级也举行了许多次罢工；比利时无产阶级进行了斗争，其中有1960—1961年的伟大的总罢工，那是被比利时社会党及其所谓“左翼”出卖的；西班牙无产阶级举行了英勇的罢工；在德国，虽然共产党的力量微不足道，而且社会民主党采取了投降主义的政策，工人们还是在各地高举红旗，游行示威，冶金工人还举行了罢工；法国矿工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尽管共产党举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旗帜。这一切事件清楚地表明了群众的情感和愿望：**我们要权力。他们**

被自己的領導出賣了，被理應成為革命中心的工人國家的哭哭啼啼的領導出賣了，他們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表明自己的心意，他們終於找到了這一句話：**我們要權力。**

建立新的革命的共產黨的問題，就是在这个形勢下提出的。英國無產階級並不處在這一歐洲道路之外，正如它並不孤立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向社會主義的波瀾壯闊的進軍，或孤立于工人國家群眾的鬥爭之外一樣。

在最近的補缺選舉中，有着倒向工黨的強大傾向；有些部門的工人，比較關心起共產黨來，儘管它執行着可恥的修正主義的政策；不斷發生的罷工和對工人的動員；工人們正自覺地準備把工黨選上台，儘管工黨的腐化的領導人執行着胆怯的政策；資產階級的社會危機使它在群眾面前的權威破了產；英帝國主義不能確立一種哪怕同歐洲共同市場（ECM）相仿的發展率，儘管工黨和工會的領導人予以合作；以上一切因素同世界和歐洲革命結合起來，促使英國無產階級在展望下一階段時，不是要改良資本主義，而是要把權力拿到自己手裡來。在這個形勢下，為了迎接這樣的任務，在英國建立新的領導，建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完全必要的。

霍姆政府是一個過渡政府。它自會盡力維持保守黨執掌的政權，但是它的基本目標是準備把政府移交給工黨。美帝國主義的頭子被刺喪命，牽涉在內的是是一個酒排間的老板，英帝國主義的首相却在略早一些時候被基勒小姐暗殺了政治生命。帝國主義的社會危機現在完全露骨地顯露出來了。

霍姆目前正在為工黨執政製造環境。他隨時得到工黨的合作。關於氫彈和核武器的全部討論就是這一準備工作的一部分。所謂為了英帝國主義的力量，任何政府都需要氫彈，就象需要女皇一樣，這已經由霍姆確立為不容置疑的事實了。無論氫彈還是女

皇，工党都接受了。

工 党

在这件事情上，工党及其领导人的所作所为无非是在执行他们作为英国资本主义的支持者的任务而已，他们同英国资本主义是联合一致，难分难解的。但是，由于工党必须多少适应工人基层的压力，它知道决不能割断同这个基层的联系，因而工党对于核军备的政策，表面上就显得不那么明确，比较游移不定。实际上呢，工党领导全部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政策。

资产阶级需要氢弹，基本上不是，或并不仅仅是为了对付苏联。当然也不是为了“和平谈判”。不管要花多少钱，核军备成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生死问题，这不仅由于经济上的需要，而且尤其是由于核军备的社会职能。

从经济观点看，军备生产维持着和平时期的资本主义运转。这种生产决不能由资本主义来转变为和平的用途。共产党要说服资产阶级，使它相信放弃军备生产，而把飞机出售给中国和苏联的好处，这是可笑的，而且是可鄙的。资产阶级经不起在这样的规模上同中国、苏联做生意，因为不用很久这就会导致它作为一个阶级的死亡。

从社会观点看，拥有核武器是对英帝国主义在群众面前残留的一点权威的決定性的支持。如果英国政府放弃氢弹，那么帝国主义仍旧保有投资的那些国家里的群众就会更加看清它的危机，更快地把它驱逐出去。但是最主要的是，那样一来，英国无产阶级争取权力的斗争将受到极大的推动，帝国主义的社会危机将进入大爆发时期。除了准备核战争，英国及世界资产阶级再也没有其他可以使自己团结一致的政策或前景了。

英国核軍备的目的特别是在于維持帝国主义对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群众的控制和权威。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与其技术发展相适应的軍备。要不然，它就崩溃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完全是同拥有核武器結合在一起的，这一点，保守党和工党的领导人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因此两者各以与其不同的社会基础相适应的不同表现形式来保卫这核軍备。

无论废止核武器委员会(CND)或者任何和平运动，除了和平共处政策，都没有丝毫远景。取缔核武器意味着粉碎资本主义。为反对核武器而斗争意味着夺取权力。在这一场合，核武器不是用来对付苏联的，而是对付社会主义革命的。就这样，美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阶层利用着核战争的讹诈。

要打破这一讹诈，必须组织无产阶级，采取在战前和战时夺取权力的政策。核武器并不改变无产阶级夺取权力的必要性。看到这个前景，霍姆正在为工党扫清道路，不是因为他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他看到工党将被工人选上台。霍姆正向他的阶级保证，要确立工党将在其中活动的结构。而工党呢，也接受这一点。所以，工党在敦提选举中获胜，证券交易市场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资产阶级对这一前景是早有准备的。

但是工党却专心致志于自己执掌政权。它不能不接受这一点，可是并不喜欢这一点。要是工党取得胜利，那么工人阶级和群众的压力一定是十分巨大的。当工党卫护资本主义的时候，它将面对这一巨大的压力。

《论坛》^①的作用

现在工党正组织它的全部防御体系以反对群众，它接受了冻

^① 工党左翼的双周刊。——译者

結工資，接受了國家收入委員會（NIC）和全國經濟發展理事會（NED），還接受了有利於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投資的“計劃化”——象蘇格蘭的計劃那樣，打算在不受無產階級鬥爭傳統中心影響的地區，用國家預算的津貼來創造現代投資區。

這些計劃都還不夠。工黨也在準備自己的左翼，以免被人拋棄並借以吸收革命的力量。在這一點上，《論壇》那樣的期刊將起作用。《論壇》增加頁數不是偶然的。它準備迎接這些新問題，起一種限制和牽制的作用。這樣做之所以特別必要，是因為無產階級新鬥爭的壓力和前景正在有加無已。

組織革命政黨的任務就是在這一形勢下提出的。正如擊敗修正主義委員會所說，共產黨是工黨的附庸，不過它是為蘇聯官僚階級服務的。

可是，在共產黨的周圍，尤其是在工黨的周圍，有著來自工人階級的許多戰鬥的革命者，這是組織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泉源。目前的任務是圍繞着一個革命的綱領和各個現存的組織把他們組織起來，在以後的階段里，這些組織將表現出工人們的全部戰鬥性，正如地方選舉和最近的罷工所已經表現的那樣。

在最近的行動及正在準備的行動中，工人階級已經顯示了把鬥爭統一和集中起來的決心。只有工會領導的做作和親資本家的政策起着制動的作用。但是通過車間代表理事會等非官方委員會，已經幾次表明了這種統一和集中的傾向。因此就引起了工會頭子們的迅速而強烈的反應，他們反對這種聯合一致的獨立行動。

現在一切部門都出現了鬥爭的徵兆，提出的要求有：增加工資，反對失業和解雇，保衛廠內工會組織，女工同酬，每周四十小時工作制等。

機械工人聯合會（AEU）最近取得勝利，增加了工資百分之

五，这表明，如果没有工会官僚分子的暗中破坏，本来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可以提出其他的要求（如四十小时工作制）。工会官僚分子确乎向老板指明，为了防止更糟糕的爆发，让步是可取的。面对不许加班的禁令，老板马上就同意增加工资百分之五。

但是建筑业工人取得的胜利为新的要求开了路。所有主要部门——造船、运输、冶金等等——都有同样的要求。

他们确立了整个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总的斗争的条件，统一了对工资、失业、假期、工时等等问题的要求。

必须决心举行总罢工，把总罢工组织起来，提出共同一致的要求，以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为后盾。资产阶级要抵抗这一进攻，既没有办法，也没有力量。

组织总罢工的任务客观上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但是无论工党还是职工大会（TUC）的官僚分子对此都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将竭尽全力反对总罢工。

可是，工人们所以要那么大力投票支持工党，这是因为这样可以更易于在总罢工中围绕着阶级要求大力团结起来。

这个纲领必须迫使工会领导接受，必须不顾工会领导的种种阻挠立即提出，必须在工厂和车间里讨论和通过。

车间代表理事会的存在和组织是工人手里的最直接的武器，可以用以领导斗争。必须把在所有企业里组织车间代表理事会的总口号推广到整个企业界去。

必须在各行各业里，在大会上，讨论和通过一个斗争纲领，争取成立车间代表理事会，争取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争取工人管理和国有化。

必须扩大斗争纲领，组织不同企业的车间代表会议，为总罢工作准备；组织工人的团结，各企业都举行罢工；尤其要组织工人的

團結，以對抗不管來自老板或工会官僚分子的压制。

車間代表

必須組織車間代表理事会的全国性运动，准备召开車間代表理事会全国大会，来討論工人阶级的一切問題和斗争綱領。

在無論哪个企业的工厂里，在工厂的無論哪个部門，必須討論这一前景，并且組織起来，到別的企业和部門里去寻求接触和支持。

在增加工資、控制工作条件和反抗失业的斗争中，基本要点是工人管理。在传送带的工作条件下，必須馬上由車間代表理事会实行工人管理，控制工时和工作节奏。

但是工人管理整个生产过程，管理整个自动化过程，同时也是必要的。自动化的全部好处必須用于提高无产阶级的生活标准。只有整个生产过程由工人管理，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同样地，为了同失业作斗争，必須設法进行其他工作，以阻止资本家利用失业工人来削弱工会組織和降低工資。

由車間代表理事会实行工人管理，是无产阶级綱領的基本要点。

这一切問題今天都直接面对着工人阶级。爭取权力的斗争，建立革命政党的斗争，夺取政权和建設社会主义的斗争，都要通过解决这些問題来組織。

必須放弃把工会和政治問題隔离起来的政策。工会领导人利用这个政策取消了一切前景，他們把最有战斗力的部門、最有战斗性的工人和車間代表仅仅限制在工会問題的范围內，而这种問題离开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是不可能获得真正解决的。

必須使工会的斗士，尤其使車間代表和理事会，把工人阶级的

政治任务担当起来。

車間代表和車間代表理事会大会不但必須討論当前要求的綱領，而且还应討論工人階級的全国綱領，包括工人管理，一切大中型企业的无償国有化，工人管理的对外貿易专营，清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一切帝国主义条約。必須要求同苏联、中国和工人国家进行貿易。必須提出立刻取消对古巴的封鎖，要在工人运动的帮助下派遣船只运送貨物去古巴，要夺取任何接受对古巴的封鎖、拒絕出售古巴所需物資的企业的設備和船只。

工 人 政 府

在英国建立工人政府以实现这一綱領的任务，就是在这一前景之下提出的。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必須根据这一前景来組織。

無論工党还是共产党，对这些任务都毫无兴趣。他們反对任何这样的前景，他們要竭尽全力来击败这些前景。但是工人們要把工党选上台，因为他們要在工党内部找到一个統一的中心，以一般地实现包含在这些任务內的前景，即英国工人政权的前景。在新的胜利、殖民地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发展、中苏論战和政治革命的发展等因素的推动下，通过世界帝国主义的不稳定和巨大危机，向着这一方向的斗争将要开展起来。在这一不稳定和危机的严重发展中，在英国工人階級的强大进军中，必須把党建立起来。

第四国际英国支部革命工人党（托洛茨基主义者）向工人們、工党內的革命战士們、共产党的战士們、击败修正主义委员会的同志們发出呼吁，請他們討論这个綱領和这些任务，討論和組織在英国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党的共同任务，討論中国同志們的二十五条以及組織一个新的群众性的共产国际的必要性，以求为执行共同

的革命任务而結成联合陣綫，大胆地貫徹革命的綱領。

由于委员会采取的立場而在共产党內造成的危机，不过是向革命方向前进的这一总形势的一部分和間接的反映。必須在上述有組織的綱領的基础上同群众打成一片。

这个任务不能在混乱中实现，也不能靠欺騙手段实现。欺騙手段是工党在工人階級中組織起来作为資本主义的仆从、共产党組織起来作为苏联官僚階层的仆从的基础。任何势力如果自欺欺人地脱离它的基础，就不能在这两党之外生存，也沒有前途。我們的任务是要进行斗争，反对欺騙的宣传者，不要利用他們那套誹謗和欺騙的手段。

我們党严厉批評委员会的同志們出于偏見或其他原因而一再加予托洛茨基主义的誹謗和捏造。同时，我們号召所有这些同志、共产党和工党的所有斗士以及所有战斗的革命工人，大家都来討論这个綱領并且組成統一战綫，以推进英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任务。

工党的竞选胜利、共产党的危机、英国革命的当前任务，都向工人們、向工党和共产党的革命战士們、向击败修正主义委员会的斗士們提出下列要求：

为总罢工作好准备工作和組織工作，迫使对方接受无产階級的要求！

保卫、加强、扩大車間代表理事会！

召开車間代表和車間代表理事会全国大会，討論和决定下一阶段无产階級斗争綱領！

建立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政党！

（譯自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机关刊《紅旗》第4期，1964年1月）

四九、第四国际英国支部革命工人 党(托洛茨基主义者)政治局 向亲华派呼吁

我們現在再次向一切亲华的势力和小组呼吁，吁請他們在建立革命潮流的任务中同我們一致行动，共同执行革命的反资本主义的綱領，打倒帝国主义，在英国成立工人政权。

今天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个事件都这样或那样地反映着帝国主义的崩潰和世界群众向社会主义的前进。这种向社会主义的前进并不限于殖民地革命。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兰西等国的罢工，这些国家的极度的政治不稳定，反映着欧洲无产阶级已經作好准备，开始夺取政权的斗争。在英国，工党的胜利——不管威尔逊的亲资本主义的领导——标志着高度集中的英国无产阶级正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如果认为我們还得等待几十年，群众才能作好准备，去推翻欧洲或英国的资本主义，那就是完全丧失了任何前景，根本不了解殖民地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国家内政治革命的能动的过程和相互作用。

中国的最近几个文件反映，对赫魯曉夫之流为什么能够提出各种反馬克思主义的政策、实行同帝国主义合作的路綫的分析，已經更加深刻了。这些文件說，在工人国家里有一个很大的特权阶层，其社会利益是保守的、反革命的。虽然这些文件把这个阶层籠統地叫做“新资产阶级”，这个分析是同托洛茨基多年前在《被出卖的革命》一书里所作的分析相一致的。这一分析反映，中国同志正在向着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場不断成熟起来，同时对于想把斯大林

作为“列宁主义的保卫者”保留下来的企图，却清楚地打了个大大的问号。这个阶层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是什么政策鼓励并反映这个政策的？显然，这个阶层是在苏维埃工人国家的发展时期成长起来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对这个阶层采取什么立场呢？他们是用什么手段同它斗争的？由于中国同志的最近的立场，这些问题都产生了。怪不得苏联官僚集团的“理论家”苏斯洛夫要指责中国同志实行托洛茨基主义路线。从最近的报道看来，中国同志对“和平共处”正作出更加激烈的批评，他们说，同帝国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实行和平共处的——这又是同第四国际的立场近似的。

我们所关心的，不但是要澄清世界革命过程发展的一般前景，而且要跟寻求革命纲领的一切力量共同工作。例如，必须提出配合群众行动的口号——以为在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话的基础上可以把革命政党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英国工人的活动是有力的、进攻性的。在工会领导的消极被动的态度面前，工人们通过自己的非官方的委员会，经常举行罢工，强迫资产阶级作出让步。革命形势的一切条件正在成熟中——被剥削阶级的信心、统治阶级缺乏权威和信心、小资产阶级倾向于撤回对资产阶级的战斗的支持。为了加速这个斗争，为了集中这个斗争，有必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领导，把它的政策和纲领同群众关心的日常事务联系起来，如住房问题、工厂中受雇和解雇问题、生活费用问题等等。

必须围绕着由许多要求组成的纲领把工人委员会组织起来，纲领内容先包括诸如最低基本工资、每周三十五小时工作等等经济要求，然后发展为工人管理工作节奏和工厂条件等要求，直到成立工人民兵、建立工人政权的最后前景。要这样做，需要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而抱有宗派主义的成见则将一事无成。

亲华派拒絕提出总罢工的具体前景，又不能提出明确的反资本主义綱領，这就在工人中造成混乱。他們一方面自称是革命者，另一方面又只限于說些一般化的話——如必須粉碎国家机器，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必須提出的，但是，除非工人們知道已經有了一个明确具体的綱領，它仍然不过是一个純学院式的命題。事实上，有些亲华分子倾向于爭論說，我們还得做許多年准备工作！这句话本身就表明，他們低估了在英帝国主义軟弱无能，不能滿足群众要求的时候，革命力量面前所展开的巨大前景。

在吁請那些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們进行討論和組成統一战綫的同时，我們并不隱瞞对中国人的批評，他們沒有能够給予刚果革命以充分的援助，还一味同戴高乐之流打交道，却不去呼吁世界群众，組織具有革命綱領的真正革命政党。在意大利問題上，他們执意低估欧洲无产階級的强大能动性。

拒絕同我們討論是极端宗派主义和反无产階級的。群众投工党的票，就是实行統一战綫。工人之間可以有不同意見，但是在階級敌人面前，他們却联合起来。

我們坚信，真正的革命战士会同我們結成統一战綫，就象在秘魯和別处那样。整个历史过程是不断革命的过程。尽管有些中国文件譴責了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也改变不了什么。行政措施取消不了全世界群众和革命势力結成統一战綫以打倒帝国主义和苏联反革命官僚集团的客观必要性。

我們特別呼吁就赫魯曉夫下台的意义和在英国組織革命的馬克思主义領導的必要具体步驟这两点进行討論。

1964年12月20日

（譯自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机关刊《紅旗》第16期，1965年1月）

(三)

五〇、关于錫兰背叛事件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 1964 年

7 月 5 日声明

在錫兰，就象在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样，帝国主义要保持它的控制，只能通过当地“民族”領袖的作用。在錫兰，当地的資產階級政党已經不能单独进行統治了；經濟危机和政治危机提出了工人階級同农民結成联盟以夺取政权的問題。資產階級統治目前所以还能維持，只是因为直到現在为止作为第四国际成員的工人政党錫兰平等社会党，为了約束工人階級的目的而加入了資產階級的班达拉奈克联合政府。

錫兰平等社会党的大多数成員已經完全放弃了第四国际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綱領。該党領袖已經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国际委员会譴責他們是工人階級的叛徒和敌人。国际委员会欢迎該党少数派組織新的錫兰平等社会党革命派的決定。

自从第四国际分裂，接着成立国际委员会之后，錫兰平等社会党一直追随直到最近为止由巴布洛领导的国际書記处。当国际書記处贊揚錫兰平等社会党是“全世界唯一真正的群众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云云的时候，錫兰平等社会党却在拥护第四国际的公开立場背后，不断地走上腐化墮落的机会主义和議會政治的道路。

巴布洛主义主要在于放弃建立独立的馬克思主义政党的前

景，而依靠小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者和工黨官僚分子的不可避免的“左”的發展。這就是佩雷拉和錫蘭平等社會黨領導人的“理論”和政治借口。

錫蘭平等社會黨參加聯合政府後，巴布洛修正主義者的聯合書記處開除了佩雷拉、阿尼爾·莫涅辛哈和喬爾孟迪萊·古涅瓦德尼三個部長，並且停止了投票贊成參加聯合政府的五百零四個代表的代表資格。這就是巴布洛派和其他人整整一年以前的“重新統一”在錫蘭結出來的果實。僅僅幾星期以前，巴布洛本人連同他在執行委員會里的支持者也被停止了在聯合書記處的職務。在巴布洛派第四國際所屬的歐洲各支部里，分裂正在進行；領導停止巴布洛職務的弗朗克和杰爾曼正在轉而公開採取在“左”派社會民主黨和修正主義的意大利共產黨內發展的結構改革綱領。

巴布洛及其親密黨羽正在公開投降赫魯曉夫，而弗朗克和杰爾曼則追隨着西歐社會民主黨和斯大林主義政黨的中央集權主義思潮。這兩派在修正主義方法上並無基本差別。他們都是為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不同派別的腐化的官僚主義服務的。

當巴布洛派的國際書記處同國際委員會的幾個前成員在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支持下於1963年6月組成聯合書記處的時候，國際委員會反對這一統一。我們堅持，沒有政治討論和協議的統一是不原則的，事實上只會造成日後的分裂，削弱而不是加強托洛茨基主義的運動。

不經過討論而統一的做法是巴布洛修正馬克思主義、放棄建立革命政黨的自然結果。統一剛剛一年之後錫蘭發生的背叛，加上巴布洛的停職，無可辯駁地證實了我們的立場。不同意見的討論是不許可的。對錫蘭平等社會黨或任何其他支部的批評是禁止的，理由是這會損害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統一。巴布洛主義就這

样有意识地、直接地准备了佩雷拉和平等社会党多数人的背叛。用托洛茨基主义的名义，組織了一次对工人阶级的挫败。

联合书记处在錫兰平等社会党会议上提出一个根据左派联合陣綫中共产党和人民联合陣綫所扮演的阶级合作主义角色而草拟的“中心”决议案，这样，事实上它继续为挫败工人阶级作了准备。甚至到了现在，他们还不开除德·席尔瓦和莱斯利·古涅瓦德尼的中心集团，虽然他们跟叛徒佩雷拉留在同一个党内。

錫兰平等社会党革命派已经采取第一个必要步骤，完全同机会主义者断绝了关系。它一定会找到建立革命政党的道路，把根扎在城市工人和种植园工人的斗争里，不要什么议会的荣誉，而准备以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政府。

錫兰平等社会党党员参加班达拉奈克联合政府，标志着第四国际演化中整个时代的结束。这一行动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是为挫败工人阶级而作的准备，是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的表现。要在世界各国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反对帝国主义的仆从官僚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反对他们的保卫者——篡夺托洛茨基主义和第四国际名义的修正主义者——重建第四国际的任务必须在这个坚固的基础上担负起来。

（译自1964年出版的《新闻通讯》专刊）

五一、关于尼日利亚政府 逮捕工人领袖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 1964 年
12 月 6 日 声明

1964 年，西非洲工人阶级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那是由于尼日利亚总罢工取得了成功，由于尼日利亚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开始了独立的行动。

尼日利亚工人在增加工资的要求方面迫使资本家作出了重大让步，并且又在总罢工之后挫败了一切迫害的企图，这就引起了资产阶级政府的恐惧，这个政府不过是英美投资的看家狗而已。罢工结束时，六千工人委托工会领袖们组织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于是政府就决定行动了。

他们利用在英国大学里做研究工作的维克多·艾伦博士到达尼日利亚之际，制造了一个煽动和“密谋”推翻政府的异想天开的指责，逮捕了三个著名的尼日利亚工会领袖：港口工人领袖悉迪·凯雅姆和 J.K. 阿巴姆，教师领袖 O. 艾地拜约。

审讯中，警察方面（其头子是个南非白人）提出了据说是艾伦所作的供词，作为他们起诉的主要证据。

艾伦坚持说，这个供词是对他施加非法的压力的产物，因此法官被迫驳回了这个证据。

尽管起诉的理由完全垮台，法官还是宣布四个被告有罪，判了每人一年劳役。

审讯过程中犯人交保在外，这时警察突然在夜间到他们的家里搜查，其中一次，还逮捕并殴打了从加纳来的一个英国客人琼斯先生。关于这件事，法官警告警察当局不要干涉证人。

法官的判决中甚至没有提到构成所谓煽动和密谋的具体行为。所谓“阴谋”是纯粹的捏造。

第四国际委员会谴责这样明目张胆地利用警察和法院的机构来镇压和监禁工会领袖，呼吁人们对判决提出最大的抗议。

尼日利亚政府曾经因为支持雇佣军和帝国主义者对刚果人民的“抢救”干涉而引起人们的注目。

这件事十分清楚地暴露了所有对密谋审判默不作声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面目，他们关心的是一个“独立的”非洲政府的好名声。

在英国，工党政府通过联邦国会大臣博顿莱宣称，它不打算提出抗议，因为它相信艾伦所受的审判是公正的。斯大林主义的各党都对这件事维持可耻的沉默。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这些工人阶级传统领导身上已经丧失净尽了。全世界有组织的工人、各国的青年运动和工会，必须响应我们的呼吁，对四个被监禁的人提供政治的和经济的援助。

（译自《第四国际》第1卷第3期，1964/65秋冬季合刊）

五二、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第六次 年会公报(1964年3月14—16日)

(一) 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和工党政府

不存在到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这一争论是早在四十五年前就已经解决了的。鉴于英国的主要社会民主党人很可能将在下次选举中上台执政，这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社会民主主义和议会政治采取的明确的态度。

社会主义劳工联盟领导成员克利夫·斯劳特，在开始讨论上周末在伦敦举行的联盟第六年年会的主要决议时指出了这些要点。年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包括下列要点：

工党政府很可能要在今年代替保守党人。这不是由于威尔逊和工党领导进行了强有力的竞选活动，而是由于保守党显然是一小撮大企业的保护人，不可能解决任何基本的社会经济问题，因而被选民所抛弃。保守党的危机反映着英国资本主义的深刻的问题，也部分地反映着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涨的阶级冲突。

但是工人阶级不可能利用这些矛盾来赢得社会主义，除非在同官方的工党和工会领导人的斗争中把革命的领导建立起来。工党政府的意义必须从解决这一领导危机的观点来把握，而不是从把它当作优于保守党政府的任何观点来把握。

1959年以来，大银行和垄断资本通过合并和接收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把财富和权力集中在愈来愈少的人的手里。与此同时，国

家机器愈来愈多地为資本主义的利益而出面干涉，把它的权力集中在一个单一的由大企业代表組成的高不可攀的司令部里。

在这个时候，資本家需要工党的领导人，他們不会改变这个集中的权力，而只不过为它提供一个議會政治的掩护，并且約束工人階級，以达到必要的加快生产、减低成本的目的。

要是不剝夺大企业手里的工业，威尔逊的“科学的革命”只能意味着通过自动化而造成的失业和剝削。工人們反对这一剝削的斗争将提出国有化的問題。在資本主义的框框里，布朗和威尔逊所作通过投資解决失业的諾言是完全毫无意义的。

尽管有着这一叛逆的领导，工人階級仍保持着爭取充分就业的巨大力量和战斗能力。只有社会主义的政策才能取代雇主們的种种經濟政策。

工会里必須天天进行反对伍德科克和工会官僚分子要把工会同資產階級国家一体化的計劃的斗争。这一計劃是在“工会結構”改革和“参加国家計劃”的名义下执行的。但是工人們的真正斗争能够粉碎工党和工会官僚分子的計劃。工会领导人很容易接受强加的工資冻结，但是工人們决不会接受。

工会和工党内的国有化运动必須要求立刻沒收鋼铁和公路运输企业，同时通过工人委员会准备机械、造船、軍火制造、化工、建筑、建筑用地等业的国有化。所有这一切現在都是由少数大公司所控制的。

此外，必須利用竞选运动的机会責成工党政府迅速废除移民条例、租賃条例和警察条例。

英国青年工人的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活动，是脱离社会民主党的保守主义、建立劳工运动的革命领导的真正泉源。这些青年工人在垄断資本主义之下沒有前途。避免殘酷剝削的唯一机会是

失业和应征入伍。在反对征兵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中，青年是可以被争取过来支持革命的政策。青年和一切被迫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人都得同时反对工党和工会里的一切清规戒律。

新的《新闻通讯》和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公开运动愈益为工人提供了需要的领导。我们是个进行斗争、力求去领导工人阶级的政党，并不仅仅是个宣传的党派。我们必须对官方组织内部的工作给予革命的领导，使矛盾尖锐化，展开改变政策、撤换领导人的前景，而不是仅仅站在一旁拉出批评。

所有主要企业里都必须建立国有化委员会，以便对工党政府提出明确的要求。在已经国有化了的企业里，必须争取制定对现代化、工资、工时、移交和同私营企业的关系实行工人管理的纲领。

除了这些工业方面的问题之外，还必须通过对建造房屋、学校、医院和疗养中心的明确要求，揭露工党政府。

在执行这样一个纲领时每前进一步都需要对资本实行进攻，而有关这些问题的宣传运动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国有化和国家机器性质的问题。

租户委员会以及甚至有关教育问题的工人委员会，必须调查政府的整个财政系统及其同私营企业的关系。有关房屋、教育、运输、社会福利的种种问题，在工党政府的统治下将积聚起来，因为人民希望这个政府有所改革。工党必须成为工人阶级的要求的冲击中心，每一个要求又必须同厂里工人反对老板的斗争联系起来。

这样，选举就成了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向资本进攻的战斗的开始。

工人階級必須準備應付叛賣

在介紹決議的時候，克利夫·斯勞特說，在這個國家，就象在每個別的資本主義國家里一樣，大企業都集中了大量資本。煤油、化工和鋼鐵企業正在這個國家里以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快速度成長着。但是，儘管情況如此，英國資本家還是不能在世界市場上取得一個地位。關於使英國現代化的所有最近的談論，實際上僅僅意味着資本家要想辦法擊破工人階級，減低生產成本，以謀求更多的利潤。

英國職工大會總書記喬治·伍德科克說，工資的份額必須降低，這意味着他要幫助英國老板們這樣做。還有財政大臣莫德林說要增稅兩億鎊，實質上也意味着要減低工資。

象全國經濟發展委員會和全國所得委員會這樣的組織，是以通過國家機器來約束工會為目的的。斯勞特說，現代投資的科學革新是規模十分巨大的，這就需要國家計劃、國家控制和國家對工會的 control，以防止衝突，並讓計劃得以實現。同時，工黨領導人和工會領導人同國家合作，這就使人覺得控制是並不那麼粗暴的。但是現代資本主義為了企圖壓服工人階級，將要更加官僚主義地使用國家機器。

文官、警務、外交、銀行等方面的唯我獨尊的高工資的專家會形成一個官僚機器，公眾對此既無法高攀，也不能通過議會去反對。斯勞特說，威爾遜提議佔據政府的席位，以及他所建議的任何變革必須從一個民主政府的角度來考慮。

他引證威爾遜的話說，工黨是一貫反對走革命的道路來實現社會主義的，也反對採取實業措施來實現政治目標。在體面大方的假面具的掩蓋之下，威爾遜會採取行動來擊敗工人階級，就象在

1926年的总罢工、1924年和四十年代后期的碼頭工人罢工中他們派軍隊鎮壓工人階級一樣。

社会主义劳工联盟认为，工人階級現在必須准备采取行动来反击那些打算在工党政府里出卖他們的人。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任务是动员工人階級支持革命的政治、建立革命的政党。斯劳特列举了未来工党政府政策的几个方面，然后評論說：沒有提出任何强有力的政策的前景，即使有着直截了当的合乎邏輯的理由。討論中，彼得·杰弗里斯对大会代表說，英帝国主义的最明显的弱点是完全缺乏組織的技术形式。有一个美国人最近报道了英国技术进步的无可救药的情况，这是同世界經濟发展和扩张的緩慢相一致的。

这使英国資本主义的矛盾尖銳化了。由于必須实行資本主义的技术变革，結果就会增加垄断和資本集中。在鋼铁企业和汽車制造业里早就发生了的变化，不过是可以逆料的一般情况的先兆罢了。

威尔逊会利用国家来作出这些必要的改变，以服务于资产階級。他会加速英国資本主义的发展傾向，朝着他的“科学的革命”前进。

北部的一个青年代表說，这个組織的任务是使工人階級通过斗争自觉到他們的立場。我們有責任在全国和各地揭露官僚主义的工党领导人，不仅仅要选举較左的领导人，而且要使工人階級脱离社会民主主义和修正主义。

另一个青年代表說，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成員每天都得进行反对工党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工党进行过迫害的地方，执政后，他們会利用国家机器来干。

一个伦敦代表在談到決議的某一部分時說，工党在移民条例

問題上所作的退却，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和副作用。驅逐出境会被用来作为对付战斗的工人階級的某些部分的一种威胁。

彼得·阿諾德說，威廉·卡伦爵士是把劳工运动同“科学的时代”联系起来的第一人，他表明了工会領導人的危险的官僚主义的思想。他說过，因为自动化多了，威尔士鋼铁公司的装配工就需要更多的工資。这就是說，每一千个工人多余下来，装配工的工資可以增加一个先令。阿諾德談到南威尔士青年的“慢性失业”。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必須关心这些青年，把他們同工厂里的工人联系起来，使他們站在改善条件的斗争的最前列。

一个約克郡的代表談到利用警察来对付青年。他說，統治階級正在准备一場战争，以击败青年。这是企图压制革命潜力，使它向国家屈服。他指出，我們必須在工人階級里訓練整个新的一代，把他們培养成为劳工运动的領導人，以击破这个阴谋。

(二) 工会

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工会會員必須在他們的工会里为革命的政治作斗争，否則最后就会象无数分散的工人那样接受失业、劳动的流动性、加快劳动速度和改組企业运动。里格·佩里在向大会提出关于工会工作的決議时說，今天工会面对的每一斗争都提出政权問題。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們坚持工会工作必須从建立革命政党开始。他說，要么我們为工人階級建立起革命的領導，要么垄断資本在工会和工党領導的帮助下破坏工人階級的战斗性，制造一支馴順的劳工力量。

決議证实了过去几个月里英国社会的发展。英国資本主义为了对付竞争者的挑战而作的努力，要求更广泛地利用自动化、新机

器、生产合理化、企业革新来增加工业的效率，尤其要通过国家的干涉，为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调整国民经济。

佩里說，工会领导人相信維持英国资本主义，相信卫护民族利益。他們愈来愈热中于同国家机构合作。这种工会和国家一体化、国家干涉劳资冲突，将要增加，而不是减少。

保守党遗留的問題，工党政府将有責任去解决。而且它要逆着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战斗性去解决这些問題，这是它将面对的艰巨任务。佩里指出，我們能够預見这一战斗性的发展，并且了解，保守党所造成的选举热潮不是使群众更加冷淡，而是使他們对阶级更有信心，对垄断资本的工資冻结和加速生产作出更大的抵抗。

我們已經看到对资本主义的这种反对，特别是在鋼铁业和碼頭业里。这是垄断资本始料所不及的。这是他們大大地估計錯誤了的。碼頭工人表明，他們已經从过去的經驗里吸取許多教訓，識破了工会领导人的犯罪的叛卖行为。工党政府所要对付的就是这样的碼頭工人。他們不会不經過恶战就接受碼頭老板們的計劃。我們都知道威尔逊的政策，那是同垄断资本密切配合的，不可能解决今天工人阶级的問題。

威尔逊早就表明他在鋼铁企业和建筑企业里的退却。他只談論把更大的合同給予更大的雇主，并說要考虑各种发展，让一个承包人包攬全部工作。

关于威尔逊所談論的“科学的革命”，在美国已經比在英国有了更高一个阶段的經驗。这样做的結果，自动化增加了，而失业則达到了百分之五到六的水平。佩里評論道，美国工人阶级的整整一个部分貧穷化了，他們的生活已經降低到挨餓的水平。

目前向英国碼頭提出的計劃，在美国早就实行过。美国西海岸二万六千名碼頭工人中，只有一万二千名是长期受雇的。其余一

万四千名临时登記，每星期受雇一天。

里格·佩里接着談到碼頭上的情况。几年前，当“蓝色工会”为了爭取承认而战斗的时候，許多碼頭工人被驅离了政治。“蓝色工会”被摒于职工大会之外，結果不少碼頭工人很长一个時間拒絕参加工会。这一弱点現在已經克服，情况已經扭轉。“蓝色工会”和运输工会的碼頭工人都团結起来反对运输工会的官僚分子了。佩里說，垄断資本和职工大会拚命要把工会統合到国家里去，碼頭工人是工会领导的麻煩的泉源，也是革命运动的力量源泉。

《新聞通訊》必須成为工人的組織者，使工人更加全面地了解社会和資本主义，了解国家的作用和官僚主义的真正的性质。它必須通过战术的說法，給予他們同工会领导人和老板們开始战斗的力量。

(三) 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組織

对于当前保守党政府面对的种种問題，哈罗德·威尔逊連一个社会主义的解答也作不出。右翼领导控制下的工党政府将要对千百万渴望社会主义的人民的希望起遏制的作用。

这就是社会主义劳工联盟总書記格里·希利在上周举行的联盟第六年年会上特別強調的一点。他說，这次年会上討論的問題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未来，而是英国工人階級的未来和建設第四国际的問題。

希利指出，工党沒有能力为工人階級提供领导，这就必然在工人階級运动里造成政治真空。他問，那么誰会挺身而出，提供这一领导呢？

我們要把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建設起来，作为工人階級政治独

立的表现，它将提供这一领导，勇往直前去推翻资本主义。我们活着再没有别的任务了。

希利补充说，工人阶级的政治思考和希望都集中到要有一个工党政府，这就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老年工人和二十年代末期及三十年代的工人中间，情况尤其是这样，他们都向往一个能为他们解决问题的政府。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要避免大规模的劳资斗争，因为他们毫不信任他们的工会领导人。在他们看来，一个工党政府似乎是把事情办好的最简便的方法。当工人们在工会里进行鼓动的时候，他们总是遇到这样的回答：“现在难啊。等着吧，让我们有了个工党政府再说。”这就是目前不少工人的态度。

希利强调指出，工党领导人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对于他们的反革命的作用，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成员应当绝对认识清楚。那些只知道迎合群众要求成立工党政府的感情而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是一定要遭殃的。

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并不等于跟在他们屁股后面乱跑，而是要在建立革命政党的过程中，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进行经久不息的斗争。只有为建党而战斗的人才是站在工人阶级一边的。

那些职业的混乱主义者，无论左、中、右，全部是反对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他们痛恨我们这个组织，因为它不断提出当前的重要政治问题，迫使他们无法逃避。如果联盟在某些特殊问题上跟这些“外交先生们”联合的话，那是为了在行动中揭露他们的不合适，而不是要象某些叛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所鼓吹的那样“跟他们一个模样”。

对于各种不同的势力，我们能够取得最灵活的关系，以便揭露他们，并把能够训练来在英国建立革命政党的人们争取过来支持

我們的观点。希利补充說，人們要成为革命者，那是必須加以訓練的。他說，革命是一种职业。人們参加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对于革命工作还是并不熟练的，必須把他們訓練成战士和領導人，以便为革命的党把斗争进行下去。

学习的斗争是同变革的斗争分不开的。这条經驗不是容易得来的。对于許多人來說，这是一条痛苦的經驗，因为它要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中小学所教的一切东西决裂。这是为了建立把工人階級領導到社会主义去的政党所絕對必要的。

工党政府和工会內部的危机一旦发展，《新聞通訊》的讀者將扩大四倍，格里·希利談到刊物前途时向年会指出。由于工党政府的无能所造成的思想上的“大真空”，这一讀者群是能够建立的。社会主义劳工联盟通过自己的报纸，將提出另一个領導来代替工党。这是为什么我們为这张报纸而战斗，为扩大它的銷路而战斗的原因。他說，我們认为，这是发展我們的組織的最重要之点。

从为工人階級提供領導的运动过渡到成立工人階級的拥有广大黨員的政党，是通过一张全面报道的报纸来实现的。希利說，如果劳工运动的右翼沒有一张日报，这表示，这些人是多么惊人地缺乏任何政策和綱領。一张报纸并不仅仅是个宣传問題，而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发展所必需的东西。

在未来的危机中，一张日报将更加显得必不可少。社会主义劳工联盟深信这种需要，它将从劳工运动中吸取人力物力来創辦这样一张报纸。把《新聞通訊》扩大到現在这个样子，把它办成国内技术最好的周报之一，过去就是使用了这个方法。我們應該为已經达到的技术标准感到自豪，因为这表明了我們所爭取的高标准的政治效率。希利补充說，这一成就也表明社会主义劳工联盟是認真对待自己的主张的，而且是相信这些主张的。

关于《新聞通訊》的建設問題，我們的組織并不排斥資本主义技术的創造发明。現在已經开始談判，为生产一张日报购置最好的装备。

他說，我們要訓練自己的記者，只能通过把在自己組織里工作和在資本主义报纸工作的經驗結合起来的办法。必須大量培訓这样的人材，为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日报造就广大的工作人員。

（譯自《新聞通訊》第 8 卷第 338 期，1964 年 3 月 21 日）

五三、从修正主义到机会主义

——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第六次年会 关于国际問題的決議

第四国际(巴布洛修正主义派)联合書記处发表声明,拒絕(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关于召开會議以求有原則地統一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建議,这又一次表明了巴布洛修正主义的背信弃义的欺詐本质。

我們必須得出結論:經過一年散漫的會談、躲閃和玩弄外交手法,巴布洛派的国际書記处沒有兴趣去澄清使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分裂了整整十年的政治原則和有爭論的綱領性問題。相反地,它企图粉飾严重的分歧,还打算同国际委员会里的新修正主义者結合在一起。这就結束了同国际書記处的长时期談判。这些談判的历史只能在本阶段予以总结。必須声明,在这个时期內,国际委员会始終沒有离开它的主要目的:在有原則的綱領性的協議的基础上統一第四国际。

1954年,紧接着发生分裂,巴布洛的大多数支持者清洗了他們在斯大林主义运动中的支部之后,国际委员会就采取主动,同国际書記处开始談判,以求解除圍繞着分裂而产生的混乱,同时探索有原則的統一的可能性。可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它在組織上并不属于第四国际,但在政治上一直支持第四国际的决定)却阻碍了这一企图的实现。

接着,在1957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詹姆斯·坎农,事

先沒有同国际委员会商量，就同国际书记处开始讨论，理由是政治分歧正在很快地消失，没有必要再去挖掘过去的分歧。国际委员会要批评国际书记处的理论政治论据的任何企图，都受到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澄清原则，而“团结”则变成了一系列组织上的做作。

这一行动是同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在理论上的蜕化变质相一致的，他们在1953年分裂发生时所采取的立场和观点，很多已经被放弃了，如果不是全部被放弃的话。

“团结”会谈终于垮啦，因为国际书记处甚至连坎农的委婉建议都不肯接受。他们要的是向他们的纲领和组织方法完全全无条件投降。得到这次教训之后，坎农被迫宣称：巴布洛派“……把‘国际’当作国际书记处的文字和技术工具，而国际书记处则实际上完全不受任何控制。这种想法和做法是同由许多独立自主的工人阶级政党组成的当今世界运动不相容的，事实上起着阻止这些政党发展的作用。”

1962年2月，还是由于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国际书记处的试探性的“团结”活动的结果，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向国际委员会提出下列动议：

“国际委员会主动同国际书记处接触，以建立一个小组委员会，由国际委员会和国际书记处各派三人组成。小组委员会的任务是作出安排，以便交换双方有关各支部的国际问题内部资料。

“……最后，小组委员会应就双方意见的异同范围，提出一个简要的报告。”

这一议案获得了一致通过。

可是国际书记处对于团结的态度却跟国际委员会不同，而且正相反。6月23日，国际书记处发表声明说：

“第四国际认为1953年的分裂，特别是那封号召把按照正常程序选出来的第四国际的领导置之不顾的公开信，是一个大错，这已经给世界运动造成极大的损害……”

“照我们的看法，1953—54年分裂的政治基础在于对第四国际在1950—51年所作世界形势的估计的正确性，缺乏充分的理解。”

* * *

国际委员会从来没有收回由社会主义工人党发出的公开信，也从来没有接受国际书记处于1950年所作、为分裂打下基础的那个国际形势的估计，因此国际委员会不能不把这一声明看作要我们无条件放弃由国际委员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953年成功地保卫了的立场的哀的美敦书。

在事先决定了的协议基础上进行讨论的任何企图，必然要严重危害国际合作和运动的最后统一。这一直是，现在仍然是国际委员会的意见。

尽管有这些障碍，国际委员会还是有原则地努力使讨论得以在国际委员会和国际书记处双方共同成立的同等委员会里进行。但是讨论还没有来得及开始，国际委员会就遭遇内部的分裂，而这是国际委员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所不愿的，如果不是它们所指示的话。

不等国际委员会在1963年9月开会来全面考虑讨论和统一的前景，中国、加拿大和瑞士的支部就阴谋分裂国际委员会，他们在1963年3月匆忙召开了一个残余会议，并且在巴布洛派的第七次世界大会上同国际书记处联合在一起。国际书记处轻率宣称，

分裂者代表了国际委员会的多数。这一谎言典型地说明了他们的手法，那是用来解除那些不了解争执的历史和性质的人们的武装的，也是为了在这些人们中造成混乱的。

这一卑鄙的把戏的细节，是并不那么简单的。

首先，无论加拿大支部还是中国支部，都没有就争论双方提出的任何重要文件进行辩论或作出决定。瑞士人从来没有提出过一次书面意见。至于中国人，究竟这个支部存在不存在，发挥不发挥作用，都是受到严重怀疑的问题。加拿大代表充当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傀儡，一点独立自主的作用也没有起。

其次，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破坏了民主讨论的一切规范，他们没有把四个主要政策文件中的三个文件提交一般成员讨论，就赞成了一致。最后，也是这一阴谋的最不可恕的部分，分裂者对国际委员会所属全部拉丁美洲支部的意见完全置之不理。

这些支部，包括阿根廷人、秘鲁人和智利人，曾经坚持，国际委员会会议应于1963年9月召开，以便他们能够派出代表团，而且有时间研究有关文件。智利革命工人党的声明特别明白清楚，毫不含糊。它拒绝“国际委员会中任何支部所作同巴布洛派国际书记处统一的任何单独的尝试。智利革命工人党决不让自己被想自行同国际书记处联合的任何支部拖着走，它知道，这是革命纪律的基本义务：必须首先作为一个团体在国际委员会里讨论，只有国际委员会的全体才能通过多数表决，决定在世界大会上同国际书记处团结的基础。”

我们并不隐瞒这样的事实：拉丁美洲各支部是赞成早日统一的，但是我们也不想隐瞒他们对团结的有原则的态度。

* * *

分裂者就是这样无视国际委员会的多数而去争取“团结”的。

国际书记处现在指责我们反对“早日集结各种力量”。我们已经在上文说清楚，我们反对——坚决反对那种事前没有经过彻底广泛讨论的团结。

这也是列宁在准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所采取的态度。

“《火星报》从一开始就在1900年的出版预告中说过，在实行统一以前，我们必须划清界限。……我们的行动准则正是：裁衣以前量七次。”^①

国际书记处向我们挑战，要我们确切说明对他们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那些文件的态度。好得很。在这一决议的篇幅里，不可能对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进行适当的评论，但是修正主义者可以放心，国际委员会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会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保持沉默。这里让我们简略地谈一谈大会上提出的主要问题。

在主要决议《当前世界革命的动力》的第四部分（“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里，我们读到：

“未来几年里最可能的转化是……这样的：殖民地革命将继续把一些新的国家牵涉进去，并且将加深它的社会性，更多的工人国家将要出现。这个革命不会直接引起各帝国主义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倾复，但是却会在建立新的世界革命领导方面起强大的作用，只要看卡斯特罗主义潮流的兴起，这是已经很清楚的了。”

如果这段话有任何意义的話，那么就是说，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建立马克思主义领导，须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出现卡斯特罗式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为根据。

^① 《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3、194页。
——译者

可是这些领导不但憎恨托洛茨基主义，而且利用一切机会加以镇压！

国际委员会坚决拒绝这种修正主义的幻想，如果接受这种幻想，那么第四国际将遭致几十年的停滞——几十年的沉沦。

国际书记处的这一吉诃德式的命题必然会进一步得出荒谬的结论，它的作者在谈到古巴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前景时满怀希望地认为：

“正如激进的（原文如此）美国记者 I. F. 斯通在访问古巴后所说的，那里的革命者是‘不自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当这些人和有关的潮流充分自觉时，托洛茨基主义将成为强大的潮流。”

对这种论点姑不加以着重抨击，我们只想知道所谓“充分自觉时”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充分自觉”就象卡斯特罗的胡子那样，是每个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和农民革命家的天赋才能？这里我们看到，科学的革命理论是怎样地被丢在地上用脚践踏，而粗鄙自然的“自发性”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则被抬高到了美德的地位。

谈论“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本身就是语词矛盾。就象说冷血的哺乳动物一样，这种说法使人误解现实——而且公然不顾一切分类的系统。

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分析方法，一种世界观，是唯一科学而合理的认识论。这是十分高度发展的人类自觉。它代表对不自觉的历史过程的自觉的表述。它决不可能是**不自觉的**。“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个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机械而荒谬地等同起来的经验主义的笨蛋。

讓我們不要忘記列寧的教導：

“人類的最高任務，就是把握經濟進化（社會存在的進化）這個客觀邏輯的一切主要之點，以便使自己的社會意識以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階級的意識尽可能清楚地、明確地、批判地與它相適應。”^①

在這一點上，國際書記處不是跟我們吵鬧，而是跟列寧和托洛茨基吵鬧：

“布爾什維主義的最大特點之一是它對於理論問題的嚴格認真到甚至有點好爭辯的態度。列寧的二十七卷著作將永遠是對待理論的最高度負責精神的範例，如果沒有這一根本的品質，布爾什維主義就不可能會完成它的歷史任務。”^②

列寧在另外的地方說過，沒有黨，社會主義意識是不可能發展的，黨代表着人類意識的最高形式。這句話一直被認為是革命運動的不言自明的真理。

可是國際聯合書記處的修正主義的自作聰明的笨蛋們却用本·貝拉的騙人的假藥和卡斯特羅的美麗的詞句來代替辯證唯物主義和黨——這個卡斯特羅一輩子從來沒有讀過一本托洛茨基的著作，也沒有寫過一本理論著作。

那麼第四國際的前景，如果還有的話，是什麼呢？讓我們聽修正主義者道來：

“在先進國家里，第四國際可以作出認真的貢獻來為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服務……第四國際可以幫助殖民地革命的戰士們保持真正的國際主義精神……在工人國家的先進工人、知

① 《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3頁。——譯者

② 托洛茨基：《斯大林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

識分子和青年中，第四國際可以起特殊的作用，幫助他們去發掘那四十年鬼話的殘瓦破磚……”

這就是被放在胡桃壳里的第四國際的前景。在這個說明里，運動的任務沒有超過日常事務和庸俗宣傳的水平。沒有提到黨領導群眾作鬥爭，反對失業，反對把工會并在國家機構里——也沒有提到把工人階級的青年爭取到黨的一邊來以及在黨的周圍建立廣大的青年運動。

舉例說，並沒有討論到出版一張正規的週報的問題——只是草率地提了提要維持“一個托洛茨基主義的出版物”。相反地，我們看到了“可以作出”、“可以幫助”、“可以起”等等詞句。國際書記處到底做了什麼工作，而在歐洲建立強有力的政黨呢？

什麼也沒有！

列寧把黨看作用科學的革命理論武裝起來的、有獻身精神的革命者的高度集中和有紀律的戰鬥組織，而國際書記處正是列寧的這一概念的直接相反的東西。

列寧所規定的黨設法贏得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通過先鋒隊，贏得工人階級的大多數——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只能通過宣傳、鼓動和組織來完成。只有黨的集体的、有組織的行動才能實現階級的領導。

馬克思主義是行動的哲學，是革命實踐的科學——不是對教科書的沉思默想，也不是象國際書記處所相信的“發掘殘瓦破磚”。

國際書記處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拒絕了“過渡性綱領”的根本思想，它說：

“關於在許多國家里建設革命社會主義政黨，一個尖銳的問題是缺乏在革命爆發以前去進行組織和去取得適當經驗的

時間。在几十年以前，这会意味着对革命的某种挫折。可是，由于一系列新的因素，情况就不一定这样了。苏联的榜样……还有世界資本主义的相对削弱，已經使某种情况下的革命有可能取得部分的成功……甚至能够建立起工人国家来。在这样的国家里，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面对着极端困难的問題(1)……在这种情况下，他們别无他法，只有完全地、全心全意地参加革命，就在革命的过程里把党建立起来。”

这里自然地得出两个結論：

(1) 今天不存在无产階級領導的危机；

(2) 革命不是組織起来的，不是准备好了的，而是自动发生的。因此，建党的任务是个純理論的任务——是需要的，却不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沒有党的領導，可以革命，甚至可以建立工人国家，那么为什么要在“革命过程中”建党呢？到底为什么呢？

不象国际書記处，我們建党不是为了光荣和威信，而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如果国际書記处的話是真实的，那么現在該是重新检查第四国际的全部理論的、綱領的和历史的基础的时候了。托洛茨基建立第四国际，做得对不对？他的斗争是真正必要的嗎？他的历史的預測是正确的嗎？国际書記处是否同意托洛茨基这一看法：“沒有人曾經在实践中表明，或在紙上清楚地說明过，无产階級如果沒有知道它的需要的党的政治領導，怎样能够夺取政权？”^①

清算者和修正主义者先生們，請不要支吾蒙混！我們要求直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維主义》。

截了当的答复。

我們对国际書記处的文件的批評还絕沒有完，但对目前來說，也就够了。我們将在自己方便的时候，另作詳尽的評論。

国际書記处声明中的压軸是关于把一切“以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自許”的力量团結起来的大言不慚的那种夸口。我們对这种說法的真实性提出强烈的怀疑，理由有如下述。

联合書記处及其大西洋彼岸的同盟者对于肯尼迪暗杀案的反应，已經无可怀疑地证明了这一宗派的改良主义的和市僧自由主义的性质。正如1953年斯大林的死暴露了国际書記处内部的腐化堕落，同样地，今天肯尼迪的死也使国际委员会和国际書記处内部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具体化了。当法雷尔·多布斯向世界反动派头子的寡妻发出吊唁，《战斗者》同意地引证一个资产阶级法官的話要求“全国”“放弃仇恨”（11）的时候，国际書記处的英文刊物《世界展望》正在轉載叛徒 E. 白劳德之流对死了的总统的頌贊，无耻地把肯尼迪比作林肯！

《新聞通訊》正确地、严厉地批評了多布斯这一令人作嘔的声明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下流的行为。这一攻击激怒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約瑟夫·汉森，他以权宜为理由进行辯护：

“法雷尔·多布斯同美国激进运动的其他领导人一道，說明了为什么馬克思主义运动是完全反对暗杀的。他的声明发表在《紐約时报》上。这张强大的报纸对于确定美国其他报纸的調子往往是极有分量的。多布斯还对报界发表簡短談話，向肯尼迪夫人表示他个人的同情……他的談話有助于反击恶毒的政治迫害者把馬克思主义者描繪成失去理性的人的努力。”（《世界展望》第1卷第18期）

汉森的“辯护”同多布斯的談話同样是胡說八道。如果真是象汉森所說，那么在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看来，多布斯犯了双重的罪：他不但在联邦面前丢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脸，而且拜倒在美国最“强大的”——**最反动的**——资产阶級喉舌的面前。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为了一点点体面已經出卖了他們的革命的天然权利。象国际書記处那样把这些人叫做“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是侮辱了“革命的社会主义”这一可尊敬的名字。

我們认为，我們已經十分清楚地說明，为什么国际委员会过去不参加、将来也不会参加“重新統一大会”的猜字謎游戏，为什么我們要譴責由国际委员会沒有代表性的少数成員所举行的殘余會議。最近的事件，如肯尼迪暗杀案，已經暴露了巴布洛修正主义和革命的列宁主义之間的分裂的决定性和不可挽回性。从今以后，斗争必須而且将要在一切战綫上公开进行，使国际工人阶級的先鋒队能够区别真正的馬克思主义和伪造的变种。

打倒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

(譯自《新聞通訊》第8卷第339期，1964年3月28日)

五四、树立一个领导以击败 官僚主义分子

——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第六次年会
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

我们的工会工作始终是根据革命政党的纲领进行的。今天的时代是世界革命的时代。要么是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要么是资本主义奴役工人，结果造成法西斯主义和战争。

为了赢得夺取政权的斗争，工人阶级首先得解决领导的危机，建立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工人运动中的帝国主义代理人 and 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的代理人展开斗争。因此，建立革命政党是我们在工会里进行工作的关键，就象在任何其他领域里一样。

资本主义继续存在，意味着更大的独占企业的成长，资本主义国家代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愈来愈多地干涉经济生活的管理。国家干涉以压制企业的行动，或者管理工会的活动。强制仲裁，国家计划委员会，由政府各部控制或建议而订立的长期合同，这些都只是国家干涉的一方面。与此同时，还有资产阶级国家的集权化、警察国家管理制度的发展，以及权力集中到愈来愈少的人的手里。资产阶级通过国家，把政权问题带到了每一个劳资斗争或工会斗争中。通过国家的干涉，罢工成了政治问题。

这种情况向工会提出了明确的阶级问题。资本主义权力的集中是对先进国家工人愈来愈强的战斗性的反应。这是对工人阶级

的联合行动足以瓦解和粉碎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形势的反应。一切事情都把重心集中在工人阶级领导的问题上。现代大量生产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需要顺利连续的运转和任意操纵劳动力的能力。为此，资本家需要工会完全从属于他们的国家机器。所以资本家首先依靠工党和工会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把有组织的工人束缚起来为他们服务。

另一方面，工人则需要革命的领导以推翻国家。所有关于“工会改革”的谈论目的在于官僚分子完全战胜会员，更有效地约束他们。因此，社会主义劳动联盟的成员在工会工作中，继续了共产国际最初四次代表大会（1919到1923年）的工作。他们认识到，工会的官僚阶层是一个确定的社会机构，代表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需要，从而进行战斗，以击败这一官僚阶层。而且，这件工作必须根据打基础的第四国际“过渡性纲领”（1938年）来进行，要认清，这首先是在斗争中建立一个革命政党的问题，这个政党必须能够如实地认识目前的形势——在这个形势下，每次阶级冲突都包含着政权问题。

工会在政治上决不可能是中立的。在英国，官僚阶层一心一意要把“政治问题”排斥在工会事务之外。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非要排斥不可的是革命的政治。他们愈来愈从属于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说来，这是采取了确定不移的政治方向。

作为改良主义者，他们声称，国家是独立于阶级利益之上的，它在敌对的利益之间起调节的作用。因此，当国家对工业事务的兴趣愈来愈大的时候，工会领导人就觉得必须同国家发生更密切的关系。无论社会民主党人还是斯大林主义者，他们在每个先进国家都这样做。有的用这样的理论来辩护，说什么资本主义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另一些人，如斯大林主义者，则用向社会主义和平

过渡的理論来为他們的行动辯护。改良主义現在比以前更加公开、更加直接地为資本主义服务，革命者必須对改良主义的領導进行經常不断的斗争。

因此，工会是社会主义劳工联盟成員爭取工人阶级領導权的政治战场。为了这个目的，为了击败改良主义者，領導由于今天的罢工形势而掀起的**对国家的斗争**，我們的成員必須是从**政治上組織**起来的，他們必須始終从第四国际的政治綱領出发。

选举后成立工党政府，不会改变資本主义、国家、工会領導、工人阶级以及革命政党之間的这些关系。相反，工党政府将企图在“使英国現代化”的幌子下，加速把工会归并于国家的过程。在从目前到选出工党政府这一段时期內，使我們在工会里的盟員更好地作好政治准备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就可以有意識地把握住工党政府之下有增无减的矛盾，就可以在斗争里贏得新的領導权。

我們的工会工作的基本綱領是“过渡性綱領”（《資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但是这一綱領常常受到曲解。为了沟通日常斗争和革命之間的关系，“过渡性綱領”提出一些**过渡性的要求**，如采用工資工时滑准法，工人审查公司賬务等等。

當我們說，“过渡性綱領”是我們工会工作的綱領的时候，我們并不仅仅是說我們爭取对方接受一套这样的过渡性的要求。“过渡性綱領”的实质是：这些要求是为了准备在一个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夺取政权而去爭取的。只有在这样的領導之下，过渡性的要求才会意味着工会性质的决定性的改变。

問題依然是：工会不能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工会要么繼續被改良主义的官僚阶层束縛于独占資本家的国家，要么在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領導之下动員起来。只要它們仍然是一般意义下的工

会，它們不可能是革命的，而只能是純粹防禦性的組織。工会作为工人階級的組織，唯一的前途是置于革命領導的控制之下。

托洛茨基反对那些靠攏資產階級国家而放弃工会工作的人，他說：

“革命的工会是完全可能的，这种工会不但不是帝国主义政策的股东，而且把直接推翻資本主义統治作为它們的任务。在帝国主义腐烂的时代，工会真正独立的程度只能等于它們在行动中作为无产階級革命工具的自觉程度。”

因此，我們的战略不能仅仅是在今天的工会里建立战斗小組，或者在那里占領陣地。相反地，我們要在工会里建立起工人階級所需要的全面的革命領導，就是說，我們要从建立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开始。

在每个工会里，我們必須提倡能击败改良主义官僚階层的各种政策，但是我們并不从每一特殊行业各自执行一种政策的考虑出发。不是的，我們要从这样的考虑出发：夺取权力以及建立一个能够領導夺取权力的斗争的党，是针对国家垄断資本主义而进行的一切斗争的本质。因此，工会中一切政策斗争的基础是工会独立于国家的运动和工会内部的民主运动。这两个口号最根本地表现了官僚主义领导和工人階級会员之間的对立。

上层官僚分子在工会里紧紧地掌握住工人階級的有組織的力量，他們并不仅仅依靠来源于資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其中以腐化和意識形态上的奴顏婢膝为主；极其重要的事实是：工会官僚領導依靠着由工資收入相对优厚的熟练工人組成的保守階层，这个階层就是各业的“工人貴族”。

就拿“蓝色工会”爭执中的装卸工人來說，这些“特权”工人往往喜欢保守的領導，因为他們希望保护他們的特別地位，免受雇主

和工人階級一般利益之間的衝突所引起的複雜情況的損害。

碼頭工人和礦工的鬥爭，每個歐洲國家中一致出現的機械工人、鐵路工人和運輸工人的被挫敗的戰鬥性，以及這些鬥爭之以青年工人日益增漲的反抗為背景——這一切都表明革命者有堅強的基础，可以領導反對工會領導中的保守官僚階層的鬥爭，正如“青年社會主義者”表明，反對工黨右翼的鬥爭存在着这样的基础。

通過不要失業、要國有化、要禁止加班、不要解雇、不要清規戒律等實際運動，通過動員全人口中最受壓迫的工人階級青年的鬥爭，我們開始動員階級力量來反對官僚階層。這種鬥爭是布爾什維克的建黨方法，是十分重要的。只有我們把建黨放在首要地位，工人階級才能吸取罷工和各項運動中的教訓。這些鬥爭不管怎樣英勇，甚至不管怎樣激烈，只會以損失告終，除非我們進行建黨，通過自覺的研究工人鬥爭，培養階級的未來領導——包括工會的領導在內。

當我們在工會里為普通工人的組織、為在勞資鬥爭中建立這些團體、為我們的政策而進行戰鬥的時候，我們首先必須集中注意於給普通工人委員會指出政治方向。這意味着把可能多的工人引導到反對改良主義官僚領導的鬥爭中去。這不僅是為了同最廣泛的群眾保持接觸，以解決工會里的特殊問題，而尤其是為了提供某種政治領導，以建立一支力量，去擊敗上層官僚分子。這些普通工人的團體必須在工會機構的內部展開工作，以擊敗法定的領導。它們創立的目的是為了對特殊的臨時問題進行一次“打了就跑”的攻擊，而是為了圍繞着革命的領導動員起來，對官僚領導集團進行有系統的政治戰。

我們同以“工會不談政治”為使命的工團主義者是根本不同的，工團主義者帶着這個使命，反對最主要的方針，即建立一個新

的領導，使反对工会領導中的資本主义代理人官僚分子的斗争能够繼續下去。大凡只有战斗情緒和受挫的斗争而不发展革命領導的地方，工团主义的傾向是强烈的。

我們的同志必須避免強調为战斗而战斗的冒险主义观点，避免脫离了建党方針的“行伍主义”(rank-and-file-ism)。击败右翼官僚集团是一个政治任务。只有第四国际具备完成这个任务的條件。

在这些准备的基礎上，我們就能够轉到一种新的工会工作上去，这是在共产国际早期列宁和托洛茨基所指望的工作。

贏得工会的領導权决不是以左翼被提名人去代替現任官僚分子的問題。这种做法的破产已經由电气工会的例子再好不过地說明了。由于反对工会改良主义領導的政治含意受到拒絕，选举胜利走向反面，出現了反动派在报纸和国家支持下直接控制左翼工会的局面。

(譯自《新聞通訊》第 8 卷第 340 期，1964 年 4 月 4 日)

五五、苏联的一次新危机

——英国《新聞通訊》周刊編輯部文章

不管赫魯曉夫“辞职”或“免职”的直接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一件事情是完全清楚的：以他为中心人物的苏联官僚統治是一个充滿危机的政体。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被出卖的革命》里所作的天才分析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一些时候以来，大家都知道，莫斯科上层方面发生了重大爭吵——但是直接牵涉在反赫魯曉夫斗争里的到底是什么人，却一直是个猜测的题目。

对于所牵涉的問題，并没有进行公开的或党内的討論——关于他“免职”或“辞职”的背景一直象处决貝利亚的軍事法庭秘密审讯那样曖昧不清。

苏联官僚集团由一些担惊受怕的人組成，他們一心希望逃避群众对他們的民主控制。虽然他們象賊一般地在莫斯科的黑夜里互相斗争，在维护自己的特权以压制城乡劳动人民方面，他們却是团结一致的。

让资本主义报刊去猜测那些大人物的前途吧，劳工运动則必須愈益注意向苏联工人伸出国际团结的手——因为苏联工人是最最重要的大人物。事实上，目前危机的根源在于苏联工人要求供应較多消费品以改善生活水平。宇宙飞船和“好日子在前头”的单调而空洞的諾言已經不能使他們满足了。赫魯曉夫无疑正使苏联更加紧密地靠攏资本主义的西方，以图除了进口消费品外，能够进口更多的生产工具。官僚集团的他的一翼和官僚集团中渴望資本

主义复辟的分子关系最为密切。

苏联报纸发表陶里亚蒂的最后遗嘱，显然反映官僚集团内部进行着严重的斗争。陶里亚蒂主张更加靠拢帝国主义者。毛泽东则相反，主张较强硬的路线，这主要是由于殖民地革命的压力之故。

那些推翻赫鲁晓夫的人暂时将从他那里寻求间接的支持。但是这种情形不会长久。形势的演变正在为建立一个革命的政党作好准备，这个政党就是第四国际的苏联支部。

官僚集团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苏联工人阶级愈来愈坚决地要走列宁主义的道路了。我们都知道，列宁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

（译自《新闻通讯》第8卷第366期，1964年10月17日）

五六、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 全国代表会议公报 (1964年11月28—29日)

1964年3月底举行的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全国会议决定，鉴于英国的重要政治形势和工党有可能当选执政，应于当年年底召开一次全国特别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已于11月28、29日在伦敦举行，出席的有社会主义劳动联盟各支部的代表、即将任满的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和全日工作的职业工人的代表。

会议举行前，各支部、各种集会上围绕着工党政府的任务和青年在建设革命政党中的任务两项决议进行了为时数周的讨论。

出席会议的人都参加过三月会议以来工人阶级的全部主要斗争，对于决议中包含的各个政治问题都是十分熟悉的。仅仅这一事实就给会议带来了一种为别的组织所未有过的严肃的政治空气。这些组织不但开会不作准备，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考虑在一年之内组织两次会议。只有社会主义劳工联盟，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懂得绝对必要培养自己的干部成为运动的领导人，才能够进行这样重要的工作。

几个主要报告做过之后，代表们一一发言阐述所提出的各个政治问题。英国工人运动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生气勃勃、思想丰富的讨论。有些青年代表谈到在北方工业城镇反抗种族主义的经验，成为发言的一个特色。青年代表们在发言中表明，他们是怎样在组织示威的过程中使以前沾染了种族主义的年青人和他们的移

民弟兄^①團結起來的。

會議充分了解社会主义劳动联盟对于为工党和工会内部正在发展的左翼运动提供领导的责任。社会主义劳工联盟远没有脱离工党内部的斗争，事实上它正准备在下一时期以大为增强的力量干预反对威尔逊右翼领导的战斗。

会议的宣言是一致通过的。这个宣言将在全运动内广泛传播，作为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对工党领导人面对国际银行家压力而干出来的背叛行为的答复。

代表们在讨论中都不断强调对巴布洛修正主义和所谓巴黎统一书记处所扮演的角色展开全面攻势的必要性。这一修正主义被看作国际上发展革命政党的绊脚石。

会议一致要求释放伦纳德·维克托·艾伦博士、悉迪·凯雅姆、J. K. 阿巴姆和 O. 艾地拜约。它保证在全国组织最广泛的运动，来揭露帝国主义法庭所加于这四个阶级受害者的罪名的欺詐性，在他们获释之前，决不罢休。会议对正在罗本斯岛上受苦、等待上诉反对对他们的野蛮陷害的内维尔·亚历山大博士及其同伴们，发出了革命的致敬电。与会代表保证竭尽全力募集款项资助上诉。

会议选出新的全国委员会，责成它传播一个有关国际前景的决议草案，希望这一决议草案将大大有助于在政治上澄清劳工运动面对的一些重要问题。这一决议草案将提交社会主义劳工联盟1965年全国会议讨论，然后发表，在整个国际运动中传播。

会议透露，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目前正接收空前多的青年人入盟，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的青年人申请参

^① 指美国黑人，因他们最初来自非洲，故称移民。——译者

加組織。代表們討論了一些由于盟員激增而產生的問題。會上通過了培養新幹部和對他們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的計劃。

我們的組織以過去從未有過的政治信心迎接1965年。代表們回去決心在支部內圍繞着會議的決定繼續討論，并把活躍的內部政治生活同建黨的最大限度的實際鬥爭結合起來。

（譯自《新聞通訊》第8卷第373期，1964年12月5日）

五七、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 全国代表会议宣言

〔下列宣言是1964年11月28、29日举行的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全国代表会议所一致通过的。〕

选举工党政府的是劳动人民，但是决定工党政府政策的却是银行家。选举刚刚过去六个星期，这一点已经是很清楚的了。政府已经拒绝在3月份前付给增加的养老金。政府这样做，是欧洲和美洲的冷酷的银行家所要求的。他们坚持工党政府必须放弃给予社会改革和福利的一切想法。大企业和大银行正在要求工党政府反过来加紧实行工资冻结、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

领养老金的工人、无家可归和住房拥挤的工人以及工会会员在大选中都支持工党，希望工党政府能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工党关心着”，这是他们听说的。养老金将要增加，买房子将要更加容易，穷人的负担将要减轻。

可是工党政府关心的是谁呢？

下院议员的俸给已经增加了每星期二十五镑。伦敦商业区已经得到保证，除了已经交付的各项税款，下次的公司税不会使他们再破钞什么。威尔逊先生不是要教资本家出钱，他是准备攻击工人的工资袋。

工党领导人当然关心大企业。卡拉汉先生于11月11日对银行家和股票交易所的投机家们说：

“如果你们对我们的行动有什么批评，请来告诉我们。我

們將虛心傾聽你們的意見，並將考慮是否能夠幫助你們克服困難。如果我們做不到，那決不是因為對你們有什麼偏見。”

十三年來在保守黨政府的治理下，領養老金的職工年年在飢寒交迫中過聖誕節。工黨議員年年要求提高養老金。現在，工黨執政了，領養老金的職工將要受到更大的飢寒之苦，因為物價在飛漲。他們當中死亡的將更多。

銀行利息的增加、全國保險費的提高、汽油的加價，這一切都意味着生活費用正在猛漲。老年人面對另一個冬天，他們的養老金的真正價值已經降低。工黨政府難道是關心他們的嗎？

年金部先是作了這樣不象樣的解釋，說什麼不能付給增加的年金，因為這牽涉到大量表報印制工作。但是11月26日《衛報》透露，許多討論增加年金問題的議員“都得到印象，覺得政府是聽命於正以大量借款貸與英國的金融界”。

工會會員們，青年社會主義者們，工黨的支持者們：你們選舉工黨政府該不是為了叫它執行銀行家的政策吧！

你們必須要求：“把負擔放在富人身上，不要放在領養老金的人們身上。”

威爾遜服從大企業的命令。他保證不會大規模進攻利潤。他取消了停止派遣海盜飛機去南非攻擊非洲人民的決定。他提議用二十億金鎊製造氫彈和軍備，以維持對那些為大企業和倫敦商業區生產大量利潤的殖民地勞苦人民的奴役。著名的工黨右翼議員正在公開談論實行征兵的必要性。

工黨政府將積極向工人的工資進攻。甚至那些勞動了一生的人們也要被強迫受苦，以挽救資本主義制度。整個勞工運動必須支持老年人，堅決要求威爾遜立刻批准十足增加養老金。

銀行利率增加到七厘，將意味着失業的迅速增漲。新年一過，

汽車業和其他行業將馬上解雇工人。成年工人、領养老金的退休工人和青年工人全是進攻的對象，因為工黨政府在大企業的呼嘯的皮鞭指揮之下，是百依百順的。

由於威爾遜-布朗公司的現行政策受制於大企業，他們非執行資本主義的政策不可。這意味著从一开始就向工人進攻。

造成這一危機的是大老板們和他們的保守黨傭仆。他們有什麼理由揮動皮鞭，強迫工人為一次應由上屆保守黨政府負責的經濟危機付出代價呢？為什麼工人階級要容許工黨政府被利用來為這個目的服務呢？

10月15日這一天，投票選舉工黨的幾乎有一千二百万工人。這是一支強大的力量，足以促成一次社會主義的變革。聯合起來，一致行動，勝利就會是我們的。今天不是1931年。告訴威爾遜-卡拉漢公司，我們永遠結束了麥克唐納主義。我們選舉了工黨，現在讓我們強迫他們執行有利於勞工運動的政策。

所有的工人，不論老少，必須在工廠里、工會里和各地的工黨里立刻開展這一鬥爭。

（譯自《新聞通訊》第8卷第373期，1964年12月5日）

五八、工党政府的作用

——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

全国代表会议 1964 年 11 月 28 日决议

自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开始以来，危机、战争和革命已经成为“正常”的了。全世界被杀死或饿死的工人达千百万，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把科学和技术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强大发展引导到了不正常和不正当的道路的缘故。

社会主义的全部客观必需条件都已经具备，五十年来，这一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社会政治危机给工人阶级提供了革命的机会，这个阶级在西班牙、德国、中国和许多别的国家已经多次显示了它的战斗力；然而在先进国家里，资本主义却保持着政权。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力量，而在于国际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领导所起的叛卖作用。

在英国，工党和工会的领导人始终忠于这一阶级合作的作用，1964年选出的工党政府是他们在任何阶段适应资本主义需要的一个最新的例子。这一政府是资本主义的政府。它不但不利用国家机构来反对权力日益集中在金融资本家和垄断资本家手里，而且刚刚相反，它的方针任务是利用国家机构来为此作出更有效率的安排。

帝国主义的特点

帝国主义最新阶段的全部特点都为工党政府接受了：需要对经济进行更加有效率的国家和支持；需要在国家机器中设置

更加强大的镇压机构；需要自动化，并伴之以高水平的利润积累来用于投资；需要进行生死搏斗以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尤其是由于美国的统治和西欧经济最近的迅速成长；需要在各国大力反对增加工资，以求积累足够的资本，投资于新技术和研究，这样才能在世界市场上保持竞争的能力；需要适应经济基础发达的国家内而不是落后国家内的那种高技术水平的加强投资（特别是美国资本的投资）。

在英国，这一切特点合起来产生了极端的矛盾，那是因为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和经济结构在历史上发生较早，其结果也就变得更加陈旧。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规律现在转而恶毒地针对着那些从前站在前列，现在在自动化和国际财政方面愈来愈落后于世界资本的优势部分的人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英国成了“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

进攻的纲领

英帝国主义昔日的有利条件（如帝国特惠关税、英镑平衡、各种各样的“无形输出”等等）都已经受到严重的侵蚀，或者已经停止发展了。在这一形势下，英国工业的落后状态所引起的严重的收支平衡危机向统治阶级提出了一个迫切的大问题。

他们需要长时期控制住工资和对他们的现代化计划的一切抵制；他们希望继之以对工人阶级立刻发动政治的和劳资关系的攻势，这是为了实现他们那重新进入资本主义大国集团的目标所必需的。有些大企业支持工党上台执政，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在阶级斗争的现阶段约束工人。

这种现象并不是少见的。资本主义政府，包括那些所谓社会主义的政府，曾经实行过这一类纲领，以反对工人阶级。这种政府

甚至还实行过国有化。

如果是为了通过信貨的安排，伴随着日益集中国家的压制力量和英国的进一步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以世界規模合并于帝国主义陣营，从而加强国际金融資本的控制，那么一切計劃措施、国家集中、控制工会、甚至国有化，都包含着反工人階級的性质。

在英国今天存在着的这一形勢下，任何資本主义政府，不管是不是工党政府，只有在某些基本工业需要全面控制和合理化，以服务于更有利可图的私营企业的时候，才会采取国有化的措施。即使威尔逊政府不放弃它的鋼铁企业国有化的法案，也会采取措施来同企业主全面合作，普遍給予津貼，使他們把股权移轉到更有利可图的工业方面去，同时把拥有大量机械和制鋼利益的独占資本如格斯特-基恩-內特耳福德有限公司 (Guest, Keen and Nettlefold) 无論如何留在私人手里。

威尔逊为資本主义服务

威尔逊政府所已經采取和打算采取的措施毫无疑问是一个直接为垄断資本服务的政府的措施。在政府和国家的文武机构方面，重要的永久性人員并没有更換，更說不上废除这一秘密的官僚的階級統治。所任命的顧問都是毫无疑问忠于資本主义制度的，是在平时和战时經受过彻底考驗的。

威尔逊支持对殖民地的鎮压，并不提出支持殖民地群众，就象他处在反对党地位时一样，那时他发言充分支持南非和塞浦路斯的帝国主义。

进出口問題是按照保守党的老办法处理的：进口稅将增加成千上万种商品的价格，而雇主們将因他們的出口貨而获得特別獎金。

象增加养老金这样的改革措施是一种无耻的欺騙：等到它們实行的时候，生活費用一定不可避免地上升了。在許下每年建造四十万幢房屋的諾言的同时，几种重要的建筑材料（包括进口木材）的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十五。

同时，政府在容納卡曾斯、卡斯尔、格林伍德等“左”派人士这一举动的支持下，坚持工人們必須接受工資冻结。工会领导人，以电气工会的坎农为首，对战斗性較强的积极分子进行政治迫害，以便为这些計劃鋪平道路。他們談判长期合同和“一攬子交易”，就几年內的劳动費用和“劳資关系”对雇主們作出保证。

財政大臣卡拉汉向几家中央銀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組織大量借款，企图借以減輕危机，尽管他完全知道，通过这些机构，世界金融資本必将坚持对工党政府的全部經濟和社会措施实行严密的检查。

这一切措施企图合理地控制住英国資本主义的日益成熟的危机，它們代表英国資本家的階級利益。它們只能被用来反对英国工人和全世界工人的利益。只有基本工业的社会主义国有化才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

自相矛盾的政策

但是威尔逊的政策是自相矛盾的，是不能解决危机的。进口稅已經挫敗了資本主义原来想通过欧洲自由貿易联盟和欧洲共同市場消除現代生产发展和民族国家之間的矛盾的企图。这些进口稅減輕了外来的竞争，事实上将鼓动英国实业家轉向国内市場，除非他們在出口方面能获得甚至更大的让步。

这些临时措施不可能对真正的問題有什么效果。大笔外国借款是必不可少地要实行減稅和“所得政策”(income policy)以滿足

債權人的需要，還可能要實行通貨貶值，同時還要直接壓制工人堅持提高工資、改善工作條件的要求。

改革和工人階級

修正主義者和中間派把威爾遜政府叫作“左翼社會民主主義”的，說是工人階級施加壓力的結果。他們主張支持這個政府，因為它採取了“進步的”措施。但是威爾遜政府並沒有什麼進步之處，除了這樣一件事實，那就是，它的執政為擊敗社會民主主義和用共產主義的領導來取而代之提供了一個機會。

威爾遜政府在一切重大問題上都站在僱主方面。卡曾斯跟岡特一同入閣，並不代表左派的進步，而標誌着左翼機會主義者為了為資本主義服務而跨出的最後一步，這是同謀就工黨政府的性質欺騙工人。

數百萬工人相信，工黨政府至少總能幫助他們解決幾個問題。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同這些工人並肩前進，堅持說這個政府決不會做任何這類事情，同時堅持必須揭露工黨領導的背叛作用。社會主義勞工聯盟支持選舉工黨政府，目的就在於在實踐中揭露這樣一個政府的机会主義的和反革命的性質。

除非在革命政黨的領導下採取戰鬥的階級行動，工人階級不可能贏得任何重要性的改革。在那樣的环境里，這種改革是不能維持的，除非提出導致奪取政權的過渡性要求並為之進行鬥爭。工黨政府空談“改革”，企圖通過左的詞句出賣群眾。我們認為，爭取改革的鬥爭是同爭取實現諸如把基本工業國有化之類的過渡性要求以奪取政權的鬥爭分不開的。

我們的出發點不是政府所說它願意幹什麼，而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在行動中揭露這個背叛的政府的那種力量和能力。今天我

們在行動中為工人階級的各部門的團結而戰鬥，我們提出的要求包括最小限度的（就是改良主義的）和過渡性的，借以揭露工黨領導。現在工黨已經執政，我們要加倍努力，繼續這一揭露。

兩種不同的形勢

威爾遜的措施將到處同拒絕按照雇主的要求作出“犧牲”的工人發生衝突。工人階級已經經歷了一個長時期的相對充分就業，它要求提高生活水平，這是同英國資本主義的客觀可能性完全矛盾的。

這次工黨執政，不是因為工人階級的压力能夠贏得資本主義為了保證制度繼續存在而準備給予的一些改革。那是1924年英國成立工黨政府和法國成立“左翼集團”政府時候的形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危機年代里進行的令人筋疲力竭的革命性的鬥爭失敗之後，資產階級準備通過容納工人階級政黨參加的“改革”政府來買得“一兩年”和平買賣。在一般的危機和蕭條時期內，總有相對的經濟回升，資本主義利用這一情況，讓工人階級的改良主義的代表參加了政府。

今天的形勢是十分不同的。正是因為危機深刻，所以才需要成立工黨政府。在維持資本主義的範圍內，採取任何措施都不可能不給予階級鬥爭以新的巨大的推動。

每一個主要的經濟措施會引起國民收入分配方面的極大鬥爭。使工會受國家束縛的長期計劃會使工會會員和官僚領導之間的矛盾尖銳化。加強對勞動的剝削必然會使資本家愈益同青年工人發生直接衝突，正是這些工人無論在政治上或工業上組成了今天全世界階級自覺行動的先鋒。

增加出口的唯一真正可能性在於減低生產成本，特別是減低

实际工资，而这还得在物价继续上涨的同时付诸实施。英国资本主义能不能克服目前的危机，这不光是威尔逊是否能干的问题，而是两种现实力量之间斗争的问题：一方面是工人阶级，争取建立自己的组织和领导，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利用工党政府做它的工具。

这也不是要支持威尔逊的“进步”措施的问题。那都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事实上就是背叛。说这种话的人不去进行战斗，为斗争中的工人提供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却使自己适应那种自满情绪，这种自满情绪正是威尔逊和卡曾斯希望用来解除工人阶级武装的。这是今天修正主义所起的标准作用。

他们和各种各样中间势力、“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斯大林主义者、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等结成联盟，同他们打成一片，借以掩盖和准备更大胆地出卖工人阶级；他们默认锡兰平等社会党的蜕化变质，他们为本·贝拉提供无批判的掩护，他们解释赫鲁晓夫怎样在古巴危机中“别无他法”，在英国他们站起来充当第二国际的遗老们的辩护人！

从哪里开始

这些修正主义者 of 某些工人中间存在着的所谓“给威尔逊一个机会”的危险情绪提供理论外衣。我们同这些人完全相反，必须把我们的注意愈益深入地倾注于工人阶级，特别是青年。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始终从阶级的实际需要出发，而绝不从那些最靠攏工党官方机构的人的情绪的次要特点出发。后一程序正代表中间派和机会主义者的做法。我们坚信，以这些客观需要为基础的政策将使我们能够在吸收党员和巩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工作中获得巨大的成就。

只有建立革命政党的这种力量才能使我们在危机愈益深重的

时候从工会和工党左翼方面吸引任何同盟者。这将是结成同盟进行斗争的问题，同盟的性质决定于我们自己的纲领的正确性和我们自己的干部的力量。

在一些争论中所表现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工人阶级青年对我们政策的响应，工党官僚分子所进行的政治迫害——这些条件都使我们能够从青年中建立一支相当广大的革命干部队伍，这支队伍知道必须同中间派和修正主义者进行无情斗争，在他们有机会在未来的阶级战役中把广大青年和成年工人引上歧途之前就及时粉碎他们，并在战斗中接受教育。

巴布洛修正主义

威尔逊政府的性质被巴布洛修正主义者规定为“左”翼的和“进步”的，这是国际修正主义潮流用进步的惯用词句粉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的一种做法。在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巴布洛主义者同左倾机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斯大林主义者同流合污，盛赞“结构改革”是对资本主义的进攻。事实上那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利益而破坏社会主义的做法的一部分。

这一纲领甚至被用“过渡性纲领”里的语言如“工人管理”、“打开书本”等等装扮起来，而“过渡性纲领”的本质，即建立独立的革命政党以反对一切官僚机构，却被修正得无影无踪了。比利时总罢工是这一修正主义的后果的重要例子。在英国，这一修正主义可以举所谓“深入地打进”工党的理论和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先等待中间偏左的运动出现以后再说的想法为例。这里必须再次强调指出的是：据说工人必须经历从机会主义到中间路线，从中间路线到革命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根本不存在的。

对于一个小小的革命政党来说，它的许多力量还幼小，没有得

到有經驗的国际革命者为后盾，要它从为“进步”力量提供支持的战略出发，那是政治自杀。如果我們在任何时候接受了中間派和修正主义者的战术建議，那么我們在青年运动中的追隨者早就遭致这种自杀的命运了。

这是一个发展我們自己的力量去領導那些被迫同雇主和威尔逊政府斗争的工人的問題。这就需要我們始終准备摧毁中間派。在这自觉領導成为必不可少的时期，我們决不可以叫我們的力量去适应官僚分子和中間派的心意。

青年的作用

不，我們恰恰是集中精力去扩大和加强青年运动，并且采取确切的步骤，使这支政治力量打进每个工会和每項工业里去。正是依靠这支用布尔什維主义培养起来的力量，我們將要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創造团结。

1964年初，我們在社会民主主义势力内部的斗争达到了重要的质量阶段，那时我們在青年失业問題上所作的争取“内部統一战线”的斗争进行得很順利。目光向外，依靠失业青年，加上盖茨克尔死后威尔逊領導在选举前的举棋不定，使我們得以胜利地取得这个結果，尽管敌人进行政治迫害，我們甚至把这种迫害轉化为有利条件，用以发展自己的力量。

在青年运动的斗争中，我們曾經通知右翼方面，只有社会主义的政策才是青年能够接受的。工党领导人既然准备去坐资本主义政府里的位置，就不可避免地决定放弃青年运动了。在这个时刻，我們就通过反对威尔逊、反对中間派的斗争，准备过渡到加强革命青年的工作上去，这是絕對必要的。

在威尔逊准备滿足资本主义的需要的時候，工人阶级的最迫

切的需要是把被导向社会主义政治的青年工人培养成为革命领导的基础。不做到这一点，工人阶级就不可避免地要遭致大失败。威尔逊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垄断资本一心专注于加强剥削、约束和“软化”青年，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青年工人的激进化。

威尔逊政府治下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的成熟，为打进去的战术的新阶段保证了最有利的条件，这种战术是以一支革命青年的广大的有训练的战斗队伍为基础的。

叫保守党人负担损失

威尔逊政府所采取和提議的措施，直接提出了“誰负担危机的损失？”的問題。威尔逊坚持把负担放在工人的背上，一面作出一两个小让步，企图借以掩飾真相，但是不到几个月，那些小让步又被他取消了。在这一綱領的范围内，銀行和垄断资本希望巩固它們的力量，而工会則帮助他們约束工人阶级。

以这样的青年为先鋒，我們的革命政党将圍繞着“叫保守党人负担损失！”的政策建立起来。如果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有化的綱領，就是說，征用全国所有大企业，拟訂使用全国所有资源的全国計劃，粉碎官僚的和軍事的国家机器，代之以工人會議和工人政府，那么唯一的替代办法就是只好让资本家在工人阶级的枯骨上建立起新的平衡来。

工党政府的任务恰恰是要击败工人的这一綱領。但是历史的結果一方面将决定于英国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刻严重性，另一方面决定于我們发展馬克思政党的能力。我們对待工党政府的态度完全决定于英国工人阶级出于自己的經驗而拒絕社会民主主义的需要，而要实现这种拒絕，只有靠我們在英国建設第四国际。

（譯自《新聞通訊》第8卷第373期，1964年12月5日）